

[苏]安·安·葛罗米柯 著

永志不忘

——葛罗米柯回忆录



A. F. Gromyko

永 志 不 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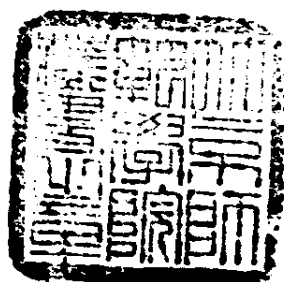
——葛罗米柯回忆录

上 卷

〔苏〕安·安·葛罗米柯 著

伊 吾 译

1232/11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77570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在人生旅途的起点上.....	7
第二章 战争风暴来临之前.....	82
第三章 在严酷的战争时期出任大使.....	114
第四章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217
第五章 旧金山：在“金门”桥畔.....	296
第六章 理智必胜.....	353
第七章 通过会见和事件看英国.....	405
第八章 在“冷战”战线上.....	452
第九章 欧洲是一座古老而又永远崭新的大厦.....	518

——作者的话——

本书的问世并不突然，很多人都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与我共事的同志、亲友和素不相识的苏联公民，甚至外国人都都提出过同样的想法。

我经常收到一些来信。在信中人们以各种方式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您的回忆录快出版了吧？”

也有些信似乎埋怨我不理睬大家想读我的回忆录的愿望。

而我呢，除了模模糊糊地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候写点类似的东西之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然而，当我目睹自己七旬的“里程碑”在眼前瞬息掠过时，我开始思考了……也许，真应该写吧？

我之所以迟疑不决，部分原因是我从小就养成一种习惯：只要动手做某件事，就一定要将它做完。

我也不想通过发表回忆录来同那些职业文学家们竞争，然而转念一想：“要知道，我见到过的，很少有人见到，我本人认识并与之谈过话的人，那些职业作家们未必对他们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我就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可能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情节，然而却都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

这样，剩下要做的就是拿起纸和笔，动手写起来罢了。

从哪里写起呢？就从我的亲人、孩提时代和初涉人世开始吧。尔后，往事就象影片般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过。困难就在于如何去粗取精，而这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然而对事实、情节、人物和事件进行的这种筛选工作逐渐地开始与其说是增加了难度，不如说是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方便。那是因为，这促使我的视野持续不断地扩大起来。

我尽量照顾今天的水平已相当高的我国广大读者。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愿为了使回忆录一味迁就通俗化而牺牲问题的实质。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曾同世界各国的几百位而不是几十位活动家打过交道。其中有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军人和学者，以及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实业界的代表。同我谈过话的，还有一些是根本不属于任何上述类别的人士。

人的性格特点、政治观点和思维方式是多么丰富多采啊！一个从事专业创作的人，当然可以运用他特有的手法对这些人、他们的内心世界、世界观和心理状态做一番更丰满的描绘。譬如，有大量极其精彩的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同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有的甚至涉及外交活动领域。

当然，本书不想对我一生中不同时期遇见过的那么众多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进行艺术描绘，然而，对于他们，我想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而首先我想写的，是那些曾经或者目前正在直接掌握本国政策的方向盘、正在制定并循着相应的方向实施这一政策的活动家。显然，这里谈的是对外政策。

总之，本书的内容首先是作者对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国务活动家所进行的会晤和会谈，以及对最重大的对外政策事件

的回忆。涉及的时间基本上是最最近的半个世纪。这样一来，本书内的人物、事件和时间就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了。

这一时期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真正是历史性的事件。这首先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使我国及其英雄的人民流芳百世。

我基本上是在围绕着苏联对外政策这个主轴在党和国家委托给我的岗位上开展活动。

对写出的东西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地方不够连贯，有的问题表达不充分。但是，要知道，回忆录——人类记忆的特性——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20世纪有一个怪现象。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原子能并进入太空，但与此同时，也使自己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本身受到了威胁。

要消除这一怪现象只有一个途径——解除人类所面临的威胁。这不仅需要新思维（关于它今天已经写得很多，谈得很多了），而且还要求将其付诸实施，使其变成各个国家，首先是核国家，最重要的是核大国的政策。

分析总的形势，这是学术著作的事。对自己的任务我看得较窄：尽可能充分地回忆起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件以及我有幸接触到的人。

在我看来，写回忆录从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由于传统习惯，多少要介绍一些自传性质的材料。但这当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去理解那些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世界命运的大量问题以及人类今天必须对付的许多迫切问题的意义。换句话说，首先是指我所经历的重要政治事件。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我经常与许多在苏维埃政权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贯彻列宁党和人民的意愿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苏维埃、党及国务活动家并肩战斗。从而反映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始终如一的、爱好和平的、捍卫人民利益的。它从不循权宜之计。

当你在同一些不太内行的人交往时，你会感到，他们常常把外交看作是这样一种渴望或者本领：用狡猾的办法胜过谈判对手；也许在某一方面得以“欺骗”对方；在某种特定场合选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字眼；由于说出一句叫人意料不到的格言而炫耀了一下或者是巧妙地引用了一段对方所不知道的话等。当然，这些观念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全权代表，特别是驻外全权代表活动的职责范围极其广泛。但首先必须具有仔细地分析、准确地表达并能用简洁的语言阐述问题的能力。

自1985年起，我开始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工作，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履行党和国家交给我的职责。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目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需要审理的问题极为广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或者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同其巩固世界和平的一贯对外政策路线有关。

到国内其他城市去旅行，使我有机会见到各行各业的人：从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到国务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这种交往使我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我国存在的问题，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认识，有助于更顺利地工作。

对党中央委员会为我提供的所有这些机会，我只能表示

衷心的感谢。

还有一点。自我开始懂事时起，我就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巨大威力。

人们正在建造一座大厦。这座大厦现在还不存在，但已经有了框架，它将被逐步地变成楼层、楼梯、走廊和房间。大厦尚未落成，但人们在施工过程中就把它称为大厦。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不是在天空中闪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星星，而是我们全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现实的创造过程。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共产党人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一支巨大的现实力量，其人数正在逐年增长。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为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为和平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贡献。

不能说我是毫不迟疑地着手写这本书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回忆录能引人入胜，那就是一本好回忆录。但如果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那为什么要把它写在纸上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艺作家的处境要简单些。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塑造那些在他看来一定能吸引广大读者的人物。他们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平庸”的人物，甚至还可能是骗子。

但所有艺术作品都应当引起读者的兴趣。在写回忆录时，作者总是从生活中选取主人公。有人会说：这要比虚构主人公简单。因而也更容易。

这是对的。但另一种看法也是对的。

无论作者多么谦虚，他自己的生活动路总是自己走出来的，

他不仅要讲述他人的行为，还得谈自己的表现。对于他来说，他所写的书就好象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他制作的，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行为举止、他们的思想、力量和弱点、世界观。它首先反映了他本人各方面的素质，包括个人素质和社会素质。

对每个回忆录的作者来说，非常困难的任务就是不能走极端。如果他想做到客观，他就无权使镜子里反映的现实歪曲变形。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把自己对人物和事件的想法及看法告诉他人，就必须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这样人们就不会指责他不客观。

作者只有采取上述公正态度，才能有把握地引导读者读完全书。

当然，作品的语言表现手法如何也起不小的作用。在这方面，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书过去和将来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所有回忆录类的作品都是如此。

《永志不忘》这本书的优缺点不该由我来加以评论，我倒不如恳切地希望读者们对它做出最后裁决。

在人生旅途的起点上

谈点历史 在贫农家里 父母及亲戚 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了…… 昔日的传说 列宁和他的助手们
恺撒占领者的暴行 “夜大学” 读书,读书,读
书…… “党活着,我们就跟随党生活” 在明斯
克学习的年代 迁往莫斯科 聆听老布尔什维克的
教导 在科学院里

人类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人们都在忙于日常事务和应付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很少有时间来回忆往事。因此,有时使人觉得,生活正在无情地把过去的和经历过的事情抹掉。但这只是感觉而已。

每当你一人独处的时候,无穷的往事便一幕一幕地在你眼前闪过。特别是人生早期的事情总是顽强地浮现在记忆中。起初,我曾经试图略过这段时期。但是记忆却不由自主地使人想起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发生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许多人在讲述自己早期生活时,总是相当重视自己的童年时代,当然是指已能清楚记事的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举例来说,即使今天,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留给我们的有关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还在使每一个读者激动不已。优秀的俄国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关于自己的孩提

时代又讲述得多么美丽动听。马克西姆·高尔基则更不待言！

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流传至今。古希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活了100多岁。直到19世纪末，也就是说，直到他的“不可分”的原子被“分裂”之前，物理和化学都采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在科学中的伟大之处。在垂暮之年，这位思想家突然把自己的视力破坏了。

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哲学家答道：

“为了看得更清楚。”

据笼罩着时代烟云的传说讲，这事大约发生在2500年以前。

卡·马克思曾将这个国家的繁荣时期称为“人类美好的童年”，它著名的儿子对自己采取了这种残酷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强调人类思维和人类记忆的威力：它能记载客观存在的现实和过去、现在及将来这几段时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记忆宝库里汲取丰富的、对他来说最深刻的关于往事的印象，以便使别人与他同享，自然，他用的是他自己特有的风格和手法使其再现。而这恰好是其价值之所在，因为这可以使他更充分地接触过去的现象、事件及事实，并更深刻地理解它们。因此，如果人类没有学会通过书籍、雕刻、绘画、建筑以及人类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一切形式将自己的经验传到后世的话，那么，今天谁也说不出来人类会是什么样的。

我想简单勾画几笔自己的早年生活。我之所以决定这样

做，是因为我后来的全部生活都受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强烈影响，那时，不论从体格上，还是从精神道德上来讲，我的个性都正在形成。

谈点历史

有时，人们问我：

“葛罗米柯这个姓是怎么来的？”

对这个问题，我几乎从来就没想过。姓就是姓。每人都有个姓，以便与他人相区别。

诚然，我们村子里有自己的识别人的办法，这就是旧俄国流行的办法。确实如此，老葛罗米柯村有100多户人家，而且几乎都姓葛罗米柯，你怎能凭姓将人区别开来呢？在邻近的新葛罗米柯村有250多户人家，也都姓葛罗米柯。大概，总共只有5户人家姓别的姓。此外，在离我们约6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波捷斯村，那儿还有200多户人家，也都姓葛罗米柯。试试看，你怎能将一户人家同另一户人家区别开来。因此，在村子里农民们都互相起绰号。

我们家族的绰号是布尔马科夫。全村的人都知道我父亲、祖父、曾祖父叫布尔马科夫。在老葛罗米柯村，当人们叫我安德烈·布尔马科夫时，我总是答应的。

我们家族世代为农，属于那种在自己小块土地上从早到晚地干活的农民。在当地教堂的名册里和当局的正式文件中，工工整整地给他们写上“葛罗米柯”这一东正教的姓。而平时在村里，他们都用自己的绰号。

葛罗米柯这个姓今天也比较常见。但是，所有姓“葛罗

米柯”的人，尽管他们住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古代的拉基米奇人^①相联系，与分布在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上游之间，在索日河流域和别斯季河畔的那些村庄、森林、草原和田野相联系。

在贫农家里

1909年，我出生在离戈麦利不远的老葛罗米柯村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里。在革命前的俄国曾有过这类居民。这就是那些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养家糊口的人。他们在城里从事工业劳动，但不是长期的，而是临时的。简而言之，我们的家业很穷，土地贫瘠。因此，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从13岁起，就和父亲一起到外面去挣钱——主要是采伐和流放木材，将其运到戈麦利的工厂企业去。

我的故乡是戈麦利。自古以来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拉基米奇斯拉夫部族从命运那儿得到了一份非常微薄的礼物，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周围的环境。

这儿的人民善良、富有同情心，但是对那些带着剑到这儿来的人却不是如此。当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我们家乡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象全国人民一样，英勇地同侵略者进行了战斗。希特勒匪帮给这块土地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共和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为纪念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牺牲的人们建立的纪念碑和他们的坟墓。

我出生并且度过童年的地方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古

^① 东斯拉夫部落之一，19世纪末归附于基辅公国。——译者

老的传统、人民的史迹和文物。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也许，就是过度谦虚了。从成年人讲的故事里，我们这些孩子们知道了真实而又神秘的过去的历史。

我和我的区中心——韦特卡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从我刚一懂事起，我就常常到那儿去。城里的居民大部分是旧教徒^①，在郊区的村子里这种旧教徒也不少。这儿的人善良、殷勤。我们村子离韦特卡城总共只有十几公里远，有时，当你出门时，途中在某一井边停下来，想要饮饮马时——瞧，主妇已从屋里跑出来，递给你水桶并关切地问道：

“您还需要什么吗？”

我们很喜欢这些人。后来，当我稍稍长大些时，才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是17世纪时为躲避尼康牧首^②和专制主义者迫害逃亡而来的人的后裔。1684年，旧教徒们建立了韦特卡镇。他们反抗的精神也传给了后代。

1735年，极其刚愎自用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③将4万名桀骜不驯的韦特卡人和邻近村镇的居民流放到俄罗斯内地，将城市本身付之一炬。但是，旧教徒的生命力很强，韦特卡城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样又复生了。

但是，1764年，沙皇讨伐者们的剑又一次落到了韦特卡人的头上。这一次是另外一个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将2万人永远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在军警押送下走了漫长的5

① 俄国17世纪教会改革中与官方正教会对立的宗教团体和派别。——译者

② 原名尼基塔·米诺夫。1652年起为俄国牧首。他实行教会改革，引起教派分裂。他以“神权高于皇权”为口实，插手国家的内外政策，结果与沙皇决裂。后被流放。——译者

③ 1730年起为俄国女皇，彼得一世的侄女。

年才到了石勒喀和谢连加。今天，在西伯利亚的这些地方还有他们的后代。现在有10万多人。

谁也不清楚，韦特卡的名称是怎么来的。一些人说，是因为这儿有一条小河，索日河的支流；另一些人则说，在索日河上有一个岛，韦特卡的名称便由此而来；还有的人认为，韦特卡是莫斯科河的一条支流，我也赞成这种说法。换句话说，旧教徒——韦特卡人也算是莫斯科人。

由于这儿聚集着一群不驯服的人，也许因此，农民战争的领袖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就在这座小城里找到了藏身之所。这是在他率领下拿起镰刀和斧头的人民群众去同专制主义搏斗的那场战争开始之前。正是在这里，在韦特卡，人们给他发了“护照”，使他顺利地绕过关卡，给他提供了一切，为了让他能顺利地通过危险的地带。就这样，叶梅利扬深入到俄国腹地，去发动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农民起来同压迫者战斗。就在这里，在韦特卡，人们称他为“彼得三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将起义镇压下去，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被处决了。富于同情心的韦特卡人在那些年里为这位“善良的农民皇帝”之死悲痛了许久。

韦特卡以自己的能工巧匠而驰名——建筑工、细木工匠、木雕技师、镀金工匠、圣像画家、冲压工。从前，人们请他们建造教堂、装饰基辅、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富豪人家的房屋。克里姆林宫兵器馆、新圣母修道院和伊韦尔斯基修道院就是他们同其他的工匠一起装修的。

韦特卡因从事罕有的在木头上刻写手稿和书籍而著称。人们在这里切磋少有的技艺——印刷书籍，在我们那里称为造书匠。不久前，在巴黎，以昂贵的售价拍卖了一本最珍贵

的书。这本书的名字为《使徒福音》^①，是俄国最早的出版商伊万·费奥多罗夫于1574年出版的。而第二本同样的书就收藏在韦特卡城的地方博物馆里，这儿的人怎能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呢！

顺便提一句，1986年8月6日早晨，当我象平日一样浏览报纸时，注意到了《苏俄报》上的一则简讯。简讯的标题叫《价值连城的发现》。据斯维尔德洛夫州报的记者报道，乌拉尔联合考古队一下子就找到了两本伊万·费奥多罗夫于1574年在利沃夫印刷的《使徒福音》，并将其送到了州中心。怎能不为苏联学者的这一成就感到高兴呢？

老实说，我这一辈子对古代的书籍、绘画以及任何同历史有关的东西都不能无动于衷。我喜欢读书，童年时代，每当我有什么弄不懂时，我就用推测方法继续进行思考。大概，故乡的整个环境直到后来都对我在精神上还有影响。

紧挨着韦特卡城就是我的老葛罗米柯村。我从小就听说，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俄国人打败了瑞典人”。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说，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都讲过，农民们在那时毫不留情地痛打了那些前来俄国进行掠夺和抢劫的“逃亡的瑞典人”。

当我已经成为大学生之后，有一次，有机会回到我们那个地区住了几天，并去过区中心科尔马。

我是经过莫吉廖夫州的斯拉夫戈罗德区到科尔马的。在从莫吉廖夫通往斯拉夫戈罗德的公路上有一个小村子叫列斯诺伊，这是一个普通的、无任何特色的村子。但是，差不多

^① 基督教礼拜用书，包括《新约》的一部分（使徒们的事迹和书信）和启示录。

300年以前，这个小村庄却一度名扬全欧洲，并在我国永垂青史。1708年9月，在这个村庄里曾进行过一场激战。俄国军队在彼得一世的宠臣缅希科夫的统帅下迎头痛击了前来增援查理十二世的瑞典后备部队，缴获了数千辆为国王军队准备的辎重车、弹药和粮食。彼得大帝将列斯诺伊村的胜利称之为“波尔塔瓦战役之母”。而20世纪的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分析18世纪初叶俄国历史事件时惊叫道：

“在赢得了列斯诺伊村的胜利后，如果输掉波尔塔瓦战役^①，将是可耻的。”

许多年过去后，我得到一本大部头的名为《北方战争》的书。它的作者就是我曾多次见过的、杰出的苏联历史学家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院士。这本书里有些话证实了我还在孩提时代听我们村里爷爷辈的人讲过的事情：那些被切断了同自己人的联系、又没有被俄国人俘虏的瑞典官兵们有一段时间在森林中游荡，并逐渐地被白俄罗斯的农民们消灭了。瑞典人一侵入俄国的国土，对他们的战争就成了人民战争，我们地区的人民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度过童年的城市戈麦利在12世纪中叶的古代编年史中首次被提到。在14世纪时，它被分离出罗斯^②并加入了立陶宛大公国，而从16世纪起，加入波兰，因为立陶宛又与波兰

① 在1700—1721年北方战争时期发生于1709年俄历6月27日的战役。彼得一世指挥的俄国军队击败了瑞典查理十二世的军队。从此俄国开始在北方战争中取得胜利。

——译者

② 古代俄罗斯之名，特指古俄的各封建国。15世纪末叶，各封建国以莫斯科大公国为首实行统一之后，始称俄罗斯。——译者

联合建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①。从1772年起，这座城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又理所当然地重新作为俄国固有的土地划入俄国版图。

在我的记忆中，戈麦利是一个大的铁路枢纽。城里还有工厂企业。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维苏威”火柴厂。我曾经幻想能到这个厂里去工作。

这座曾被法西斯分子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城市今天不仅彻底地恢复了，而且还成了白俄罗斯共和国巨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1924年以前，戈麦利城和戈麦利边区全都归属俄罗斯联邦）。1970年，戈麦利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以表彰该城劳动人民在完成发展工业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中所取得的成就。

父母及亲戚

当你提起笔开始在纸上写下对往事的回忆时，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你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哪怕这些看法是一些尚未最后定型的童稚的看法，它们更象是混乱地堆积在一起、只反映所观察到的环境和某些事件的一幅幅画面，——我能记得的是我的亲戚、亲近的人和邻居。总之，可说没有一条明确界线可以划分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更为成熟的年代。

在人的一生中，印象、事实和经验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又转变为信念，转变为系统的观点。

^① 从1569年卢布林合并到1795年的联合的波兰和立陶宛国家的正式名称。

我完全不想象文学家那样深谈这一题目。文学家不仅要描写周围的环境，而且还要描述其作品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形成过程。然而，大概每一位想回首往事的人，都会产生这么个问题。

大概是从4岁起我开始记事的。除了对家庭怀有深厚的依恋之情可说是人的天性之外，我心中萌生的第一个强烈感情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爱我出生的那幢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头。我觉得，这幢房子恐怕已有100多年了，因为看起来它已很陈旧。那幢房子有两间屋子，每间屋子里放着一张床和两三条长凳。这两间屋里住两家人，其中一家是有孩子的。我们的家产同这座房子是相称的：两家共有一头牛和一匹马。

在老葛罗米柯村旁边有一个不大的湖，是同别谢季河连接相通的。每当回忆起童年，我总会想起当年在那湖河水流中尽情游泳嬉笑，同小伙伴们一起欢快地叫喊逗趣的情景。这样的游泳嬉水（而且有时是背着大人悄悄去的），对小伙伴们来说是莫大的乐趣。

回忆当年，我不能不用最美好的语言来谈谈我的双亲——父亲和母亲。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并怀着感激之情缅怀他们。

我的父亲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是一个通常所说的有点儿文化的人，能读善写。但他仅仅念完了四年制的教会小学。

记得，我很羡慕父亲写的一手好字。我的字从一开始就写得不好。似乎努力想按老师教的那样把字母正确地书写出来，但写在纸上的字却总是歪歪扭扭。当然，我在练习格本上书写字母时，写出来的字就比较工整。然而，只要在一张

白纸上写，这些字母就开始上下乱舞，参差不齐。

还有一个方面我很佩服我父亲。他拿起一支铅笔、铺上一张白纸后，就能在纸上很快地画出人体形象、马、奶牛、绵羊等各种动物的图象。尽管这些都是用普通铅笔画下来的，但我和我的小朋友们都会着了迷似地仔细欣赏这些图画。当时，我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有油画颜料，而且还是听说的。我父亲却从未想过去搞点艺术创作。

我父亲喜欢向家里人和亲戚讲述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在满洲战场上进行的战役以及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俄德前线西南战区的战斗。他是这两次战争的参加者，因此，他讲起这些事来情况很熟悉。他在评论俄国将军们时指名道姓，话中还带些“粗鲁”的话。我记得，有一次，他说：

“我永远热爱士兵和那些同我们共挑战争重担的军官。而对俄军最高指挥人员，我们士兵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去打仗，但总是缺少武器，尤其缺少大炮。经常发现弹药供应不上。敌人的火力比我们要强好几倍，因此，俄军总是损失惨重。”

我惊讶地问道：

“父亲这些怎么都记得？”

我常常注意到，据我父亲所说，士兵们把俄日战争的失败都归罪于军队指挥人员，而不是沙皇。

“为什么呢？”我问道。

父亲想了想后，答道：

“他们不大敢直接指责沙皇。有人还常说：‘从满洲到西伯利亚近在咫尺，这里是前线，而那里就是流放地。’”

的确，他讲的这些事都是针对无能的统治者说的。

“战争初期，”父亲说，“军官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我们俄国人多，打败日本人是轻而易举、不在话下的。’而士兵们似乎是针对他们的话说道：‘是啊，我们对付日本人是轻而易举、不在话下的，但我们干吗要跑那么老远到这里来呢？’”

年轻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这些故事。

我几乎未见到过我父亲闲着不干活儿的时候。即使在讲故事时，他仍在不停地用手做些东西，刨刮木料，修理杂物，整理农民干活用的简单工具——犁、耙等等。要是这些事都做完了，而且父亲不出去打短工（通常打短工要好几个月），那他还是能找到活儿干的，如储备过冬用的木柴：在树林中捡枯树枝、掘老树根，然后用马把它们驮回家来。

尽管如此，我父亲仍不失为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他能够几个小时一声不吭地在田地里、院子里、刈草场干活，在树林中砍柴。尽管通常他周围都有人，他可能也想同他们聊聊。可他就是不喜欢这样，认为说话会妨碍劳动。我一直觉得，如果他没活干（哪怕是轻活），他就生活不下去。

但他也有健谈的时候，这或是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的时候，或是在夏天夜晚，几个男人聚集在谁家房屋旁边的场院上时。这一般都是男人之间的聊天。女人们不惜去旁听这类谈话，因为谈话中常会参杂些难以入耳的话。

在一次这种男子汉的谈话中，父亲同其他人争论起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富。大家说法不一。有一个人说，德国大概比别的国家都富，因为德国人是掠夺者，他们也掠夺了俄国。另一个说，美国最富。他们谁也没有说俄国富。有一个参加

争论的人说了这样一种看法：

“美国人有一个聪明的总统，他的名字叫西奥多·罗斯福。据说，他很会治理国家。”

我的父亲这样说道：

“美国看来是比别的国家富，因为美国人还把别人的财富攫为己有。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狡猾的总统。”

一位邻居同意这一看法。他说：

“对，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狡猾而聪明的总统。”

他们说，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从童年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关于美国有一个“聪明而又狡猾的”总统的话。

这次“场院会议”的争论（我们这群男孩都很认真地听了这场争论）快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该回家了、准备明天还要干活。

类似的“会议”在村子里常有，男人们就在这里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场所。这些国际问题“会议”在我的一生中是第一次见到。我未直接参加会议，但那里所讲的一切我都认真地听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从前线回家短期休假。那时已由伍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但我一直记着“聪明而又狡猾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1933年，我在明斯克读书。有一天父亲到森林里去拉干树枝，可却未回来。许多小时后，人们才找到了他，此时他已奄奄一息，失去知觉。由于附近没有医疗救助，他很快就死了。那年我父亲约57岁。

我的母亲，奥莉加·叶芙根尼耶夫娜，出生在相邻的热列兹尼基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她是一个心肠极好的女人，从

不说别人的坏话。母亲似乎在谁的身上都看不到什么不好的事，更重要的是她不愿意去看。

母亲只上过两三年学。她未能完成学业，因为父亲死后，她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承担了全部家务和田间的重活。但是，她还是学会了读书和写字，而且读了不少书。

我前面所说的关于父亲勤勉、热爱劳动的话完全可以适用于母亲。她是一位勤奋的女人。她不知疲倦，费了不少心血操持我们的家务和干农活，而以后又同样努力地在老葛罗米柯村农民联合组成的集体农庄中干活。

我的母亲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最温暖的回忆。从儿时起，我就感到惊奇，一个人怎么能片刻不歇地老干活。要知道，在一块不大的农田里需要种一些土豆、白菜和黄瓜，她得为这些操心，还得想着播种和栽培亚麻。亚麻在我们的家庭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否则就没有衬衣穿，没有被褥用。总之，穿的就要成问题了。要为奶牛储备饲料。在管理谷类作物，主要是黑麦方面，在这些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妇女的劳动起了很大作用。她们为此付出的劳动不亚于她们经常考虑为了节省食物、让全家吃饱的操劳。

所有这些生产上的活也落在妇女身上。可妇女在我们家只有两个。除母亲外，妹妹也干活。因为她年岁比我小，所以在我同家里失去联系去读书时，她才成为大人的帮手。

我爱读书是母亲熏陶出来的。村子里都叫她“教授”。这听起来有点儿怪，可是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常常这样称呼她：“奥莉娅阿姨是教授。”

我现在仍记得母亲说的热忱的、充满了对我关心的话：

“你喜欢读书，老师也夸你。看来，你应该读书……你

也许会有出息。”

生活证明，母亲提出的是一个好建议。父亲同意了她的想法，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我的母亲于1948年在莫斯科去世。她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去世前几个月时来到莫斯科，想治治病，但到底没能治好。而我是在她去世前两星期从美国回来。还赶上同她在医院里见一面和谈一谈。这是一次令人难过的谈话。

父亲和母亲的榜样，以及生活本身使我们，我和我的同龄人很早就参加了劳动。我在七八岁时就开始干体力活。多半是和父母一起在田间劳动。

我的父母在俄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便结婚了。父亲当时大约27岁，而母亲大约19岁。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塔季扬娜，比我早一年半出生。她大概两岁时就死了，我已记不得她了。

我们家与爷爷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爷爷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时期的同时代人。他识字。好几次吃饭前，我听到他清晰地、有点儿慢声慢气地朗读《福音书》。爷爷1927年去世，享年75岁。

对马特维爷爷来说，他的妻子，我的奶奶玛尔法是一位很好的生活伴侣。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要将善良撒向人间。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可以说，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时，有一次我就听到奶奶说了一句异乎寻常的话。我不记得，我犯了什么错误，但她却用手指头威胁我说：

“嘿！你这个民主党人！干么要调皮捣乱？”

这是革命前沙皇时期发生的事情。她听说，将“民主党人”投入监狱，流放去做苦役。于是想用这个“可怕的”词

儿来吓唬我。后来，如果什么事没按奶奶的意思去做，我就经常听到：

“嘿！你这个‘民主党人’！”

但我知道，善良的奶奶是不会生气的。因此，从童年起，“民主党人”一词对我来说永远是亲昵的，一定是同亲人联系在一起的词。

我们家，父亲两个弟弟的家和两个妹妹索菲娅和玛丽娅的家相处得很和睦，但是当开始分爷爷最后一块耕地时，这种和睦生活也就结束了。爷爷家的耕地生产的粮食本来就不总能维持到来年收获时节，现在要分为更小的家产时，就出现了摩擦，而我父亲同他弟弟伊万之间的摩擦尤为严重。他弟弟尼古拉的家早就分出去了，所以没有参加最后一次分家。

我很不喜欢发生这种摩擦。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自己人为什么要吵架，互相说难听的话。

我们的边区不富裕，人们长期贫困，用繁重的劳动挣钱过活，尽管那里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一些难处，但在我们大家庭中，亲属之间依恋之情还是牢靠稳定的。

我们对自己的村庄、亲人和熟人有一种亲切之感，他们中有些人住在邻近的村庄里。去他们那儿做客和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酒不受欢迎。我们家没有人喝酒。但一年总有两三次村里有人喝醉酒，通常是几个年轻人。谁也搞不清楚，他们是真醉还是故意取闹，想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我热爱老葛罗米柯村周围的一切——田野和森林、草地和小河。我感到，这里是最好的地方，尽管这里的人们，除

个别人外，有时甚至连土豆也吃不到冬天结束。

别谢季河令我心醉。它是一条不大的河流，只有春天才能行驶小汽船。夏季河流太浅。河岸象磁铁一样吸引着人。男孩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岸边伸着钓鱼杆，看着，是不是咬钩了？唉，可惜鱼不怎么上钩。如果能钓到五六条小鱼，就算走运的了。这时幸运的钓鱼者便会昂首阔步地走回家去，自以为几乎已经长大成人了。

男孩和女孩长到能干活时，都要在田里帮大人干活，特别是帮助干女活：收割亚麻、大麻、土豆和谷物。对少年来说，这些活并不轻松。由于饲料不足，田间役畜很少，连一般牲口也很少。

离村庄3公里远的地方是一片相当大的格腊夫森林地区，这片森林延伸到相当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完全无边无际的。当时，人们认为，森林里什么都有：有野兽，有土匪，可能还有巫师。而孩子们想象丰富，更是想入非非，甚至断定那里住着树精。

“是啊，树精不在森林里，又能在哪儿呢？”我们议论着。

夏天，当蘑菇生长季节到来时，人们无所畏惧地来到森林里。在吹牛方面，采蘑菇的人不亚于钓鱼的人和猎人。确实，猎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少见，因为搞到猎枪很困难。

冬天，大家有些怕狼。多少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都不是单独一个人去砍柴。当我同父亲去森林时，我常常清楚地想象着，为了救父亲和马，我将是怎样用斧头左右劈狼。可是，好象是故意似的，狼没有出现过。我心里对此感到庆幸，但在父亲面前，我还得装出一副英雄好汉的样子。

孩子们从小生活得很和睦，大的照顾小的，护着小的。后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或者叫互助精神一直得到发扬。这种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中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影响的结果。比如，要是发生火灾，一家农民无家可归，那么全村都会来帮助他，运来木料和其他建筑材料，帮他盖新农舍和板棚。这对儿童、少年和大人都是一个好榜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犹如晴天霹雳，传来了德国向俄国宣战的消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当然是以儿童的眼光观察和理解所发生的事件。而大人的反应特别强烈。

父亲说：

“德国人到俄国来了。他们强大而又危险，给人们带来的只有苦难。”

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还是无意识地体会到，什么是热爱自己田地和森林、自己家园、自己国家的感情。使人感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¹粉碎入侵的条顿骑士²的楚德湖激战的回声从远古时代传来。当时我在村子里弄到了一本带插图的书，里边讲述了这位大公爵俄罗斯大地的敌人浴血奋战的功勋。在人民的心中，对入侵者的仇恨并没有泯灭，对

¹ 诺夫哥罗德公（1236—1251）及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年起）（1220—1263）。由于他战胜了瑞典人（1240年涅瓦河会战）和日耳曼骑士（1242年楚德湖冰上激战），保证了罗斯西部边界的安全。——译者

² 即日耳曼骑士。——译者

自己力量的信念也没有消失。难道这不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关于保卫国家的勇士们的传说为人们永志不忘么？动员开始了。我父亲也应征入伍。对他来讲，这已是第二次战争。

亲人、朋友和邻居都为上前线的人送行。送行的人挥泪道别，当然是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然而，手风琴声这时激起的自然不是欢快情绪，而是忧郁的思绪：“亲人们从战场上能否回来？”应征入伍的人自己表现不错，甚至显示出勇敢的样子。如果泪水涌上眼眶，他们也会设法悄悄地抹掉。送行时，大人们还喝了酒。我们村里把喝酒多半看作是一种传统要求，是发生某些大事时必不可少的情景。人们认为，仿佛喝酒是理所当然的，不喝是不行的。实际上，这是克制自己悲伤的一种办法，因为这些亲人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我父亲在阿·阿·布鲁西洛夫指挥的西南战线的一支部队中服了3年兵役。在前线干了两年后，父亲被准许回家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他又返回战壕，返回到德国炮火轰击下的佩烈梅什利地区去了。

昔日的传说

城市人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农村人，特别是我这么大年龄的孩子们接触到一个什么样的迷信传说和传奇故事的世界。这些迷信传说和传奇故事好象是迷信和某种浪漫主义的融合物，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它们的起源看来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这些各具特色、引人入胜的故事通常触及人们极其敏感的心弦，如：信守诺言、仁慈博爱、光明磊落和行为高尚。

比如，大一些的孩子常说，有一种办法能使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命运。怎么才能知道呢？这非常简单。在夜间进入一个孤零零的木棚，必须是在村子外的木棚。当然，也可选择澡堂，这也可以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澡堂通常是由菜园同住房和院子分隔开来的。夜晚应是漆黑的，阴雨天则更好。

随身要带上松明和镜子或者是一小块破镜片也行。镜子安放的位置必须使人能在镜中看到进屋的那扇门，而且必须是一扇敞开着门。

然后，正好在半夜时，如果卜测自己命运的是小伙子，那门口就会出现姑娘的幻影；如果是姑娘在对镜窥测自己的命运，那就会出现小伙子的幻影。一句话，那里能够见到自己的未婚妻或者是未婚夫。

想用这种办法探索自己的命运，需要有很大的胆量和毅力。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这样做。

7岁到9岁的孩子们不会去费心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人确实见到过以及何时见到过一心向往的事物。可比我大一岁的表兄阿尔乔姆卡和我却商量好，一定要查对一下人们所说的是否确实可靠。我爷爷那儿有一座比较简陋的澡堂。于是，我俩相互说了些类似誓言的话：我们两人中无论谁呆在澡堂里，他必将是好样的，决不会可耻地逃跑。

为实施我们的“战略计划”，必须事先解决一些可以说是“司令部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我们谁去澡堂坐在镜子前，谁隐蔽在不远处的树丛中等候结果。抓阄儿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就同意采用这个办法。我抽着的阄儿是要充当勇敢

者（大概，我当时的模样会使人感到，普希金的朋友、十二月党人伊万·普辛说的话似乎也包括有我这样的人，他说：“半个俄国，听从命运的支配，走向死亡。”）阿尔乔姆卡也有点儿闷闷不乐，但他只好服从命运为他做的安排。

第二，假如澡堂里突然发生什么意外之事，如出现了妖精而不是未婚妻，那么我们应当对此有所准备。我们商定，只要阿尔乔姆卡感到情况不妙，就应当跑来救我。那好吧，可是用什么手段来进行防卫呢？要知道，我们什么武器也没有，就是家里也没有。于是决定在傍晚背着大人从农舍中偷偷拿出一根不知干什么用的铁条。这次“战役”完全成功了。

于是，阿尔乔姆卡带着这件“冷兵器”钻到了树丛中，而我就进入澡堂面对镜子坐着。松明在燃烧。当然，我们没有表，无法知道准确的时间。因此，我们说好坐的时间要长一些，为了确实保证不会在前半夜就离开澡堂。

我坐了很久。周围是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儿声响。使人觉得，这时似乎连村子里的狗也都在沉睡。当时有这样一种感觉，所有的鬼怪都在从一些隙缝里瞧着我。唯一能使我待在澡堂里的是我对表兄所做的保证。我清楚，如果我离开这个危险的岗位，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可耻行为，而这就意味着，绝对不能这样做。

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尔乔姆卡可能认为，幻影出现的时间已经过了，应该去瞧瞧朋友和弟弟怎么啦。而我手中的松明也熄灭了。我听到传来他轻声呼叫的声音：

“安德烈！你活着吗？”

我立刻小心地取下镜子，从漆黑一团的环境中走出来。我们很失望。但同时，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隐埋着另一种

感情：太好了，幸亏在澡堂中没发生倒霉的事，我总算平安地、完好无损地离开了一切妖魔鬼怪。但这一感情我没有向表哥表露出来，只是将所有感受都藏在自己心里。我们分手回家时，已是黎明了。

我们的家里都知道，我们有时相互在对方家过夜。这次以为也是这样：我家认为，我在阿尔齐姆卡家过夜，而他家想，他在我家过夜。因而，一段时期内我们保住了这个秘密，况且也没有什么可特别吹嘘的。后来父母亲知道了这事，但因我们所做的事已过去很久，我们也就未受到任何惩罚。但有时大人们会重提此事，他们并无恶意，只是为了跟我们开几句玩笑。

许多人确实相信一切超自然的现象，尽管这样做在生活中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人们为了谋生要进行繁重的劳动，而且是在收成很不好的田地里劳动。因此，这并不足为怪，他们有时想互相讲一些神秘古怪，有时甚至是逗乐开心的故事，可以说，那是为了松弛一下。

总的说来，当时农村居民的生活也离不开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但说不清楚，在这些传说中哪些成分更多一些，是对超自然事物的迷恋向往，还是对美好动人事物的虚构想象，因为小伙子和姑娘们可借此不受约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风俗。在每年的一个固定日子里，好象是在圣诞节前，在一些人家的院子里聚集着一群群姑娘。她们纷纷把她们的鞋子从门楣上扔过去，然后瞧瞧，落在地上的小鞋尖指向什么方向。按迷信说法，你要按小鞋尖指的那个方向去寻找你的未婚夫。俄罗斯古典抒情诗的奠基人、杰出诗人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好象观察到发

生在老葛罗米柯村的这一动人的情景，然后在他美妙的故事诗《斯维特兰娜》第一节中刻画了占卜姑娘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形象：

主显节一个傍晚，
姑娘们把命来算：
脱下一只小皮鞋，
将它抛向大门外……

当我学会读书后，在田间劳动的短暂间歇之时，我常常手拿一本书到田地里或到小树林里，躺在草地上幻想着。通常这都是在学校没有课的时候。我边幻想，边向自己提问题：

“星星是什么？它们为何在夜间闪烁？为什么说上帝生活在天上？谁见到过上帝？”

然后，自己回答：

“要知道，我认识的人中谁也没有见到过上帝。”

我还向玛尔法奶奶提出这个微妙的问题：

“谁见过上帝？”

她答道：

“人是见不到上帝的。”

然后，我向她提了另一个问题：

“既然谁也没有见过上帝，那怎么能谈论上帝的事呢？”

对此，她回答得很简单：

“知道得太多，就老得快。”

她这样说，就是表示，关于上帝的谈话到此为止了。

其他大人，自己家的和别人家的大人说的的大约差不多。但是，他们中年纪越轻的人，在回答孩子们的提问时态度也就越温和。而有些人却说，人不应该知道有关上帝的一切，

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我们村里有一个叫米哈伊尔·舍柳托夫的人，他是我家的近邻，他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他不论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对大人们，都相当奥妙地说：

“上帝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且许多学者不相信有上帝存在。”

米哈伊尔常喜欢坐在谁家住房旁场院上，同大人和孩子们“高谈阔论”，如谈论太阳、月亮、星星，还有海外国家。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听他讲，都知道，他尽管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但读过许多书。他经常到远方的城市去，有时受雇在哪里干活就停留在哪里，这使他开阔了视野，了解到许多有趣的事物，并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文明。

“米哈伊尔叔叔，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东西？”孩子们胆怯地问他。

“我会读书。”他爽快地回答道。

我对他极为尊敬。对我和比我大一岁的邻居瓦夏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下定决心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读遍所有图书馆的书。当然，我们未能读遍所有图书馆的书，但我们在一些我们能够去的图书馆借了不少书，并饥不择食地把它们都读完了。这些书籍并未列入学校的大纲。我记得我在小学时是这样，后来在七年制中学时也是这样。

也许，在另一种条件下长大的人很难相信，读书和同有丰富阅历的大人的谈话，对我们在儿童时期的成长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有时大人也决不会想到，孩子们从年长的人那儿听来的东西会吸收得那么快。但主要的甚至不在这里。主

要的是启发了少年的独立思考，更不要说青年了，而且是早在他们开始听教师和教授讲课之前。

大约从9岁起，我开始阅读无神论的书籍。这一内容的小册子只是在革命胜利一两年后才出现的。弄到这种书很不容易，因为它在我们村子里还没有广泛传播，大部分都到了乡图书馆。

尽管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们对无神论的概念还是有了一种最通俗易懂的了解。总的来说，我出生和生长的家庭以前是个信教家庭，但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我们这种家庭似乎也按年龄大小出现了分裂。

爷爷和奶奶毫无疑问是信教的。他们的孩子通常已不祈祷了，仅限于在坐下来吃饭之前有时画个十字。就是对这一习惯，他们也在逐渐淡漠起来。

至于我们这第三代人，几乎已经不画什么十字，只有一年一次的复活节是例外。我们喜欢在复活节这天去教堂观看祈祷，祈祷时合唱队唱得十分悦耳动听。不知是谁竟能找到那么些好嗓子的歌手啊！

孩子们愿意上教堂还因为有一件能吸引他们的事。在教堂举行圣餐仪式时，可分给大家尝一点点味美甘甜的饮料，有些象药用的卡奥尔酒^①。的确，由于瓦西里·沃尔托夫斯基神父每次只给一茶匙喝，而且还常常不满，所以孩子们把他看作是一个贪婪的人。孩子们小声嘀咕：

“吝啬的神父大概会得到小鬼的支持。”

我们村里的神父，或者象民间通常称呼他为牧师，有一

^① 甜葡萄酒，因法国城市卡奥尔得名。——译者

个家庭：妻子，两个女儿，其年龄与我们相近。我们这些孩子们聚集在教堂附近，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究竟怎么来“报答”他的吝啬行为。我们中的一个人、我的邻居伊万建议：

“我们在教堂外，正好在他走的那条路上挖一个坑，他走过去时就会掉进去。”

我不同意他的建议：

“你父母会怎么说呢？要是掉进坑里的不是他，而是牧师的妻子或甚至可能是他的女儿呢？”

看来，我没能说服他。伊万不容争辩地说：

“既然你不想干，那就别干。我自己会干的。我夜里拿把铁铲到这里来挖一个坑。”

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了。我们边走边想，伊万敢这样做吗？他会不会显示自己的胆量？

那天夜里，我几乎未能入睡。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着，翻来复去，始终在想：你看，态度坚决的伊万正在挖一个深坑，坑挖好了；你看，他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回家去了；你看，睡眼惺忪的牧师走在小路上，突然身不由己地掉进地狱里去了。

早晨，天刚亮，我就起床跑出门去，有几个和我同龄的人早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他们也说几乎彻夜未眠。

我们成群结队地奔向教堂观看“惨状”，以为神父已经在那坑里面坐着，并正在呼救。我们跑到那里，可教堂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一派和平和安宁的气氛。从昨天起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

看来，勇敢的伊万没敢惩罚神父，害怕自己的灵魂要承受这份罪孽……

列宁和他的助手们

1917年10月……革命的消息象闪电一样很快地传开了。

“工人夺取了政权，”我们村里的农民说道，“我们也应当同他们一道走，而地主现在完蛋啦。”

许多用语孩子们不理解。什么是“政权”？大人解释了。“同工人们一道走”又是什么意思？莫非马特维爷爷和在我看来体现工人形象的米哈伊尔·舍柳托夫紧拉着手，走在同一条路上？可是，什么叫“完蛋啦”，我们却很熟悉：打仗时，德国人就在不远处驻守着和来回调动，一些德国词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

从彼得堡传来消息，说“列宁和他的助手们”领导着革命。

这样，我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而且它作为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领导革命的列宁和他的助手们，使我回想起那些总是及时与敌人战斗而且必定胜利的好汉和勇士。

革命后，我们村里立刻发生了变化：区警察局长的警铃声听不见了。农民按照老传统害怕区警察局长，一直把他看作是吓人的怪物。使人们提心吊胆的警察也消失了。尽管如此，人们有时还要议论，甚至争论。

从前，农民经常感到最为可怕的还是沙皇。所以革命后，当整个生活已经改变面貌、当国家发生惊人变化时，在农民中间有时却会有人贸然说出这样的话：

“要是沙皇突然回来了，我们将会怎样呢？”

不久后，我们村的生活经历了一个复杂和艰难的时期——德国人的占领、从被占领状态中解放出来。后来，又经过不少时间，苏维埃政权才得以牢牢地巩固下来。

恺撒^①占领者的暴行

1918年初，德国军队侵占了我们西部地区，其中包括戈梅利地区。他们如同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批又一批恺撒的军队向东部挺进。在最初听到同德国打仗的消息时就已笼罩在人们心中的忐忑不安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侵略者是作为奴役者手持武器进来了。只有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才制止了他们，这是弗·伊·列宁极其英明的政治步骤。布列斯特和约虽然对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重负，但没有损害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而这也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获得了必要的和平喘息机会，以解决复杂的国内问题和创建红军。只过了8个月，德国发生的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皇帝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这是列宁立场的胜利，是列宁预见的胜利。

当经过正规步法军事操练的恺撒士兵侵入东部地区时，他们不是在行走，而简直是在阔步挺进。然而，轮到他们该向西撤退的时候，他们终于可耻地溃败逃跑了。侵略者们侵占和然后离开我们国土时，到处胡作非为。他们掠夺城市和

^① 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号。——译者

村庄，赶走牲畜，把它们装上开往德国的火车。居民的马被抢走用来驮德国士兵。我们的一个邻居仅仅因为他没有告诉占领者，他们要抓而未抓住的马属于谁，竟被占领者打得半死。总之，任何试图抗拒抢劫掠夺的人都会遭到毒打或者杀害。无论在我们村里，还是在邻近的村庄，都是如此。

他们在老葛罗米柯村挨家挨户巡视并赶走奶牛。

我现在还记得，3名武装士兵要把我们的奶牛牵出院子。我父亲、尼古拉和伊万叔叔当时在森林里，所以什么忙也帮不上。农舍里只剩下马特维爷爷是年岁最大的。他勇敢地、不顾死活地冲上去要夺回奶牛。一个士兵开始拿枪瞄准爷爷。这时，奶牛被绳子绊住了，倒在地上。一阵混乱使妇女和孩子们，其中包括我（当时我9岁）和7岁的妹妹有足够的时间拉住爷爷的双手，不让他去进行这场毫无希望的拼搏。

记得，爷爷马特维对占领者将奶牛抢走极为难过。可以说，这件事发生后，他一直坐立不安。他秉性稳重、沉着，善于恰当地控制自己。我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真正动过气，并用农民的粗话骂过人。爷爷难过地说：

“这个该死的德国人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抢走仅有的一头奶牛？连孩子们都没奶喝了。”

我们村的妇女，包括我母亲，事后还到栅栏门外去，久久地朝掠夺者离去的方向眺望，显然是希望那些人能突然回心转意，送回奶牛。可是奶牛就这样一直没有送回来。我和妹妹每天早晨本来都要去板棚喝鲜奶，但现在板棚里已荡然无存。

一天早晨，老葛罗米柯全村一片烟尘。烟尘是从30公里外一座很大的村子佩烈列夫卡随风飘来的，这个村子全部烧

光了。其他许多村庄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是占领者对游击队的活动和他们想消灭游击队的企图未能得逞而进行的报复。

当年对这些强盗和杀人凶手的愤怒和仇恨非常强烈，甚至连孩子们都学着大人的样子组织成许多小组，跑到附近的森林里去了。这一现象是自发地产生的，大人没有去组织。的确，亲人们寻找过孩子们，而找到后，甚至还惩罚了他们，但当然，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心情，只不过是轻惩处了一下。

我也参加了一个这样的小组。我们隐蔽在黑麦地里和灌木丛中。有一次，当我们正在一大片黑麦地中央时，出现了敌人的骑兵侦察班。由于我们个子毕竟都比黑麦高一些，敌人发现了我们。侦察班站住了。我们以为，我们该完蛋啦，因为我们谁也没有步枪，没有手枪，只有普通的菜刀，就连菜刀也不是人人都有。从队伍中走出来一个骑兵，骑马走到我们跟前，然后又折回去了。看来，他向军官报告了“战略”形势，之后骑兵们继续向邻近的大村庄热列兹尼基村驰去。

我们地区被敌人侵占之前，许多人为了逃避德国人，坐着马车带着家具什物路过这一地区向东驶去。这持续了几个星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其中有些人曾居住在属于波兰的领土上。这些难民们的俄语常常说得不好，但居民们能明白他们说的意思，对待他们很好。有时难民们以自己的某些家用什物换取一些食品。随着德国军队向西部撤退，难民们便开始返回故乡。

到1919年1月，戈梅利地区的德国占领者被彻底肃清了。

西方出版的有关这一时期形势的历史书籍，企图在某种

程度上掩盖恺撒的丘八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的血腥罪行。事实驳斥了对占领者罪行进行的这种“涂脂抹粉”。从罪行规模来说，如果要把他们同别人比高低，那么，他们只不过比希特勒分子略见逊色罢了。

就在那时，一个思想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巨大的灾难，进攻我们国家的德国人是敌人。他们为何要侵占我们的土地？为何要杀害俄国人？我们这些孩子们经常玩自编的游戏，我们一部分人装成侵略者，而另一部分人充当俄国人。我们的“战略家”组织“军事行动”，其结果几乎总是俄国人取胜。

这么大年龄的孩子哪个不爱玩打仗游戏？在开始之前，总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参加者都抢着当统帅。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统帅的名字，紧接着统帅的名字很快就被抢光了：

“我是苏沃洛夫！”

“我是波将金！”

“我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那我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①！”

这些英雄的对手的名字，我们并不都知道。但突然有人叫道：

“我是库图佐夫！”

于是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谁当拿破仑呢？”

谁也不愿意当拿破仑。我们从大人讲的故事和丛书中得

^① 莫斯科大公，伊凡二世之子。1380年在顿河上游的库利科沃会战中打败侵略者，表现出卓越的统帅天才，故得名顿斯科伊。在其为大公期间，确立了莫斯科在俄国的领导地位。——译者

知，拿破仑是侵略者，他烧毁了莫斯科。于是库图佐夫的名字由于简单的原因被否决了。

“没有拿破仑，你就不要当库图佐夫了。”

成吉思汗和拔都汗王¹也没有人想当。

我不知为什么脱口喊道：

“我是鲁·缅·采·夫²！”

我当时真想给土耳其人一个反击便急切地大喊一声，不让别人压倒我的声音。这个名字我谁也不让。

如果当时问我，鲁·缅·采·夫是什么人，我未必能说得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个统帅，同土耳其人打过仗。

我还是拼命使足全身力气叫喊，为了让周围的所有人都能听见：

“我是鲁——缅——采——夫！”

我喜欢这个词开头时舌头的颤动声，也喜欢整个单词的发音。它使人想起樱桃和李子快成熟的美景，它仿佛与我们房子周围的一切——花园、树叶微红的槭树、秋天紫红色的森林——都很相近。

要商定谁当敌人和敌人的指挥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少不了要争吵。但打仗游戏还是玩成了。

秋天来临了，学校开学了。冬天不是玩打仗游戏的时候。一年中，孩子们变样了，去年孩子们向往的事有点儿淡薄了，而后来就自行消失了。春天时，我们还试图用这些统帅的响

¹ 蒙古汗，成吉思汗的孙子。1236—1243年蒙古军远征东欧和中欧的首领，1243年起为金帐汗国国王。——译者

² 俄国统帅，陆军元帅。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在坑凹墓地、拉尔加河和卡古尔河等地打败土耳其人。——译者

亮名字来互相称呼，但从前的热情已经消失了。我们长大了。

我童年的苏沃洛夫们，你们在哪里？我知道，你们在艰难的岁月里都拿起了真正的武器。几乎无一人从伟大的卫国……战场上返回故乡。你们的坟墓分散在我们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也许只有在某些墓地的碑牌上才能看到你们简短的真实姓名。

在革命胜利后不久，我们地区的德国军队被赶走了，苏维埃政权机构得到巩固，此后，我们地区呈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但在森林某些地方，确实也流窜着小股盗匪集团。有时称他们为“绿色集团”，但常常是没有什么名称的。的确，他们有些人在和平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于是就干脆以抢劫为生。而居民并不总有能力来进行抵抗，因为他们没有武器。但这一现象持续的时间不长。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逐渐地完善起来，农民开始关心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对发展农业生产产生了特别的促进作用。列宁提出的上述主张发挥了很好的效果。

我回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报告人在全村大会上宣讲。他的任务不仅是宣传新政权的政策，而且还要使人们对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个了解，即使一般地了解也好。

报告人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

“马克思在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批判地采用了其他学者，其中包括黑格尔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一切好的东西，即从他那儿拿来了合理的内核，其他一切不合适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拿。”

报告人觉得一切都讲得很清楚了。做完报告后，他很感兴趣地问：

“谁有问题？都听懂了吗？”

有一位农民，他是一个活泼的人，但不太有文化，在此之前甚至没有听到过黑格尔的名字。他问道：

“可以问个问题吗？”

自然同意他提问题了。但是，他提的不是问题，倒更像是声明。该农民说：

“您刚才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只拿来了合理的粮食¹，而其他什么也没有拿。但前几天从我们这儿把粮食全部都拿走了，连种子粮都几乎没有留下。”

报告人只好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观点的区别再解释一遍。至于农民说的话，表明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在实行余粮征集制时，有时把农民留作口粮和种田的种子都当作余粮征收了。

这是实行粮食税以前的情况。以后，农民就知道了，他应该向国家交什么和交多少，自己家里留什么。这样，农民越来越相信，新政权尊重他们的利益。这定会有益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国家则扩大了向城市、工人阶级供应食品的能力。

“夜 大 学”

人的内心和道德世界是随着他所呼吸的每一口故乡的空

¹ 俄语 ЗЕРНО一词有多种含义，通常的含义是粮食或粮食作物，而报告人所指的是其特定含义——内核。——译者

气，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在童年早期是在母亲摇篮曲的歌声中，再晚些时候是在不知产生于古代何年的美丽而又可怕的童话、传说及民谣的影响下形成的。

而历史的影响，传说中介绍的那些为捍卫故土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杰出人物的事迹的影响呢？

那些直到今天仍然令考古学家伤脑筋的珍贵的古代文物（哪怕已成了一堆废墟）的影响呢？

那些碑文、古代大教堂、小教堂、隐修院、书籍和手稿，甚至那些许多世纪前曾被我们祖先的手抚摩过的、在地下埋藏了很久令人费解的古物残片的影响呢？

在接触所有这一切时，难道它不会印入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的心田，使他们永生难忘吗？

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文艺作品对永不涸竭的无价的历史宝库利用得还很不够！须知，今天仍然需要采用各种能够影响人的理智和感情的手段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爱国者。

卷帙浩繁的历史专著、描写值得永远怀念的事件的文学作品、天才的作家写的有关人民英雄的书籍将能使读者激动，唤起他们的同情与反感，丰富他们对善与恶、爱与恨、真理与谎言的概念，培养他们忠于祖国的感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我国成千上万的人正是怀着这种感情去保卫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田野和森林、自己的城市和乡村，保卫前辈们用双手建立起来的自己的家园。

爱国主义的情感确实是从生命一开始就产生的。这指的是你对诞生并说出第一句话的屋子的喜爱，对亲人和亲友的依恋，对永存于你记忆之中的故乡城市、村镇、乡村、对伴随你长大的山岗河流的忠诚。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对祖

国的爱。

今天，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我们有权把这个神圣的字眼同“苏维埃”这个词连在一起。它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有财富的忠诚。在这个社会里，它与对祖国的爱、对自由的追求、对人剥削人和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里的生活方式的鄙视密不可分。

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童年时代我所观察到的，从周围世界中所吸取的一切究竟是怎样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世界观的形成及以后的爱好呢？对此，我会这样回答：所有这一切激起你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使你想为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好事。这种感情是如此之强烈，以致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名俄国军人，正在保卫祖国，使其不受敌人的侵犯，正在同敌人——蒙古—鞑靼人、瑞典人、日本人、德国人进行战斗。

我出生并且在15岁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有许多古老的、无人能说出它们来历的土岗。甚至我和我的同学上中学后向老师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有一次，我们一帮小孩决定把老葛罗米柯村边的一个古老的土岗挖开。我们用铁锹挖了几天，把土岗挖开了一部分。可是，除了一块不大的金属，什么也没找着。那块铁可能是马具的残片。大人们谁也没有对我们这个发现感兴趣。

在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这些土岗要么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要么就是在17世纪初波兰人入侵后，即在罗斯^①的“晦暗时期”出现的，再就是在18世纪初，瑞典军队经过

^① 11—17世纪史书中指俄罗斯国家，也指俄罗斯人。——译者

戈梅利的疆土向置他们于死地的波尔塔瓦战役地带进发时产生的。也有的说这些土岗是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出现的。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实际情况如何，今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虽比前人知道得更多一些，但也并非无所不知。

土岗这个谜是使我对祖国历史发生兴趣的动因。

只有那些受过这种夜幕下的教育的人才知道它对青少年的意义有多大。好象没有一个著名的神话，没有一个有趣的笑话没有在这所“大学”中讲过。在夜里——从晚上9点或10点到早晨8点——讲故事的人可以讲上两三个小时，这样的人才是不缺的。

应当说，夜幕下的教育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授了一些知识，而且也丰富了生活常识，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向年轻人提供了信息。那些体验过夜间教育乐趣的人（这是一定意义上的乐趣，因为它也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不轻松的劳动），都因为现在这种“大学”已成为过去而感到遗憾。是的，它留下的仅仅是回忆。拖拉机、康拜因，总之，技术没有为“夜大学”留下余地。

读书，读书，读书……

是的，我过去和现在都酷爱读书。从童年时代我刚刚学会把字母拼成单词，把单词排成句子的时候起就是如此。读过的东西促使我去遐想。就这样我学会了思考。

我常常一放学就急急忙忙赶回家，一到家就拿起书，并设法找一个僻静的角落，以便没人干扰。一边读，一边琢磨刚刚知道的一切。然后继续往下读，再面对着敞开的书本，

对每一行字进行思考。

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偶然所得的，没有任何系统性。所有的书我都读。但是，我努力对刚刚从书上学来的东西进行思索。

有一次在朋友的协助下，我搞到了一本《美丽如画的天文学》。这是革命前的版本。文中经常出现古字母。封面上写着作者的姓名：卡米尔·弗拉马里翁^①。如果有人对这位法国天文学家说，在俄罗斯中部的一个乡村里，有个中学生正在刻苦攻读他的天文学著作，就好象将面临天文学考试一样，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不知怎的，我一生都记得那本书的第一幅插图和图下的一句清清楚楚的题词：“我们的地球插着时间的翅膀，正在向无人知晓的目的地飞翔……”

65年后，弗·伊·列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回答我的查询时问道：

“您要弗拉马里翁书的哪一个版本？”

我答道：

“就是在第一幅插图下面有这样一句题词的那个版本。”

我把这句题词说了出来。他们找到了它。记忆没有骗人。全都对。

众所周知，这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是雅各宾派^②。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也把他卷了进去。但在罗伯斯庇尔^③的

① 法国天文学家。写有许多科普名著。——译者

②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组织。——译者

③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实际首脑。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时被捕，次日被处死。——译者

头颅从巴黎热月党人¹的断头台上掉下来之后，弗拉马里翁不得不移居国外。

这位法国人的名字迄今仍未被人忘却，已经名垂青史。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争取社会正义的战士。当然，这是当时法国革命活动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正义”。

我还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动物、家畜和野兽？什么是鸟？所有这一切从何而来？”

那时，我尚未听说过达尔文这个人。有关著作当时还未碰到过。

每当听说某个有趣的书名，我就准备跑远路去买：无论是相距 30 公里还是 40 公里——我从不在乎。结果总能带着“猎物”归来。我也到邻近的村、镇和乡中心去弄书。在乡中心有一个我当时觉得非常大的图书馆。有一次我就是在那里找到一本德国科学家——自然科学研究者威廉·伯尔舍²的著作。书名叫《大自然中的爱》。我心想：“嘿，这下可有的读了。大自然中的爱——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又一头钻进了这本书，有些东西弄清楚了。但许多问题仍不明白。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写了这部宏篇巨著，详细地描述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各种自然现象。令人惊叹的是，在叙述某个独特现象时，所列事实严谨、系统，并附有大量插图，特别是关于动物界的插图。

除了无神论和自然科学书籍外，我还设法找些俄罗斯历

¹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新历共和2年热月9日政变（热月政变）的参加者。——译者

² 德国达尔文的传播者，有很多科普著作。——译者

史书来读，关于我们祖先以及革命者，其中包括民粹派^①的生平业绩的书籍。有关薇·扎苏利奇^②、斯·哈尔图林^③以及施吕瑟尔堡要塞^④的囚犯尼·莫罗佐夫^⑤（后来我在莫斯科见到过他）的故事特别使我着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读完了捷依奇^⑥、斯特凡诺维奇^⑦和博哈诺夫斯基是怎样从沙皇监狱里逃出来的小册子^⑧。

最难弄到的是通史方面的书籍。在我能看懂的书中，米·尼·波克罗夫斯基^⑨的著作我读得尤其认真。看来，这是因为我第一次得到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书，尽管，众所周知，该书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远不是无可争议的。

就这样，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我又迷上了关于游记、地理发现之类的书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关于詹姆斯·库克^⑩

① 指1861—1896年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时期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译者

② 俄国女革命家，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译者

③ 俄国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880年2月在冬宫制造爆炸事件，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译者

④ 位于苏奥列霍维岛上。18世纪初为政治犯监狱，狱规极其严酷。现已被辟为博物馆。——译者

⑤ 革命民粹派分子、学者、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32）参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译者

⑥ 民粹派分子，1884—1901年在喀拉服苦役时逃跑。——译者

⑦ 民粹派分子，1883年被判处8年苦役，在喀拉服役刑。——译者

⑧ 1986年这本小册子被国立公共历史图书馆的普通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一边回忆着少年时代，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封面：“米·弗·弗罗连科《捷依奇、斯特凡诺维奇和博哈诺夫斯基的出逃》，莫斯科，1924年，全苏前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出版社”

——作者

⑨ 苏联历史学家，党和国务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译者

⑩ 英国航海家。领导过三次环球考察。——译者

航海的故事怎样令我心醉神迷。

有好几年，包括在中学学习的最初几年，我简直是在“啃”书。当时还没确定，将来到底选择什么专业。譬如，有一段时间我对几何和三角很有好感。最令我激动的问题是，人们怎么会猜到在数学，特别是在上面列举的几何和三角领域里存在着严格的定律。例如，有这样一个并不很复杂的数学定律： $勾^2 + 股^2 = 弦^2$ 。这条定律正确与否甚至可以通过实验和测量的方法加以证明。可那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我对这一切是那么入迷，以致于暑假里我跑进森林里，测量树与树的间距，不是爬上树而是通过运用并检验某些几何和三角定理量出树的高度，我知道这些定理早就确立了，但仍想亲自试一试，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而且这给了我莫大的乐趣。尽管如此，我对数学的兴趣逐渐开始减退了，而对人文科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虽然，对我的老朋友——几何和三角我也多次复习过，甚至在休息时也没有忘记。

在沉湎于历史、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书籍时，我也不时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读了这些书，欣赏它们，可是它们也是人写的啊！对，这一定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大概一生下来就是天才，要不然能学会写书吗？我这样想着，自己也开始背诵亚·谢·普希金的作品，或者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或者伊·谢·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一些东西。我可以整页整段地引证他们的话。一般说，背书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古典作家的一些名句常常使我的内心激动不已。我读过不少他们的作品，而且往往是读上好几遍。有时候，当我听到有人朗诵普希金的作品：《我是在给你写信——够了……》^①这一句时，我已经在等着听是不是还要讲下去。每当我听到以俄罗斯诗人的诗为歌词的歌曲时也产生过这种情况。那些精炼准确的语言、诗的音乐以及歌曲本身都紧扣我的心弦！

果戈理的作品我起初是从老年人的讲述中知道的。他的《魔地》和《狄康卡近乡夜话》^②中的其他几个中篇充满了浪漫主义和抒情色彩，即使在口头转述时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同时又美妙动听。后来我读了这本书，我象着魔似地沉醉在那白色的小屋、快乐的长头发哥萨克和爱争吵的酒店老板娘的世界中，为果戈理精确、幽默的语言所陶醉。其人民性和真实性给人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致于你首先感到的不是惧怕，而是非常希望果戈理笔下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苦难和恶作剧，直至他那些骑着扫帚上天和驾着魔鬼去彼得堡的主人公^③，都是确有其事。

过了不久，我搞到了瓦·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奥德赛》

① 这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达吉亚娜给男主人公奥涅金的情书中的第一句话。该译文引自中译本《欧根·奥涅金》第98页，查良铮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

② 这是果戈理的第一部小说集。题材大都取之俄罗斯民间传说，充满着说神道怪的怪异色彩，语言优美，抒情性强。——译者

③ 这是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部《圣诞节前夜》中的两个情节。骑着扫帚上天的是妖精莎洛哈，她上天是搜集星星的；驾着魔鬼上彼得堡的是莎洛哈的儿子、铁匠伐库拉，他上彼得堡是为他的未婚妻向女皇索要一双女皇自己穿的最贵重的镶金鞋。——译者

和尼·格涅季奇翻译的《伊利亚特》。我知道瓦·亚·茹科夫斯基是个诗人，当我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个翻译家时感到很惊讶。

根据远古的故事和神话编织起来的有众多英雄人物的特洛伊史诗特别受人们喜爱。不管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对这部史诗的细节有多少争论，这位天才的亚加亚人^①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褪色，反而比过去更加光彩夺目。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者的渊博学识也令人赞叹。诗人的天赋使他能以生辉的妙笔把这一事件传颂到我们这一代，今天读来还是那么有立体感，那么精确。

荷马作品中所描写的是真实事件还是诗人无限想象力的产物，这并不重要，所有这些作品都在丰富我们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宝库。

关于史诗中的人物同样也可以这么说，普里阿摩斯^②和墨涅拉俄斯^③、阿喀琉斯^④和赫克托耳^⑤、阿加门农^⑥和帕里斯^⑦、奥德修斯^⑧和佩涅洛佩^⑨、海伦^⑩和卡珊德拉^⑪、以及其他许多人物，他们是现实的历史人物抑或也是作者的虚构，这一点并没有多大意义。

仅仅一个《特洛伊木马》^⑫的故事就有多么大的价值啊！如果远古时代没有赠给我们这一文学瑰宝，那么今天不仅是

① 古希腊四种主要居民之一。参加了特洛伊战争。这里系指《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作者荷马。——译者

② 特洛伊的最后一个皇帝。——译者

③—⑪ 均为特洛伊史诗中的人物。——译者

⑫ 希腊传说中的一匹大木马，内藏有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军人。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内后，夜间藏在木马里的希腊军人走出来，把希腊人放进城门，城遂陷。

——译者

艺术语言，就连人的思想本身也会贫乏得多。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的文献。人们从中知道古代祖先的生活，他们的精神财富。他们对善与恶、爱与憎、责任感和狡诈行为的基本观念，他们的哲学观。

人类与诗人这座宝库里的许多财富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在我们的时代很难找到一个有教养的人，或者就是个有文化的人没有听说过荷马及其作品。艺术，特别是绘画和戏剧，如果没感受到流传了几千年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嘹亮的歌声的影响，简直是不可想象。

我并不认为古希腊的六音步长短格诗很容易读。尽管这些史诗都是杰出的诗人、翻译家翻译的，无论是诗句还是文体对我来说自然还是非常吃力的。但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这样的人物特别使人倾倒。我不由地把他们同我已经从书中知道的俄罗斯壮士歌中那些勇士进行比较。

后来我又阅读了约·伏·歌德^①的《浮士德》。老实说，起初它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它似乎复杂而又怪诞。我觉得奇怪的是，在书中被作为主要角色刻画的竟然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只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浮士德博士^②，尤其是梅菲斯托费尔^③在我面前才成了另一个样子。

我就是这样地读书。有一次，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浮士德》是其代表作。——译者

② 德国民间传说和世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人类探索知识的象征。原型是约翰·浮士德博士（1480—1540），一个四海漂泊的星相家。——译者

③ 欧洲民间故事中的恶魔形象。在《浮士德》中，他是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

——译者

弄一本象“相册”似的本子，自己来试一试写点儿东西呢？为什么不写写诗呢？”

想着想着，就开始干了。很快就写了几十首诗，尽量注意押韵。但对他人绝对保密。不过，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些怀疑。最后到底怀疑心被战胜了。我在暗地里偷偷写的东西，也在暗地里偷偷地烧掉了。我这样做对家里任何人什么也没说。我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安慰自己说：“要知道，就连果戈理也把《死魂灵》第二部烧掉了，因为他不喜欢它。他还是个大作家呢，而不是个无人知晓的孩子。”

这个秘密我是首次在书中披露。

有时，我头脑里也冒出这样的想法：“我行为正常吗？为什么有时我总想一个人呆着，而且一般都是在思考某一本书？”

这种爱独自沉思的习惯渐渐地开始同更为积极的，甚至是强有力的行动结合起来。我很想同朋友们一道为人们做点儿事，同那些按知识水平能够这样做并与我同龄的人一起去做。我结交了一些同样渴望获得知识的朋友。当然，也有些人不太喜欢读书和思考读过的东西，他们认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工作技能已经足够应付将来的生活了。

然而，学习和社会工作毕竟使我们的精力得到了发挥，青年人开始发现自“我”。每个人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没有一天我们不“到民间去”（当时我们把完成某种社会工作叫做“到民间去”）。我们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成年人会听我们的话，甚至对我们好象还挺尊敬的？

年长的人这样对待我们，使我们的干劲更足了。

“党活着，我们就跟随党生活”

在我没有得到1917—1918年以后出版的革命书籍之前，我对世界、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总的看法没什么系统的观念。但已开始萌芽。例如，沃尔托夫斯基神甫坐着马车巡视各村。农民们送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主要是谷物和米。为了保持“尊严”，他自己不到农民家里去。看到这一切，我心里产生个问题：“既然神甫为上帝传教，那么上帝就应该帮助他呀？”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并未帮助。于是我得出结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大人们在谈话中从不涉及这个叫人头疼的问题。他们听到这样的问题，总是摆摆手，象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

有一点可以说：还没意识到的唯物主义已经进入孩子们的脑海中。这就是为什么13岁的我就成了共青团员。我的几位朋友也是共青团员。我们已经向村民们做反对宗教的报告了。我清楚地记得，有几位老农妇得知在一个小屋里正在开共青团会议，有一个团员在做报告，说没有上帝，她们经过这间小屋时都在自己身上画十字。

回想起来高兴的是，无论是父母还是其他亲戚和朋友，都没有责怪我不信教，虽然他们并不都赞成我的信仰。

这里值得提一提的是，我们这些少年还决定在艺术舞台上显显身手。革命后出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小册子，里面也登载了一些剧本。剧本中反映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后国内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精神。

我们发现了一个剧本，其中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

公开交锋，反映了国内战争这一暴风骤雨的时代。

这个剧本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它的内容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红军指挥员”和“白匪军官”。他们在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可演员怎么办呢？

我们找了一个勇敢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他名叫伊万。“白匪军官”的角色就派给了他。

谁来演“红军指挥员”呢，我的朋友异口同声地说：

“安德烈。他能做报告，那就让他来对付‘白匪军官’吧。”

我没有拒绝。这种信任令我难以忘怀。

剧中还有其他角色，但它们不十分重要。

我们兴致勃勃地排练起来。学校提供了场地。学校的礼堂足能容纳100到150人。

服装和演戏所必需的道具我们一件也没有。因此我们就穿着平时在家里穿的衣服上了台。只是尽量做到衣服不破不坏：毕竟是要在舞台上演出嘛！为“白匪军官”做了一个有点儿类似肩章的东西。他常常斜眼看，看它们象不象肩章，会不会从肩上掉下来。但他服装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双新靴子，他竭力把它擦得锃亮。好歹是个“军官”啊！而我却恰恰相反，靴子虽然很结实，但已经穿旧了，我们把它叫做“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靴子。脚跟上还钉着铁掌子。而且我们尽量使我的衣服看上去更朴素些，但还要体面——要知道是“红军指挥员”穿的衣服。我们的腰间都挂着真枪套，不过里面是空的。没有手枪。

随着剧情的发展，“红军指挥员”应当显示出勇敢精神，

因为他尚不知道“白匪军官”会如何表现。

辩论开始了。“白匪军官”自然是保护富人的，关于穷人他是这样说的：

“要知道，总得有人工作是吗？需要，就是这样！那就让人们在工厂里工作，在田地里劳动，建筑公路，流放木排吧。而另一部分人应该支配一切，其中包括那些干活的人。”

这就是“白匪军官”沃瓦（这个角色的名字）的哲学。

“红军指挥员”反驳这种认为富人、剥削者要支配一切的观点。

他说：“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工作。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列宁的领导下工农群众才起来革命。”

“红军指挥员”克沙坚决地捍卫了这一哲学。

其他人物也小心地介入了辩论，并且分成了两派，而“红军”这一派人数要多些。

“演员们”都未来得及把台词背熟。在舞台的一个角落里安排一个人提台词，并特别要求他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但是，由于他坐的不是地方，我们常常听不清他的提示。因此，有时我们就来点儿即兴创作，选择一些听起来有劲的话，当然也注意分寸，以不引起成年观众的不满。顺便提一下，我母亲也是观众之一。提台词的人也做了最大努力。有时当他发现演员讲的跟剧本上写的不一样时就喊得很高，以便盖过演员的声音。而当我们听清楚了他的话时，就再重复一遍。

不用说，全剧看上去相当别扭。

但一切顺利结束。主要角色的扮演者甚至没有打起来，虽然在台上争论时常常几乎要打起来。我回家后，母亲对我

说：

“我真怕他把你的新衬衫给撕坏了。”

一句话，演员、戏剧导演及观众人人满意，观众表现出少有的平静，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耐心。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以前在我们村里从未演过戏。

我的“演员生涯”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不知怎的，到现在我不仅还能回忆起我自己讲的一些话，而且也能想起“白匪军官”对他的“勤务兵”讲的话：

“咳，真见他妈的鬼！我问你，我的靴子擦了没有？”

“勤务兵”听到呵斥，急忙去擦“白匪军官”的另一双靴子……可是一失脚踏进了提台词的人呆的“小棚子”里去了。提台词的人很不高兴，气得几乎要跑掉。但最后这事还是妥善处理了。

后来，在村里象演戏这种社会工作我们再也不干了。我们选择了其他一些更积极、更成熟，当然也是力所能及的形式。

1923年初，团员推举我当村团支部书记。对于年轻的团干部来说，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老一辈的帮助和支持。给全乡各个团支部下达指示的自然是乡团委。这些指示几乎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共青团员们必须为农民、为村子里有文化的人树立一个榜样。榜样！这对我们来说含义多广啊。

我是怀着多大的热情阅读乡团委的指示啊。我觉得我似乎是在与卡尔·马克思本人打交道。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每读一遍都得到莫大的快乐。我家里人也都尽力协助我在团里的工作。而当他们同其他村民们一样，看到在村苏维埃选举中团员们力争使他们支部所推荐的候选人得以当选时，所有的成年人都刮目相看，认真地对待我们了。

我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实成了我进行总结概括的素材，而直到1936年从研究班毕业时为止的学习又丰富了我。我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意识，使我的个性完全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说，我还得感谢艰苦的物质条件。我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学会了同困难做斗争。性格就这样形成了。

少年时代，我常常独自一人呆在田里或是在离村子不远的牧场上。天气异常炎热。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连鸟儿都热得躲起来了。突然传来教堂的钟声，多半是祈祷前的钟声。每一声钟响，宛如雷鸣，在破坏着这宁静。脑子里思绪万千。念头一个比一个沉重。万一是送葬呢。墓地离老葛罗米柯村和新葛罗米柯村都不远。念头一个比一个阴郁。忽然，你会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摇摇头，自言自语道：

“喂，老兄，你怎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了！就不能振作起精神吗？”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跳加快，嗓子也象是发痒，或是被什么卡住了似的。这显然是一种年龄特征的表现。于是，你就暗自发誓：再不能表现出这种软弱病。这时你快步地来回走上几圈或者跳上马遛一阵，直到恢复常态为止。

其他人也发生过这种情形。我的几个同龄人也讲述过类似的感受。

各国文学中有不少作品深刻地描写了当一个年轻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独处时的心理状态。列·尼·托尔斯泰，弗·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伊·谢·屠格涅夫和其他许多语言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不避讳实情地做了这样的描写。

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我得出个结论，每个重要的阶段都

不仅有愉快的方面，也有艰难的时期。这包括从我上七年制中学到研究班这一阶段。当然，父母是宁肯自己艰苦，也竭尽所能来帮助我。在食品不够的情况下，我自己也得干些体力活，尤其在夏天。

1924年1月，不幸降临到国家头上——列宁逝世了。这是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艰难地穿过高高的雪堆，来到学校，在那里举行追悼会。老师们在致词，我们一边听一边想，这个我们谁也没见过的人为我们这些坐在教室里、课桌边、长凳上的人，为俄罗斯所有的工人和农民做了多少事啊。

村里人只谈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事。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的一个是：

“现在怎么办？”

也有人问过我。他们认为，既然我是团支部书记就应能解释一切。

他们对我说：“你是个团员，你谈谈，没有列宁我们怎么生活？”

我能回答他们什么呢？我自己还需要有个人对我讲清楚这个问题呢。但是，那时我还是想起了在十月革命初期我所听到的一句关于列宁的话：“革命是由列宁及其助手们完成的。”于是我想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列宁逝世了，但他的助手——党还活着。我们就跟随党生活吧。”

在农村，农民对整个国家的命运极为忧虑，然而，他们对未来，对列宁生前开创的新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应有失去信心的现象！

在此之前，我已经阅读了列宁在第三次团代会上的讲话，

对他“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我心领神会。列宁好象知道我的心思一样。

从戈梅利市的七年制中学和职业技校毕业后，我进入中等技术学校学习，该校在离明斯克不远的鲍里索夫市。

我住的屋子是木制的平房。但当年建造时，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是颇有特色的。这座房子首先是由于拿破仑·波拿巴曾在这里夜宿过而出名。这是在皇帝与其被打垮了的残余部队逃离俄罗斯时候的事。离房子大约1公里处，奔腾着载入史册的别列津纳河^①。

拿破仑及其残余的近卫军决定在斯图坚卡村附近强渡该河。渡河对他们来说成了一场悲剧——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葬身在别列津纳河中，神奇的俄罗斯勇士们在这方面帮了他们的忙。我们这些大学生当然把参观这个地方看作是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我们站在那里不禁心潮激荡。这条河该受我们深深一拜，感谢它忠实地为祖国服务。

至于我提到的这座房子，大家都称它为“拿破仑故居”。而且这样叫的时候通常都含着对这位落泊的皇帝的辛辣讽刺。历史造就了他，好象就是为了教育后代，首先把他推上荣誉的高峰，然后又无情地把他抛下来。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道尔顿制”^②已没多大意义了，在我大学时代，在鲍里索夫和明斯克的学校里——包括高等

① 苏联白俄罗斯河流。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拿破仑军于11月26—29日在强渡该河的战斗中损失5万人及大部分炮队和辐重，溃不成军。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和1941、1942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在这里也进行过激战。——译者

② 这是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应为佐治亚州——译者）小城的名字命名的。该城首次在学校里采用这一新的教学方法。——原编者注

和中等学校里——都进行过作为这一计划基础的教学方法的实践。这种方法内容如下：把一个年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4—6人。为了检查学生的知识水平，老师不是同每个学生而是同一组人交谈。这种方法实际上反映不出某个具体人的水平。有时老师就根据几个人的发言来给全体学生打分，而这几个人又是小组为应付这种场面自己专门推选出来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较滑头的学生用两三句话来敷衍了事，这显然不能反映他们掌握知识的深度。我本人，而且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学生都不赞成这个教学实验。幸好，这个实验很快就停止了。

在联共（布）中央1932年8月25日的决议中指出，“道尔顿制”，或者按当时的叫法“实验小组方法”，导致了“教学工作剥夺个性的畸形现象，降低了教育者的作用并在许多情况下忽视了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

我于1931年，还在鲍里索夫市时就入了党。当我一听说有一个表达并捍卫人民利益的党时，我就幻想着成为共产党员了，而那时我刚刚开始知道贫农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区别。得到党证后不久，我就赶上召开总结选举大会。会上，我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一下子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党的工作强烈地吸引了我。不论是早年，当我还很年轻，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还是现在，我都要做人的工作，处理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常常处在事件的漩涡中。不同的是工作对象不再是青年，而是对生活、对党的政策都有自己见解的成年人——共产党员。

那时党员——其实，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是如此——在最重要、最艰苦的地方总是走在前面。我们不仅仅

是做解释工作，不仅仅是宣传党的政策。当时头等大事是农业集体化。我们带头参加星期六和星期天义务劳动。一旦需要，我们就去准备木柴，卸火车，哪儿需要人手我们就被派到哪儿去。不管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满怀激情地去干。从不拈轻怕重，挑挑拣拣。党和共青团都了解面临的困难，并爱护在那些忠于列宁的事业、忠于人民的事业的青年人心中燃烧着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火花。

我们的助学金不多。尽管比较艰苦，但是这段生活在我的心里总是保留着温馨回忆，其原因哪怕只举一点就够了。就在那时我与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格里涅维奇建立了家庭生活，她是个大学生，白俄罗斯农民的女儿。她出生在明斯克往西一点儿的卡缅卡村。

我还记得青年时代的某些生活细节。尽管事情本身微不足道，但却能说明一点儿当时的情形。

大学生们都腻烦了学校那少而无味的伙食。他们有时就共同出钱到市场上买点儿食品，这差不多要花去他们一个月的助学金，以便每月哪怕有两三天能吃饱肚子。有人可能会问：“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们是这样过的。有时，谁家里寄来点儿东西，大伙一块儿分享。晚上出去挣点儿外快。甚至有时采取这样的办法：一个人卖掉一件似乎是“多余的大衣”，另一个人则卖掉一双似乎是“多余的皮鞋”，第三个人再想出点儿什么“多余的东西”来。就这样相互帮助，摆脱困境。青春和激情占了上风。

从那时到现在55年过去了。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阿纳托利和女儿埃米利娅。现在阿纳托利已成了教授、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是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女儿是历史学副博士，从事编辑工作，因此我和妻子对孩子是满意的。我们有3个孙子——叶戈尔、安德烈和阿烈克谢——及两个孙女——利季娅和安娜。有一个孙子已生了儿子——奥列格。我妹妹叶夫多基娅还健在，她和自己的女儿索菲娅住在戈梅利市。

我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残酷的战争屠刀。我有两个弟弟——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牺牲了，他们都是苏军军官。一个牺牲于战争初期，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另一个是炮兵连长，是当强大的苏军纵队追击退却的希特勒军队于博布鲁伊斯克^①地区强渡别列津纳河时牺牲的。第三个弟弟——德米特里也历经磨难。战时，他先打游击，后来参了军。从前线归来时身体已垮了。艰苦的战争岁月留下了后果——1978年他去世了。我有两个舅舅——费奥多尔和马特维·别卡列维奇：他俩也是在战争期间被杀害的。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非常爱她的唯一的弟弟阿尔卡季。他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牺牲于莫斯科城下。

在明斯克学习的年代

七年制学校毕业后，我又继续学习了12年：职业技术学校（戈梅利），中等技术学校（鲍里索夫），学院（明斯克），研究生班（明斯克——莫斯科）。在记忆中，这一时期的学习一直是很紧张的。这个时期不仅是掌握知识的时期，而且还是完成各种大量社会任务（后来主要是完成党的

^① 苏联莫吉廖夫州城市，别列津纳河码头之一。——译者

系统的任务)的时期。

我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中等技术学校时甚至担任过党组织的书记这一事实，使我经常有机会出差去执行党的上级机关交办的任务。一般是一个月一次，有时是一个月两次。出差的任务是各种各样的。

当我离开鲍里索夫时，我接受了协助搞集体化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工作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农村工作的任务。

有时，出差是和完成某些农产品的征购计划有关，如亚麻或被人们称之亚麻征购的计划。在明斯克，学生党员，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也继续按党和国家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完成这些任务。

我在学院念完二年级后，被任命为一所中学的校长，这所中学离明斯克不远，位于捷尔任斯基区。我的妻子当时是这个区一所国营农场里的畜牧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在学校里教书、搞行政工作，一边还继续在学院里学习，当一名校外考生。

有一次，白俄罗斯党中央的一位特派员来找我。他的通知显得非常突然：

“打算让您去念研究生。当然，如果您同意的话。”

“可是我在学院剩下的学习期限里还没有通过考试呢。”我申诉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对此却说：

“没关系。您作为校外考生去考试，再过几个月马上就可以进研究生班学习。”

我没有立刻表示同意，而是请求道：

“请给我点儿时间考虑一下。”

我担心的是读研究生的物质条件问题。在中学校长的职位上，我还有一份可以过得去的固定工资。可是研究生的奖学金恐怕会使我家的物质状况下降。那时我家已有3口人，我们生了一个儿子。特派员向我解释说：

“关于你将来学习的条件我并不全都知道。我只知道，您在学院毕业之前剩下的时间里可以通过相应的考试，不必中断学校的工作。不清楚的问题，应当同明斯克商量解决。”

我立即动身前往明斯克。这里离明斯克很近，坐车只须30分钟。特派员把要去打听情况的地址给了我。

我事后得知，为我做的鉴定已经寄到委员会去了，不仅有学校的，而且还有党的系统的鉴定。当时，我的党龄差不多已满3年。

由伊·米·鲍里谢维奇教授领导的委员会对我很有礼貌。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教授说：

“考虑到您在教学、生产和社会工作中的成绩，委员会决定建议您去刚刚在明斯克设立的研究生班学习。在研究生班里，您将研究经济学问题。”

我自然提出了问题：

“研究生班培养哪一类专家？”

我得到的回答是：

“培养专业面很广的经济专家，既是实际工作者，又是理论工作者。我们知道，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为苏联高等学校培养社会科学教师。在准备录取您的研究生班里，也打算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他们接着向我解释：同从革命前的俄国继承下来的个体

经济相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的改造和农业的集体化给我国的农民带来了好处，必须特别强调这些好处。简而言之，应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明，同过去的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相比，苏维埃政权是能够提供给人民（其中包括农民在内）以无比优越的生活条件的。

后来，我从一些也被叫到委员会去谈话的同志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与我不同，立刻就同意去这个研究生班。而我却要求给我几天的时间来考虑一下。

“我讨厌靠助学金过日子。”我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这么坦率地表示。

他们安慰我说：

“过一段时间，研究生们得到的助学金大概会达到相当于称作党员最高月工资的数额，这是相当可观的了。”

鲍里谢维奇说：

“您在学院里考试的事不会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很熟悉您，会照顾您的。大概再过半年，研究生班就要开始上课了。这个期限对您来说是足够了。”

谈话结束时，教授又补充道：

“据我所知，即使您不进研究生班，他们还是打算要调您去明斯克工作。”

这就是说，我无论如何都得离开中学和捷尔任斯基区了。

尽管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我还是权衡了一下“去”还是“不去”，便说：

“我同意你们的建议。”

结果，我被录取为研究生。

紧接着，我到明斯克去进行考试和解决住房问题。我通

过了学院最后年级的考试，成绩“优秀”，这是严格按照委员会拟定的工作计划进行的。随后在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他同志们也经过了同样的谈话。

还是那位伊·米·鲍里谢维奇教授领导我们这个研究生班，他的副手是Г·Н·克利姆科教授，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

就这样，我带着全家，彻底地（我是这样觉得）在明斯克定居下来。起初租了一套私人住宅。教授关于党员最高月工资的说法是对的，发给我们党员最高月工资了。在当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些钱是足够用的了。

我们开始认真和紧张地研究学问。“研究生”这个词，象人们开始叫我们那样，听起来有点不寻常。如何对待我们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我们自己暂时还不清楚。我们7个人，就这样迈进了科学工作者的圈子。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我们看作是应当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从事劳动的人。我们又响应党的号召进入了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科学院庆祝一个什么周年纪念日。现在已经说不清，这个周年纪念日同什么事有关了。只记得我们这些研究生去会见一些大学者、有名望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当我们被平等地安排在同一张桌子上坐下时，我们是多么惊奇啊。我们觉得，宴请的食品是相当丰盛的。

我记不清当时我们彼此说了些什么，但反正说来说去又谈到了对首次就坐在大桌后面、而且不知为什么竟坐在贵宾席上的研究生们表示颇为尊重的话题，我们从声望很高的学者们那里也感受到了这种颇为尊重的态度。我们对此找到了

自己的答案：不，苏维埃国家对学者待遇如此之好不是没有理由的。看来，科学是受人尊重的，而搞科学工作的人是国家非常需要的。

老实说，恰恰是在同院士们的这次会见之后，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多么重视我们、国家对学者们是多么关怀备至的时候，我才懂得，如果你具备搞科学的某些才能的话，那么攻读科学就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我当时就作出了这种选择。

前一年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英语上了。我们的教师队伍是相当强的。

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和答疑人是N·C·沃尔夫松，他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作者。

我们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导师是亚·伊·诺特金^①教授，他是一个十分有才能的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造诣很高。

后来，当约·维·斯大林开始注意研究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时，正是诺特金向斯大林提出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诺特金的问题和斯大林的回答都刊登在苏联报刊上。最后一段时间，诺特金在莫斯科的经济研究所工作，那时他已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我当时很喜欢同他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的渊博知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逝世于1982年。

迁往莫斯科

1934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产

^① 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译者

生了影响。学院领导出乎我们这些研究生意料之外地宣布：

“你们班要迁往莫斯科类似专业的科学研究所。”

这可真是一件新闻！我们大家经过共同和单独的认真思考，一致认为，“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这句通俗的谚语对于我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总不能反对迁移的决定嘛。

于是，我们就出发到莫斯科去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了3个箱子里。

我忘不了我在去莫斯科途中所经历的那种感受。我内心有种感觉告诉我，今后的全部生活将取决于在我们国家的那个主要城市所作出的决定。由什么人决定、什么时候、在哪一级上决定，这些自然都一无所知。

还在动身之前，我怎么也不能习惯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会同我度过了20多年的那个地方越来越疏远。一些无形的绳索把每一个人同生养他的那个地方联系起来，这些地方总是使人想起家乡的和亲近的东西。我聊以自慰的是希望将来还会有可能到那些童年和青年时代很熟悉的地方去走一走。

但我努力丢开各种悲伤的念头。内心的声音仿佛告诉我：

“不管怎么说，你和你的家庭毕竟不是要去随便其他什么地方，而是要去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

有一次，我竟设想自己进了克里姆林宫里。难道我会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沿着它那有名的长方石块马路走一走、走到近处，而不是在画片上看一看克里姆林宫的墙吗？难道我能很快就到红场上去吗？难道这些幻想将成为现实吗？

我难以解释为什么只要我一想到莫斯科，想到莫斯科的过去——这通常发生在开始有意识地接受现实的时候——我

不知为什么总是首先想起这座伟大城市历史上的种种最悲惨的和最欢乐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多半是因为这些事情从童年和青年时代起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这是经常看书、喜爱文学作品的结果。

是的，莫斯科发生过一次大火。但贪婪的草原可汗^①因其在压迫时期施行的暴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库利科沃原野^②永远载入了史册。

全俄罗斯的钟楼以及莫斯科的数百口钟都在为欢呼波尔塔瓦一战战胜瑞典查理十二世的军队而响彻云霄。这场战役的显赫声势提高了俄国士兵的声望，使大国进入了强国之列。

难道不正是在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之后，他这颗星星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里黯然失色，乃至完全坠落的吗？

当我来到首都时，离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还有7年的时间。苏联人民将要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功绩。这距苏联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德国举行胜利阅兵式时把第三帝国军队的军旗抛在红场的石头上还有11年的时间。阅兵式那天，站在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墙旁观礼台上的有我们在战争中的盟邦代表，他们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反希特勒同盟国的官方来宾。

就这样，我们下了火车。我和我家里的人都成了莫斯科人。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迁入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大学生居住区，它位于莫

① 可汗或汗，中世纪和近代中东一些国家对部落首领、君主（蒙古帝国的兀鲁思统治者）等的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尊称。——译者

② 位于苏联涅普里亚德瓦亚河与顿河之间。——译者

斯科的东北郊。这里，一度曾是罗曼诺夫王朝^①第二个君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宫殿。到我们去时，早已没有宫殿的一点影子了。留下的只是“沙皇”的名称——阿列克谢耶夫斯基，而且这个名称与其说是来自沙皇，不如说是来自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这个村子是在从前沙皇府邸的原址上扩展起来的。

这个地方距离奥斯坦基诺^②不远。在奥斯坦基诺至今仍屹立着舍列梅捷夫^③的宫殿。这座宫殿过去为著名伯爵的地产，而现在则成为博物馆、首都的名胜之一。现在与舍列梅捷夫宫殿并排矗立着有著名的奥斯坦基诺电视塔和世界闻名的全苏电视中心大楼。

后来我才知道，无论是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村，还是舍列梅捷沃这个地方，都同它们相毗连的罗斯托基诺区一样，把沙皇家族和达官显贵们吸引到这里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紧靠着通向扎戈尔斯克^④，即通向特罗伊茨基修道院（1744年改称为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⑤）的道路，那是君主及其亲信们去朝圣的地方。

当我们来到莫斯科时，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大学生居住区

① 罗曼诺夫王朝，14—16世纪俄国的一个贵族家族，安德烈·科贝拉的后裔。1613年起为沙皇王朝。末代皇帝是尼古拉二世。被1917年2月革命推翻。——译者

② 俄国18世纪末艺术建筑群。过去是莫斯科近郊舍列梅捷夫公爵府邸，从19世纪末划归莫斯科市，1918年为农奴制创作博物馆。——译者

③ 俄国元帅、伯爵、彼得一世的战友。1681年起为督军，参加过克里米亚和亚速远征。——译者

④ 苏联莫斯科州城市。1930年前称谢尔吉耶夫，后为纪念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B·M·扎戈尔斯基而易名。——译者

⑤ 古代俄国修道院。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建于14世纪中期，位于莫斯科以北71公里处（今扎戈尔斯克），1920年起为受国家保护的历史艺术博物馆。——译者

已住了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大胆地说，当时这里是城市的青年区。在这里，通常只要你一走出家门，你就到处会遇到男女青年，他们都是朝气蓬勃、充满乐观精神。其实，这是历代苏联大学生的共同特点。

我们是初春时节——3月份迁往莫斯科的。我们熟悉了一下著名经济理论家M·A·卢里耶教授领导的研究所。住所很快就安排好了。可以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在苏联科学院在契卡洛夫街的新楼里分配给我一套相当不错的住房以前，我一直凑合着住在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大学生生活区。

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房的是年轻的病毒学家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丘马科夫。现在，他已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他对战胜象脊髓灰质炎这类重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多少生命、首先是儿童的生命，被他同阿·亚·斯莫罗金采夫^①合作研制的抗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所挽救，这种疫苗是世界上现有的许多疫苗中最成功的一种。

在30年代，这位学者对于如何同另一种疾病——大脑炎作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冒着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危险、作为病毒学家考察队的成员在远东工作，考察队的任务是查明人们为什么和怎样患上大脑炎的。在那些地区考察期间，丘马科夫自己也成了这种疾病的受害者，结果他的听力严重损伤，有一只手还麻痹了。

但是，这并未使学者丧失信心。他后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1984年11月14日，是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苏联

^① 苏联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译者

医学科学院的正式院士米·彼·丘马科夫75岁生日。就在他生日的这一天，为了表彰他在发展医学科学、人民卫生保健和培养科学干部方面的卓越功绩，丘马科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我向自己的这位老熟人、过去一个单元里的邻居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十分愉快地得到了他热情的回复。

我在莫斯科的研究生课程与在明斯克的课程区别不大。只是受党机关的委托去出差的次数更多了，尽管在鲍里索夫和明斯克时，这种出差已经够多的了。在后个时期，出差去完成任务仍是各种各样的：有时是为了在集体化时期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有时是为了加强集体农庄和向庄员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国际局势。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纳罗福明斯克、奥列霍沃—祖耶沃和莫斯科附近的其他城市就各种题目讲课。有时还曾多次向农村劳动者发表演讲。

是的，除了要参加区党委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向群众讲课之外，又增加了扫盲和对当地情况进行检查的任务。例如：要搞清楚集体农庄庄员们是否懂得农庄章程，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否有过什么混乱思想。有多次出差是为了讲解某些理论问题的。例如，我讲过关于弗·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和他的另一部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出差途中，当要安排我过夜时，地方村苏维埃主席向我建议：

“您可以在一个多子女家庭中过夜，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把您安排在干草房里，过去一些出差的人也都在那里住。”

“我比较喜欢第二方案。”我回答说。

我立刻想起，从前夜间喂马时，我都是在类似的条件下过夜，睡在干草上的。

主席把我带到过夜的地方，在我们已经来到院子里时，他好象顺便似地说了一句：

“在不远的一个仓库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久前杀死了一个到我们这儿来出差的人。”

真糟糕！这种顺嘴说出来的话当然不会使我得到鼓舞，我不敢说睡得很熟，但过夜时没有发生意外。

总起来说，正如党组织告诉我的那样，我的历次出差都是顺利和有益的。

大约就在这时，我决定不脱离科研工作去飞行学校学习。飞上天空是我们许多同龄人的理想。那一时期，在苏联，对突飞猛进发展起来的航空事业有一种崇拜之风。飞机已经在北极上空飞行，并且已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开发。但等待着我的的是失望。飞行学校校长接见我时这样问我：

“您叫什么名字？”

“安德烈·葛罗米柯。”

“您有什么要求，请说吧。”

“我想成为你们学校的一名学员，我想飞行。请接受我的申请。”

“您多大了？”

“25岁。”

“已经满25岁了吗？”

“是的。”

“我们只录取25岁以下的。您已经超过25岁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录取。非常抱歉。我们有严格的规定。”

看来，我想学会飞行的愿望来得太迟了。我对命运的变幻莫测感到很懊丧。我太想飞行了。但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渴望当一名飞行员，所以飞行学校领导有很大的挑选余地。我不得不就此作罢，对自己说：

“再见了，航空事业。看来，我和你是无缘了。”

聆听老布尔什维克的教导

在这一生中，使我永志不忘的是在莫斯科同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①一些杰出的革命家的会见。这个协会还在弗·伊·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已建立，但其组织却是在30年代初形成的。这个协会的形成是老布尔什维克们渴望彼此交往、谈谈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事的自然结果。

被接纳入会的都是有18年以上党龄的共产党员。到1934年1月，这个协会已有2千多人。按照1931年批准的章程，协会的宗旨是利用老布尔什维克们的革命经验来帮助党教育青年和搜集革命史料。

我和我的研究生班上的同学们都很熟悉那些同列宁关系密切的老党员、列宁的志同道合者们的名字。那时，这些人因年龄或健康关系都已不再从事积极的工作了。在他们当中，有著名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是从民粹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似乎是从民粹主义者走向布尔什维克党的桥梁；他们同意和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和斗争目标。

^① 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苏联联合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老党员的社会团体，1922—1935年属党史委员会，后附属列宁研究院。出版《布尔什维克》文集和《通报》等革命历史汇编。——译者

如果根据我们这些年轻人凭请柬也有机会参加的会议次数来判断，那么协会的会员不常开会。当然，除了这些会议之外，他们还在更狭小的范围内彼此进行交往，尽管那时的活动条件很不理想。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俱乐部位于第一梅先斯基街（现在的和平大街）上。每当我们走进举行会议的大厅时，心情都很激动。道理很简单。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当时出版的小册子，有时还读一些介绍列宁那一代老革命家事迹以及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和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厚本书籍。我们对那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地下工作和从事地下工作的人的勇敢精神的书籍读得简直着了迷。列宁及其领导的党燃起的革命斗争激起了青年们无比丰富的想象力。青年们想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把生命献给争取人民自由斗争的人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里想介绍一下其中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主席团上就坐的都是一些传闻已久的人们，他们的英雄业迹多年来就一直被当作榜样来教育青年。

在主席台上首批出现的人中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①。他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早先是秘密革命团体“土地和自由社”^②的成员，后来是“民意

^① 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学者、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32）。“柴可夫派”小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参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1882年被判处终身苦役。有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还有诗歌、小说和回忆录《我的一生》。——译者

^② 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其纲领是：农民革命、土地国有化、由公社联邦代替国家。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译者

党”^① 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年轻时曾同马克思本人见过面，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马克思很珍视同俄国进步人士的接触。但那时，年轻的莫罗佐夫还接受不了马克思主义。他成了一个民意党人。1882年，因他参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②，沙皇制度判处他终身苦役。莫罗佐夫当时刚满28周岁，后来有将近1/4世纪的时间他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③和施吕瑟尔堡要塞^④的单人牢房里。

在彼得保罗和施吕瑟尔堡低窄不能直立的石头牢房里度过多年之后，他获得了自由。要塞的单人囚室并未摧毁他的意志，他象一个为人民的理想而斗争的真正战士一样，重新投身于革命斗争。沙皇的暴吏再次拘禁了他，但这一次是关在德维纳要塞^⑤的围墙里，只是革命才把他从要塞围墙的“包围”中解放出来。

他的健康被损害了。但他把全副精力投到科学工作上，并取得了成绩。他几乎毕生都从事科学，这件事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莫罗佐夫具有多方面的天才。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和历史，都是他发挥自己作用的领域。

① 俄国最大、最有势力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年8月诞生于彼得堡。其纲领是：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要求民主自由、将土地交给农民。1881年以后遭到大逮捕。——译者

② 1855年起为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长子。1881年被民意党人杀害。——译者

③ 位于苏联列宁格勒扎亚奇岛上，1703年由彼得一世奠基。现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译者

④ 位于苏联奥列霍维岛上，涅瓦河源头附近。1323年为诺夫哥罗德人所建。现为博物馆。——译者

⑤ 位于苏联白海的东南部。——译者

过了一些时候，苏联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天文学家们为了表彰这位大科学家的功绩，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恒星。

在我的青年时期，莫罗佐夫除从事大量的科学工作之外，还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里参加活动，我也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

看来，自然界本身已经为使这个人比其他人更为出众提供了条件。莫罗佐夫的外表就令人尊敬。他那一头几乎是白色的浓密蓬松的头发和漂亮的银白色的胡子使他容光焕发。与会者们热烈地欢迎莫罗佐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莫罗佐夫很活跃，积极主动地同主席台上坐在他周围的人们交谈，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他脸色红润，甚至略带红晕。但同时皮肤却很细，好象透亮似的。我坐在离舞台很近的地方，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同邻座的人交换了一下各自的观感，发现他们的印象和我是相同的。

我们期待着他发言，但在这次会上莫罗佐夫没有讲话。

发言的是贝拉·库恩，他是匈牙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19年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之后，库恩死里逃生，于1920年侨居苏维埃俄国。

库恩的发言很精彩，令人信服。尽管他使用了翻译，但从他的发言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俄语大概学得很扎实。他回顾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期的情况。

库恩的整个发言贯穿着一个主要思想，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是工人的死敌。工人阶级只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并应

由它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才有可能战胜这些敌人。库恩还表示深信，匈牙利的劳动人民一定会获得自由。他说：

“激励我前进的榜样，就是苏维埃国家和列宁的党。”

库恩尽管提到了斯大林，但只是捎带着提了一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熟悉自己国内情况的坚定勇敢的革命者。他熟悉地引证事实根据，即席演说。从他讲话的思路和风度来看，他无疑是一个很有教养、性格刚强的人。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威廉·格奥尔吉耶维奇·克诺林^①。他是拉脱维亚人，是一位有天赋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起就参加了俄国的革命运动；那时，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他的发言主要是阐述国际形势。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克诺林说：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执政使欧洲的形势严重地复杂化了，使国际局势更趋尖锐了。但是如果共产党人能借鉴过去和避免犯新的错误，那么他们就可指望获得成功。”

克诺林在谈到德国时，尽量不作任何预测。大厅里的所有与会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总之，他的发言令人感到是经过斟酌的，对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未来不作缺乏根据的肤浅的推测。甚至在别人也许会谈希特勒的军事计划的地方，克诺林都讲得很慎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已经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分子准备进行侵略的全部计划在当时并不都很清楚。在发狂的元首的书和小册子里，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意图，但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希特勒德国要在实际政

^① 又姓克诺林什（1890—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政论家、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译者

策中实施这些意图的地步。但当大家看到法西斯恶魔是如何悄悄地逼近邻国并进而实行侵略的时候，全世界很快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克诺林看起来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演说家，表达思想时明确清楚。我看他象一位阅历很深的教授。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机智敏锐、善于辞令的人。他擅长同对手进行论战，而且他的语言特别生动活泼。

我们这些在这之前几年才入党的党员，象被磁铁吸住一样很想同职业革命家们见面。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①发了言。他是1905—1907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难道对这样一个人——前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移民协会^②的会长，从1931年起是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主席——向青年发出的号召能无动于衷吗？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发言专门论述了对共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的思想教育问题。

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马丁·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多夫^③，他是1893年入党的党员。1905年莫斯科街垒战的参加者。初次见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难以忘

① 原名古别利曼·米涅伊·伊兹赖列维奇（1878—194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1年任中央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干部培养训练委员会委员，《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译者

② 1921—1935年的苏联社会团体，会址在莫斯科，有50多个分会。机关刊物为《苦役和流放》、《通报》。——译者

③ 又名曼德尔施塔姆（1872—1947），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译者

怀的感觉：在你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刚刚离开车床前来欢迎到会者的工人。从他的身材和举止来看，你会感到一种真正的工人气概。

几乎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指出了党击败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意义。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敌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那时已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在俱乐部举行的会议上，晚来的人从来没有找到过空座位。到这儿来的客人们都靠墙站着，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到这个大厅里来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这段历史，这一点报告人是知道的。

1935年，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取消了，它的俱乐部也关闭了。这一切发生在对斯大林出现了个人崇拜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俱乐部参加者的名字在报刊上开始消失了，这一事实使这个问题更清楚了。

在科学院里

在研究生班四年（撰写副博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也包括在内）毕业之后，即于1936年举行了论文答辩，随后我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高级研究员。当时，领导这个所的是马·亚·萨韦利耶夫院士^①，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弗·伊·列宁的战友。

当时我认为，我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将是十分认真而又长期不变地确定下来了。我开始在莫斯科公共建筑工程学

^① 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884—1939）。1930—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36年起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译者

院兼职讲授政治经济学。顺便提一下，在我所教的那个班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后来成为在国内具有显赫地位的人。例如，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①就曾是一名大学生。在那些年代，大学生们在年龄上同教师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教师们——起码对我来说——有时会感到有些尴尬。想使自己看起来年龄大一些。

此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一直接受党的委托，在党的政治教育系统中领导莫斯科一家大企业科技人员的学习小组。这就是我的社会工作。

无论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小组的听众来说，上课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来听课的一共有30个人。讲课的题目不仅涉及我国的政策，而且涉及其对外政策。后来才清楚，党中央委员会在为外交工作挑选候选人时，也注意到了我履历中的这段经历。

从1938年底起，我在经济研究所不得不代理一段时期学术秘书的职务。有一次，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院长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科马罗夫^②把我叫到他那儿去。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到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那里后，他向我宣布说：

“我们想任命您为科学院远东分院学术秘书。”

我不敢说我对这项建议有多大的兴趣。我认为，需要一个声望甚高的学者来担负这项重要的工作。我没有隐瞒自己

① 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公共建筑工程学院。后从事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1964年起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65年12月起为苏共中央书记兼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译者

② 苏联植物学家（1809—1945）。苏联科学院院士。1936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长。——译者

的意见：

“要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而建议我担任的这个职位看来至少应当由一名科学博士来担任。”

我这样说，但却暗自思忖：“假如科学院院长是个心理学家，而不是植物学家，那么他大概会说服我，那么我就得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了。”但我的理由看来是令人信服的。

不管怎样，院长考虑了我的意见，同意一切维持原样。为了以防万一，他又说：

“但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但那时我并未能在学术界里长期工作下去。后来，当我已经在华盛顿当苏联大使的时候，我开始写《美国资本输出》这本书，而在伦敦当大使时才把这本书写完，并于1957年出版，笔名是Г·安德烈耶夫，国立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为此授予我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写了一本专著，题为《美元的扩张》，并于1961年出版，笔名还是Г·安德烈耶夫。

对上述两本书所阐述的题目的研究工作，我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1982年底，出版了新的专著《资本的对外扩张：历史和现代》^①。在经济科学这一重要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从事实际活动。

^① 安·安·葛罗米柯因《资本的对外扩张：历史和现代》一书于1984年获苏联国家奖金。——原编者

——第二章——

战争风暴来临之前

乌云密布 我的誓言 去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 前任大使约瑟夫·戴维斯 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会见 赴美国途中 在现代的巴比伦 在美国的10天旅行 我们是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客人

30年代……这是巩固苏维埃国家的时期，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在苏联大规模建设新社会的和平工作是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特别是在30年代后半期。空气中已经明显地嗅到火药味了。一切征兆表明，沉重阴暗的战争乌云已逼近祖国上空。真不愿意相信！但情况就是如此，苏联人也明白这点。

乌 云 密 布

一个又一个的民族、许多国家都成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牺牲品。鉴于这种局势，英国、法国和美国对这些国家奉行“绥靖”政策，千方百计地企图避开侵略矛头，并促使其指向苏联。这一切在今天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能把这些阴暗的、令人不安的几页从历史书上抹去。

1938年9月，英国和法国统治集团在慕尼黑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使“绥靖”政策达到了高峰。这种政策不仅鼓励了侵略者进行新的冒险，而且反过来首先指向了那些姑息侵略者的人们自己。慕尼黑交易之后还不到一年，世界大战之火就延烧到了这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参战国。在全世界面前，西方国家某些集团臆造的法西斯的侵略不会触动西方国家的概念崩溃了。

至于苏联，那么它在整个30年代都为争取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坚持不懈地斗争，运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扼制侵略者，防止灾难。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仅靠苏联的努力是不够的。英国和法国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不愿意同我国一起抗击法西斯侵略者。

越来越明显，各国人民，首先是欧洲人民正处于世界性悲剧的边缘。在业已形成的国际局势中，苏联竭尽一切可能来争取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以赢得时间为反击希特勒侵略做好准备。

我们国家必须解决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任务，这就对苏联外交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苏联外交应该为此而利用它拥有的一切可能和手段。当年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为维护和平所进行的斗争是历史承认的事实。

我的誓言

不论是按年龄，还是按水平，我当时只能尽我所能贪婪地获取报道世界形势变化的消息。在与我的同代人并肩前进的同时，我开始参加一些落在我这个年轻人肩上的工作。每

当我回顾走过的生活道路时，都觉得我好象是走对了。当时开展过争当“伏罗希洛夫射手”称号的竞赛。我看我够格，决定参加，于是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争取“劳卫制”证章我也达到了标准，并且得到了它。到各地出差已经成了常有的事。而且我总是准确地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

在那些日子里，工厂里常就令人担忧的国际局势举行座谈会。我清楚地感觉到，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所获得的知识使我看清了世界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那时我才真正懂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其中包括顽强地克服对这些著作中的一些原理在理解上的困难，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说到这里，不妨再补充几个我青年时代的事例。还在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列宁的著作。开始时读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小册子。革命领袖深邃的观点一直使我惊叹不已。但偶尔也遇到一些不熟悉的词句和概念。我意识到，我的文化程度不够。中技、大学和研究生班都是以后的事。

所以，当时我就立下了誓言：“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就读书，反复地读，思考读过的东西，探索、了解，向懂得的人求教，直到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为止。”

我终生都信守着向列宁求教、顽强地研究他的著作的誓言。

我们经常同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交换意见，争论如何更好地学习列宁的著作，我们也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在辩论中产生了一个决定：

“应当想法搞到列宁全集。如果我们连这些著作都搞不到，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

尽管我们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能马上弄到。不过区图书馆里很快就有了。我们可以一卷一卷地把它们借回家去阅读。

出现了一个问题：

“从哪儿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呢？”

于是我们就本着各尽所能的原则来办，每人都认为自己是

对的。而我认为，研究列宁著作应从第一卷开始。我当时觉得这种方法是有根据的。“既然是开始，那就一定要从头开始。”我是这样想的。

于是我就开始钻研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它使我十分明确地懂得了，资本家们在残酷地剥削工人，他们无耻地从工人身上收刮各种各样的罚款和苛捐杂税。

我长时间地啃列宁全集第一卷，然后是第二卷。有一次，一位有经验的教师看见我在这样读书。他问我：

“安德烈，你干什么呢？”

我说：“我想了解列宁，我在学习他的著作。”

“你是怎么学的呢？”

“啊，我是从第一卷开始，按顺序读的。现在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这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学习列宁著作最好不是简单地从第一卷开始，一卷接一卷地读，而要选出某些著作，把它们弄懂了，能帮你理解其他著作，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遗著。”

这是个很宝贵的建议。对列宁的思想似乎了解得更深刻

了。在完成作业后，我尽量找时间仔细研究诸如《国家与革命》、《论合作制》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我觉得，每次阅读和重读列宁的某篇著作之后，我不仅精神上成熟了，而且身体上好象也更强壮了。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虽然我看问题的视野更宽阔了，对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但同列宁学说中所包含的内容相比，我的知识还只是沧海一粟。

我渐渐地感到渴望更多地了解社会科学。稍晚些时候，当我读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我就发誓要忠于人文科学。我以前就知道，马克思的朋友有这样一部著作。但我认为，大概要等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理解这本书。直到16岁时，我才决定读《反杜林论》。不是简单地读，而是研究这部著作。不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鞭策我这样做的是，我已经领导着一些很勤奋的青年政治学习小组。况且我已被选为共青团组织的书记。

一开始读《反杜林论》，我就停不下来了。当我发现这本书比我想象的更容易理解时，我是多么惊讶啊！

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阐述得如此清楚，令人惊叹不止。作品的第一篇就是谈这个问题的。第二篇也较好懂，讲述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觉得第三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更清楚。当我把全书都读完后，我沉思起来：“我这么快地就全都理解了，是不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于是我开始慢慢地把书中最突出的地方做摘要，更认真仔细地进行研究。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产生了想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愿望。这门科学在判断上有着数学般的严谨，而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关事实和现象进行的分析又很深刻，这就吸引着

我。概念、论据、事例、结论的严整性也使我折服。

后来，在大学和研究生班学习时，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著作。特别是在研究生班时进步更大，在那里这门科学被置于首位。

在我加入共青团不久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有那么一本书——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长辈对这本书的谈论和报刊对它的评论，我明白了，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弄到它。几个月过去了，我才得到它。

最初我是在戈梅利市图书馆见到这本书的。后来就买到了，稍后还买到了列宁选集。我发现这本书很难，书中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我把复杂的地方标出来。指望着将来“当我变得聪明些”时，我就能搞清楚了。

读《资本论》时，我思考了许多问题。

这本书就象珍贵的纪念品一样陪伴了我30年。但是后来，在我们从美国返回祖国时，“胜利”号轮船在黑海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本书连同我们家的东西都被烧毁了。

还在少年时代，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某些著作，特别是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本书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认为，这部著作就是现在也一点没失去其意义。书中深邃的思想同对马克思学说的实质进行的精确生动的阐述结合得那么好，使人在读这本书时不能不发出赞叹。

如果说我所获得的理论知识已完全够用了，并且一切问题都已绝对搞清了，大概是不谦虚的。就象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那样，这里也没有一个严格规定的够与不够的标准。总是要求继续提高自己，我一直有这种感受。但有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过去所获得的知识是必要的，也是为后来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人应该遵循的一门科学。这既涉及其丰富多彩的国内生活，也涉及对外事务。知识水平的深浅可以是不同的，但这个学说的实质、灵魂则每个人都应该懂得。

去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

1939年初，党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邀我去，这个委员会负责从共产党员中挑选一些可以派到外事、外交岗位上去的新的工作人员。这个委员会设在位于铁匠桥大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里。那天和我一起应召前往的还有其他候选人。我们所有的人到了铁匠桥后都在等待着，看命运女神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被邀请者一个接一个给叫进去。

我进去了，站在委员会成员面前。在这些人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维·米·莫洛托夫和格·马·马林科夫。他们对我说：

“现在谈的是可能把您调到外事部门工作，很可能是外交工作。”

现在很难准确地判断，委员会成员们为什么选择了我。我想，自我从事共青团尔后是党的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积极参加了科学宣传活动，如讲演、做报告、在机关和工厂企业举办讲习班和学习小组等，这些可能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学习小组和会议上。我的听众们多半是工程技术人员。

我经常按党的系统出差，完成的正是那些宣传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任务。毫无疑问，这也有一定意义。

显然，在读研究生班时，我在学习英语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我所掌握的知识离完善当然还差得很远。他们问我：

“您读过哪些英文书？”

我说了几本书的名字，然后又补充了一本使我感兴趣的科学方面的书：

“美国经济学家司徒雷登·乔易斯的著作《富饶的土地，贫穷的土地》。”

我已感觉到了委员会对我的好感，尽管还没对我宣布决定。

谈话就此结束了。

几天以后把我召到党中央去了，人们向我简单地宣布：

“如果您同意，就把您从科学院调到外交部门。”

随后是短暂的谈话。谈话结束时，我同意了。

就这样，1939年春天，我被任命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国司司长。毋庸讳言，我是怀着一种模糊不定的感情去接受这项新的工作的。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想尽快地熟悉业务，以便在委托我负责的岗位上能有把握地去工作。

开始了日常的外交工作。同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举行了首次会见。我仔细地观察着美国外交官。

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是劳伦斯·施泰因加特，此人的活动没有为苏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好处。我甚至还记得，我后来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一个问题：“罗斯福总统的视野开阔，况且苏美关系又事关重大，他怎么会选中这样一个人物呢？”

生活本身修改了这个决定。施泰因加特在莫斯科没呆多久。从各方面情况看，双方都对此感到满意。

自1933年苏美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到施泰因加特已经有两任大使到过莫斯科了。

第一位是威廉·布利特，从1933年至1936年。

是的，正是那个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同意于1919年来到我国的布利特。当时正值红军进攻最激烈之时，他们派他来商谈在俄国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弗·伊·列宁同意与布利特进行谈判，但在谈判中推翻了所有旨在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建议。

西方大国始终没有把在莫斯科商定的草案寄给苏维埃政府，因为他们指望，高尔察克已发动的进攻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恢复旧俄国。

但是协约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打错了算盘。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匪帮，高尔察克本人被枪决了。白卫军在全国范围内被击溃，外国武装干涉者则被赶出了我国领土。在我国各地都确立了苏维埃政权。

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罗斯福就把布利特作为美国首任大使派往我国，这大概并非偶然。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这位外交官已经拥有同苏联政府交往和接触的经验。

布利特作为驻莫斯科的大使，对苏联奉行的当然是不友好的政策。他千方百计地企图给华盛顿造成苏联软弱的印象。在任职期间，他竭力别有用心地描绘他在莫斯科的一切见闻。当布利特从莫斯科被调往巴黎当大使，以及在后来的活动中，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情绪。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利特参加了法国军队以后还是如此。同时，他是美国以反苏情

绪著称的《生活》周刊的正式记者。初露头角的新闻记者威廉·布利特也是用这个调门写自己的文章。1944年当罗斯福时代播种下的同苏联盟友建立友好关系的种子开始在美国的土壤里发芽时，布利特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仇视苏联的文章《罗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它激起了美国进步力量的愤怒。一直到后来，布利特始终坚持这种反苏立场。

他的继任者——约瑟夫·戴维斯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他劝导罗斯福政府，必须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其中包括发展贸易。他从1937年1月至1938年6月在苏联工作，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正面人物。他的夫人——玛尔杰丽·波斯特也很有名。当然，罗斯福总统不是平白无故地选中戴维斯这个人物的，他是民主党著名的、受人尊敬的活动家，所以，他自然能在发展苏美关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在华盛顿流传过一些关于戴维斯来到苏联首都的善意的笑话。应该指出，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美国也进行对苏联不友好的宣传。资产阶级报刊、政客不仅辱骂苏维埃制度、苏联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散布了大量谎言，如说苏联人民在挨饿，他们似乎生活在崩溃的条件下等。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革命，归罪于苏维埃政权。

新大使为了以防万一，于是决定添置家产。设在斯帕索—佩斯科夫斯基小巷的美国官邸的地窖、仓库没空着过。往莫斯科运来了不少各式各样的食品：既然说莫斯科糖少，那最好就自己运来半吨糖；米和油少，那最好也运来大量的米和油。让布尔什维克们知道，美国大使喝茶时加的是美国的糖，吃的是用美国米煮的粥，并且加了美国的黄油。

传闻大概有些夸大了，但在两国的首都都传得很广。

我要指出，戴维斯是位品行端正的人，况且还是着手同苏联发展关系的罗斯福派来的使者，后来这些都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戴维斯对我国一贯友好。他对苏联和对驻在国领导人的态度同其前任布利特的情绪截然不同。戴维斯深信，英国和法国政府对希特勒奉行绥靖政策并企图孤立苏联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时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常听到这种声音的。

戴维斯不知怎么地很快就同斯大林建立起了正常的事务性接触，对斯大林，他后来在同苏联代表，其中也包括同我的谈话中，总是给予充满敬意甚至热情的评价。戴维斯所阐述的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他说：

“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在研究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实际问题时，必须把意识形态分歧和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差别放在一边。”

这个意见很受罗斯福欣赏。德国法西斯日益增长的侵略性增强了美国有势力的人士对苏联采取这种态度。

戴维斯为发展美苏关系所进行的有益的活动被积极地坚持了下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想进一步谈谈这个题目。

前任大使约瑟夫·戴维斯

我在美国工作时就同戴维斯结识了，当时我们经常见面，相互到对方家里去做客。一句话，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戴维斯位于华盛顿市郊的住宅看起来很有气派。它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富人的官邸。我一生中有机会多次到过许多

加冕为王的人士的官邸。这些宫殿通常都建于那些不计工本的年代。数百万人勉强度日，过着极可怜的生活，但君主们却把拥有豪华奢侈的宫殿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否则，他们算什么君主呢？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普通人看到国王或女王陛下的宫殿时，惊讶得连气都喘不上来：“这才叫气派！”

美国还是在1776年就从英国国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里不承认国王，但当地实业界的代表人物积累的资金比欧洲某些君主还多，这些美国人在奢侈方面开始效仿旧世界^①，也修建宫殿。当然，大亨们的宫殿外表上并不一定富丽堂皇。有时甚至相反。有意识地使外表的建筑“平民化”。然而内部的装饰，他们认为是绝不能差的。其实，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常能见到。

美国总统们郊外的别墅——戴维营就是体现了这种观点的范例。戴维营内的房屋都是些矮小的建筑物。有时甚至使人觉得它们似乎是长在土地里的。然而外表是骗人的。进到里面，你就会为内部装饰之豪华而惊诧。你马上就会了解美国人在建筑内部装修、装饰方面讲究实在的精神：既豪华，又舒适，而最主要的是，巧妙地避开了外界的眼光。

戴维斯的官邸在这方面有点儿象戴维营。在官邸里没有狮子、龙、圣母的雕塑品。主人还忽略了喷泉。至于说到装饰本身，如常言所说，真是令客人眼花缭乱。并且大多数家具陈设和艺术作品都不是美国的，而是欧洲的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竟是从苏联运去的。

① 旧世界是指欧、亚、非洲，新世界是指南北美洲，这里是同新世界对比而言。

——译者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独一无二的家具、俄国女皇小客厅里特有的东西、金器皿，都是价值万贯的东西。我记得，在一次午宴上，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想用一下盐瓶，碰了它一下，但盐瓶未动。我发现妻子有些不好意思，就问她：

“你怎么了？”

“我怎么也拿不起盐瓶来，它可能被固定死了，而另外一个盐瓶离我又太远……”

盐瓶很重。它是用纯金做的，它曾经属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在桌子上就好象是被钉住了似的。当我们解开了重量之谜后，同盐瓶的斗争就以我夫人果断的胜利而告终。

主人邀请我们参观离主楼很近的所谓“俄罗斯小屋”。这座小屋里装满了贵重的、罕见的东西。而小屋本身则是介乎于博物馆和珍宝仓库之间的一种建筑。戴维斯一家在介绍展品时，回忆着何时、何地，在苏联的哪个城市里得到了这件或者那件东西。至于说到手的时间，那么大部分都是在30年代，也就是戴维斯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时候。那时，我们设了一些“对外”商店（全称为“同外国人做生意的商店”），在这种商店里出售许多用外汇支付的有艺术和物质价值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合法买来的，主人们显然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他们很骄傲地夸耀那些从苏联搞到的东西。

在观赏这些珍品时，我们无法摆脱掉这样一个念头：“这些东西最终将流落到何处呢？”这些由我国民间能工巧匠创造出的艺术杰作，主要是珠宝，在这个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国度里很可能要流散失所，漂泊各地，坦率地说，我对此感到惋惜。

当戴维斯举行大型招待会的时候，我和妻子也曾去做过客。前驻莫斯科大使的名声及其家庭的豪富吸引了“上层社会”，主要是政府、国会和阔绰商界的人物。从各方面看来，在这个社会里，对物质问题，女主人比男主人更在行。

在客人中我们经常见到参议员托马斯·康纳利和众议员索尔·布吕姆，他们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我常同他们交谈。

参议员康纳利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是个彻底的罗斯福派。正是总统提名他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和他最初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他在一系列有关同法西斯德国作战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有着正确的意见。有一次在约瑟夫·戴维斯家做客时，康纳利很大胆地主张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那时，在华盛顿，人们宁愿悄悄地谈论这个话题。政府尚未就此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就连戴维斯在发表意见时也很小心，尽管自称他主张英美军队在西欧登陆。

康纳利在维护自己的观点时说：

“如果美国从红军手中接受现成的胜利是非常不好的。从自己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美国应该显示自己是一支军事力量。而这样做的途径不仅是通过租借法案，而且应通过参加军事行动。要知道，情况已经表明，红军开始取胜，希特勒快完蛋了。”

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康纳利表现得比较温和小心。在关于新的国际组织的章程和作用的主要问题上，他对局势的估计比美国代表团许多其他成员都更为清醒。在关于五大国一致原则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康纳利也出过一些笑话。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头半部

分讨论建立一个各国在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进行合作的世界性组织问题。自然，就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主要是在苏联及其朋友和西方国家之间。轮到康纳利发言了。他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谈到各国，大国和小国。我的意见是，在这方面也应竭尽全力来维护小国的利益。例如，发言者们提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能欺负这个小国。应当保护它！”

他说到这儿时是慷慨激昂的。

当然，大厅里发出了善意的笑声。康纳利简直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什么是“尤耐斯克”。当他后来得知自己出的纰漏时，他自己也纵声大笑，只有美国议员才会那样笑。

在战前和战争年代，康纳利和布吕姆积极支持了罗斯福的对苏政策。

我在戴维斯那里还见到过好莱坞的“国王们”，其中包括哈里·华尔纳——一位当地有影响的电影工业家。华尔纳兄弟影片公司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影片公司之一。戴维斯是这样向我介绍哈里·华尔纳的：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位对苏联友好，并且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的人。”

只有我们3人站在那儿，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微笑着轻声地对我一人补充说：

“和他兄弟马约尔斯不一样。”

象戴维斯这样的美国富翁，照美国的做法，在社会上要表现出应有的形象。比如，哪一个有资本的美国人没有快艇！它可说是进入“上流社会”的名片。戴维斯家里也有一艘豪华的快艇。如果风暴不作怪的话，乘客们在这艘快艇上会感

到很舒服的。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的药片能防止晕船。有一次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应戴维斯一家的邀请也乘过他的游艇。当然只游了一会儿，离纽约不太远。观赏了沿岸景物。那次乘艇出游，给我留下的印象既有大城市的美景，也有岸上的脏物和成堆的垃圾，有些靠近岸边的水面上还覆盖着一层石油，在港口码头扔着大量的纸箱和碎玻璃。

戴维斯看起来总是那么笔挺整洁、精神集中。他没有美国实业界和中级官吏中的富有代表人物具有的那种做给人看的豪爽阔气和特有的扭怩作态。例如，那种人在和别人谈话时可以毫不在乎地就把脚放到桌子上，于是你就看他们的皮鞋底吧。戴维斯同这种美国人不同，他有另外一套习惯。他喜欢仿效显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骑在马上显示矫捷的骑姿。在英国首都，人们尽管不知道骑马的是什么人，都会对他怀有一定的敬意，因为只有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才能骑马散步。更何况是在海德公园或者是在肯辛顿公园……

在美国城市里，几乎见不到遛马的人。但戴维斯的住宅及其大片土地是在城外，故他可以骑马。遗憾的是，50年代末，在一次类似的散步时，戴维斯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他又活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能完全康复。他的妻子玛尔杰丽比他多活了几年。而且在这几年里，她又重新嫁过人，还不止一次，万贯家产帮了她的忙。

大概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本关于战争时期以及战后时期的对外政策问题的书里没有提到戴维斯这个姓的。1941年他领导一个隶属于总统的委员会，它将所有从事在战时负责盟国援助问题的组织的行动联合起来。

德国入侵苏联两天后，戴维斯宣称：

“俄国抵抗的规模将使世界震惊。”

这是什么？是直觉的作用吗？也许是因为对什么是苏联有很好的了解？我想两者都有，但最主要的大概是第二点。

戴维斯通过报刊、广播和许许多多的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美国人放弃对苏联及其人民的偏见。他也顽强地要求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出版的他写的《赴莫斯科的使命》一书和同名电影加深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戴维斯还曾是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也是其名誉主席。

他积极拥护罗斯福加强美苏间盟国关系的政策。1946年5月，戴维斯宣布：

“只有通过普遍承认罗斯福的遗嘱——英、美、苏团结一致，才能保障和平。”

为表彰戴维斯对加强苏美友好关系、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活动，1945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最高勋章——列宁勋章。

这个人有权要人们在美国和苏联长久地记住他。人们是在纪念他的。

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会见

让我们再回到1939年。我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美国司的工作时间不长，总共只有半年左右。有一天，人民委员部一位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说：

“克里姆林宫召您去，去见斯大林。”

消息来得很意外……在这以前，我只是在远处见过约·

维·斯大林。那是在红场上，当时他在向游行致意。只有一次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大会时见到的，我同企业、机关及科学界的其他代表一起被邀请上了主席台。

我迅即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有一位个子不高、仪表整洁的人。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回答说：

“我是波斯科列贝舍夫。”

这是斯大林的助手和秘书。他走进办公室通报我的到来。

就这样我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气氛严肃宁静。一切都是按工作需要布置的。一张不大的写字台，当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时，他就坐在这张桌子旁工作。还有一张大一点的桌子，是开会用的。后来我将多次坐在这张大桌子旁边。通常在这里举行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

斯大林坐在这第二张桌子旁边，侧面坐着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我已经在人民委员部见过他了。

斯大林，接着是莫洛托夫同我问了好。谈话是由斯大林开始的：

“葛罗米柯同志，想派您作为参赞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

坦率地讲，这个决定使我有些吃惊，尽管那时大家已经认为外交官同军人是一样的，应准备接受突然的调动。难怪流行这样一句话：“外交官就象士兵。”

斯大林简短地（他很善于这样做）指出苏美关系中应予特别注意的方面。

他说：“首先，鉴于法西斯威胁的增长，苏联能够同象美国这样的大国保持不坏的关系。”

这时斯大林就一些具体问题提了一些建议。我十分满意地接受了。

同时，莫洛托夫也说了些插话，支持斯大林的想法。

“我们想派您去美国，不是去一个月，可能也不是去一年。”斯大林又补充道，并认真地看了看我。

他立刻又挺感兴趣地问我：

“您的英语如何？”

我答道：

“我正同它斗呢，虽然学习过程是复杂的，特别是缺乏必要的口语实践，我好象在逐渐掌握它。”

此时斯大林提了一个建议，他令我有些不知所措，同时也使我活跃起来，主要是在谈话中不那么拘谨了。他说：

“您为什么就不可以常到美国的教堂、礼拜堂去听听教堂牧师的布道呢？因为他们讲话清楚，用的是纯正的英语。他们的发音也很好。要知道，许多俄国革命者在国外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外语水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大林这个无神论者怎么会突然建议我这同样的无神论者去美国教堂呢？他不会象人们说的那样，在考验我的可靠性吧？我差点儿想问：“那么，斯大林同志，您采用过这个办法吗？”但忍住了，没有提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斯大林不会外语，所以提这样的问题一般说是不合适的。当时我正如人们所说，“咬住了自己的舌头”，而且我做对了。当然，如果斯大林听到这个问题，他大概会把自己的回答变成玩笑，他在类似的场合经常这样做，这点我后来已得到证实。但是，在第一次会面时，我不想去冒这个险。

在美国，我当然没去教堂、礼拜堂。这大概是苏联外交官不执行斯大林命令的唯一的一次事例。可以想象，苏联的大使去美国的教堂和其他礼拜堂等会给那些机灵的美国新闻记者们造成什么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会茫然失措。这会把他们弄糊涂，迫使他们进行各种猜测，他们会提问：

“无神论者的大使为什么要去教堂呢，大概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无神论者吧？”

这就是我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会见后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按照我对一切经历过的事都进行分析的习惯，我思考着。想起此前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康·阿·乌曼斯基被召回莫斯科，看来，他未能全部满足中央的要求。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信任我，并委我以重任。

后来我才清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对大使有意见。尽管乌曼斯基又返回美国了，然而一切迹象表明，他在美国的工作快结束了。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后，有过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由一位以其在国际联盟的工作而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并与国联有联系的外交官担任驻美大使的话，大概能得到罗斯福的赞赏。所以任命了马·马·李维诺夫为苏联驻美大使。但他任此职的时间很短。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斯大林认为这个改善苏美关系的措施也是临时性的。

很快，就由本书作者替代李维诺夫当了驻美大使。

赴美国途中

见过斯大林后，我及家人立即准备启程。在被派往美国

之前，我没有出过国。所以我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热那亚、从那儿再换轮船去美国旅行，当时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从离开苏联国境到抵达热那亚之前，我们穿越了罗马尼亚（在那里我们停留了一昼夜）、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意大利实际上是我有机会直接了解国外生活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处都可看到社会阶层的强烈对比，特别是在人们的穿着上。

我还注意到，只要有两个人意大利人凑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发表演说，而这第二个人还没听完别人讲自己也就开始对第一个人发表演说。使人觉得周围似乎在举行群众大会或者在开会，尽管每一处的参加者常常只有两三个人。

我还记得这样一幅典型的意大利景象：衣服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晾在阳台上，在狭窄的小巷里，横跨街道拉着晾衣绳。我不由地产生个问题：“意大利人如何区分自己的和别人的衣物呢？”然而，他们是能分得清的。要是在我们那儿，我想，准得搞混，要有经验才行。

在热那亚，由于时间不够，旅游者通常要参观的那些地方我们都没能去看。

但是，我记住了参观以纪念碑闻名的墓地的情形。我们是同返回美国的康·阿·乌曼斯基一起去的。导游精力充沛地领着我们看一个又一个的纪念碑，热情地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墓地里的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有一段历史。而且，他讲得越多，我们听他讲的时间越长，这些故事也就变得越加美丽动听，如果在墓地里也可以用美丽两个字的话。

一位老年意大利妇女的雕像成了墓地——博物馆的独特

的中心。每一个第一次来墓地的人都认为必须来看看这位“老妇人”。我们从导游那里得知，这位普通的笃信上帝的热那亚女人年轻时就开始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建造一座纪念碑的钱，到时候好把这块纪念碑立在她的墓地上。她本人是卖小白面包的。当老妇人死时，她留下用于墓地建设的钱正好够造一个墓碑。结果就出现了一座体积不大、然而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念碑。这段往事的宗教色彩早已失去意义，然而，这座雕像在长时间里吸引了所有不同年龄的游客们的注意。

在热那亚，我们换乘了意大利的轮船“列克斯”号。^①船启航了。在轮船上我们看到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在那里度过了不少时光的卡普里岛。很快就抵达那不勒斯市。

过去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都爱唱歌。但我们一首歌也没能听到。好象故意似的，那不勒斯人没唱歌。

我们驻足那不勒斯郊区时，去了维苏威火山。我们是3个人：康·阿·乌曼斯基、我七岁的儿子阿纳托利和我。当导游一说出这座山名时，我一下就想起了我童年的“维苏威”——戈梅利的火柴厂，这个火柴厂在当时真叫我入了迷。工厂主为何给它取名为“维苏威”，至今对我仍是个谜。大概是因为想向人显示一下，他们的产品能象意大利火山一样地燃烧。

而现在，我已来到了真正的维苏威火山脚下。我们参观了火山爆发后被灰烬吞没的古庞贝城的遗址。

庞贝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

^① 后来，在战争期间，《列克斯》号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巴里地区被英国人沉入海底。——作者

导游讲述了这座遭受悲惨命运的古罗马城市的居民是怎样生活和死亡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导游是如此详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古老的庞贝城居民的风俗习惯，大概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会知道得这么多。我们怀着某种激动的心情在庞贝城的大街小巷里走着。由于只是部分地清除了各种各样的废墟、石块、碎岩，所以，考古学家在一些地方从废墟中挖出些专门的通道，相当清晰地复原了这座被毁掉的城市草图。挖掘和清理这座古城的工作实际上已不间断地进行了两个多世纪。谁也不知道，这项工作还要进行多久。历史学家们正在仔细地研究庞贝城，以便了解古罗马人是什么样的，其风俗习惯如何。

但是，尽管在有些经过发掘的地方杂乱无章地堆积着废墟，庞贝城总的景象却给人留下一种特殊的感觉。当你走过某个贵族的别墅或庶民住房的遗址时，总是有一个想法萦绕在你心头：“要知道，在此地居住的不是别人，而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在欧洲史而且在世界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很难想象，几乎全城的居民都在大自然残酷而盲目的力量的作用下死去。可事实就是如此。

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方时，导游把嗓音放低，而且已经很有经验地故意装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

“现在你们将要看到一种动人的现象。”

他带领我们缓缓地走向一堆废墟，显然指望着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服务会受到特殊的评价。

我们靠近了两具石化的骷髅。这时导游只说了一句话：“至于其它情况，你们自己会猜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欣赏着他所造成的效果，然后又补充

道：

“多少世纪过去了，这被灰烬、熔岩埋葬了的一对好象还在给后代做出与众不同的榜样：爱情胜过死亡”。

讲得不俗，而且，总的来说，是清楚的。

在城边上还保留着会场的遗址。我们去看了。在发生灾难时，吞噬了半圆形的剧场，但有些东西还是残存下来了。直到今天还完全可以想象出这座古罗马风格的遗迹的总面貌。当你现在望着它时，你会想到，大概有不少斗牛士奴隶在这个古代舞台上迎接了自己的死亡。总而言之，对每一个到过庞贝城遗址的人来说眼前都仿佛打开了一幅人类多卷历史中那最悲惨的一页。

我们注意到，不仅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街上，而且在国内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众多的军人。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都可见到穿军装的人。

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停地把手举到头部，相互行举手礼，甚至在大街上普通场合也尽量走正步，尽管众所周知，意大利人通常的行为特点是无拘无束和自由散漫。我对乌曼斯基说：

“您不觉得，意大利军人特别想让自己的举止象德国人吗？”

“是的，可能是这样。”他答道。

我们觉得，如果命令我们见过的任何一组军人马上开始唱抒情歌曲或者唱著名的《圣母玛利亚》，那么，士兵和军官们会忘掉所有的军队纪律和墨索里尼政权给他们穿上的军服，而象普通的平民那样高兴地唱起来。

然而，那些日子实际上已经是战争时期，离法西斯德国

进攻苏联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了。

……重新上路了，离开了那不勒斯，在海浪上颠簸。在船上有一件不寻常的事使我难以忘怀。这发生在我们穿越大西洋的时候。

船长邀请康·阿·乌曼斯基和我去他的船舱。看来，邀请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因为这一天是11月7日，适逢伟大的十月革命节22周年。船长用极好的意大利酒招待我们，并低声地祝酒：

“为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了列宁，干杯！”

我们当然被这种盛情所感动，热情地响应主人的提议。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法西斯统治意大利时期。

后来，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起这次祝酒。大家说，如果让意大利的领袖知道了，那咱们的船长就要吃苦头了。由此可见，即使在那严峻的岁月里，在意大利也有鄙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制度的真正的爱国者。意大利民用船队的大型轮船“列克斯”号船长就是其中之一。

又过了几天，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了大西洋的风暴后，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还有孩子——7岁的阿纳托利、两岁的埃米利娅到达了美国海岸。

在现代的巴比伦

我们离开了远洋巨轮，立刻就投入了大城市的怀抱。其实，“投入怀抱”这句话不能表达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被连续不断的轰鸣声和永不间歇的运动包围着。城里除了摩天大楼本身外，似乎一切都在轰隆作响和在运动着。而一切

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都在喧闹着，轰鸣着，叫喊着，吱吱响着，呼啸着。

四面八方都是一个紧挨一个的石头造的和金属造的高楼大厦。甚至对欧洲来说是正常的街道在这里也变得狭窄了。大街的宽度和房屋的高度之间一般的比例在这里都乱套了。难怪我们的儿子阿纳托利感兴趣地问道：

“怎么，美国人是经常住在这个城市里，还是只有白天在这儿？”

只好给他解释说：

“是的，他们经常住在这里。但是在这座城里住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苏联的总领馆就在这里，在纽约的第六十一街上。我们现在乘坐的就是总领馆的车。所以，在这座城市里还住着苏联人。”

不能说，我对这个现代巴比伦的最初印象同我读一些作品时（其中包括美国作家塞·德莱塞、杰克·伦敦、厄·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所形成的印象有多大不同。但不论如何，正如所说，当你置身在这座庞然大物的腹中时，你会更清楚、更明显地认识到，人凭借技术可以创造出实际上是与其天性相反的东西。要知道，本来应该尽力建造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使人可以欣赏智慧的力量和双手的技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叙述英国城市工人生活时所描绘的艰辛、阴郁的景象比那些第一次从旧大陆到美国的人所看到的一切要逊色得多了。在城里，特别是在工人居住区，会使你尖锐地感到，人的尊严在这里被践踏。永无止境地追求暴利的资本是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岁月里，象所有在美国担任公职的苏联人一样，我也确信，纽约并不是例外。在这

个城市里耳闻目睹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所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特点。

在领事馆我们住了不到一昼夜。受到了以苏联总领事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费久申为首的领馆工作人员的殷勤招待。然后就启程去华盛顿，我们乘坐“普尔门式”火车5个小时后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就是美国首都。如果就城市的嘈杂和街道交通来讲，当时的华盛顿同纽约相比，那是一座相当安静的城市。而且，今天的情况还是如此。在华盛顿没有大型工业。小企业、各种各样既是工厂又是商店的小厂占主导地位。有色人种居民在当时就已占城市居民一半左右了。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首都基本上一直是座官吏们的城市。为了从华盛顿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统治阶级需要一个由人数众多、官位等级不同的职员组成的机构。

对外政策和外交部门是这个机构的重要部分。苏联大使馆首先就必须同它打交道。我马上就开始了拜会。首先是拜会美国国务院。

引人注意的是，为我这个新来的在使馆算是第二把手的外交官拜会活动安排得相当顺利。

这里我应当说明一下，华盛顿的官方机构对乌曼斯基怀有某种戒备心理。最初，我认为，美国国务院里有人不喜欢他，于是决心跟这位苏联大使“过不去”。美国报界不停地散布各种关于他个人的谣言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大使同行政当局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的代表人物之间最终也未找到共同语言。我，这个处在汹涌澎湃的政治生活海洋浪尖上的新手也不得不考虑这一切。况且这些都发生在法西斯侵略苏联

的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开幕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尽管身体有病，但他依靠一个精心藏匿在讲坛后面的支撑物，站着讲话。

我望着他，想着他的勇气和意志。这个经常要同严重的病痛做斗争的人在讲坛上看上去是那么安详、充满信心。

不，当时我没有料到，命运会赐予我在今后几年里经常同他见面的机会。这一切都将发生在同德国法西斯进行严酷战争时期。

在美国的10天旅行

任何一个因职务上或其他原因到了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总是渴望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除了首都以外，还要去其他城市，访问各个地区。这是自然的。因为世界各国的首都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相似的。它们是国家主要政权机构的中心。

了解和研究驻在国，这是外交官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他有责任尽可能充分地向本国政府通报该国的政治和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情况。

到美国后，我很快就利用第一次机会去参观了美国几座工业城市。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了解在美国一些工厂实习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这次旅行是在1940年年中进行的。

我同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巴济金去了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辛辛那提、密尔沃基、伍斯特、坎登。在每一个城市里，我们至少参观一

个工厂。在有苏联专家的地方，我们同他们谈了话。

可以看出，苏联专家们对这种机会也感到高兴。远离祖国的苏联人渴望听到关于我国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关于当时还比较紧张的苏美关系的消息。美国统治集团本着反苏的精神按自己的意思解释刚刚结束的苏芬战争结局。他们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重新加入苏联也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这次旅行使我们得到了许多关于美国内地的实际材料。从报纸、杂志上不能读到所有的东西。而要想从那些在华盛顿经常与之打交道的国家职员、官方人士那里得到需要的消息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当然，后来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变。

还想谈谈与此次旅行有关的几点情况。

底特律是生产福特牌汽车的大型工厂。我们见到了工厂领导，就问他：

“能否参观一下贵厂？”

“请吧。”他们答道。

他们很愿意地给我们看了好几个车间。对技术问题的讲解既内行又清楚。我们在传送带前停了下来，汽车发动机被传送带送下来。我们注意观察，一些单独的零件是如何在经过几十道工序后变成了发动机的。

我们看见了正在从事真正苦役般劳动的工人。他们用手举起发动机上极为沉重的零部件，把它们翻转过来，把什么东西进行了加工，把螺丝拧紧。不难发现，工人们，大部分是黑人，都身强力壮，显然是挑选出来干这种工作的。当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时，可以看到，就连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劳动的肌肉也处于极大的紧张状态。他们脸上汗流如雨。传送带不停地运转着。

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是对马克思在其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描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学说的现实的图解。今天，剥削的方式变得更讲究了，但其实质却依然如故。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的传送带使剥削的形式更加巧妙了。

我们是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客人

在那次旅行中，我们有机会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民主党要推举弗·罗斯福作为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候选人。我们还在华盛顿的时候，就收到了作为代表大会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邀请。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大会都展现了极不寻常的、从一定意义来讲是独一无二的景象。

大厅里有好几千人。有无数的宣传画和标语牌。因为它们都安上了金属或木制把手，而且几乎每一个大会参加者都举着它们，故挥舞这些宣传画和标语牌，并且还要喊叫就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必要的了。他们指望所有这些叫喊声都有利于民主党人。至于这些有时汇成一片轰鸣声、仿佛身边发生了地震似的喊叫的内容，那是谁也弄不明白的。大会主席参议员阿尔本·百尔科利不断地敲击锤子，企图履行自己的义务——使气氛安静一点。但他白费劲了。如果没有扬声器，那么无论是主席的锤子声，还是百尔科利本人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听到。

看，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走上了讲台。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头发全部脱光了。他把两只手向上举着。站了一两分钟，然后开始讲话。故意充满了情感。当然，什么也听不懂。根

据手势判断，他讲得越来越起劲。然后停了一下，又重新举起双手，双眼也朝上面看着。他站在那儿，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听众会突然发出慈悲呢。但没有发慈悲的迹象。谁也依旧不听他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俯身问一位和我们并排坐着的代表（我们坐在主席台上）。我尽量大声讲话，以使我的声音不被疯狂的叫喊声湮没。

“为什么参议员在讲坛上表现得那么奇怪？他觉得这种滑稽手法有什么好处吗？”

我听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众所周知的。参议员研究过古希腊的演讲艺术。所以就采用了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古代人不象我们这样，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话。”

我的谈话伙伴笑了起来。

但奇怪的是，大厅里的听众对演讲人“优美的”手法并不感到很奇怪。根据我们邻居的态度看，他们在本国见得比这更多，算不了什么。

我心里想，如果这个把双手伸向天棚的人登上某个欧洲国家党代表大会的讲坛，那么，那些维持秩序的人大概会叫医生来帮助检查一下，这个人是否正常。而在这里，在讲坛上这种怪诞的行为却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差不多是很平常的现象。

在喧嚣和吵闹声中还是不难发现，每当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总会激起代表们兴奋的赞扬声。大厅里的人显然想表明，提名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是有把握的。结果也的确如此。

我们从头到尾参加了会议，然后走出房间开始兴奋地交

换感想。每个人都回忆起刚刚看到的大型表演中某个滑稽可笑的场面。然后，巴济金说：

“要想参加这种大选前的活动，或者出席这种会议，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行。”

我们对此都表示同意。我还补充说：

“但照我看来，我们在大会上见到的主要东西是罗斯福在这次面临的选举中注定要获胜。”

这是多数美国人所希望的。苏联人也对此抱有同感。

大会后，我们游览了芝加哥，参观了市容，然后继续我们的旅行。

在这10天里，我们仿佛在美国走了一个圆圈。我们经过底特律、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回到了华盛顿。

大使馆继续注视着美国政治生活的脉搏，尤其是因为1940年总统大选已临近。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罗斯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保住了总统的位子。

就这样，开始了我在苏联大使馆的工作。我到华盛顿时，整30岁。

此时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大学生约翰·肯尼迪正在攻读法律和资产阶级国家活动机制。他是22岁。

而在美国的另一端，在好莱坞，罗纳德·里根这颗电影明星正在升起。他刚刚拍完《地狱里的厨房》这部影片。

当然，3个人当时谁也没想到，许多年后我们将以另外一种身份相见……

——第二章——

在严酷的战争 时期出任大使

美国举棋不定 战争期间不拘礼节 罗斯福总统其人 他需要聪颖的人 华莱士的政治信念 在蓬加洛的午宴 外交界的元老 一批不寻常的活动家 洛克菲勒是这样想的 在美国土地上的动人会见 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和儿子们 美国文化界的明星 保罗·罗伯逊浑厚有力的歌喉 查理·卓别麟迷人的微笑 爱德华·鲁宾逊妙语惊人 俄国移民的分化 俄罗斯音乐文化的骄傲 “从白痴到天才” 前科学院院士和爱国将军 “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克伦斯基和索罗金 在布莱尔国宾馆同贝奈斯的谈话 历史包袱沉重的杨·马萨里克 一条艰难的航线：莫斯科—华盛顿

华盛顿，第16街……

通常读者在苏联书籍中看到的美国地址，常和某种神秘的东西或某些侦探情节有联系。然而，这里所说的地址绝对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它只不过是苏联驻美利坚合众国首都大使馆的馆址而已。

在紧张的战争年代里，这里是大使和全体苏联工作人员的活动中心。换句话说，它与我们整个伟大而强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比只不过是是很小的或者说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

根据国际法的所有规定，使馆领土和使馆工作人员享有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主权，这一点本身就一直鼓舞着苏联人，使他们感到自豪，因为正是他们受到信赖，被委以捍卫祖国利益的重任，他们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他们的感情是和祖国紧紧相连的。为了祖国他们身居海外，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和本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战期间、战后、直至今天，负责美国对外政策的华盛顿官方人士从来没有准确和详尽地回答过，美国为防止这场战火燃起做了些什么？

无论是已不在人世的，还是至今仍在分析那个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这一无疑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回答。

美国举棋不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西方政治家的言论和回忆录中以及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中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谴责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国的扩张主义野心，因此它似乎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在西方国家里，无论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家，还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迄今为止尚未有人认真地去思索一下，假如美国出来同主张和平的国家站在一起，首先是同苏联站在一起，表示决心参加组成强大的

反对侵略者的联合力量，局势的发展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折。

西方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意不这样做，因为战前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打算，也没有采取步骤对走上侵略道路的国家予以还击。对这些国家侵略行径的谴责主要只能在美国国务活动家在国会讲坛上发表的或在报上刊登的讲话中看到，况且这些讲话从实质到形式上都是极其软弱无力的。这当然只能证明当时华盛顿无意采取积极态度去制止希特勒及其同谋者实现其侵略计划，别无其他解释。

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疯狂地、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进行战争准备。这不仅包括军事战略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经济措施上的准备。假如美国愿意，凭借其经济和工业的潜力是能够做不少事来迫使希特勒帝国的领导人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进行三思的。

美国似乎长时间举棋不定，他们等待观望，犹豫不决。其统治集团似乎还没有完全看透法西斯侵略者的真正目的，没有意识到他们会给欧洲和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其实在战争前夕美国统治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同英法领导集团的政策很少有什么差别，英法领导集团是根本不反对法西斯德国把侵略祸水引向东方进攻苏联的。

只是直到灼热的战争硝烟开始吹向美国的时候，华盛顿的情绪才发生转折。德国进攻苏联后，每一个美国人都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问题：“哪个国家将是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目标？”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就连德国的盟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1941年12月）给美国造成极大的战争惨祸这一事实都远未能使所有美国人擦亮眼睛，认清

德国法西斯及其东方帮凶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自由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

更有甚者，在美国还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希望看到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在他们看来，这样在总结战争时由美国来说决定性的话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增大了。

这一切难道能够忘记吗？当然不能！苏联、苏联人民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国在战胜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胜利中所做的贡献。这一点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但是，美国却没有做到它为防止世界大战能够并且应该做到的事。

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把错综复杂的因素带进了战前的苏美关系中，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说也给苏联的外交造成了困难。美国对外政策决策集团的思维中原有的惯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战争过程中都有影响。

战争期间不拘礼节

1941年夏，华盛顿过着有条不紊的悠闲生活：国会放假，各部委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官员们一齐离开城市去度周末——在家人中间愉快地过着星期六和星期日。离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也就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半年。但是在苏联大使馆已经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了，这里收到了从莫斯科来的和部分从美国政府那里来的可靠消息。大量的信息需要认真分析，星期六、星期日我们也开始上班了。

莫斯科已是凌晨4点，华盛顿还是前一天晚上8点。因此，当希特勒空军轰炸明斯克、基辅、考纳斯和其他苏联城市时，当布列斯特要塞炮火冲天时，华盛顿还是6月21日的

晚上。

当天很晚时，美国电台援引欧洲方面的消息报道说：

“德国军队越过了苏联国境……”

6月22日清晨，我们在华盛顿收听了莫斯科广播，消息说，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

战争爆发了……

苏联人民和英勇的苏联军队坚毅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与德国法西斯及其强大的军事机器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许多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欧洲国家里开展了抵抗运动，这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第一天起，苏联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协助创造最良好的国际条件以组织向敌人的反击，进而彻底击败法西斯侵略者并从他们的沉重压迫下解放欧洲各国人民。苏联和苏联外交竭力设法巩固反希特勒同盟和开辟第二战场，尽管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

在同法西斯主义的鏖战中，由于事态发展的历史逻辑，美国 and 英国一起成了我们的盟国。搞好和发展苏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是战争年代苏维埃国家外交活动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在战时紧张条件下，苏美两国通过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经常进行联系并频繁交换苏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件。这是一种新的现象。这在过去两国关系中从未有过。从目前已经公诸于众的两国首都互相交换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信件中所提出和商榷的问题是多么重要。

通常由总统的军事助理恩德文·沃森将军到第16街的苏

联驻华盛顿使馆来见苏联大使，拿取斯大林给罗斯福的信。这是事先与罗斯福谈妥的。一切都进行得极其迅速。那时几乎没有不紧急的问题。当时我还是临时代办，将军从我手中接过斯大林的信后立刻将它交给总统，前后时间不超过15—20分钟，有时更短些。

有一次，罗斯福同我谈话时风趣地说：

“沃森的经常造访，大概搞得你们不得安宁吧？”

我说：

“总统先生，这种拜访使我们感到高兴，况且在莫斯科也重复着同样的做法，只不过情况相反，将您的信交给斯大林罢了。”

同罗斯福谈话时，我们讨论的始终是那个时代的实质问题，首先是最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尽快战胜希特勒德国。

同罗斯福的会见我至今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是坚定地认为，罗斯福是美国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他是一位智力非凡的政治家，视野宽阔，品德高尚。

还记得在向总统递交国书时，我说：

“作为苏联驻美国的大使，我将为谋求我们两国的合作和巩固两国的同盟关系而努力。”

罗斯福回答说：

“我认为苏美友好关系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按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相互致词，上面引用的几句话是在见面过程中谈话时说的。刚一见面，总统立刻就以他特有的直率建议说：

“请把您的讲话给我吧，这是我的，给您。明天它们将

会见报。现在我们最好来谈谈组织美苏英三国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

他指的是即将举行的三大国德黑兰会议。我们就这样做了。

说实话，总统干练的作风和他的直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喜欢他的这些特点。战争期间不拘礼仪，罗斯福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我当时想，白宫的主人并不是那种只关心给自己的思想套上一层华丽的外衣、以便给对方留下一种印象的贵族，而是任何一位将军都会羡慕的有性格的实干家。

罗斯福总统其人

总的来说，这次我作为苏联驻美国大使与罗斯福的会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代表美国正式同我打交道的是一位能够轻松自如、无拘无束地同人谈话的人。当谈到某个话题时，他不要求对方立即对他所提出的思想或建议作出反应。可以感到，他愿意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即使他的观点大体上似乎已经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喜欢回到他谈过的观点上，而且每次都用别的语言和从新的角度来表达。这些初步的印象在我以后同他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

我不能不指出的是，总统尽量使用别具一格的语句。这对他来说是轻松自如的。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同他谈话的人也用玩笑或讥讽的评论使谈话充满生气，当然如果这些话不是针对总统本人说的。

当时，在同罗斯福谈话时，如果细心端详他（在我同他

将近5年的交往中是有这种机会的)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里和脸部表情中流露出一丝忧愁。总统的微笑和有时欢快的举止看来更多的是因为他做出某种内心努力的结果,目的是想掩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想抑制心灵深处的忧郁。因为他那时已重病缠身。

还在1921年,罗斯福遭到了不幸。他得了病,疾病使他双腿失去了活动能力。事情是这样的:某一个夏天,罗斯福携同家眷在缅因州的康波贝拉岛休养。有一次,在海里游完泳回来他觉得不舒服,浑身发冷。第二天早晨开始发烧。他的左腿瘫痪了,过了两天右腿也瘫痪了。

从纽约请来的教授诊断说,罗斯福患了成年人中少见的传染病——脊髓灰白质炎(小儿麻痹),这种病当时正在美国流行。过了一段时间后,医生说他们已无力使他病情好转。罗斯福意识到,这次疾病的严重后遗症将伴随他终生了。

但是,罗斯福没想过要屈服。他以惊人的毅力发挥自己性格上的长处,他使自己(特别是在公开讲演时)显得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甚至和健康人一样。

罗斯福经常在各种不同的听众面前公开讲演,也在电视上做过讲演。他第一次向电视观众讲话是在1938年,这是在1941年美国开始定期的电视转播之前,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美国人做半小时广播讲话已成为传统,被称为“壁炉旁的谈话”,这种讲话罗斯福一年要进行几次。罗斯福善于把自己潜在的必要的毅力和力量发挥出来,使自己看起来面色很好,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

在群众大会和电台电视上讲话时,总统说得很慢,吐字清楚,思想表达明确。他不喜欢用手势,脸部表情高雅而坚

毅。总之，罗斯福的讲演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因此，他生前就被誉为“美国当代演说家中最伟大的政论家”是不无道理的。这事发生在美国全国讲演艺术教师协会的一次大会上。

后来，我再也没有碰到一个在这方面能与罗斯福媲美的美国总统。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点，这是我自己同总统会见时发现的，经常同他交往的美国活动家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这一点。他对自己谈话的对方，甚至对直接的政治对手都没有使用激烈言辞的习惯。当然，这不包括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活动家。

在有这种必要时，罗斯福更喜欢施展自己用幽默回答对手的本领。而那些被罗斯福狠狠嘲笑过的人正象所说的那样都有些“那个样子”了。罗斯福射出的幽默之箭更刺痛人！连他的政敌们都发现了这一特点。

也应该讲一下罗斯福是如何参加谈判的，首先当然是参加苏美英三个同盟国领导人的德黑兰和克里米亚会议。根据我个人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对总统的观察，应该强调指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克制力，甚至在这次工作会议最紧张的时刻也努力为谈判创造和解求实的气氛。

在这方面，美国总统肯定要比英国首相丘吉尔略胜一筹。总的来说，他们两人从性格到气度有许多不同之处。众所周知，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尽管丘吉尔在会谈的对方面前竭力使自己的举止不越常轨，但还是在讨论某些问题时大发雷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给读者的印象也是这样。

罗斯福辩论时的做法更象斯大林。斯大林说话从来都留

有余地，而丘吉尔却不是这样，他有时控制不了情绪，为感情所左右。在这种时刻，美国总统就用适当的词语试图缓和气氛，使争论的双方平息下来。

当然，这里不是指罗斯福会过分地做某种谦让。他同样坚定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努力获得可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比丘吉尔做得更巧妙、更策略。

不妨提一下，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他属于美国统治阶级中比较清醒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对待苏美关系发展问题的那些人士。所以，正是在他执政的1933年苏联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不是一般的巧合。

罗斯福得以在战争时期为加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信任做了不少事，认识到并珍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役中所作出的，用他的话来说，巨大的贡献，而且不怕公开说出这一点，所有这一切只是更突出说明这位政治活动家的现实主义精神。

说到美国总统同苏联代表的会晤，应该指出，这些会晤的性质和气氛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使苏美关系受到限制，但是在涉及讨论两大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以及在建立和发展两国之间合作事业中的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两国达成相互谅解的范围仍是相当广泛的。

那些忘记了这一点的华盛顿活动家完全可以重温一下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执政时苏美关系中积累的经验。

在美国，关于罗斯福的文章和书都很多，其中主要是他逝世后写的，绝大多数是写他任总统期间的政治生涯，这是

可以理解的。

这些作品的作者同美国整个社会舆论一样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将他看成备受大多数美国人尊敬的杰出领袖来评论他的政治生涯；另一派是他的政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总统的观点甚至持批评态度。不言而喻，第二派人倾向共和党。

这位杰出的美国人去世已有40多年了，现在与罗斯福同时代的、又对他本人很熟悉的人已经不多了。

因此，目前出版的关于罗斯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转述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发表过的东西。

作者的评价也大约同过去一样分为两种，区别只在于援引罗斯福时期政府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的事实时不确切的東西增多了。

上面所阐述的是我对美国和苏联都感兴趣的政治问题的某些评价，由于本书的体裁是回忆录，所以阐述得非常简略，甚至有些吝啬。但这些评价是需要的，因为谈论的是重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要知道，斯大林与罗斯福讨论了未来世界的格局问题，未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这里说的是要记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了的千百万人，建立一个有效的、能保障和平的国际组织。

但是，现在文艺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客观材料足以塑造罗斯福总统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现有的照片和电影镜头是很不够的。因此，我愿意为他的肖像再补描几笔，并不奢望讲得详尽无遗。

我想也许以下意见是正确的：在解决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千百万人性命的重大问题时，在许多方面是取决于政治

家们的，这样的一些政治家很难扮演“双重人格”的角色。一个对和平持敌对立场的人在每天同人们的交往中，包括同其他国家重要活动家的交往中不可能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和平、友谊、人类善良的伟大理想的代表，不可能不冒暴露其真实面目的风险。

历史上有许多这种例子。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疯狂的元首^①。早在德国总统兴登堡^②接受新总理宣誓之前，这个纳粹分子的侵略哲学就已一目了然，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

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目光真诚，待人接物和藹可亲、彬彬有礼。他总是能对谈话的对方及其国家说些美好的言词。如果谈话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他的举止就比较随便，会请你看墙上的画像，尽管画像并不很多。

当然，他由于有病谈话时自始至终都坐着，但他能够以自己的举止使周围的人甚至忘掉他行动不便的事。他坐在桌前，灵活好动，来回转身，有时画些什么，或拿起需要的文件。

他时常叫来助手询问情况，或下达指示，这自然使谈话多样化。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我说，看罗斯福的脸色就能猜到他对所讨论的问题持何态度。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我注意到，他是怀着什么样的敬意提到斯大林的。他在说斯大林时把重音放在了“林”上。我没有给他纠正，因为我知道别人曾想纠正过，可他根本不注意这些意见。

① 法西斯德国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

② 德国总统（1925—1934）。1933年1月30日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将政权交给了法西斯分子。——译者

我不想来判断，罗斯福在召开各种会议时或在白宫进行双边会谈时是否经受着肉体上的痛苦。我想，多半是有过这种痛苦的，尽管用了药，但是，从外表上却很难察觉。显然，这是由于他那惊人的自制力，无疑还有那非凡的毅力。

但是，他的疲惫，更确切些说，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还是逃不过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一点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才能看到。

在克里米亚会议之前的会谈中我注意到，罗斯福在提到丘吉尔的名字时微微一笑。这多半是因为三巨头之间书信频繁，丘吉尔就波兰问题和德国赔款问题向罗斯福提出了各种主张，而罗斯福当然也清楚斯大林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观点。斯大林的观点同丘吉尔的意见是各不相同的。

总统显然是赞许他的夫人到我们使馆来拜访和同大使夫人进行接触的。

他需要聪颖的人

在美国总统周围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总统经常同他们商讨内政外交问题。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和去世后曾有人认为，似乎罗斯福几乎一切问题都是自己决定的，不需要同其他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进行深入的讨论，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确实，当罗斯福认为某些决定无疑是有充分根据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但在确立这种信心之前，他也要别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那些他所信赖的和懂行的人士和朋友。总统喜欢有专门知识的人。

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他说：

“这么多问题弄得我头晕脑胀，要想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聪颖的人。”

罗斯福也没有逃脱几个世纪的经验所证明的规律。在这方面总统的做法同其他古代或历史上较晚一些时期的重要人物一样。

一般地说，由于罗斯福所处的地位和他具有的某些性格特点使他同某些人的联系为人所共知。对此他也不想掩饰。比如，在就任总统期间，罗斯福经常向苏联大使，其中包括我在内，建议说：

“请您去找哈里·霍普金斯谈谈这个微妙问题，他也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能准确无误地向我汇报。”

苏联大使们当然重视总统的这一建议。不过有时也碰过钉子，那多半是由于发生了误会。比如，在苏联使馆的一次午宴上，乌曼斯基大使在同霍普金斯谈话时就一个重要问题阐述苏联的立场，对方觉得他说话的语气过于严厉了。这位美国人大发雷霆，谈话已经难以挽回了，只好就此结束。乌曼斯基向莫斯科报告这一事件时做了自我批评，由于事情只涉及到阐述立场的方式，而不是内容，这件事虽然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留下了痕迹，但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

霍普金斯被认为是一个聪明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人。除在短时期内（1938—1940年）担任商务部长外，他并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然而他却得到罗斯福的赏识。在战争与和平的所有基本问题上，他的政治观点和罗斯福本人的观点相吻合。这正说明为什么霍普金斯在华盛顿和政府中有这样分量的主要秘密所在。

哈里·霍普金斯本人是美国政治天地里一个罕见的人

物。他在43岁时来到白宫，而在此后的12年里始终跟随罗斯福。当时任何一位国务活动家都没有霍普金斯同总统所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

大家都知道，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总的来说，他的生活按美国的标准来看是相当俭朴的。在白宫任职期间，他的年薪比1937年前还要低。

他被非正式地称为“副总统”、“白宫参谋长”、“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最令美国人惊奇的是，霍普金斯不愿靠自己接近最高权力来发财，不愿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捞取个人的好处。

鉴于他的作用，外国首相和总统到美国来时都争取同他会面。在最复杂的危机时期，他处事冷静，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就连美国的商业巨头也无不为之兴叹。

霍普金斯不仅是总统的耳目，形象地说，他还是总统的腿脚。在美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罗斯福总是派他，霍普金斯，到国外去完成最重要的使命。

1941年1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在欧洲熊熊燃烧时，霍普金斯飞往伦敦去见丘吉尔。1941年6月，纳粹德国侵略苏联，同年7月霍普金斯就已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罗斯福对他极为信任，以至从未给自己的这位密使下达过任何书面指示。

霍普金斯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他身患重病。飞机在伦敦着陆时，他虚弱得不能自己解开安全带。医生始终无法确诊他患的是什么病。饮食对他毫无用处，他基本上靠注射和输血维持。

罗斯福去世后，霍普金斯立即要求退休。他唯一的愿望

就是写一本关于与他并肩工作多年的总统的书。但是，他没能来得及，罗斯福去世后9个月他也离开了人世。

我曾同霍普金斯进行过多次密谈，其中有的是在我们使馆进行的，他有时带着夫人一起来使馆。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总是非常高兴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霍普金斯喜欢小范围的会晤，从同他进行的谈话中我不记得有过他所说的话同罗斯福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使馆同霍普金斯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他对未来非常关切，主动谈起这一问题，他说：

“战争结束后，美苏关系究竟会怎样呢？德国将被迫投降，这是无可置疑的。罗斯福总统对此毫不怀疑。”

这次谈话是远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进行的，当时红军已经向西挺进，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白：谁都无法阻挡它前进。

霍普金斯说：

“罗斯福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问题，他想展望一下未来，而且他不是顺便说的。各界的代表都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确，政治家多于实业界代表。”

霍普金斯被认为是消息十分灵通的人士，因此，他的意见总是使人很感兴趣。

霍普金斯说：

“罗斯福本人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固定的看法，因为要找到准确的回答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因素当然是作为大国的苏联的政策。”

当时“伟大的强国”这个词还没有开始使用，霍普金斯所使用的词汇在现代政治家看来已经过时了。

他继续说：

“但是，从总统言词不多的表态中，我还是体会到一点，那就是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在将来也要同苏维埃俄国搞好关系。”

我回答道：

“由我送交的，其中也包括通过您，霍普金斯先生，向总统转交的所有斯大林的信件，不仅充满着对总统的敬意，而且也充满着对贵国的敬意。如果两位领导人的观点相同，那不就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吗？当然，斯大林所表达的愿望，甚至坚决的请求并非总是得到赞同的答复。”

这时我引证了一件事，尽管霍普金斯似乎应该知道此事，但这还是给他留下了印象。

“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几天后，”我说道，“苏联驻华盛顿使馆收到斯大林签署的电报，电报中请求美国政府向苏联提供坦克用的装甲板，我们极其缺乏这种装甲板。但是，我们没有收到同意这一请求的答复。当时美国什么也没有提供。自然，莫斯科和大使馆对此只能感到一种苦楚。”

“是的，”霍普金斯说，“这我知道，并不是罗斯福政府所做的一切都能使莫斯科满意。可是后来情况还是有了改进，我们提供了军用飞机、载重汽车、轮船和许多食品。”

我不想同他争论，也不想去证明什么。即使不做任何说明，我们国内和美国也都知道，在战争的第一年，也就是伟大卫国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美国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他们似乎在等待观望，看苏联是否能坚持下来。只有当他们看到苏联一对一地坚持了下来之后，才开始逐渐提供一些东西。

霍普金斯说：“不知怎么华盛顿当时就是这样，战前总统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国内问题，而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日

本偷袭珍珠港和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后，他开始更多地思考未来的世界局势和战后我们两国的关系问题。”

这位接近罗斯福的政治家知道的事情很多。霍普金斯对与最高权力接近的这种关系毫不掩饰，反而为之自豪，他谈起过有关总统的细节情况。例如：

“从前罗斯福象位战士，尽管身患疾病，还是猛烈地抨击共和党人。这些人常把自己的侧翼暴露在罗斯福面前，因为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上他们无法与总统较量。当他情绪很激动时，言辞也十分尖刻。有一次他把共和党人称做‘盗马贼’，针对他们的强烈反应，罗斯福声明说：‘我完全不是说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是盗马贼，只是说所有的盗马贼都是共和党人’。”

霍普金斯把罗斯福称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专家，接着他又开始评论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他说：

“总统逐渐地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外交事务，在这方面他比过去积极多了。”

这时我想起了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于是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

“在谈到两国未来的关系时，斯大林的言词虽不多，但却使人相信，假如美国愿意，苏联领导会努力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霍普金斯讲了自己对未来苏美关系的看法，并没有说这是直接受罗斯福的委托谈的。我了解霍普金斯，所以相信，他的思想就是总统的思想。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我对这一点都确信不疑。

这就是我同霍普金斯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况。

当然，他是完全忠实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民主的。而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始终代表自己的阶级，并且对谈论理论问题不感兴趣。

但是，这位外表瘦弱的人作为罗斯福的亲信和爱国者，在战争年代，为苏美关系的发展，因此也是为了赢得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做了重要的工作。

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许多方面也赞同霍普金斯的政治观点。我同这位亲罗斯福的活动家建立了极好的关系。我不止一次地证实，他在同我谈话时所表述的思想也反映了总统的意见。摩根索本人也不掩饰这一点。

财政部长谈论战后世界格局时非常大胆。

他说：“应该使德国在战争结束后无力重新走上侵略道路。希特勒时期所犯下的罪行已是罄竹难书，无论是我们的人还是你们的人，今后不应允许这一切重演。”

他不认为这种政治方针在美国会遭到一些有影响的集团的反对。

他说：“军人们相当坚决。美国商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不希望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部长做了如此坚决的表态，始终是一个很大的谜。因为就其职责来说，他应该知道，在整个战争时期美国垄断组织都在用自己的资本帮助德国的工业为希特勒军队制造武器。

在军事行动结束和德国投降后，报刊立即披露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很难设想，我的谈话对方在战争年代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但另一方面，战时美国政治的秘密有时是难以接触到的，以致许多人，甚至连身居

政府要职的人士都不知道美德资本在战争年代进行合作的规模。因此，毫不奇怪，战后国会开始对这种合作事实进行调查的工作立刻就收场了。完全有可能连摩根索都不知道战时美德垄断组织合作的规模。

在谈到德国的未来时，摩根索这样说：

“在欧洲防止侵略的最可靠途径是将德国分成几部分，甚至可将一部分德国人移居到世界上别的地区去，如北非。”

的确，在谈到这事时他每次都补充说：

“总统本人尽管知道有这样的主张，但还没有切实地对此计划进行研究。”

在战后如何解决德国命运的问题上，看来摩根索站在最激进的立场上。但是，这种决定具体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谁也说不确切和权威性的意见。连罗斯福也不急于确定自己最后的立场。况且同盟国也决不是对所有有关战败的敌人的命运问题观点都一致。

内务部长哈罗德·伊科斯也是同罗斯福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我同他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不无裨益的。

身为权威人士的霍普金斯、摩根索、伊科斯同罗斯福一样，坚定地认为，苏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妨碍两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和战胜敌人后在建设和平生活、建立两个盟国间良好关系方面进行合作的障碍。

后来的事件，特别是战后的事件证明，决定罗斯福及其政府的政策方向的观点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

在“冷战”时期，当美国政府开始信奉暴力和军备竞赛时，其政治战略就迥然不同了。

华莱士的政治信念

当时我同罗斯福政府中的许多其他高级官员保持着经常联系，其中也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这位人士是罗斯福政策拥护者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值得费些笔墨。

从其父母来看，华莱士是出身于19世纪上半叶分别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世袭地主家庭。同在美国的整个华莱士氏族一样，他所代表的是农场主、即“家庭农场”占有者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代表其上层人物的利益。从阶级观点看，他所持的观点是在大垄断资本的极权面前心惊胆战、并力图在社会发展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华莱士受过多方面的教育，对经济、统计、生物学、遗传学乃至历史都十分精通，并对哲学问题很感兴趣。他还是农业科学方面的一位大专家，有不少学术著作。

在罗斯福第三次总统任期里，华莱士出任副总统（1941—1945年）之职，在此之前他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理论家，领导农业部达7年之久。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地位显要的人中，我很少遇到象华莱士那样在对外政策方面不是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是着眼于未来的人。身居美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他总是同那些主张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苏联积极合作并渴望战后建立持久和平的人站在一起。

美国人中有人坚信，无论战时还是战后，离开苏联就无法解决世界政治中任何一个稍微重大的问题，华莱士就是其

中之一。他敢于公开宣布苏联对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战争年代，华莱士就说过：

“俄国人重创敌军，使其土崩瓦解，抓获的俘虏至少等于所有其他盟国抓获俘虏总数的20倍。”

作为苏美合作的拥护者，华莱士早在1943年1月就在日记中写道，保持苏美之间良好的相互关系将是战后世界上的首要问题。他在那时就已想访问我国并于1942年开始学习俄语。后来他俄语讲得还相当不错。

对苏联的访问极大地丰富了华莱士对俄罗斯和我国人民的了解。1944年5月，他先后访问了马加丹、雅库茨克、（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塔什干和其他一些城市。他还访问过舒申斯科耶村，参观了当地的弗·伊·列宁博物馆。

华莱士返回美国后，对我说：“这次对苏联的访问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此后，华莱士不止一次地重申了这一看法。可以说，在亲眼看到我国人民的伟大、忘我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后，他才真正认识了苏联。

华莱士在交谈中常常主动把话题转到美苏在国际事务中利益一致的问题。他十分清楚地了解两国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观点：

“美苏两国人民具有一切条件来进行有效合作。两国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我相信，苏联将恢复并成功地发展其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然而，苏美合作首先意味着应排除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华莱士没有特别深入地从理论上去论证美苏和平合作的

必要性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甚至不太愿意去深入思考这些他称之为“高深的理论”。他用坚决的口吻说：

“美国人与俄国人任何时候都不应互相残杀，更不应发动新的战争。”

华莱士特别强调，美苏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防止德国在将来发动侵略。他的思路同最接近罗斯福的其他许多人士的想法相差无几。

华莱士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并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毫不动摇地采取了反法西斯的立场。

“纳粹关于北欧人种是优等人种的谬论^①显然是一场骗局。”他坚决地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主张坚决抵抗纳粹德国及其盟国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

华莱士认为和平永远是十分珍贵的。他推崇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进行广泛有效合作的主张，反对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正是他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成为评价这位活动家政治信念的主要依据。

所有这一切与今天确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方针的那些人的政治哲学相距甚远，他的观点与就在世界大战结束三四年后成为华盛顿对外政策基石的东西也根本不同，那时在美国的庇护下一些与苏联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相对立的国家开始拼凑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

对于我这个苏联驻美国大使来说，同华莱士谈话是很轻松的，因为他的见解很有生活的逻辑。我国竭尽全力进行了

^① 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一种反科学的理论，认为北欧人种是优等“人种”，似乎他们才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译者

反法西斯斗争，自然对战后保障持久和平非常关切。这种和平是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同反希特勒同盟国合作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是，为此要求所有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始终忠实于自己同盟者的义务。

在美国，与华莱士思维方式相同的人当时无法想象到，华盛顿和其他与我国结盟国家的首都很快就开始践踏这些义务。在罗斯福的陵墓前，我们的西方盟国开始放弃他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吹捧与不久前三巨头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宣告的建立战后和平的目标和原则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

很清楚，越到后来越明显，华莱士的观点同美国领导集团中地位日趋巩固的那部分最反动的人的情绪相距甚远。副总统的反对者企图给他戴上幻想家、不求实际者的帽子。在1944年总统大选中，为了得到右翼民主党对自己的支持，罗斯福不得不同意推举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而不是华莱士。

在华莱士副总统任期结束后，我还同他会过面。1945年，还在罗斯福逝世之前他被任命为商务部长，可是在1946年就被后来成为总统的杜鲁门免职了。此后华莱士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

当然，华莱士看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向什么方向转变。制定这一政策的决策人已经越来越偏离苏美进行战时合作以反对法西斯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方针了。在杜鲁门政府上台的初期这就已经很明显了。

1948年华莱士试图碰碰运气，作为他所创立的进步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结果失败了。竞相提出各种对苏不友好的主张，煽动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成了那时美

国政治气氛的特征。华盛顿的政策越来越为帝国野心服务，这公开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拼凑侵略性军事集团，在他国领土上部署稠密的美国军事基地网，扩大美国对外经济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同华莱士观点相同的人士是毫无前途的。

在蓬加洛的午宴

我想再做些补充，大体描绘一下华莱士这个人。同他见面后得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象俄国人。他中等身材，褐色的头发，诚恳而愉快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我觉得华莱士似乎有点儿腼腆，动作有些拘谨。但这并不影响他自由地交谈、交往和殷勤地待人，尤其是当他不是客人而是主人的时候。

华莱士很能引起对话者的好感。如果他讲话中有什么不准确或错误，那你会感觉他不是故意的。

华莱士很善于识别人。对引起他好感的人非常关注，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不成其为华莱士了。

华莱士对苏联代表的态度始终很友好。有一件事，我回想起来感到很亲切。有一天早晨7点钟，我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喂。”我拿起了听筒。

这么早就往大使家里打电话是很不寻常的。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是使馆值班管理员，刚才使馆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副总统华莱士，还对这么早就来打搅表示歉意。”

“后来怎么了？”

“他请求把一些药片转交给大使夫人，然后就走了。药现在在我这里。”

原来，前一天华莱士的夫人和我的妻子在一起谈起过一种减肥药，这药的好处只有妇女们清楚。当时，搞到这种药是很困难的，可是华莱士还是不怕麻烦地把药搞到了，并亲自送到大使馆。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却说明了一些东西。

我和副总统经常在华盛顿市里见面，但有一天他建议说：

“我们与夫人们一起到郊外去，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吃饭，同时讨论一些问题，您看怎么样？”

我对此没有异议，华莱士接着又提了一个建议：

“我想，如果瑞士大使夫妇参加我们这次郊游，您不会反对吧？”

我对这点也没有不同意见。

“顺便说一下，我的妻子和这位大使的妻子是近亲。”华莱士补充说。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约定的时间出发前往城外约40英里处约会的地点。我们的会见是在蓬加洛的一所木房里举行的，这座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里面却很舒适，完全不象从外面看起来那么一般。

午宴组织得很好，安排得恰到好处。谈话时，瑞士大使告诉了我一个重要情况：

“我国政府表示有兴趣恢复瑞士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当然，我对此也表示了应有的关注。我们两国外交关系是由于1923年我国全权代表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在洛桑被害而中断的。我答应大使说：

“我将立即把您所说的话向莫斯科报告。我个人想指出，这一主张会得到发展的。”

结果正是如此。苏联和瑞士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蓬加洛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华莱士小声对我说：

“我想同您单独谈一会儿。”

于是，我们站起来离开了餐桌，把夫人们留在瑞士大使那里，走到了离他们不远处，在那个宽敞房间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坐了下来。

副总统对我说：

“现在，同盟国战胜希特勒德国的迹象大体上已经很清楚，我们两国应当利用这种形势迅速改善两国关系。同盟国的关系不应当削弱。这个问题很使我担忧，因为对这个问题在美国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大商人中有些人对苏联的反感情绪现在甚至占了上风，压倒了在美国人民心中被苏联红军在战争前线建立的功勋所激起的友好感情。”

听完了华莱士的讲话，我回答说：

“您说的完全对。的确，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绝不能削弱。因为我们所以成为盟国是两国基本利益所要求的，而不是权宜之计。这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两人亲自交换意见的结果。”

我稍加停顿，看了看华莱士，想知道他对我的话的反应。他在注意地听我讲，于是我又继续说：

“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美国大商人的情绪问题，您作为副总统，当然更清楚这种情绪。但是，我想，您所說的某些大商人的情绪在变化的倾向是存在的。我们在美国的苏联人也感到了这一点。但我们觉得，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

力量施加影响，改变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因为商业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认为，实业界可以从同苏联的贸易和发展关系中得到许多好处。和平时期为此提供了极大的可能。特别应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将非常需要从美国购买设备，以便恢复因德国强盗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

紧接着，华莱士象顺便提到似地（同我会见时还是第一次这样）说道：

“正如所知，总统的健康状况不佳，尽管他仍积极地处理各种事务，而且十分关注苏美关系的未来这一问题。”

当时我得出的印象是，有关总统健康的这段话，似乎是顺便说的，实际上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很难说，华莱士是否知道，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他这颗星将坠落，参议员杜鲁门将成为他的继任人。很可能，他并没感觉到这一点。也完全可能，当时连罗斯福自己对更换副总统的计划也还没酝酿成熟。

后来，我们同华莱士又见过两次面。1946年初在纽约，他来见过我，当时他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您怎么看，我能否在1948年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我的回答当然是想鼓励他。但是，坦白地讲，他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使我有为点儿为难，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的对话者清楚地知道，我们把他当作罗斯福的知名战友来对待。因此我们对他所提的问题的回答会是简单的：“我们主张保持苏美友好关系，如果持这一主张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我们只会表示欢迎。”

第二，他提这样的问题，毕竟表明他对实际情况和选民

情绪没有足够确切的了解，当时选民已经受到主张“大棒”^①政策的强大宣传攻势的影响，早在本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极力鼓吹这一政策。美国统治阶级现在也想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大棒”政策。

说实在的，这次谈话之后，我感觉到，华莱士似乎越来越难以摸到美国政治生活脉搏的跳动，显然他缺乏经验丰富的谋士。

好象还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次华莱士邀请我和妻子到他的别墅去玩，在那里逗留几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到离纽约大概100英里处他的郊外庄园去。我们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实业养殖场。那里饲养供出售的牛犊。但是养殖场主要还是养鸡，用饭店的话说是“雏鸡”，主人亲自给我们讲解：

“雏鸡是我的主要生意，其余的都算不了什么。现在请看看我的‘家产’吧。这是鸡舍和它们的‘住户’。”

我们看到那有成千上万只鸡。参观过程中可以发现，这里认真地对待组成这个生意的有机部分的每一个环节，如清扫鸡舍等。而且，这位前副总统本人好象也毫不躲避这种工作。

交谈中，我感兴趣地问道：

“养鸡业赚钱吗？”

华莱士没用什么数字来回答我。他很快地说了几个字，其意思用“不怎么样”来表达最好不过了。

我们感觉，华莱士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很可能他对此也

^① “大棒”政策是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1901—1909）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推行的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政策。——译者

并不怎么追求。显然，做“大生意”他并不入门。

我怀着亲切友好的感情回忆华莱士，从政治方面，也从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回忆他。

外交界的元老

毫无疑问，1933—1944年任国务卿的赫尔·科戴尔是战前和战时罗斯福政府的台柱之一。他是深受总统尊敬和信任的、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在我们同他打过交道的苏联人的记忆中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赫尔任国务卿时，苏联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其中说明了，包括赫尔在内的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能够逾越导致华盛顿长达16年不承认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狭隘阶级利益的障碍，从而现实地对待那种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无视苏联的荒谬做法。在新的战争危险开始增加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步骤只能理解为，对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作用有了认识。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赫尔奉行罗斯福路线。诚然，苏联使馆不止一次从完全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国务卿与总统不同，他在苏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不那么始终如一，他认为不应当急于同苏联发展关系。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美国国务院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在战争年代由于两国间纯政治性的关系被战争事件直接造成的因素所取代，因而罗斯福政府中某些人对苏联的冷淡态度还是被美国领导层中总的、更清醒的情绪所压倒。

苏联驻美国大使亚·安·特罗扬诺夫斯基、康·亚·乌

曼斯基、马·马·李维诺夫以及后来的我，曾多次同赫尔·科戴尔会见过。当国务卿本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同我们会见时，常常由他的副手接见我们。从会见总的次数及当时莫斯科与华盛顿频繁联系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总的讲赫尔对苏美关系是十分重视的。

我不记得，有哪一次同赫尔的谈话因某种原因而突然紧张起来。他有分寸、善于控制自己。当讨论问题出现了困难和分歧时，他宁愿暂时放在一边、挂起来，也不愿争吵。当他对某一问题持否定立场时，他尽量说得婉转些，这时连讲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这恰恰符合赫尔本来的音色。

当然，这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这样做也未必能使谈话对方感到快慰，但这有助于创造一种气氛，使双方分手时不感到紧张。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赫尔经常是尽量把那些达成协议的希望极小的问题交给副国务卿去同苏联代表讨论。

赫尔有扎实的法学知识，当然也精通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这里赫尔有自己“爱谈的话题”，即关于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问题。由于赫尔的倡导，在30年代罗斯福政府宣布“睦邻”政策是它在西半球对外方针的基础，这一政策意味放弃帝国主义最粗暴干涉的形式，因而使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当然，这里没有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以在拉丁美洲进行进一步政治和经济扩张为目标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依然如故。

赫尔不属于那种现在通常所说的爱抛头露面的活动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不喜欢而且回避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演说，如果这种讲话不是官方的和必要的。赫尔更喜欢

小范围的谈话，多半是双边会见时各方有两三人参加的谈话。

他说话声音很低，总的来说没什么讲话艺术。因而有时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赫尔身体不适。他行动和讲话缓慢，走路不慌不忙，如同陷入了沉思。

我们继续保持了5年接触，直到1944年11月赫尔因病卸任国务卿职务而退休。当时他73岁。他白发苍苍，高高的个子，面部表情聚精会神。正如画家所描绘的那样，赫尔的外貌里有着圣经中摩西^①所具有的某种东西。我记忆中的这位在罗斯福政府里多年领导美国外交的大政治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萨姆纳·韦尔斯是美国第一副国务卿。他不是内阁成员，其权力和政治分量都不如国务卿，但熟知他的人公认，他在领导战时美国外交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韦尔斯实际上成了美国外交机构全部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况且赫尔本人经常生病。

认识韦尔斯的人都称赞他与众不同、有非凡的才干、知识非常渊博。

由于韦尔斯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他被公认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具有盎格鲁撒克逊^②气质的人。他不仅毫不掩饰，而且尽量表现自己这一特点。当外国外交官去拜访他时，不管客人是什么级别的，他都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向前走几步，在他认为适当的距离迎接客人，同样不慌不忙地

^① 摩西是圣经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上帝曾向摩西传“十诫”。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都尊摩西为“先知”。——译者

^② 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元5—6世纪征服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和弗里西亚人的日耳曼部落的总称。——译者

伸出手，更加慢条斯里地对客人说：

“您请坐！”

韦尔斯的举止、对谈话者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再三考虑和斟酌的。他的谈话从两句标准的客套话开始，然后他才表示准备进行实质性的谈话：

“我听您说。”

如果会见是由韦尔斯本人提出的，那么他就以请求的口吻向对方说：

“请您先听听我们的意见。”

或者这句话会这样表达：

“请您听听我们的想法。”

他与人交往的风度总是很得体。但讨论实质问题时韦尔斯却是一个强硬的对头。“嘴甜手辣”这个俗语用在他身上十分恰当。

他表达观点时语言也十分明确，他认为这些明确的语言是可以写进书中的，他的书是战争期间，即战争已出现了转折之后出版的。书中讲的是关于西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金融界和商界的代表，据韦尔斯的看法，他们“坚信，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只会对他们本身有利。他们断言，俄国必败，从而共产主义将被消灭。”^①

领导通常把苏美关系中那些不带特别友好色彩的任务交给韦尔斯来办，如向苏方提出交涉、声明或采取其他外交行动。我们使馆非常清楚韦尔斯在国务院中担负的就是这种使命，因此当需要拜会国务院时，如果可能的话，宁愿会见其他副国务卿。当然，这样做的时候都注意掌握分寸，不过分。

^① 萨·韦尔斯：《抉择的时刻》，纽约1944年版，第321页。——作者

然而不能不考虑到，韦尔斯经常自由出入白宫，而且对他的意见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本人都注意听取。

使我们感到一定安慰的是，一些其他外国使团的代表告诉我们，韦尔斯同他们接触时几乎持同样的态度。

从韦尔斯的性格特点来看，他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人。后来据报道，他是在乡村独自一人散步时去世的，他的遗体就在散步的小路上被发现的。

一批不寻常的活动家

罗斯福政府班子里的美国国务活动家象一把五光十色的“花束”，其中有海军部长乔治·福莱斯特^①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样的人。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作为大使的我以及我过去的前任们都经常同他们见面并讨论军事问题，也讨论苏联和美国政治关系的某些问题。战时罗斯福政府的部长们不仅不畏避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而且还表现得很主动。

我记忆中的福莱斯特比较年轻，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每次我们谈话时，他都坚决主张，必须把战争进行到彻底战胜希特勒德国，并不惜对它的元首使用最尖刻的语言。

福莱斯特喜欢小范围的会见。他常来我们大使馆或请我和妻子去他那里做客。这些会见总的气氛都是友好的。有时，福莱斯特会相当自如地谈论美国大资本家的习俗。他所以熟悉这些，与其说是凭其自身的经验，还不如说是靠他出身于豪门的妻子。

^① 此处原著似有誤，应为詹姆斯·福莱斯特。——译者

有一次福莱斯特对我们讲起，在一次举行招待会的时候，他妻子的许多贵重首饰被盗的事情。顺便说一下，美国报界报道了这件事，它十分引人入胜，其情节的复杂程度大概一点儿也不亚于阿格瑟·克里斯蒂^①的侦探小说。但是，福莱斯特讲这个故事时所用的幽默的评语看起来有点儿造作，因为被盗的“小东西”是很值钱的。

海军部长的特点是精力旺盛、灵活好动，因此在谈话时他似乎不愿意总坐在一个地方。他更喜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两手比比划划，大骂希特勒及其走狗。如果在附近的墙上挂着地图的话，他肯定会走到地图跟前，根据当时具体的战争形势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做几个“战略”的手势。他倾向谈论海军题材的问题。但是，福莱斯特不仅熟悉自己的本行，也善于在政治范畴内来思考问题。

福莱斯特的结局极其意外和悲惨，他是在医院治病时跳楼身死的。这事发生在50年代^②。他在跳窗身亡之前发出狂叫：

“俄国坦克！”

他心灵深处怎么会产生似乎危险来自苏联的这种荒谬想法，而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年代里他是钦佩苏联的。

从福莱斯特在战时和战后发表的拥护苏美合作的讲话到他跳楼自杀中间相隔不少年。无疑，他的思想是受了罗斯福去世后华盛顿推行的敌视苏联的政策恶劣影响。

但是，仅仅把福莱斯特说成是牺牲品是不对的。他是牺

^① 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已销售：亿册以上。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译者

^② 此处原著有误。福莱斯特于1949年5月身死。——译者

牺牲品，同时在战后他自己也扮演了推动美国庞大的政治军事机构运转的角色之一。这个机构是逆着同盟国协议给该国所规定的方向而运转的。应当公正地指出，福莱斯特与当时制订这些协议直接有关。

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是个不亚于福莱斯特的复杂人物。但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复杂。在卡尔文·柯立芝^①总统任职期间（1923—1929年）史汀生是美国国务卿。因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罗斯福那么密切地关注不削弱使他执政的民主党的地位，却把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曾在其政府中担任显赫职务的一位活动家吸收到自己的政府内阁中来。然而，罗斯福既是一位战略政治家，也是一位策略政治家。他认为，吸收共和党人进自己的内阁带来的好处可能多于坏处。

至于史汀生属于什么党，在罗斯福眼里，这不能构成障碍，因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不存在形式上的成员资格，而且在美国，某个活动家从一个党转入另一个党，根本不认为是了不起的不道德行为。这样做的人往往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就是两个党都是代表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至于两党其他方面的分歧没有实质意义。

我记忆中的史汀生是进入暮年的人了，他比福莱斯特大很多。他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有的沉着、冷静，尽管多半是外表上的。他的讲话和声音呆板、单调。过去说这种人象诵经、打钟的执事。但是，史汀生说的话是很严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虽然讲的不多，但还是十分明确地表示过赞成在战后也发展苏美合作。

^① 美国反动政治家（1872—1933），1923—192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如果再补充如下情况，即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也多次发表过赞成苏美友好关系的讲话，那么就更清楚了，当时，在战争时期，美国武装力量上层人物对我国的态度是十分不错的。后来华盛顿对苏联态度的变化是在高级政治级别上通过的决议的结果，后面有万能的大资本家、垄断集团和军火商的背景。官方的政策变了，美国军事家的观点也随之变了。

乔治·马歇尔在战争时期是个大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早在30年代，人们就知道他是个观点反动、同垄断集团关系密切的人。1939年他一度任代总参谋长，而1939—1945年是美国陆军参谋长。我在华盛顿同他见过面，当时他是从欧洲做短暂访问后回到首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谈话正是在向美军高级将领授苏联勋章的那天进行的。当时苏维埃国家向马歇尔将军授了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在米·伊·加里宁和亚·费·戈尔金签署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中写道，这个奖赏是为了表彰在领导美国军队反对苏联和美国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的事业中进行了杰出军事活动并建立了功勋的人。

隆重的仪式是在华盛顿豪华的“五月花”饭店举行的。在这种场合，象通常一样聚集一群记者、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还有许多身着军礼服的美国武装力量的代表在场，他们个个精神抖擞。

我向他们授勋并表示祝贺，他们之中有军衔最高的马歇尔。他们也祝贺我们在前线取得的战果。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大家都清楚，胜利已经在望。

授勋以后，我同马歇尔谈了话，他说：

“我本人及我的部下，即那些参谋人员，都钦佩你们战

士的勇敢,而且钦佩你们的军官克敌制胜的本领。总的来说,红军不愧被称为战无不胜的。这是我这个不轻易讲恭维话的人说的……”

那次谈话时,马歇尔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欧洲的未来,特别是如何对待被打败的德国等政治问题。

美国政府让马歇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大型国际会议和会见的工作,包括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工作,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在美国政坛上是个多么突出的人物。

政府后来注意到了参谋长将军的威望。于是1947—1949年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计划,旨在对西德和某些其他西欧国家实现杜鲁门“主义”。^①“马歇尔计划”^②的目的是要加强西欧资本主义阵地和阻止那里进行进步的社会变革。

后来马歇尔成了“冷战”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辩护士之一,他的政治生涯是在美国国防部长职位上结束的。外交官的燕尾服和军人的制服好象在乔治·马歇尔身上融为一体。

洛克菲勒是这样想的

在战争年代,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向

① 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纲领。其目的是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幌子下,干涉其内政并利用其领土作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基地。——译者

② 1947年由马歇尔提出。通过美国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加强美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建立反对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译者

美国公众通报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进程，增强美国人对战胜法西斯的必胜信心。我们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美国人，特别是在珍珠港^①事件之后，越来越担心苏联是否能坚持住、反希特勒同盟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粉碎法西斯侵略者。

美国大商人的代表们也提出这样的问题。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对此十分关切，并且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的关切也是真诚的。其中一位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我作为大使，经常与他会见。

众所周知，罗斯福曾竭力利用洛克菲勒的名字，因为这个家族过去是，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富裕美国的象征。部分地也是为了缓解那些不赞成总统的经济试验的人对其政策的批评。纳尔逊·洛克菲勒是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代表，他与其他几个兄弟不同，很有政治头脑，政府委派他负责一方面的具体工作——拉丁美洲事务协调官。

华盛顿未必有谁能解释清楚，什么叫“协调官”。但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大富翁的家族对官方职称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讲，主要的职称是同“亿万”这一词相联的“美元先生”。在美国，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这几个字才具有真正的魔力。

当然，我同洛克菲勒的谈话极少涉及拉丁美洲事务，而更多的是谈国际政治和苏美关系问题。他在政治方面对情况的了解相当详细。

“我赞成我们两大国之间应保持正常的乃至友好的关

^① 珍珠港——美国在夏威夷群岛建立的海军基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对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使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丧失战斗力。——译者

系。”纳·洛克菲勒多次对我这样说。

的确，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很清楚战后政治、经济、人员交往各领域的关系应该如何发展。然而，这一点当时政府内大概谁也不清楚，尽管有一些设想。战前时期苏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洛克菲勒提出一些大胆的设想。他是这样提出自己主张的，有时他个人的看法与美国政府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总的来说，洛克菲勒一谈到政治问题，就谈得很有气魄。

“我不在乎政府内的职业政治家们如何议论我的观点。”他大胆地说。

洛克菲勒把他所占有的位置看作是向上爬、进入白宫的阶梯。这一点显然没有逃过罗斯福及其身边人的眼睛，但很少令他们感到不安。那时总统没看到，而且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没出现有威胁性的竞争者。总之，罗斯福巧妙地利用了洛克菲勒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洛克菲勒在同我的谈话中暗示说：

“关于我对苏美两国关系的意见，罗斯福是注意听取的。”

我不能不相信这些暗示的真实性，况且它们已被事实所证明。

在其他情况下，我同洛克菲勒的谈话应被看作是绝对秘密的。但那时谁也没这样认为，包括我在内。这些谈话是坦率的。它们的方向没有背离苏美两个同盟国关系的实质。那时许多美国活动家认为，到苏联大使馆去，同苏联的负责代表谈一谈，对自己是一种荣誉。

应该公正地承认，甚至后来，在1974—1977年间当洛克菲勒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同我国的关系也是得体的。当然，他属于社会另一极端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对苏联表示过公开的敌视，没有滥用“人权问题”，他的出发点是苏联和美国应该在和平条件下共存。

后来我又多次见过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在各种场合见到的，在正式场合，即他当副总统时，和非正式场合。在当选副总统之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自己的大富翁的家庭中度过的。有一个晚上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中。

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我收到了洛克菲勒和他夫人的请帖，说他为我们举行一次午宴。当我们到达那家豪华的饭店时，看到一大批美国大商人和他们的夫人们。

招待会的男女主人从主宾开始邀请大家就座。餐桌是按照洛克菲勒家族的风格布置的：豪华而不显眼，不引人注目，处处是鲜花。女主人说，如果餐桌上没有鲜花或者花不对她的胃口，她的食欲就不好。我问：

“那么说，花是您的爱好了？”

她回答道：

“不，这不是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是另一种东西。”

我发现她拖延不说什么是她的爱好。

她说：

“如果您想知道，我就向您公开这个秘密。我的爱好是，从一套住宅搬迁到另一套住宅去，也就是搬家，购买和布置家具。我非常喜欢布置新家具。

她这番话说得特别津津有味。

坦率地说，我当时想：“你这位女主人选中了这样的嗜

好，倒挺不错。可是几天前，我们在布鲁克林大街上看到的那些美国人是怎样生活的啊。晚上他们过夜的房子里窗户是被钉死的，也没有供暖设备。这些房子被房产主们抛弃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让这些房子住人不合算。我们看到过许多这样的景象。整个街区，甚至整条街都是这样的房子。”

但这一切对招待会的女主人是没法说的。必须遵守礼节。这类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话题通常是非常广泛的：谈一点儿政治，谈一点儿生意，谈一点儿嗜好，可以谈谈文学和戏剧，也可以谈谈孩子、亲戚等，谁在哪儿住，怎样度过空闲时间。

如果谈到孩子，当听到谁的孩子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时，围坐在桌旁的这个圈子里的代表人物就会很惊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离开家庭出去住，多数住在城外。

引人注意的是，象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那些上了年纪的、中年的银行商业家们，总是喜欢谈一通深奥的政治，并且听一听苏联代表说些什么。

洛克菲勒本人特别喜欢谈这个题目，而花旗银行副行长兰卡斯特积极为他帮腔。顺便说一句，后者积极而始终不渝地主张美国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当美国实业界上流社会聚会时，无论人多人少，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这些人习惯于慢条斯理地、轻声地讲话。每一个参加者好象都想让人明白，他无须提高嗓门，谁想听，谁就会听到。任何一个出席的人只应该留心听他那些字字珠玑的话，并且抓住它们，谁也无权从这些无价的只言片语中丢掉什么，或者，甚至漏掉什么。

在这个社会中，这种举止风度很早就养成了。显然，养成这种习惯的原因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总是取决于谁的口袋里钱多。在这里高声喊叫，哪怕是你手里握有最纯的真理也无济于事。当真理遭到百万美元和它们的拥护者反对时，它就没多少价值了。

正是这样一种气氛在根据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倡议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中占着上风。甚至在谈论与生意和经济无多大关系的其他问题时，也未能摆脱它的影响。

这个圈子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式的举止风度，比如说，同英国的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不论在英国的实业界，还是在同英国的政治生活有联系的人们当中，都表现得更为忙碌和喧嚣，从表面上看去，这好象更民主些。争论、提问和答辩、对反对者进行幽默的批评都是常事。为此不一定要有个象样的集会。甚至两三个英国人就能够喧闹一场，虽然在谈话结束时他们都向对方表示真挚的友情，说他们谁离开谁都不能生存。

看来，英国议会实行的那种制度对此也有相当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古老的威斯敏斯特^①，发言时不允许念稿子，必须口头讲，只能口头讨论问题，争论，插话，相互挖苦或使用激烈的言辞。而且这些必须让大家都听见，这是民主的。

英国议会的这种制度就象无线电波一样从议会传播到社会生活中，并在某种程度上传到商界。

在同洛克菲勒会见时基本上是典型的美国气氛，甚至在谈到政治问题时也是这样。主人无须努力去制造这种气氛，

^① 威斯敏斯特城位于伦敦西区中央。议会大厦、唐宁街、新的政府办公楼均在此城。——译者

他的朋友们象有身份的美国大商人应该做的那样，表现得彬彬有礼。

虽然那已是1947年，在丘吉尔富尔敦演说^①一年半之后，但是美国商业界那些严肃的人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指望苏美两国能把战争年代它们关系中的许多东西保存下来。时间表明，这些希望没能实现。

从杜鲁门总统时代起，苏美关系开始变冷，有时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比如，在古巴危机期间，在发生鲍尔士U-2型飞机事件^②时以及巴黎四方首脑会见失败时。万能的军事工业集团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扩大军备竞赛和积聚核武器的方针。

宴会结束时，洛克菲勒仍按照他的习惯表示愿与我进行简短的单独谈话。我们在房间的一角坐下，每人手拿一杯咖啡。他说得很坦率：

“我发现美国的社会舆论在对苏联的态度方面正在向右转。”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继续发挥他的思想：

“连我自己也没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的趋势会更为稳定。但罗斯福死了，而已故总统的政府在同贵国发展关系方面足够的决心也随同他一起

①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反共演说。——译者

② 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型高空喷气间谍侦察机在深入到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进行间谍活动时，被苏联导弹击落。5月16日，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U-2间谍飞机事件公开道歉。艾森豪威尔不肯，赫鲁晓夫只好退出会议，随后宣布取消艾森豪威尔原定6月10日-19日的访苏计划。——译者

死去了。

“现在开始吹的是另一股风，不知这股风要把我们吹向何方。”洛克菲勒说。

我回答说：

“苏联对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即同这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国里刮起另一种风并不是莫斯科的过错。”

我问洛克菲勒：

“您知道吗，在决定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的的问题，是设在欧洲还是设在美国时，苏联以及它的欧洲朋友们一起投了美国的票，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被选作刚刚成立的世界性组织的总部的所在地。当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在旧金山出席国际会议时，我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说如果表决联合国总部的地址时，要投美国的票。”

我向他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

“您知道吗，莫斯科出于什么动机向代表团下达这样的指示？”

洛克菲勒回答说：

“我对这一问题提不出什么明确肯定的意见。”

我说：“莫斯科这样做的一个考虑是，在联合国总部地址问题上支持美国人将会保持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兴趣。换句话说，莫斯科担心，美国可能陷入孤立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知道某些欧洲国家的政策将向何处转。看吧，苏联是多么信任由罗斯福奠定基础的政策的善良意图。”

洛克菲勒说：

“如果斯大林对美国持有您刚才对我说的那种观点，那

么，他确实是始终一贯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高尚的。”

后来，当洛克菲勒成了副总统时，他也不属于公开敌视苏联的那一类活动家，尽管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他已不站在从前罗斯福政府的立场上来讲话了。在他身上表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他主张苏联和美国之间必须有和睦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赞成有个强大的美国，武装起来的美国，一个大商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主宰国家命运和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美国。

他的社会面貌是复杂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位拥有百万巨资的银行家，百万巨商。后来，纳·洛克菲勒的生活很不简单。他的儿子在太平洋西部水域，在靠近印度尼西亚海岸的地方偶然地淹死了。他的家庭破裂了。剩下的只有财富，这些财富现在很少听人提起。他自己是在某种神秘的情况下死去的。这事发生在1979年，当时他71岁。

我还记得同托马斯·拉蒙特的一次会见，他在美国的克雷兹^①——约翰·皮尔庞特·摩根^②死后，主持美国亿万富翁摩根银行。1944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拉蒙特要求见我。在我们驻纽约领事馆举行的这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初看起来很意外的请求：

“请莫斯科采取行动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③

① 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公元前4世纪），他拥有无数财富，成了俗语。——原编者

② 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世界上金融巨头之一。1871年与人合伙在纽约开设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1895年改为摩根公司。——译者

③ 连任3届纽约州州长（1945—1955），长期担任共和党领袖，1944年和1948年两度被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但均落选。——译者

我们知道，在这次大选中，杜威在同罗斯福竞争。然而提出这种请求的本身就是一种征兆，表明美国社会舆论对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肩负主要重担的我国的好感仍占主导地位。共和党人极想在大选日，当美国人走向选区时，利用这一因素来为自己的党谋利。

我只好向拉蒙特解释说：

“我们的国家不能干涉美国的内政。”

拉蒙特听了我的话，颇感失望，但同时也表示一定的理解。

是啊，百万富翁们是不经常向苏联提出请求“帮帮忙”的，但某个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事。

我和我的许多前任们和继任者们都同这位银行家的儿子科利斯·拉蒙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可以大胆地说，他是美国那些头脑清晰的人物之一，这是个有很深的信念和大胆见解的人。他同父亲断绝了关系，实际上是同自己的家庭断绝了关系。原因是纯意识形态上的。他完全彻底地同自己的整个阶级决裂了。

科·拉蒙特一生都是苏联的朋友。他为动员美国的公众舆论促进苏美两国人民的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长期担任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在美国土地上的动人会见

一列纽约—华盛顿的列车。车轮有节奏地撞击着铁轨。这是硬座车厢，因为路程不远。我正在向窗外观望，突然听见：

“您好！葛罗米柯先生。”

“您好！”

“我认出了您，就决定走过来。我叫艾伯特·里斯·威廉斯^①。我钦佩贵国人民、贵国军队的英勇精神。你们在拯救欧洲和世界。”

我们经常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碰到美国人对苏联表达友好的感情：在火车上，在城市的街道上，甚至在官方的机关和组织里。通常，美国人问过好，表述了自己的友好感情后就离开了。而且有时做自我介绍，有时不介绍。这些会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令人感动。

一位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艾伯特·里斯·威廉斯就是以这种方式走到我身边的。我请他并排坐下，我们就谈了起来。他热情地回忆起自己同列宁的会见，关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他到我国的情况。除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他还去过我国其他一些地区，其中包括伏尔加河沿岸地区。

他讲述道：“当然，我去贵国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是最困难的年代。当时我目睹了破坏的景象，经济严重混乱，特别是农业，歉收，有些地方相当严重。”

威廉斯在我国旅行时没有隐瞒自己的国籍，即便他不说出来，根据他用俄语讲话的情况，也很容易猜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并没有感到苏联人对他有不友好的表示。而当时，美国对苏维埃政权，对以列宁为首的苏联政府采取了敌视立场。

威廉斯讲道：“有一次，一个农民同意让我搭乘他的大

^① 美国新闻工作者。1917年—1918年曾逗留俄国。见过列宁。著有《列宁——人及其事业》等书。——译者

车。他问我：“您是哪儿的人？”我说，来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这位农民的脸上表现出某种疑惑的表情，他又问了一遍：“您说您是最富的国家的公民？”同时他打量了一下我那身不象样的衣服。这个农民大概想，他的乘客只不过是个骗子，可能比这还坏，因为我那双皮鞋相当破，而且总的说，从衣服上看，我一点儿不比那个农民强。尽管如此，这个普通苏联人还是相信我，我们分手时很友好。”

威廉斯向我讲述这一切时很热情。

后来，作为我国的真诚朋友，我们经常在我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他，而且同他的交往总是饶有风趣的。

我们知道，他后来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听众面前做了不少关于苏联的演讲，包括在美国的大学里。他到处受到欢迎。可以大胆地说，艾伯特·里斯·威廉斯的名字在历史上有权同另一位美国进步刊物的卓越代表约翰·里德^①的名字并列。约翰·里德是十月革命的见证人，他在自己的杰作《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中描绘了这些事件。

战争年代在美国供过职的所有苏联人都感受到美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巨大同情。在此期间，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收到的美国人、各种组织、团体、院校寄来的对苏联表示友好的电报和信件不计其数。

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罗斯福及其政府对侵略的受害者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第二，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命运以及欧洲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我国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这场生死大搏斗的结局如何。

^① 美国作家，新闻记者。——译者

这是普通的美国人对苏联人自然产生的感情，而杜鲁门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压下去。后来，开始践踏历史，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相互友好的感情。

但是，甚至在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有杜鲁门出席的情况下在富尔敦（美国的密苏里州）发表了那篇成为拼凑有美国参加的广泛的反苏战线的信号的演说之后，仅仅这个演说还未能根本改变美国公众的情绪，美国反动集团所培植的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也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他们需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浪潮，以使社会舆论有个明显的改变。

应该说，就是在战时，华盛顿官方对苏联也经常表现出不符合同盟国精神的态度。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有3名苏联飞行英雄，米·米·格罗莫夫，格·菲·拜杜科夫，安·鲍·尤马舍夫来到华盛顿。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想要得到哪怕是一架美国斯佩里公司制造的装有炸弹瞄准器的飞机，这种飞机当时已不是什么特别的秘密，因为希特勒分子已经有了。

我们的飞行员在美国首都花费了大量时间，但却空手而归。谁阻碍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呢？那些政客们。如果愿意的话，本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他们对我们说，顾不上去处理这个问题。很清楚，之所以顾不上，就是因为首脑不让他们这样做。

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事实。其中包括如何解决租借法案问题。要知道，为了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供给，经常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办事效率没有了，代替它的是有意的拖延，预谋的怠工和十足的官僚主义。

从1941年秋天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开始领导租借法

案实施委员会（这是在他1944年11月被任命为国务卿之前）。我们同他保持了相应的接触。但就连斯退丁纽斯（据我们观察，他还是想尽力解决问题的）也不总能使这个或那个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差不多总是要提出一大堆附加条件，还要援引许多有关部门的规定，而这些部门在研究租借问题时一直使用否决权。

然而，那时，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相当一部分支持罗斯福政策的美国政界人士中，更具有代表性的情绪是，对苏联开始表现出公开和广泛的好感。其中，可以引举为例的是，当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时，除了被邀请者之外，常有数百位没有请帖的人也争取前来参加这种招待会。他们都想亲自表示一下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好感。遗憾的是，想来的人总是多于我们能够邀请的人。政府部门、高级军事指挥部门的代表，参议员，众议员，商人，科学和文化界人士都很愿意参加这些招待会。

我想讲一件有趣的事。已故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是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众所周知，这一条约到底也未获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的遗孀从未去过任何使馆参加招待会，但她却到苏联使馆去了。

人们问她：“为什么？”

这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妇女说：“为了对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和英勇精神的苏联人民表示敬意。”

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和儿子们

我想谈一下有关罗斯福总统家庭的一些情况。他的妻子

埃莉奥诺拉不回避政治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她甚至试图在报刊上从白宫这座“高台”的角度上来阐述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一般都能说到点子上。但是也有过偏离官方政策的情况，尽管这种事并不太多。她毕竟不是总能来得及追踪观察世界舞台上发生的复杂进程，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有一次，我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应埃莉奥诺拉·罗斯福的邀请前去参观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家的庄园。这已是总统死后的事了。我好奇地问她：

“请告诉我，您在报刊上谈论的题目是您自己选择的还是您已故的丈夫给您提示的？”

她迅速地做了回答：

“所有的题目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埃莉奥诺拉·罗斯福立即又笑着补充说：

“有时总统甚至很不喜欢我的选择，但我没有退让。不错，如果我丈夫明确表示不要这样做，我当然只好让步。”

显然，她的回答不太明确，但总的说是清楚的，即总统夫人是听从丈夫意见的。我从一些国务活动家以及新闻记者那里不止一次地听说，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在她文章中所表达的看法通常同总统的观点都是相吻合的。如果这些看法同总统的观点不吻合，那只是一种例外，说明存在某种规律的例外情况。

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过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在不同的时间同她谈过话，包括讨论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总统逝世后不久战争就结束了，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开始经常出国。她也到过苏联。

1945年秋天，她刚从伦敦回来就前来苏联使馆参加招待

会。

“我从英国来，”她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说，“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陪我去的。您知道吗，我证实了，他根本不相信俄国人。”

“为什么？他这种不信任感是哪儿来的呢？”我颇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看来，丘吉尔对他的影响很大。”总统的遗孀说道。

看来，她不太了解杜勒斯的家庭。还在战争年代，约翰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在瑞士曾同纳粹德国上层的代表就单独交易的可能性举行过秘密谈判。在1945年的那些日子里，两兄弟从政治观点上看是心意相通的。而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很快就成了美国的“实力”政策的鼓吹者。在陪同埃莉奥诺拉·罗斯福的那次旅行中，他自己也能挑动丘吉尔的反苏情绪。在政治生活中有时已能感觉到某些风头，这些风头在“冷战”年代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说起来，罗斯福本人在同我们的会见中，一次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到过埃莉奥诺拉，好象她不存在似的。那些断定他们夫妻关系冷淡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可能有某些根据。至于我，则宁愿仅限于谈一谈这个微妙题目的政治方面。

正如人们所知，罗斯福夫妇有4个儿子：杰姆斯、富兰克林、埃利奥特和约翰。在父亲在世时，儿子们没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各种情况都使人感到，总统不赞成他们从政。但是，由于罗斯福的名字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有的儿子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包括外事。

埃利奥特·罗斯福战后访问了苏联。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并接受了他的采访。他提出的问题主要涉及

苏联和美国的双边关系、联合国对世界局势的监督、进行核研究、召开“三巨头”会议的必要性、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柏林的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内不搞肃清纳粹影响活动。对所有这些问题埃利奥特·罗斯福都得到了详尽的回答。这次谈话发表在1947年1月24日的《消息报》上。

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埃利奥特邀请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去听音乐会。他同他的夫人，一位出身于大富翁杜邦家族的、年轻美貌的妇女在一起。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家族与杜邦银行家的家族代表人物之间的婚姻看起来很有意思。看来，这两个家族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那些很了解总统及这桩婚姻全部情况的人对他们的结合一点儿也不惊奇。这只不过再次证明，对总统的各种指责，说他在内外政策方面所奉行的方针、同苏联建立友好的关系，使他几乎成了“赤色分子”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问题在于罗斯福在忠实于自己的社会阶级的同时，站得比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高出一头，后者在对外政策中坚持仇视苏联的立场，在对内政策中只知道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完全无视他们的社会需要。同罗斯福这位伟大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当时和现在一直是政治上可怜的侏儒。

坦率地说，同埃利奥特的会见唤起了我对已故总统一些生动的回忆。这部分是由于儿子的外表非常象父亲。

在音乐会中间休息时，我同他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所谈的主要是他访问莫斯科的印象，首先是同斯大林会见的印象。

总统的儿子说：“这次会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对所见到的一切都热情称赞：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雄姿、他所遇到的苏联人对未来的信心、我国人民忘我的劳动、在

战争中以自己的胜利使世界惊叹的红军的威力。他说的话是真诚的，使人毫不怀疑，说这些话的人对我国及我国人民抱有真正友好的态度。

不久以后出版的埃利奥特·罗斯福所著《以他的眼光》一书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指的是“父亲的”。书中的主要思想是：为了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必须和睦相处。对那些早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就特别关心使苏联和美国相互疏远的人来说，埃利奥特·罗斯福这本书当然是不合心意的。

显然不能期待埃利奥特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表示称赞。他也没有这样做。但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两个最大的国家进行合作是有利于世界的，这至今仍值得赞许。

罗斯福的其他儿子很少去华盛顿。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某一次欢庆的节日里，比如说在纪念父亲生日时，出现在美国首都，这大概几乎就会被当做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所以在高层的政治圈子中，他们都未能各自赢得自己的名声。

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大儿子杰姆斯在1954年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一直保持到1966年。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政治积极性。

美国文化界的明星

战争时期，在美国文化活动家中可以说对苏联及其人民的兴趣空前迸发。这些活动家多数都是远离政治的。但是，当世界大部地区已被战火笼罩、在欧洲和其他大陆人们血流成河，当我们的人民以自己的胸膛保卫祖国、同时也保卫全

世界使其免受“褐色瘟疫”时，这些人也明白了，苏联士兵也在为美国人、为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生命而战。

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界的许多卓越的活动家同苏联大使馆建立了联系，经常出席我们的招待会，与我们进行交谈。

在这方面可以提一提洛杉矶交响乐队的优秀指挥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纽约交响乐队的建立也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尤金·奥曼迪，费城交响乐队的指挥也值得回忆一下。他从1938年起在很多年内一直指挥这个乐队。他的法国妻子莉莉·庞斯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歌手。所以人们称他们为“一对名人”。

40—50年代，是奥曼迪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费城交响乐队的音乐会上，当奥曼迪站在指挥台上时，观众简直兴奋得发狂。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等的不朽作品的演奏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位美国交响乐的鼻祖85岁时在费城逝世。在1985年3月的一天传来了这一消息。

在战争年代，美国文化界的人士发表声明，呼吁同苏联友好。他们当中除上面提到的斯托科夫斯基和奥曼迪之外，还有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弗兰克·西纳特拉、文学家莉莲·海尔曼、电影和歌剧明星艾吉·尼尔森、著名歌唱家和电影演员珍妮塔·麦克唐纳以及其他许多人。

关于西纳特拉和海尔曼，值得特别谈之。西纳特拉至今还健在，他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很长时间内，一直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艺术风格很轻松，但不庸俗。

海尔曼成了美国著名的女作家，美国文学界与众不同的

重要人物。她首先是以一个剧作家而闻名。一段时期内，她甚至被认为是国内“戏剧界的第一夫人”。

海尔曼所持的进步观点在她还住在共和制的西班牙时就已清楚地形成了。从那时起，反法西斯的题材就成了她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她创作的一个剧本中，反映出对苏联人的好感。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电影《北方之星》在美国人中唤起了对苏联盟国的友好感情。

在战争年代，海尔曼在苏联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旅行，是罗斯福总统派她去完成这个加强美苏两国文化联系的非正式使命。斯大林接见了她。返美后，她对我说：

“这次旅行中同苏联人的会见使我终身难忘。在前线同苏联将军切尔诺夫的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建议我随同贵国军队到华沙去。根据他的估计，在我到达他的部队之后再过大约9到10天就应该解放华沙了。他还叫我同他一起继续前进，直到柏林。我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来才知道，切尔诺夫将军在华沙解放两天后牺牲了。知道吗，他牺牲了，牺牲了……”

她悲伤地说着。

我们坐在一家不大的饭店里，参加她和弗兰克·西纳特拉为苏联大使及其夫人设的晚宴。我们刚刚一起参加了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西纳特拉在音乐会上演出了。

我想着莫斯科，想到就在不久前这位勇敢的妇女到了那里，亲眼看见我国人民的英勇精神；而现在，在这个寂静的角落里她在叹息，在缅怀一个命运使她与其在这场战争中相遇的苏联人。

不论是她还是西纳特拉，都强调他们对我国的友好关系，

他们崇敬我们的国家。

“您知道吗，大使先生，”西纳特拉说，“在美国有这样一部分社会力量，他们不希望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我看着西纳特拉，心里想：“这个富有魅力、体态匀称挺拔的年轻人——青年一代的偶像，谈论起问题来就象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一个成熟的国务活动家、某些美国国会的议员若是有他的头脑、他的观点就好了，他们怎么也不明白，或者是不想明白，谁承受着战争的主要重担。”

同他并排坐着的莉莲·海尔曼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她外表很朴素，不惹人注意。但在她身上却表现出多么崇高的人道精神、公民的勇敢和清醒的见解啊。

她就是这样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一个中等身材、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的妇女。

她在信念上是毫不妥协的，永远忠实于自己的人道主义、天职和真理的理想。她在那些不赞成以麦卡锡主义^①时代所特有的用政治方式指导国家文化生活的美国人中间受到重视和尊敬。

在许多年内，反动派在这个女作家周围制造了敌视和排斥她的气氛。她成了国会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在审讯和调查中进行侮辱嘲弄的牺牲品之一。但是，任何威胁都不能压倒海尔曼的声音，尽管她自己承认，有时陷入近乎无能为力的状态。

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天性脆弱的女艺术家却没有被压垮。海尔曼忍受着苦难，以傲然的姿态蔑视那些想从精神上

^① 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机关活动委员会及其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迫害进步人士和组织，拥护军备竞赛和“冷战”。“麦卡锡主义”标志着反动政策。——译者

和政治上消灭她的人。“我不能也不想牺牲自己的良心来迎合当时的时髦。”她在1952年5月19日写给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麦卡锡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联邦调查局和这个委员会嘲弄美国的良心的黑暗日子里，海尔曼表现出的精神力量不能不令美国国内外一切正直的人们钦佩。

战后，海尔曼也访问过苏联。苏联人民总是把她作为我国的好朋友、民主和仁爱的捍卫者给予热情地接待。她的话剧在我国很有名。她的三部情节紧张的社会心理话剧——《儿童节目》、《未来的日子》、《小狐狸》——在苏联最好的剧院里上演。作者直接参加了莫斯科一家剧院上演《小狐狸》的准备工作，并出席了排练。

海尔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她访问我国的强烈印象。她于1984年6月底逝世，享年79岁。

这位妇女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她那些优秀的作品，在世界许多剧院上演的话剧就是对她的纪念。

尊敬的和无与伦比的莉莲·海尔曼，为了真理，您在文学和生活中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奉献！

保罗·罗伯逊浑厚有力的歌喉

您随便问哪一位成年的美国人：

“您知道保罗·罗伯逊吗？”

他一定会惊讶地看着您说：

“谁能不知道他呢？”

提起这位举世闻名的人物时，任何一位正直的美国人除了使用赞美之词外别无它言。只有从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者

那里才可能听到另一种性质的评价。30、40、50年代，这位杰出的黑人歌星、戏剧演员蜚声美国。不言而喻，珍视和爱戴他的首先是黑人，然而，他却赢得了全体美国人的交口称誉。

罗伯逊雄浑的歌喉始终吸引着众多的听众，每当他演唱时，音乐厅和剧院总是座无虚席。他名扬四海，曾应邀到许多欧洲国家巡回演出。

有幸在伦敦看过罗伯逊扮演奥赛罗的人，无不对他的歌喉、演技和天赋赞不绝口。舞台上出现的是一位真正的非洲摩尔人。而这个角色似乎就是莎士比亚专为他写的。出席观看这场演出的所有观众从未听到和看到过这种精彩的表演。剧院的墙壁似乎在因嫉妒而发狂的丈夫对无辜的苔丝德蒙娜发泄的怒涛的冲击下几乎摇摇欲坠，而罗伯逊所表现的奥赛罗对苔丝德蒙娜的崇高爱情也同样强烈，在这一幕的最后一刻悲剧性的结局前，这种感情他表现得尤为出色。

罗伯逊从不放过与苏联人见面的任何机会。他对我们十分坦诚，犹如朋友。1945年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同罗伯逊的会面留下的正是这种印象。作为朋友，他带着美国人民在战争年代对我国人民所怀有的并在战后仍保持的一片诚挚友好之情多次访问苏联。

罗伯逊始终是一个驳斥对苏联诬蔑的美国人。他热切向往苏维埃国家及其文化，特别是戏剧和音乐。在苏联，他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他的儿子也叫保罗（在使馆里，我们称他为“帕夫利克”），学习俄语，并能用俄语表达感情。

保罗·罗伯逊曾多次到苏联使馆做客。他一般都是同他的妻子和帕夫利克一起来。他的妻子，混血儿埃斯拉达无疑

也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的家庭生活得很和睦。罗伯逊十分敬重自己的妻子，对她怀着温柔的眷恋之情。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我的支柱》献给妻子并非偶然。

我们和他会面时亲切地进行交谈，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些谈话。大家都想见见罗伯逊，和他谈谈。保罗不回避政治话题。他是罗斯福对苏方针的支持者，拥护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不能忘怀的是，有一次在进行无拘束的谈话时，罗伯逊突然引吭高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①

他是用俄语唱的。我觉得使馆大厅窗户玻璃都震动了，他那自然美妙有力的歌喉使大家大为震惊……

苏联社会没有民族和种族的偏见，这一点给罗伯逊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

他说：“可是在我们美国，您看吧，一会儿是亲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一会儿是三K党偷袭。”

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国当局不采取措施制止种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

罗伯逊情绪忧郁时，也到大使馆来。

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便讲起他的朋友们仅仅因为不是白皮肤而遇到的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

可恶的种族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这位歌手对此有亲身体会，而当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因种族不同其人格受到侮辱时，感到痛心疾首。这位杰出的人物具有与亲人共同分担灾难和

^① 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别列杰夫·库马奇词，杜那耶夫斯基曲。——译者

不幸的崇高感情。

他自己开始一点一点学习俄语。有一次，我给他读了普希金的诗，他请我把诗写在一张纸上。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用俄语给我念了这首诗，并开玩笑说：

“美国能翻译普希金作品的人还没出世呢，所以伟大的普希金的诗应该用俄语来读。”

美国反动派不能原谅罗伯逊的进步观点，首先是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就连官方当局也向罗伯逊进行报复，因为他反对美国对黑人居民采取的令人发指的种族偏见，因为他是一位天才的歌手、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演员，因为他是保罗·罗伯逊。

他们千方百计迫害罗伯逊，一方面对他的成功避而不提，另一方面竭力打击他的自尊心。这一切罗伯逊都清楚，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刚直不阿的人，他沿着他还在年轻时已走上道路一直走到底。

在罗伯逊生前的最后几年，他被剥夺了离开美国到任何国家去的机会，就是不准许他出境。当局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属都采取了这种敌视的态度。

不仅美国人民，而且大家都将永远缅怀保罗·罗伯逊。

查理·卓别麟迷人的微笑

与查理·卓别麟的多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我们来到华盛顿之前，卓别麟就已是名扬四海、无与伦比的电影演员了。他的电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观众。每当广告上又一次出现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留小胡子戴礼帽的卓别麟的形

象时，电影院的票房周围便开始热闹起来。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战争期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官方慈善活动上。这次招待会的明确目标就是集资作为帮助盟国伤员的基金。

我正站着同一位外交官说话，这时有一位从许多电影中早已熟悉了的人走到我面前，他简单地，但是带着迷人的微笑做了自我介绍：

“大使先生，您好。我是查理·卓别麟。”

他的笑容很自然。顺便说一句，微笑很少从他脸上消失。假如他不笑的话，显然还得证明一下，他就是卓别麟。当时，他在所有的电影里都是“愉快”的查理，后来，稍晚些时候他的“忧郁”的形象才出现在银幕上。

我也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他说：

“您知道吗，不仅仅我个人，在我国凡是看电影并知道什么是电影的人都非常熟悉您。战前在我们苏联就上演过您的影片《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因此苏联人，特别是城市居民都知道您的喜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卓别麟说：“谢谢您的夸奖。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贵国的观众对我的电影和我本人都怀着善意。”

我补充说：“当苏联人听说您表示反对法西斯并支持苏联后，更增加了对您个人的好感。”

然后，我们谈论了苏联的故事片。卓别麟说：

“您看，苏联生产的故事片我知道得比较少。但是，根据看过的影片我可以说明，苏联电影艺术的倾向性是正确的，你们的电影中没有任何腐败下流的东西，这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我和站在旁边的苏联外交官弗·伊·巴济金听到卓别麟说的这些话自然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同这位卓越的演员极其亲切地告别了。分别时，卓别麟说：

“祝你们胜利。”

我第二次见到卓别麟是在伦敦的外交招待会上。我们象老相识一样重逢了。那时卓别麟已经彻底离开了美国，但还没有最后在瑞士定居。

在他离开美国之前，美国对卓别麟这个人、这个演员进行了长期迫害，真是极尽栽赃诬陷之能事。连许多西方国家的人都惊讶不已：美国当局怎么会突然容不下一位伟大的演员呢？为什么在美国要对他进行迫害？我向他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您现在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卓别麟带着一定的幽默感回答说：

“大概更准确地说不是美国人。”

然后，他十分严肃地说：

“直到现在，一想起几年来敌人往我头上泼的脏水，我就恶心。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

我们稍稍离开参加招待会的大批人群，走到一边，他继续说：

“您想想，我被鄙视的原因就是结过好几次婚。但是，如果这是罪过的话，那么大概应该把千百万美国人都列为罪犯。我不过是在这方面不走运而已。难道有谁敢控告我对待哪一位前妻不够人道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我已经受到了生活本身的惩罚，而对我不怀好意的人还想惩罚我。

您能理解我吗？”

他这样对我说，仿佛是在寻求同情。

他又激动地说：“他们迫害我，因为我在自己的艺术中坚持的一些信念是他们不能同意的。正是为此我毅然决定离开美国。接着，他们马上又对我提出了一个指控，如果说第一个指控是纯道德范畴的，那么，第二个指控已经带有法律和钱财的性质。我被指控没有付清在美国的全部所得税。这时我明白了，反击这些卑鄙的运运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当然没有违反什么法律，但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在当局的协助下可以把完全无辜的人‘断送掉’。所以我只能对美国说：‘永别了！’”

卓别麟看了我一眼，突然问自己：

“我为什么对您讲这些呢？”

然后，他急忙自答道：

“首先，因为尽管我不是共产党人，却尊重贵国的诚实。其次，是因为我知道，您永远也不会利用您所听到的这些话给我带来损害。”

我当然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一些人士几乎把他视为左翼激进分子、共产党人。因此，我如实地说：

“勿庸讳言，我为您、一位伟大的演员对我的信任所感动。我想强调的是，我想做的只是去证明您的话是正确的。我们苏联人以自己的道德基础为准绳，与大洋彼岸的那些搞阴谋诡计反对查理·卓别麟的阴谋家大相径庭。”

招待会上，在我们谈话时有位英国记者给我们照了像。这张照片至今还使我想起这位杰出的电影演员，聪颖而有魅力的卓别麟。

爱德华·鲁宾逊妙语惊人

美国最杰出的电影演员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享有盛名。他们在美国代表的是在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

当然，美国电影业的社会方向并非由演员，哪怕是天才的演员来决定的。它归根结底还是听“美元先生”的指挥。

但是，演员是各不相同的。遗憾的是，正确地说，绝大多数演员，有成千上万，要么顺从地和自觉地为一些为美国电影艺术确定十分明确的艺术和思想目标的人服务，要么只是沉浸在物质生活之中，主张无须讲究思想内容。

但也有一些演员有自己的电影艺术特色和自己的信仰。他们这些人懂得，他们的公民天职就在于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施加影响，以培养他们的高尚、公正和尊重他人的情操。现在在这方面情况依然如此。

我与著名的电影演员界的代表爱德华·鲁宾逊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国内外的观众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坐在离驻华盛顿的苏联使馆不远的餐厅里，我和参赞弗·巴济金邀请这位著名的电影演员来吃顿午饭。而他是想来见见苏联大使。

谈话是亲切和坦率的，因此，我想稍稍回顾一下这次谈话的情况。我认为，这次谈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宾逊给美国影坛的状况下了一个准确的，可以说是惊人的定义。

他讲道：

“美国的电影业操纵在无耻的百万富翁集团手中，主要

推动整个电影业运转的当然是利润。千百万元应该产生新的千百万元。至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对银幕主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派生的问题。只要能够保持按乘法递增，那么所有手段、方法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花费在影片上的资本在电影上映后增长好几倍，那就大功告成了。至于人类的道德、公正和人道，电影业的主人们一概置之脑后。”

鲁宾逊继续说：

“尽管我不精通复杂的经济和金融机制，对许多发生的事难以作出评价，但是长期以来，我已经注意到风气急剧败坏，银幕上就是这样鼓吹的。这就发生在我的整个创作生涯过程中。”

他说着，有些激动。可以感觉到，他所说的一切使他十分痛苦。

“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位演员说，“接受不接受别人建议的角色呢？我不一定总能躲过张开的网子，有时我陷入网中，结果自己对自己的表演不能都满意。当然我不是指狭义的艺术表演，而是指我银幕生涯中的追求，是指我在某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不会默默地接受好莱坞老板的强加给我的条件。

“你们苏联人，我以为可以说苏联朋友们，”他信任地说，“你们也许还记得根据杰克·伦敦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海狼》中的一些场面吧。我对自己在这部片子里扮演的主角很满意。但是，我曾不得不同某些人进行了不少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弱自然主义和粗鲁的表现，而更多地赋予这个角色以人道主义色彩。”

我和巴济金都高度赞扬了鲁宾逊的演技。

他问：

“杰克·伦敦的书怎么样？苏联读者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多吗？”

我回答说：

“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年代，苏联人都在读杰克·伦敦的书，其中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部作品。总之，如果不算马克·吐温、费尼莫尔·库珀和约翰·里德，杰克·伦敦在苏联大概是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了。”

鲁宾逊抱怨说：

“自然主义、庸俗下流和极端的荒淫腐化越来越充斥美国银幕。但最令人痛心的是，许多观众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开始喜欢上了这些东西。而制片人利用这种情况扩大这种影片的生产。同这种现象做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再说谁又去做这种斗争呢？力量悬殊，结果转化成了原因，又派生出新的不良后果，它们又重新给人们的风气带来不良的影响。”

我问鲁宾逊：

“有没有一个由其他著名的天才演员也许还有导演参加的团体或协会，试图施加影响使电影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呢？”

他回答说：

“没有这种类似的有组织的团体或协会。在美国，它们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想走这条路的演员就会受冻挨饿。您自己想想吧，是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明显地感到，我们的谈话对方对那些支配电影演员命运的人积怨甚深。

这位著名的演员最后说：“您看，这支庞大的电影演员队伍是在什么情况下工作的。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他们不断

地向美国人灌输的行为准则是与人所固有的（如果人没有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变坏）一切善良的和人道主义的素质格格不入的。”

通过这次谈话我们更清楚了，为什么爱德华·鲁宾逊参加了当时由美国著名进步社会活动家科利索·拉蒙特领导的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

这位杰出的美国电影界代表总的心情与查理·卓别麟对我讲述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是相近似的。

俄国移民的分化

使馆的工作使我同出身、信仰、职业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我还记得同那些当时被生活从我国带到美国来的人的会面。那时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犹如强大的放电传遍了全世界。它也在俄国移民中引起了明显的分化。

那些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实际上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大多数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或是在观望事态将会如何发展。还有一部分侨民未搞清局势是怎么回事，多半是下意识地、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离开了苏联，有的人是出于物质方面的某些考虑。这部分人分裂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代表人物转到了真正的爱国立场，开始积极支持苏联的政策。也有不少人战后希望返回祖国，他们得到了这种机会，高兴地返回了家园。

战争期间，达维德·布尔柳克^①从不错过苏联使馆的任

^① 俄国作家，美术家（1882—1967），俄国未来派创始人之一。1920年侨居国外。

——译者

何一次招待会。我还记得他第一次露面时的情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朝我走来，他那已经花白的头发松软而美丽。他伸出手，握手问好，他握手时那么有力，使我觉得前面站着的是一位力大无比的举重运动员。的确，他的问候是发自内心的。

诗人布尔柳克曾是谢尔盖·叶塞宁^①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我知道把布尔柳克与弗·弗·马雅可夫斯基连结在一起的创作上的友谊，这一友谊扎根于俄罗斯土地。在革命前的俄国，布尔柳克在诗人中享有威望。马雅可夫斯基本人称他是自己的老师。

十月革命后，这两位诗人在创作方面的联系和纯粹的人际往来依然没有中断。1927年马雅可夫斯基去美国在纽约逗留时，就住在布尔柳克家里。

作为俄国的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布尔柳克知道他所保存的与马雅可夫斯基往来的书信以及其他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生平的材料有多么宝贵的价值。战后他把大部分书信和材料作为给苏联人民的礼物赠送给了国立列宁公共图书馆。

布尔柳克是被一场俄国移民风刮到美国彼岸的。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但是，他在美国满意吗？

要知道，甚至到现在，80年代了，普通美国人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概念一般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只有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有十分强烈的求知精神的人除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列·尼·托尔斯泰、伊·谢·屠格涅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帕·契诃夫流芳千古的名著。在美国

^① 苏联俄罗斯诗人（1895—1925）。——译者

亚·谢·普希金、米·尤·莱蒙托夫、尼·瓦·果戈理不朽的作品鲜为人知。阿·马·高尔基、弗·弗·马雅可夫斯基、米·亚·肖洛霍夫、阿·尼·托尔斯泰、康·亚·费定、列·马·列昂诺夫和其他为数有限的苏维埃时期的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开始为美国社会所熟悉。苏联文学家的书籍在美国简直很少出版。

普通的美国人对革命后初期我国未来派艺术家和意象派^①诗人以及其他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这还是在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名望全然没有衰落的时候，而现在，相反，他们的名望在我们国内外甚至更高了。

比如，其中包括谢尔盖·叶塞宁。达维德·布尔柳克同叶塞宁的友谊大大地提高了布尔柳克的名望，今天他的名字为苏联读者所熟悉。

在美国，人们根本不知道诗人布尔柳克，也不可能知道他。在那里，他另一个方面的创作得到了人们某种程度的承认。最初，他只是作为一个酷爱绘画的爱好者，后来在这方面显示出杰出的才能。他的肖像画尤为成功。

当我认识这位善交际的人时，他正准备庆祝60寿辰。自从他和叶塞宁的其他几个朋友故意放纵自己以来，他弄得一无所有。布尔柳克已经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

在美国见过他的苏联同志都坚信，这个人是被社会的风暴卷到了他所陌生的异国土地上的。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布尔柳克同我谈起莫斯科时眼睛湿润了。

“想起它我的心情就很沉重。”他坦率地承认。

^① 本世纪20年代俄国的一个文学团体，认为形象本身和作品的形式比体现思想更为重要。——译者

布尔柳克积极地参加了动员美国舆论支援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他成了“援俄作战委员会”的一个积极的参加者，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募集钱、衣服、鞋、药品，然后把这一切东西寄到苏联。他在进步报刊，首先是《俄罗斯之声》报上发表充满着对苏联同情之感的讲话和他的爱国活动是他在脱离祖国的情况下能够为祖国做的最好贡献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尔柳克访问苏联的梦想实现了。1955年，作为苏联文化部的客人，他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他曾有机会到克里米亚去旅行，在旅行期间他为苏联著名的演员尼·契尔卡索夫画了一幅肖像，这位画家将这幅作品赠予伏尔加格勒画廊，它至今还保存在那里。

布尔柳克第二次到苏联，是在10年之后的1965年。他携夫人一起来苏，在“莫斯科”饭店住了两周左右。布尔柳克特意请求给他安排一间能看得见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的客房，因为他想把这一切都画到油画上。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

不，后人一定不会忘记布尔柳克这位俄罗斯文学中未来派的创始人、天才的诗人、独树一帜的画家、我国赤诚的爱国者。

俄罗斯音乐文化的骄傲

苏联人中谁不想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这位作曲家握握手呢？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是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光辉一页。命运也把他带到了遥远的美国。

我同他只见过一面。战争期间，拉赫玛尼诺夫向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提出申请，要求准许他返回祖国。为了同苏联

代表们详谈一些有关这一决定的细节，他来找我们。事情是这样的，他到苏联驻纽约的机构时正赶上我出差从华盛顿来到这个城市。

当我走进领馆大楼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正准备离开。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碰上了，我立刻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肖像在他健在时已经为相当多的人所熟悉。

我对他说：“您决定回国，我很高兴。您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我们的人民当然会热烈赞同您的决定。”

“请你们争取尽快办好手续。”他请求说。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我将尽力而为。”我答应说。

拉赫玛尼诺夫说：

“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注视着红军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史无前例的功绩。”

然后，他又补充说：

“美国人崇敬苏联人的力量和精神，我本人就曾经多次目睹这种情况。”

我感谢他对我们共同的祖国苏联所说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话，也感谢他举办音乐会集资为苏联红军的伤员购买药品。

我还对他这样说：

“我妻子向我讲述了您的音乐会的进行情况。她去听了音乐会，目睹了观众怎样热情地欢迎您这位演奏家兼作曲家。我们驻华盛顿使馆和驻纽约总领事馆对您举办这些音乐会再三表示感谢。”

映入我眼帘的是作曲家不太健康的样子。他脸色苍白，身体显出病态的消瘦。我不想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也根本不想触及这个题目，更何况答案一般来说会在预料之中。这一

方面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谈。

听陪同拉赫玛尼诺夫回住处的领馆秘书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费多西莫夫讲，作曲家上车后自己谈起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您看我的手，”他伸出手来让他看，“现在还能很好地弹动琴键，可是很快就会失去演奏能力了。”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说这些话时，嘴唇都在颤抖。费多西莫夫尽力安慰他。

拉赫玛尼诺夫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居住期间，他作为作曲家的才能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他最优秀的歌剧是在青年时代写成的。比如写《阿列科》时他只有19岁。他创作了驰名苏联和世界的杰作，这些作品至今仍象在本世纪初和本世纪中那样使每一个音乐爱好者激动。

但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人们更多地把拉赫玛尼诺夫作为一个音乐演奏家来器重他，而他的作曲家的天才似乎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这当然对他刺激很大。

回忆起拉赫玛尼诺夫，可以说，他那丰富多彩的天才还是在祖国的土地上备放异彩。在我国的音乐文化史上，他始终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离美赴苏的问题未能迅速解决。那是1943年。苏联举国上下与敌人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同年，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与世长辞。这对俄罗斯文化是一个重大损失。伟大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始终是我们的骄傲。他也是爱国主义者。尽管战争时期困难重重，身患重病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仍然决定返回他1917年

12月离开的地方，返回自己的祖国。

众所周知，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初期——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和经济崩溃的年代里——要保障文化人士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缺少资金、住宅、煤、柴、粮食、面包和许多其他东西。因而，苏维埃政权机关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满足了一些音乐家、演员、作家、画家临时出国的请求。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受弗·伊·列宁的委托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表示愿意到美国去的文化活动家中就有谢尔盖·库谢维茨基，当时他已经被认为是著名指挥家了。在美国，他很快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并成为美国最有声望的乐团之一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主要指挥。这个乐团的确可以同纽约爱乐乐团、费城、洛杉矶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并驾齐驱。波士顿乐团以演奏古典音乐而著称，它经常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

有一次我和妻子应谢尔日（在美国，人们这样称呼谢尔盖）·库谢维茨基的邀请出席了这个著名的交响乐团在波士顿举行的音乐会，音乐会上这个乐队首次在美国演奏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库谢维茨基亲自站在指挥谱架前，这就更加突出了此事的重要意义，而且这已不单单是音乐上的事情了。库谢维茨基指挥波士顿乐团，可以说已经与它融为一体。结果是：指挥是我国的侨民，乐队成员是美国人，演出的曲目几乎全是俄罗斯音乐和苏联音乐。

谈到这个问题时，库谢维茨基说：“这种结合当然是复杂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

战前和战争期间，库谢维茨基为苏联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他参加了美国对我国友好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他经常到苏联使馆来，通常由其侄女陪同。美国举国上下都知道，谢尔日·库谢维茨基是俄国移民，是在俄罗斯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杰出的艺术家。战后，他多次率自己的乐团到苏联巡回演出，而且总是受到我国观众的热情接待。

“从白痴到天才”

30年代在苏联报刊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沃罗诺夫教授的名字。在少年时代，这位大生物学家跟随父母移居国外。他在法国受了医科教育后，在巴黎的一个医院任外科主任医师。

后来他专心致志于老年学，主要是研究返老还童的问题。当时，部分是受他研究的影响，这门令人好奇的科学领域开始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在战争年代，沃罗诺夫成功地躲过了在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来到美国，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沃罗诺夫同苏联使馆建立了良好的友善的接触。可以感到，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容易。在那里，他的科学活动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在同使馆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他公开抱怨生活。根据一切情况看，他的科学工作进展缓慢。因此，在谈到他的著作时，他态度拘谨。

我同他见过面，而且交谈过。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侨民的情况，谈论对美国医学水平的印象。当我们谈到使人益寿延年的想法时，他就异常兴奋。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令人高兴的话题了，”他说罢便

开始讲述自己的关于使身体返老还童的理论。

我问他：“您能不能从您的试验成果中举几个例子？”

他举了例子，但直率地说，它们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总的看来例子为数不多；其次，他所举的都是些难于察觉的现象，而且手术后人的命运以及教授对他们施加医学影响的结果，广大公众还是很少知道。

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您是怎么开始研究老年学问题的？”

他调皮地笑了一下，说：

“完全是偶然的。”

于是，他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他说：

“早在战争前，我曾有机会去过埃及。我参观了开罗附近的金字塔区。在举世闻名的奇阿普斯金字塔附近有一家饭馆，光顾这家饭馆的人基本上都是旅游者。走进饭馆时，我立刻注意到了一个服务员一副奇怪的样子。如果从他走路的步态和迅速而利索的动作看，他无疑是年轻人，可是他的外貌，尤其是他脸和手上松弛的皮肤把我弄得摸不着头脑：我面前的这个人好象是个老头。后来，我又去了一次。我又看见了3个外貌特征同以前在这里碰到过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的服务员，我简直惊讶不已。有意思吗？”

讲话者用询问的眼神望着我。我没隐瞒地说：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话鼓舞了他，于是他继续说：

“作为一个医学家，我开始打听，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原来当他们还在童年或少年时，就给他们做了实际上使其失去男子功能的手术。我弄清楚了，在古埃及，

法老们就这么做。在新的时代，现代的埃及皇室仍沿用这种称不上是“传统”的做法。于是我开始思考，能不能消除这种反常现象，能不能帮助这些人呢？是不是可以把加速皮肤和人本身衰老的进程变为延缓这一自然的生物进程，甚至使它往回走呢？不久，我暗自发誓：献身于解决这一问题。这以后我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在法国，和后来在美国在科学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服从于这一誓言的。”

谢·瓦·沃罗诺夫教授给我往使馆寄了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书留作纪念，他的这本书是在美国用英语出版的，这本书至今还存放在我的家庭图书馆里。书的名称惹人注目，叫《从白痴到天才》。我不准备谈论它的科学价值，只是把它作为一本吸引人的小说来读。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尽管单纯从人的角度看是引人入胜甚至妙趣横生的，但从科学的观点看值得商榷。

我们也邀请他到使馆来参加招待会。谢尔盖·亚历山德维奇总是同自己的法国妻子一起来。他个子很高，给人一种竞技运动员的印象。初看上去，觉得他很年轻，但从他的满头白发可看出他的年龄。他的妻子是金发女郎，个头几乎与他不相上下，年龄却至少比他小一半。

沃罗诺夫的举止彬彬有礼，他认为自己是远离政治的人，但是在俄侨中他所从事的是真正的政治工作：他讲述我国在战前时期和在前线所取得的成绩的真实情况，募集资金帮助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伤员，总之他的行为是一名真正的俄罗斯大地的爱国者的行为。战争年代他远离祖国，却为之做了有益的工作。对此我们使馆向他表示了谢意。

沃罗诺夫属于那种有一颗爱国者之心的侨民。这些人由

于常常与政治无关的种种原因脱离祖国，他们在许多方面与自己的人民有着共同思想和感情。这些感受在阿·尼·托尔斯泰、亚·伊·库普林、伊·阿·布宁和其他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国外来信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前科学院院士和爱国将军

老一代苏联人也许还记得，30年代我们的报刊是怎样谴责科学院院士弗·尼·伊帕季耶夫的行为的。他是化学领域的著名专家。伊帕季耶夫去美国出差后，没有再回来。不言而喻，他的行为是不爱国的。我们国外的敌人自然对此加以利用，来反对苏维埃国家。

苏联科学院和科学界理所当然地对这位学者的行为表示愤慨，他在祖国具有一切条件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显然是在追求“厚利”。苏联学者们公正地表示，作为一名专家，他为金钱出卖了自己。

多年来我们国内，以及驻华盛顿的苏联使馆都没有听到过伊帕季耶夫在美国活动的任何消息。他突然在1944年出现了，并请求苏联大使接见。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值得见他。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打来电话，而且越来越坚决地重复这一请求。使馆值班人员每次报告时都以不寻常的句子开始：

“又是伊帕季耶夫……”

我同意见他。

走进办公室的是一位中等略高身材、体格健壮的人，与他的年龄相比他显得相当灵活，看样子他至少有75岁左右了。

正象人们常说的，他开门见山地说：

“您听说过我，我姓伊帕季耶夫。我是来负荆请罪的。”

尽管我在使馆工作的年头已经相当长，而且在国外各种事情也听到过不少，这位来访者还是使我大吃一惊。我想，他似乎应该得到了他所追求的金钱了。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离开苏联是我一生中犯下的重大错误。真是鬼使神差！我根本不需要这些洋钱……”

我回答说：

“如果鬼能把学者弄糊涂，那不言而喻，这对学者非常不好，而对鬼神则不然。而且您的鬼神的比喻是极为恰当的。您想想，鬼神使歌德的浮士德怎么样了。”

伊帕季耶夫当然不准备去理解文学比喻。他知道他为何而来，于是决定不浪费时间，立即将对他说来是主要的问题和盘托出，看来，他担心别人不听他讲完，不理解他，于是坚定地说：

“请您理解，我来不是为了向您抱怨我的物质状况。我无需抱怨我在美国这里的工作条件。他们在芝加哥给了我一个试验室，这个试验室我管理得非常出色。在我的领导下试验室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得到科学界和政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我们在研究如何获得高辛烷值汽油，这种汽油首先用于满足军事航空业的需要。确切地说，这是一项同生产这种燃料有关的科研工作。但是我始终受着良心的折磨：怎么能这样呢？我是一个学者，是给了我教育、学位、科学中的地位等一切的这个国家的学者，我是苏联人啊，可是我的劳动成果却被另一个，对我来说是异邦的国家据为己有，尽管它现在是苏联在战争中的盟国。”

他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我，似乎是在检验，我是否相信他说的话。沉默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请允许我回到祖国去。我想，苏维埃政权是会理解我的……科学界也会……”

我好奇地问：

“您想什么时候、怎样回到苏联去呢？要知道，现在正在打仗。如果考虑到美国当局对此事的态度，您有可能回去吗？”

伊帕季耶夫开始情绪激动地说服我：

“美国当局不会对我回国制造困难。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么样我都能回去。只要能够回到祖国。”

可以感到，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当时在战争时期从美国回到苏联有多么复杂。

他接着说：

“我希望我能够有可能带走我实验室的部分设备，那是我用个人的钱买的。我相信，美国方面谁也不会反对，此外，我还请求允许我实验室的助手——美国公民同我一起到苏联定居，他是我必不可少的科学工作人员。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这一请求不能不使人警觉，引起一连串的疑问：这是个什么人？现在伊帕季耶夫以他的名义所说的这些他会同意吗？他真的想去苏联定居吗？可是学者说话时心情很平静，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一问题的所有细节他们俩早已谈妥，并早已下了决心。伊帕季耶夫继续说：

“我想回国工作，再也不想留在美国了。”

他突然哭了起来，总重复着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眼泪难为情。看来，他激动不已。他擦干泪水，又重复道：

“您不知道，脱离祖国大地意味着什么……脱离祖国大地……在我面前除了死胡同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假如您能想象，我是多么后悔……后悔我犯了……”

我十分坦率地对他说：

“现在自然没有必要去讨论您过去的行为。至于您回国的请求，过一段时间，我希望过不长的时间，能够答复您。”

伊帕季耶夫道谢后朝门口走去，他在门边停下来大声说：

“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着这个答复。”

勿庸讳言，同伊帕季耶夫的会面给我留下了印象。我看着他时在想，有时“鬼神”是多么容易把人搞糊涂啊。然而留给他们的创伤却终生难愈……有时这种创伤甚至会成为不幸的结局……

当天就将伊帕季耶夫的请求报告了莫斯科，并很快得到了答复。答复的中心内容是伊帕季耶夫提出的回国条件无法接受，而就此问题同莫斯科进行长信来往确定不可能，因为正在打仗。

苏联驻纽约的总领事把来自莫斯科的答复内容通知了伊帕季耶夫。他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从此伊帕季耶夫再也没有在苏联驻美国的代表机构中出现过……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亚洪托夫是美国俄侨中十分知名的人物。1917年，他36岁。当时他已是少将衔，任临时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前，亚洪托夫因军事上的公务去过英国和法国，一段时间曾任驻日本武官。

这位将军的一生是非常复杂的，他没有马上认识到我国革命变革的实质，最后漂流到美国并在那里定居。但是，应该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亚洪托夫从未参加过任何同我国敌对

的组织。他属于为美苏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事业进行工作的那一部分俄侨。在战争年代，亚洪托夫为苏美友谊，尽早开辟第二战场，为美国给苏联提供更多的援助进行工作。

他大量的演说使他闻名于美国。他表明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在群众大会上，在讲坛上，他讲述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反法西斯入侵的斗争，讲述这场斗争对全人类命运的重大意义。他说话时情绪激昂，语气坚定。

我不止一次地见过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半是在苏联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身材匀称，总是衣冠楚楚，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年轻得多。作为一名过去的将军，他在战时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上传来的所有战报，挑出互相矛盾的、有时相互排斥的消息仔细分析，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同他谈话令人愉快。当他谈论苏联国内的生活和战场局势时，怀疑消除了：面前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人。

我对他说：“我们赞赏您在俄侨中和整个美国社会的活动。”

他回答道：“为祖国服务。”

亚洪托夫于1975年回到苏联。次年，在他95岁生日时，他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他于1978年去世，葬于列宁格勒亚历山大一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公墓。

“政治上的庞然大物”

——克伦斯基和索罗金

在美国工作期间以及后来，我曾与一些人打过交道，我把他们称之为“政治上的庞然大物”。这些人中有的甚至企

图在大的政治风浪中漂浮，他们与生养、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国家是如此疏远，以至实际上已经同自己的人民失去了一切联系。

他们中间也包括苏维埃国家的疯狂敌人。生活将他们抛向远离祖国的异乡，正是因为他们公然敌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所向往的一切。

那是在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几天之后，有一次使馆里电话铃响了，是美国国务院打来的，请我接电话，我拿起了话筒。

“喂，葛罗米柯先生吗？我是伯利，副国务卿，”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了我熟悉的声音，“您听得见吗？”

“听得很清楚，您好。您这么早来电话有何贵干啊？”

在此之前我同阿道夫·伯利不止一次地见过面，互相已经熟悉了。

“您要知道，葛罗米柯先生，我同克伦斯基先生进行了谈话。他想见苏联的临时代办并请我协助安排这次会面，他在贵国十月革命前夕领导了俄国临时政府。”

假如有人告诉我这是从彼岸世界传来的请求，我大概也不会比听到这些话更惊讶。当然，我听说过，克伦斯基在美国的某地生活，也不准备离开这个国家到别国去。他和一个澳大利亚富有的寡妇结了婚，但是革命以来的这些年，他从未尝试过同苏联官方代表接触。可是突然……

他想干什么？爆发了战争，法西斯动用了所有他曾成功地使其为自己效劳的全部欧洲力量来反对我国。从柏林、从莫斯科传来一个比一个更使我们苏联人不安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在问，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就是那个在1917年曾是俄国临时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他想干什么呢？幸灾乐祸？我们的同志一定会立刻将他赶出门外，把他撵走。那将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来表示同情？可笑。是谁同情谁呢？散发着樟脑味的政治破产者。不，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能同克伦斯基见面。我将这一切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然后用平静的声调对着话筒说：

“伯利先生，我不打算见克伦斯基。我想您会正确理解的。”

显而易见，我的反应对于伯利来说并非出乎意料。

说完，我就挂上了话筒。我至今仍然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的根据是，他曾经而且一直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他的名字同俄侨中最敌对的力量牢牢地拴在一起。任何一名苏联官方代表都不打算见他。

我向莫斯科报告了我对克伦斯基请求的答复，我的决定被认为是正确的。此后，莫斯科对此再未作出任何反应。再说，1941年7月莫斯科难道能顾得上克伦斯基吗？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政治人物。他向报刊发表声明。一些低级庸俗的刊物有时刊登他的讲话。在一次声明中，他声称仍然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但是他祝俄国武器在同德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正象在难忘的1917年一样，这个喜欢装腔作势的人又一次故作姿态……

这位前临时政府总理，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男扮女装，逃出彼得格勒。他在人生的筵席上逗留了几十年，在这些漫

长的岁月中他实际上被人完全遗忘了。只是有时，当美国再次掀起反苏运动时，才让他在电视屏幕和二流聚会的讲台上露面。在他的反共讲话中，他不止一次地申辩，他绝对不是男扮女装逃出冬宫的，而是穿着自己平时穿的衣服离开那里的。

他终生从事的就是颠倒黑白，愚弄欺骗历史。不，他不是“离开”，而是逃跑，抛弃了一切：国家、人民、人格、良心、甚至自己的妻子……1925年《消息报》上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称列宁格勒的一个公证处收到一份拿来复制的离婚证明：“鉴于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抛弃了妻子，奥莉加·利沃夫娜·克伦斯卡娅与克伦斯基的婚姻就此解除，特此证明……”

直到老年，克伦斯基仍旧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仍旧留着过去的那种发形——“平头”，穿着他年轻时照片中和漫画中画的那种式样的弗伦奇式军上衣^①。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了他在麦克风前的照片。命运用孤独惩罚了他。俄国的保皇党人憎恨这位曾一度得势的人，认为他虽然不是“赤色”分子，也是过于“粉红色”了。往昔曾把他奉为偶像拜倒在他脚下的从前的战友和崇拜者干脆和他断绝了来往。而所有的白俄听众谁也不听他在美国电视里的关于他似乎没有男扮女装的讲话和保证性的表白，而是轻蔑地叫他“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至于西方的政治领袖们，从来就没把克伦斯基放在眼里。

他就这样度过了自己枯燥单调的一生，象一个远离政治的异国小摆设那样活着，靠偶尔得到一点点西方宣传经常烤

^① 以英国元帅弗伦奇命名，有4个贴兜，带扣带。——译者

制的反苏馅饼的残屑维持生命。就连他的两个亲生儿子也不同情他。1970年克伦斯基生病时，他们不愿花钱给父亲治病，将他送进了市政慈善医院。出院后，他意识到如自己病情恶化，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屈辱，于是他自杀了……

有一些不速之客也千方百计地来参加苏联使馆招待会。为此他们用的是我们负责礼宾工作的同志发给他们的熟人，当然不是发给他们的正式邀请。他们讨了一张这样的请柬，便出现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大楼里。显然，有名的俄侨皮季里姆·索罗金也是用这种方法到使馆里来的。

这位社会学家、哲学家的一生是戏剧性的。这位投身于汹涌的政治浪涛中的学者的名字早在革命前，尤其是在俄国知识界中已相当有名了。他有许多印刷成册的著作，其中包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书。索罗金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它的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充满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正是这种列宁严厉批判过的唯心主义使他加入了社会革命党，成为其右翼领袖。1917年克伦斯基发现了索罗金并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

索罗金的堕落是他整个过去生活的必然结果。十月革命后身为彼得格勒大学的教授，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作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幌子。这样他成了一名反革命阴谋家，坐到了被告席上，被判处死刑。但是根据列宁的提议，1922年将死刑改判为驱逐出境。

1923年皮季里姆·索罗金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在美国度过了他的残生，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授。由于这个社会主义的疯狂敌人的履历，学校对他采取鼓励的态度。他出版了四卷本著作《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这使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为

自己树立了一定的威信。

当别人把索罗金领到我面前时，我惊讶不已。这个人从何而来？从哪个陈列馆而来？报界从未提过他的名字，在俄国侨民中他没有任何威信。除了认为他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外，大家都根本不想知道这个人。

不过，我象其他苏联同志一样，没有问索罗金是怎么到招待会上来的。这不用解释我们也能猜到了。我问他另一个问题：

“您想念祖国吗？”

索罗金回答说：

“由于我的过去，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深深地感谢列宁本人为我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使我活了下来。”

我又提了两三个问题问他的情况，但他避而不答，由此我明白，皮季里姆·索罗金不太想多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况且，也许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谈这样的问题是不适宜的。

后来我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了解到索罗金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诚然，在战争年代他同许多俄国人一样，对彻底摧毁衣冠禽兽的纳粹的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示钦佩，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他站到了苏维埃政权一边。

科学院院士伊帕季耶夫和哲学家索罗金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来负荆请罪的，承认了自己在“自由世界的金钱生活”计划的破产。而后者却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未放下武器，他的一生直至死为止始终是苏联的敌人。他死于1968年。

在布莱尔国宾馆同贝奈斯的谈话

我还有机会不仅同我国，而且同其他国家昔日的代表人物见过面。我同他们会面时，对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来说“昨天”还没有来临。比如，我对同资产阶级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会面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43年5月，在华盛顿。贝奈斯从伦敦来美国进行访问。他当时是流亡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那时也在流亡中，贝奈斯从英国飞到这里是为了会见罗斯福并总的感受一下美国首都的政治气氛，同时也想了解大洋彼岸对欧洲的未来，当然，首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有什么考虑。这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从东方传来的消息，注视着红军已开始打击希特勒分子并向西挺进的时候。欧洲各国人民有了信心，他们从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希望将来自东方。

当政府和总统远在他国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在同法西斯进行搏斗：游击战争在捷克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领土上广泛展开，同时也在打击表面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是亲法西斯的斯洛伐克政权。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请您接电话。”使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拿起话筒：

“葛罗米柯先生，”这是我所熟悉的国务院“俄国处”的一名职员的声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想同您谈谈。”

我同意了。

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布莱尔国宾馆，这里是政府正式接待外国贵宾的国宾馆，这一古老的美国式三层楼别墅紧挨着白宫，来华盛顿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每次也在这里下榻。

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不高、看样子不到60岁的人。他说：

“我十分高兴能继几天前在捷克斯洛伐克驻美大使举行的午宴上相识之后同您进一步接触，很遗憾，我们当时没能详谈。”

我们在宽敞的会议厅里就坐。

贝奈斯以特别敬重的语调开始了谈话。他明白，与之交谈的是苏维埃国家的代表。他说：

“现在，几乎全人类都在注视着苏联，人们在等待着英勇的苏联武装力量把各国人民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

应贝奈斯的请求，我向他通报了来自前线的最新消息。

“我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及我本人，向苏联表达我的友好感情，同时我相信，这也是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感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得以自由呼吸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由于很自然的相互同情之感而产生的最亲密的友谊，一定能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紧紧地连在一起。”

接着，贝奈斯开始评价美英两国战时和战后的政策。他强调说：

“但愿这两个大国能为战胜法西斯的事业动员一切力量。”

贝奈斯对早就必须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讲得有点快，因而不清楚他是否相信第二战场会很快开辟。然而，感到他在下述问题上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不

应该让德国作为威胁邻国生存、威胁欧洲和平与安宁的侵略势力重新抬头。

他向我保证说：

“在华盛顿会晤过程中，我要美国政府明白，德国应该解除武装，在不受德国影响的情况下协助欧洲恢复原状。这无论对美国还是英国来说都是最理智的行动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美英两国政府那时已经采取了可能造成德国分裂的立场，而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德意志国家甚至连想都不想，这一点从贝奈斯讲的话中也可看出。这种路线十分明显地表现在西方国家的战后政策中。该政策不仅使德国走向分裂，而且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拉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

听贝奈斯发表议论的时候，我回想起战前有关国际联盟内部“争吵”的报道。贝奈斯同英国、法国及其他一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竭力过低估计来自潜在的侵略者的危险，他们的发言使各国人民丧失了警惕性。

贝奈斯在国际联盟的人士中间以狡猾和随机应变而著称。

他的名字，如同与他一样圆滑的政治家——希腊人波利季萨的名字一样经常见诸于报刊。30年代末，苏联报刊揭露了那些对当时的局势毫不了解、在法西斯主义面前心惊胆战、估价未来时鼠目寸光的人。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贝奈斯在历史的法庭面前是有罪的，因为他在战前多年来一直与法西斯勾勾搭搭，并在1938年9月接受了在慕尼黑签订的英、法、德、意关于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协议的条件，这样就把自己国家的政府推上了投降的道路。

有些政治家曾经在客观上纵容法西斯在欧洲发动侵略，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而他却向我表白他对苏维埃国家怀有友好感情。

不知他是否注意到，我几乎没有谈起他的过去。指责他未必合适。而恭维贝奈斯，他又不配。因而我们谈的一些问题都是些可以避开个人方面来谈的问题。

“我们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也代表苏联政府，”我说，“支持美英必须对反对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作出更大贡献的思想，这就要求苏联的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真正直接地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开辟第二战场。”

贝奈斯的华盛顿之行是否成功呢？就其同美国政府结识、建立联系这方面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对华盛顿政策产生影响——就大有问题了。

谈话时，我发现贝奈斯精神相当饱满。从一切情况来看，他身体很不错，看不出任何劳累过度及精神和肉体上的疲惫迹象。我甚至想：“这哪里有德国空军空袭伦敦时那些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迹呢？”美国报纸对这样的夜晚做了相当频繁的报道。

我明显地注意到，贝奈斯常常用手在桌上画着一些他设想的、据他认为是象征着交战各方军队的运动方向或一些国家政策方向的线条和箭头，好象空间的地方还不够他打手势。

无论此人的外表，还是他的举止都和某些人文科学的教授，可能更与法学教授非常相称。他讲起话来从容不迫，抑扬顿挫，中心突出。这一切显然是为了使他的话更富有表现力，尽管他的听众只有我一个人。贝奈斯似乎是在表现他的

演说才能。

贝奈斯至死都是一个不理解劳动人民真正的思想和心愿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他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并在战后的头几年依靠它们，极力阻挠在国内发生的革命变革。

1948年2月事变的潮流将贝奈斯卷走，使他远离人民。他参加了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策划的阴谋。这些阴谋家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并使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帝国主义的北大西洋集团。

这一阴谋失败后，贝奈斯于1948年6月退休，这位总统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他的路线与被苏维埃国家的战士们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形势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将他抛弃，并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开始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包袱沉重的扬·马萨里克

另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扬·马萨里克的命运是很独特的，我与他也有过多次交往。他是1918年至1935年间担任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托马斯·马萨里克^①的儿子，他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条件下长大的，自然，他基本上是倾向西方的。

战争期间，扬·马萨里克侨居英国。1940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而从1941年起任政府副主席。

^① 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1918年是苏维埃的捷克军团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者

在苏联军队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以后，马萨里克有了效忠本国人民的可能。在国家已肃清了占领者并着手建立人民政权时，他就面临着抉择：是跟着人民走，还是投身于另一个营垒？最初，马萨里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于1945年4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在战后的头3年中，我和马萨里克经常会面。第一次会晤于1945年，是在旧金山召开的关于成立联合国问题的会议上。我还记得，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苏联代表们表现得那么殷勤亲切，我们报以同样的热情。

在整个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团紧密合作。苏联代表团团长（最初是维·米·莫洛托夫，后来是我）与马萨里克几乎是每天见面。所有的会谈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苏联代表团关于各种问题的观点，其中包括所谓的“否决权”问题，总是能够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完全理解和支持。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后来率领本国代表团多次参加过联合国大会。他与其他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一起到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处的格兰考夫别墅来。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去他那里做客。

马萨里克是个很有意思的谈话伙伴。但是，让他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说一句强硬的话，对他们进行回击，对他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倒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仅仅是由于性格气质的关系，他不善于讲那样的话。大家对此都很清楚。

我记得，1947年9月28日，在我同马萨里克的一次会晤中谈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选举捷克斯洛伐克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的问题，当时我不得不提请他注意。

“当然，为了维护贵国的利益，你们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对其他代表团做些工作是有益处的。这也符合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

马萨里克做了些事，但做得毫无热情。

只要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他经常在思考着什么问题。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谈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更多地由于他没有把事情全部说出来的缘故。特别是当谈及西方国家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态度和政策方面一些尖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马萨里克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跟着政治上的死亡后是肉体上的死亡：1948年他突然自杀了。显然，扬·马萨里克始终未能摆脱过去的重负，他的过去使他不能彻底地以自己超群的才干和力量来为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服务。

一条艰难的航线：莫斯科—华盛顿

在战争年代，从苏联到美国是很不简单的。

人们经常问我：“您那时是怎么从莫斯科到达华盛顿的？”

的确，由于明显的原因，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直接穿过大西洋的航线。

这样，由莫斯科到华盛顿的可靠航线只有一条，它必须穿过我们全国：经西伯利亚、远东到阿拉斯加，然后骤然向南到加拿大，再到美国西部，从那儿才能到达美国首都。

在战争期间，我从华盛顿到莫斯科往返共飞过3次，所

以，用当代旅游者的话来说，我完成了3次“旅行”。在这些“旅行”中有两段空中的线路是在战争快结束时穿越北非，有4段通过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

那时，由苏联到美国的航线要穿过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过西伯利亚的几个小型机场，奥廖克敏斯克（北方人教我们简单叫它为奥廖克马）、雅库茨克、楚克奇半岛上的马尔科沃。苏联境内最后一个居民点乌埃利卡利，也在楚克奇半岛上，然后是阿拉斯加的几个小城镇——诺姆，费尔班克斯——再往前就是美国的其他机场。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路线，令人疲倦不堪，但是战争年代正是通过这条航线运送美国按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为保持两国首都之间的联系，一些官方人士或者代表团也得飞这条线。

我们的飞行员把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楚克奇半岛这条航线称为“马祖鲁克线”。苏联英雄、空军少将、著名的飞行员伊利亚·巴甫洛维奇·马祖鲁克在我国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北方。他为给我国家航空队增光做了不少事，飞过北极和南极。他曾参加过帕帕宁^①四人小组在北极着陆的活动。曾任北方海上航路总局的极地空军指挥员。

在这条航线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1944年1月的某一天，一架“解放者”号美国飞机在雅库茨克着陆。机上坐的是从莫斯科飞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代尔·威尔基及其随行人员。西伯利亚和北方显出了自己的秉性。这架美国飞机冻得那么厉害，以致美国空军的飞行员怎么也无法将它发

^① 苏联北极考察家，地理学博士（1938），海军少将（1943），两次苏联英雄（1937、1940）。领导苏联第一个“СВ-1号”漂流考察站（1937—1938）。——译者

动起来。因此不得不用苏联飞机将威尔基先生送往阿拉斯加。

从华盛顿飞到莫斯科单程就需要 5 个昼夜。这样，当我从高空俯瞰西伯利亚原始大森林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国大地是多么辽阔。有一次，飞经雅库茨克上空某处时，我透过舷窗看到了一场森林大火，一条弯弯曲曲的火龙在大森林里绵延数十公里。原始森林中这一火景不能给人带来快感。“就象在前线一样，”我想道，“那里仿佛一切都在燃烧，而且我们的人也在流血牺牲。”

楚克奇半岛，雅库茨克，西伯利亚好象无边无际。飞机已飞行了许多小时，下面却一直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和原始森林。

最后一次沿这条航线从莫斯科飞往华盛顿是在 1944 年。那时在这条航线上，我又一次领教了老天爷送给的意外礼物。

我被任命为参加在敦巴顿橡树园（华盛顿市郊）举行的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的国际法专家谢·阿·戈伦斯基和谢·鲍·克雷洛夫教授，苏联有名的外交家阿·阿·索博列夫和谢·康·察拉普金，海军少将康·康·罗季奥诺夫，少将尼·弗·斯拉温，格·格·多尔宾，米·米·尤宁（代表团秘书）和弗·米·别列日科夫（秘书兼翻译）。

在到楚克奇半岛之前，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然而，在克列斯特湾岸边的小镇乌埃利卡利却滞留了一昼夜多。由于天气恶劣，我们的飞机不能起飞。狂风怒吼，虽然时值 8 月，但北方寒冷的气候已经让人知道它的厉害了。

乌埃利卡利在当时只是一个仅有几间小房子的小镇。有人把我们领进一间房子里，并对我们说：

“如果想打发晚上的时间，可以去看电影。流动影院就在隔壁。今晚将要放映军事纪录片。”

我们决定去看电影。但我们刚一出门，就不得不拉起手来。离“隔壁的”房间大约有200米左右，但是我们只有紧紧地手拉着手才能到达那里。

当我们花了好长时间、费了不少力气才来到这个将要放映电影的小屋时，里面人已挤满了。小镇的全体居民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在椅子和长凳上坐着妇女，小孩和老人。同我国其他城市、乡镇、居民点一样，这里的男人早已上前线去了。战争也影响到了这个我国领土最东端的楚克奇半岛上的小镇。

开始放映的是新闻纪录片。那时，战局已发生了转折，红军正在各条战线上乘胜前进。银幕上出现的每一个前线的情节，都反映了胜利的场面，而且这是符合事实的。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屏住呼吸，看着电影新闻。然后，放映的是军事题材的电影剪辑——这是一些战时在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赶拍的故事片。有一辑是由三四个反映前线生活的小故事组成的。一般来说，都是些简单而引人发笑的小故事。影片中敌人的形象都是漫画式的。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这些电影可能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更不用说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了。但渴望看一场电影的观众都怀着满意的心情看着电影，特别是关于前线情况的电影。当时全国都是这样。勿庸讳言，那时在苏联的驻外使馆里也是如此。在极北地区就更不待言了。命运把我们抛到了这里，从莫斯科传来的每一条珍贵的消息（更不用说以这种电影的形式）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在这个小小的礼堂里——将它称为礼堂也是假定

的——虽然闷得透不过气来，却没有一个观众离席而去。所有的人都是一直看到完。

返回住处的路更难走。狂风肆虐，真会把人吹倒。我们紧紧抱成一团，艰难地向前移动。勉强走完了这段在通常的概念中是很短的路程。

清晨，风暴停息了。但还是不让我们的飞机起飞，在航线某处，以及在阿拉斯加，天气仍未转好。我们在乌埃利卡利又呆了几个小时，因此，就有机会去了解楚克奇人的生活习俗，这个民族只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他们居住在房子里。这里的许多事都使我们这些来自食品匮乏、并经常忍受着其他各种战时困难的莫斯科的人们感到吃惊。其中，那些上前线的男人们做的事都由妇女来承担了，包括那些在极北地区属于典型的男人们的职业。妇女们既登船打鱼，也去打猎，还出现在冻土带的养鹿生产队里。令我们惊讶的另一件事是，虽然全国都实行凭证供应，换言之，靠定量配给，过着饥饿的生活，而在这里，却感觉不到食品短缺。

我们去过当地的集体农庄管委会，管委会主席也是个楚克奇人，原来他还在列宁格勒的北方民族学院里学习过。在那里，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医生发现他患了肺结核，所以建议他立即回到楚克奇来。他们对他说，“楚克奇的气候和习惯的饮食会有助于您康复。”就这样，他已经领导这个集体农庄好几年了。

“是的，由于疾病，不让我上前线，”他说道，“但病情没发展，还有好转。在家里我感觉不错。”

他向我们讲述了，农庄是如何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他是

如何照顾前线官兵的孩子们的。更主要的是，虽然男人们减少了，但他们上交给国家的鹿肉并没有减少。轮船定期将肉运往大陆。楚克奇作为苏联远东的“肉食加工车间”对自己的职能履行得很好。总而言之，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们感到，遥远的楚克奇也与全国同呼吸共命运，它也在盼望着前线传来的消息，并相信会取得打败法西斯德国的全面胜利。

1945年初，我奉召回到了莫斯科以筹备、然后是参加三大国领导人的雅尔塔会议。

我曾多次飞越大西洋。然而，那一次飞行也许是最值得纪念的。在那些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全天候的、舒适可靠的大型客机。旅客坐在里面简直是一种享受。那时的飞机带有螺旋助推器，或者象人们所叫的那样，是有螺旋桨的，因此，乘这种飞机飞行并不意味着旅行者保证能飞到目的地。这不一定是因为敌人进行阻截，虽然发生过这种情况。例如，1943年7月在直布罗陀地区，由于敌人的暗中破坏，一架飞机爆炸，机上以弗·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成员几乎全部遇难身亡。

显然，机械不是十分可靠。经常发生飞机事故，发动机损坏，从而导致机毁人亡。我所乘坐的飞机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各种事故。有一次飞机从纽芬兰起飞，刚刚飞了半个多小时，转了个弯，又向回飞，然后平安地降落在纽芬兰原来的机场上。我们得知，有一台发动机失灵，不得不换一个。

这一次好象一切平安无事。我们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后，最后在百慕大群岛上降落，但直到我们在亚速尔群岛着陆之后，我同机长有过一段有趣的谈话。

“知道吗，我们是靠3个发动机飞的。”他说道。

“怎么是3台呢？为什么？”

“因为从百慕大起飞后，一台发动机失灵了，就这么勉强凑合着，一直凑合到亚速尔群岛。”

“难道可以这样吗？”

“可以，靠3台引擎也能工作，”他说的是发动机组，“即使再有一台引擎失灵，机器也能运转，只不过飞机会越飞越低，最后坠入水中。”

“难道真发生过这种事吗？”我吃惊地问道。

“发生过，”机长平静地说，“但如果这架飞机上有3台引擎失灵，那么飞机就会象石头一样一头栽下去。”

在亚速尔群岛上，排除了故障，所以我们继续飞行，再没发生任何意外。

当时欧洲战事犹酣，尽管法西斯野兽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了。我们沿卡萨布兰卡—突尼斯—的黎波里—本加济—开罗—哈巴尼亚（伊拉克）—德黑兰—巴库的航线飞行，并在这些地方着陆（在巴库的机场上，阿塞拜疆同志用我很久未尝过的黑色咸鱼子招待了我们，这种东西出产于我国里海地区，当然，那时向美国出口这种鱼子的贸易已停止）。

最后一站是从巴库飞往莫斯科。不得不花一些时间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里认真地准备苏联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所需要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然后，苏联代表团乘专列从莫斯科去辛菲罗波尔。火车飞速行驶。一路上都给它开绿灯，因而畅通无阻。

除斯大林外，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在辛菲罗波尔集中。我们当中级别最高的是莫洛托夫。

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飞机已抵达机场。在机场上举行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飞抵克里米亚之前，美国和英国代表团的服务人员、各方面的专家和顾问、大批军事人员已先期到达。美国人和英国人总共约700人，其中包括技术服务人员。

首先是丘吉尔先飞来了，然后是罗斯福。总统的座机叫“神牛”号。罗斯福是被抬出飞机，然后又送到汽车里。他给人的感觉是很虚弱。

为欢迎贵宾，苏联士兵排列仪仗队，乐队奏乐。罗斯福乘车检阅了仪仗队，丘吉尔和莫洛托夫并排走着。

就在这里，在机场上撑起了一座大帐篷，里面摆好了桌子，请客人们吃点儿东西，洗洗尘。

尔后，宾主分别登车启程。那天，大雾弥漫。在2月里的克里米亚这种阴天是司空见惯的。但那天老天爷却对我们的客人们开了个格外恶意的玩笑。本来说要让他们看看克里米亚南岸的美景：高山、大海、神话般的风景，可现在这一切都被白茫茫的大雾笼罩起来，数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汽车开着前灯，缓缓移动。

我们的车队在爬行，经过好几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司机们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所以车开得极其小心。四下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无际的白色云团，似探手可得。

开始下坡驶向南岸了，突然，好象有个魔棒一挥，云雾顷刻散去。露出一轮红日，顿时暖意融融。克里米亚还是温和地迎接了前来的客人们。

沿途，在所有的羊肠小路、桥梁、陡崖和峭壁上，在所有山村的街道及小溪的岸边，都站着肩荷自动步枪的士兵。当时采取了一切必需的警备措施——因为聚会在这里的是“三巨

头”，在德黑兰才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们。罗斯福兴致勃勃地从车窗向外看。最后在里瓦基亚宫停了下来……

每个代表团都住进了为他们准备的官邸。

当然，我在国外的外交生涯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美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曾在最紧张的时刻——战争时期和战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不少外交家在美国工作过，至今，我仍常常回忆起我前任和继任的驻美大使们。虽然他们是各不相同，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为发展苏美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是：阿·阿·特罗扬诺夫斯基，康·阿·乌曼斯基，马·马·李维诺夫，尼·弗·诺维科夫，阿·谢·潘友新，格·尼·扎鲁宾，米·阿·梅尼希科夫，阿·费·多勃雷宁。当然，其中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近25年的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是最有建树的。他对美国的了解是无与伦比的。目前还在华盛顿担任苏联大使这一重要的外交工作的尤·弗·杜比宁也是一位著名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在德黑兰发生的事 关于波兰问题 德黑兰会议之后 在里瓦基亚宫 角色已经确定并分配完毕 苏联信守诺言 再谈波兰问题 雅尔塔会议的成果 斯大林在会议上 一项指示的由来 伟大战役中的伟大胜利 最后是波茨坦会议 在第三帝国巢穴的废墟上 缺少热情 把原子弹当作“王牌” 谁应对波兰的前途负责 谈判桌旁的“三巨头” 基本上出自对苏联的尊重 在威廉·皮克处做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继续。但在战争进程中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红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

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需要立即研究解决的问题。历史威严地要求：盟国必须举行会晤，讨论极其重要的问题。苏、美、英三大盟国领导人举行的各种会议就成了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的机制的主要环节。这些会晤的目的是解决如何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问题，同时也为战后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1943—1945年期间，这样的会议共召开过3次。它们分别在德黑兰（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尔塔（1945

年2月4日—11日)和波茨坦(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举行。我有幸参加了后两次会议。

此外，我还率领苏联代表团或以我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一系列其他级别的会议——部长级、大使级的盟国会议，其中包括参加关于建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问题的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建立联合国问题)。还参加了最后研究和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法西斯德国宣布投降。

德黑兰、克里米亚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已公开发表，人人都能看到。对它的兴趣直到今天也没有减弱。人们力求客观地了解战争及战后年代发生的事件的实际进程。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决议在西方某些国家已被有意篡改。今天，那些企图使人们怀疑盟国协议是否有根据，并曲解其真正涵义的人竭力歪曲这些协议。更有甚者，有人甚至号召拒绝承认它们。这种企图反映了反动势力旨在破坏欧洲业已形成的领土和政治现状、破坏战后安排的基础的方针。

我想，就有关三大盟国会议及会议进行的情况做一些回忆是会使读者感兴趣的。

在德黑兰发生的事

随着战场上形势的发展，三大盟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想法越来越明确了。

关于在德黑兰举行“三巨头”会晤的建议是1943年11月5日斯大林在通过我转交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美国总统在复信中写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三人的这次

会晤，您、丘吉尔和我亲自互相熟悉这一事实将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有助于进一步扰乱纳粹的士气……”

美国官方人士不太愿意回忆有关德黑兰会议的某些情节。伦敦尤其如此。可要知道，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教益的，更不用说它的意义了。它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由于职务上的关系，我有可能了解苏、美、英三国为组织这次会议所进行的全部细致耐心的工作，并且参加了这一工作，然后又参与贯彻“三巨头”会议的决议。我想着重谈一谈那些在德黑兰讨论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

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斯大林就担心西方盟国想篡改或者干脆否定为反对希特勒德国而开辟第二战场的主张，德黑兰会议证明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围绕这一问题所要的各种手腕，特别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花招，以及美英领导人不断推迟在欧洲西部采取军事行动的期限，自然地使莫斯科对我们反希特勒联盟伙伴的政策产生不信任感。

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这样的，似乎从南线——在意大利北部、巴尔干、罗马尼亚以及德国的其他附庸国——发动一系列旨在消耗敌人实力的战役，就会使敌人败北。丘吉尔拼命维护的这一立场的真正意图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就是想阻止苏军向西、向法西斯匪帮的老巢——柏林推进，从而保证西方盟国的军队得以通过占领欧洲东南部推进到苏联西部边界。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采取了坚决果断的行动以敦促盟国不迟于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一点，全世界都应当清楚。这一页已经永久地载入史册。

大使们一般都是消息极为灵通的人。他们不仅收集驻在国的情况，而且也得到来自本国首都的机密信息。

我记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在华盛顿收到了一份通报会议经过的电报。

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几次想听到丘吉尔的回答，盟军何时在欧洲登陆，也就是说，何时开辟第二战场。但他怎么也得不到这个答复。有一次，斯大林强忍着性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说：

“我们家里的事情堆积如山，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我看，不会有什么有益的结果……”

丘吉尔显得惶恐不安，担心会议破裂，他说：

“元帅没有弄明白我的意思。准确的时间可以定在1944年5月……”

气氛缓和了一些。

与会者继续工作。西方盟国采取了较为建设性的立场。虽然实施“霸王”（这是开辟第二战场的代号）行动的这个日期——1944年5月——还是被推迟了，但英美部队到底还是在法国海岸登陆了，那是在1944年6月6日。

从其他方面来看，德黑兰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会议召开之时，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已不容置疑。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与会者都知道这个问题已提上日程。

德国在20世纪已经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苏联认为，必须排除德国再次进行侵略的任何可能性。为此，应当竭尽全力，使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

美英两国政府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并没有正式公布如何对

待投降后的德国的计划。不错，前面已经提到过，从两国首都不断地听到一些传闻，说它们正在酝酿着一个将德国分割成几个小国的计划。

在第一次就战后问题交换意见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都主张肢解德国。但是，可以看得出，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们两人一致坚信，应当特别重视普鲁士，要缩小其领土面积，剪除日耳曼帝国中这一最富有侵略性部分的翅膀。

听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发言后，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战场上，普鲁士人和德国其他地区的士兵——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以及其他的人等打起仗来一样疯狂。我认为，不应当通过消灭德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问题，因为德国是消灭不了的，就象不可能消灭俄罗斯一样，而应当通过使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消灭法西斯、法西斯的军队，将罪行累累的‘第三帝国’领导人交由各国人民审判。”

接着，斯大林提了一个简单的建议：

“鉴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就让三大国有关的代表去做这件事吧。”

与会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是苏联领导人的胜利。

关于波兰问题

苏联、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在德黑兰就波兰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的盟国对讨论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们

有些担心，因为苏德战线已推进到靠近波兰领土的地方，波兰行将解放。西方盟国最害怕的是，波兰的民主力量展开强大的反法西斯解放运动，有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忠于人民和对苏友好的管理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美英领导集团极力想使战后波兰的发展走地主资产阶级的老路。它们想让反动的流亡政府回国。为此，它们企图敦促苏联恢复同这个政府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是1943年4月25日由于它公开推行反苏政策而破裂的。

华盛顿和伦敦的这一方针具体表现在，流亡政府违背早先同我国达成的协议，从苏联领土上撤走了在我国建立的波兰部队。它还就波苏边界提出了荒唐的要求，实际上参与了希特勒宣传机器对苏联的造谣诽谤。

在会议讨论波兰问题的正式会谈中，罗斯福第一个发了言。

他说：“我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同波兰流亡政府开始谈判并恢复关系。”

其用意显而易见。

丘吉尔非常积极地支持了罗斯福。他怎能不这样做呢！要知道，波兰流亡政府就躲在伦敦，英国公开地对它进行保护。

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是考虑到了1944年即将举行的例行总统选举的准备工作。因此，他关心的是将700万美籍波兰人的选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波兰人深受在美国特别嚣张的反苏宣传运动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对丘吉尔企图把一个显然对苏不友好的政府强加给波兰的做法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他不无根

据地认为，这种企图可能会导致盟国阵营中发生美国所不愿见到的分裂。从这个角度去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1944年1月19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与波兰流亡政府的方针划清了界线，他坦率地指出：

“这个政府把波兰的未来建立在英美同俄国斗争的基础上。我看不出我们会对这种状况有什么兴趣。”

这一声明给这位外交官员带来了声誉。

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恢复关系的前提呢？当然不存在。须知，这个政府仍在从事敌视我国的阴谋活动。它所推行的政策同波兰人民的利益越来越背道而驰，因此，这个政府渐渐地失去了波兰人民的支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丘吉尔和罗斯福不能不看到，这种政策是不理智的。他们甚至还试图开导过流亡政府。但他们是白费力气。流亡国外的波兰反动派很快就垮台了。

在德黑兰会议上，各方还就波兰未来的疆界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丘吉尔在谈到苏波德三国之间今后应当怎样划分边界时，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他使用了三根火柴棍，似乎其中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第三根代表苏联。

他说：“这些火柴棍都应向西移，以便解决盟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确保苏联西部边界。”

应该指出，英美毕竟还是承认了我国对此拥有的合法权利，尽管他们并不乐意这样做。

斯大林要丘吉尔澄清一下，他这三根火柴的例子运用到具体问题上是什么含义，尔后他说：

“倘若指的是苏联同波兰之间1939年的边界线，苏联仍然坚持这条边界线并认为这是正确的。”

这指的是，由于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相应地并入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而确定的边界线。

鉴于过去关于波兰边界所发生的争议曾不止一次地成为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借口，我国一贯主张确保波兰有公正的、符合历史根据的边界线，以使其成为欧洲安全和持久和平的因素。

在德黑兰会议上最后通过的提法是：“……波兰国家和人民的本土应在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这个提法也包括了苏联的观点。关于将哥尼斯堡及其毗邻地区划归苏联的问题也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

这样，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在德黑兰讨论解决波兰及其边界问题时从一开始就设法使其能符合波兰人民的利益，符合保障欧洲和国际安全的任务。我国不能允许战后的波兰在政治上受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摆布，成为便于进行反苏冒险活动的基地。斯大林非常明确地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懂得这一点。两大同盟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苏联立场的合理性。

关于波兰问题的具体决议还有待通过。但是，由于各方就这个使三大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的困难问题表明了各自的立场，这就成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波兰问题”的积极因素。

在德黑兰对德国问题以及波兰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在许多方面为后来在雅尔塔和波茨坦通过的政治协议的准备工作提供了依据。

苏联政府首脑关于苏联将对日本侵略者宣战的声明对巩

固三大国军事同盟以及尽快结束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用清晰果断的语言说道：

“在希特勒德国被粉碎之后，苏联将给予同军国主义日本作战的盟国以必要的援助。”

在德黑兰关于盟国战后进行合作以确保持久和平的问题，虽然谈得不多，但却很重要。与会者就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组织问题阐述了自己的大体设想。

关于建立这个组织并没有通过什么专门决议。这是后来的议题。尽管如此，苏、美、英三国为了世界和平进行合作的思想在德黑兰会议通过的三大国宣言中已得到了体现。宣言指出：“……我们确信：我们之间现存的协同一致，必将保证持久和平。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及所有联合国家对实现这种和平负有崇高的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球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并在未来许多世代中，消除战争的祸患与恐怖。”

德黑兰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会晤是非常必要的和有益的。最重要的是在会议上确定了盟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期限。从而否决了英国的“巴尔干战略”。这是个导致拖延战争、增加伤亡的战略。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签署的宣言说，“我们在这里达成的相互谅解为我们取得胜利提供了保证。”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做了一个颇为动人的象征性的姿态。受英国国王乔治四世^①的委托，他授予斯大林一把荣誉剑，要他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的公民以表达英国人民对该市人民的尊敬。

^① 此处原文似有误，应是乔治六世，不是乔治四世。——译者

德黑兰会议之后

美国政界和社会各界人士赞同德黑兰会议的结果。在1943年12月的一天，我同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尔克进行过一次谈话，他是最接近罗斯福的人之一。他说：

“美国政府高度评价这些成果。官方一致认为德黑兰会议为进一步加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友好联系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他讲了些很重要和有价值的话。

沃尔克说：“会议表明，两国间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阶段也存在着合作的现实有利条件。”

罗斯福从德黑兰回国后，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在向他们通报情况时，罗斯福热情地谈到了整个德黑兰会议所特有的合作气氛，以及苏联代表团对会议所做的贡献。

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员也一致强调会议的重要意义。至于美国的主要报纸，在12月份的那些日子里，都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刊登了大幅标题：“盟国决心从三面采取联合攻势”或是“‘三巨头’在伊朗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如果说偶尔还会听到一些对美苏接近发表不满的声音，那么它们也被美国人对德黑兰会晤的一片赞扬声所淹没了。

在这种形势下（1943年12月），我第一次访问了古巴。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国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我作为苏联驻美大使，同时被委派兼任驻古巴公使。我不得不飞往该岛去递交国书。

从华盛顿到古巴不远，然而当时还没有直达航班。我在

佛罗里达州的主要城市杰克森维尔换乘飞机。

随我一起飞往哈瓦那的还有我妻子和一名助手。在那里停留了两天，我履行了自己的外交职责：递交了国书。在那里设立了使馆，将苏联外交官德·伊·扎伊金留下任代办。

归途中，由于天气不好只得在杰克森维尔过夜。我所以记得这一夜，是因为恰逢除夕之夜。杰克森维尔一家旅馆和小餐厅的主人得知苏联大使和夫人将在他们这儿过夜，便亲自前来表示对苏军在前线取得胜利的赞赏，并决定让客人高兴高兴，他说：

“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有俄罗斯风味菜的晚餐。”

当然，我们吃的菜只能在那个地方说是“俄罗斯风味”。然而，甚至在这件事上也反映出美国人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态度。这种真诚的关心使我们深为感动。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在2月初才同他就“三巨头”会晤的结果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是总统先开始的：

“我同斯大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然后，他大致谈了一下会议的经过。他谈的许多内容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有关德黑兰会议的情况莫斯科已向我做了通报。但是，我当然还想知道总统本人对会议的看法。他说：

“为在会上取得一致意见，不得不向丘吉尔施加压力，因为他在德黑兰转弯转得相当的慢，但毕竟还是转到了寻求达成协议这一边。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

提到丘吉尔时，总统以他所特有的“罗斯福方式”令人愉快地对我笑了笑，这使我清楚地明白了，英国首相是一个

难以对付的伙伴，给他本人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当时，苏联大使馆密切注视着美国对德黑兰会议结果的反应，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来解释会议的决议。我和所有当时在美国的苏联人对会议的胜利结束感到非常高兴。三大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晤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加速了战胜法西斯德国那一天的到来。

在里瓦基亚宫

德黑兰会议后过了一年多，在克里米亚又举行了三大同盟国领导人的会见。

胜利的1945年2月……雅尔塔。里瓦基亚宫——当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个俄国皇帝就喜欢在这里休息。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庄严雄伟。斯大林走进了会议大厅。在他身后，是苏联代表团。大厅里一片肃静。早已落座在自己位置上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尊敬地向斯大林点点头，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他们三人已举行过几分钟的会见。斯大林走到桌前，与迎上前来的丘吉尔及坐着的罗斯福问候——美国总统由于身体有病，没有副官的帮助，不能很快站立起来。

第一次会议是从讨论军事问题开始的，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国代表团的成员中有红军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伊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大将，他在这次会议上负责苏联军事专家小组的工作。根据三国代表团团长的愿望，他每天同美国和英国军事参谋部的代表在会议上会晤一次，以交换军事情报和协调联合打击敌人的行动。

在第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通报了苏德战场的情况。

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之后，这时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这一战场被称为西线战场。1月份在西线由于德国法西斯在阿登地区的突破，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局势。丘吉尔向斯大林求援。作为对这一请求的答复，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快局势的发展进程。尽管苏联军队对转入进攻尚未准备好（计划终究是计划），1月12日，还是开始了进攻。

安东诺夫讲道：

“本会召开前3天，苏联军队在通向柏林的中央战略方向上，已进入奥得河的屈斯特伦^①地区，占领了西里西亚工业区。在18天内，他们且战且进，前进了500多公里。击溃了德国法西斯45个师。切断了东普鲁士敌军集群与德国中部地区的联系通道。”

战况报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军队给予了盟国有力的援助。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极其认真地听取了汇报。接着，苏联将军通报说，希特勒分子已开始将自己的几个师从西线调往东线。苏联方面建议盟军在西线加速进攻，轰炸那些从西线开往东线的敌军运输纵队，以阻止敌人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军队。

罗斯福认真地而且怀着越来越大的兴趣听着情况介绍。丘吉尔吸着雪茄烟，目不转睛地盯着报告人。虽然当时提供的是连续传译——先是发言人讲；然后再翻译，那时还没有同声传译的耳机和专用的小房间——但丘吉尔始终盯着苏联将军，而不是看着翻译。

^① 即今科斯钦。——译者

会议期间，当斯大林发言的时候——他发言通常都很简短——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极力捕捉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话，尽管从表面上看一点儿也不激烈，更谈不到粗暴，他很注意分寸，但还常常使两位西方大国的首脑听起来很刺耳。斯大林不管是针对着谁的讲话，都会使对方深深地印入脑海之中。

引人注目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话反应不一样。罗斯福是以平静的理解的态度听着，而丘吉尔则表情严峻，有时甚至表现出掩饰不住的不满。这位英国首相不想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雪茄烟却暴露了他的心境。当气氛紧张和情绪激动的时候，他抽的烟要比在平静的时候多得多。他抽的烟头的数量直接取决于每次会议的气氛。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背地还开过他的玩笑。

应该公正地指出，斯大林并不掩饰自己对罗斯福的好感，而他对英国首相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用罗斯福有病、出于对他的同情来解释。然而我和其他苏联同志坚信——我们是有根据的——对形成这种态度起更重要作用的还是人所共知的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同的政治立场。

我记得，从未有过斯大林漏掉或不够准确地理解自己会谈对手的重要讲话的情况。他一下子就能抓住他们话的意思。他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如果用一句今天的话来比喻，就象电子计算机一样，什么也不会漏掉。在里瓦基亚宫开会期间，我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人具有多么超群的素质。

还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也注意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明确据他看来是会议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当然，

他也知道，许多有关部门，其中包括外交人民委员部，及有关的使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为会议准备材料——决议草案、公报、声明、无数的资料，等等。但他关心的是别忽略了什么主要的东西——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

斯大林胸有成竹地指挥着苏联代表团的工作。这种信心也传染给了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特别是那些和他一起坐在谈判桌旁参加会谈的人。

尽管时间不够，斯大林还是想办法做代表团内部的工作，至少是同那些按其身份能够对所讨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被委托去与美国和英国代表团成员进行接触的人谈话。

这些“内部”会见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有小范围的，也有较大范围的。一切都视情况而定。有一次，斯大林举行了一次类似“鸡尾酒会”那样的招待会。在美国把这种在室内举行的会见称为“酒会”，撤掉椅子，室内只留下桌子，桌上摆放各种饮料和凉菜；可以来回走动，自由交谈。

在举行这种会见时，他会走到一个个苏联同志面前，就某个问题交谈几句。他走动得很缓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也很活跃，甚至还开开玩笑。每个参加者他都认得。这是他这个人的一个特点——他能记住很多很多的人，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并且常常能说得出，在哪里和在什么场合下见到过这个人。他的这一特点，赢得了谈话对方的敬佩。

当斯大林走到我面前时，问道：

“罗斯福在国内主要依靠哪些社会阶层？”

我回答说：

“美国总统当然首先是捍卫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些右派极端分子对他进行荒谬的指责，说罗斯福有

时甚至同情社会主义。这是那些不愿苏联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不喜欢罗斯福政府对内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的人的一种宣传手段。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大垄断集团的利益。”

然后，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目前罗斯福作为总统还没有竞争对手。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

据我的判断，斯大林主要是对这句话很注意。

这时，莫洛托夫站在我们身旁。他当然谙知美国事务，并且偶尔也插几句话。

斯大林继续向前走去，在我们代表团其他成员的身边停下来，以便向他们也提些问题。引人注意的是，他自己很少讲话，但却饶有兴致地听对方讲。他从一个人身边走到另一个人身旁，就这样地了解了大家的意见。我觉得，他甚至是用这种形式在继续工作，准备着“三巨头”的下一次会见。

一天晚上，斯大林设宴招待我们苏联代表团部分成员。不知是什么原因，至少是不清楚，他让我坐在他的右边。根据礼宾上的规定，主人右手的位置被认为是全桌最显赫的席位。斯大林在同外国人士交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我暗自思忖：“看来马上就会提出一大堆问题，必须做出准确的回答。”我在内心里已全神贯注地做好了准备。

然而，席间谈的却是前线情况及我国经济的一些问题。并且，斯大林是对着大家讲话。当谈到军事问题时，阿·伊·安东诺夫或海军人民委员尼·柯·库兹涅佐夫^①也插话。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尼·格·库兹涅佐夫。——译者

看来，由于考虑到远东未来的局势发展，还谈到了拟议中的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谈到了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运输的复杂性问题。这时，斯大林说了这么一个想法：

“必须铺设一条从乌拉尔到太平洋沿岸的新铁路，而且，它要比现在这条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建的横贯西伯利亚的干线大大北移。”

可以感觉得到，他这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众所周知，修建第二条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设想，在斯大林生前，没能实现，虽然早在战前，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前不久通车的贝阿铁路实际上就是这一方案的修正案的具体实现。

席间还谈到了当时在巴尔干开展的解放斗争，以及即将被解放的国家的政治局势，其中谈到了罗马尼亚，那里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几乎已经全部被肃清。

斯大林的言谈中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当务之急是”，他说道，“肃清被解放的领土上的法西斯余孽。”

我问道：

“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否都无问题了？能否相信，那些现在领导着这个国家爱国力量的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们不会手软吗？”

斯大林回答说：

“那些从地下、从监狱中出来并领导着爱国力量的人，都是好样的，可靠的人，他们是可以信赖的。”

在会议期间，斯大林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了正式宴会，三方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

宴会桌上的人并不很多，每个人的发言实际上大家都能听得见。显然，参加者都首先注意听3位领导人说些什么。斯大林很活跃，时常开玩笑。他在宴会上的笑话总是恰到好处，有时引起全体哄堂大笑，这种气氛使大家感到轻松。

宴会上对重大问题未进行深入的讨论。然而，三方领导人都有一些言简意赅的插话，他们从容不迫地进行着交谈。谈话的实质内容就是必须保证尽快地粉碎希特勒的军队，并努力使德国今后不能重新走上侵略的道路。

角色已经确定并分配完毕

克里米亚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清楚，在里瓦基亚宫通过的决议对欧洲以至全世界的未来都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所有在那里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在这个会议大厅里他们是处在历史事件的中心。而历史，则象主持公正裁判的司法女神菲米达^①一样，现在就站在你的身边，手持天秤，正在作出自己的判决。

3位历史人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他们一起在当时握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假如那时他们相互间能就所有的问题取得所必须的一致，假如正义能完全获胜，还可以解决多少问题啊！这正是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所期望的那种一致和正义。

无人怀疑，在几个月内，可能就在几个星期内，法西斯侵略者将被打败。被各国人民为争取和平的未来而洒下的鲜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译者

血染红了的胜利的旗帜将在欧洲的上空高高飘扬。每当我们走进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参加三大国领导人会谈时，我们所体验的正是这样一种感情。我们明白，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时代的财富。根据他们在此取得的结果，不仅同代人要对这次会晤表示自己的看法，而且后人也将据此对3位领导人是否有远见做出自己的评断。

当时，未能就所有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对苏联的赔款问题，它一直悬而未决。非但如此，与会者对此问题的立场大相径庭。

斯大林和我们每一名苏联代表都在自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美国总统，特别是英国首相，在想些什么？他们是否知道，即使达成协议，付给苏联200亿或300亿美元的赔款，这也仅仅是补偿了法西斯德国给我国带来的直接损失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一直接损失后来被估价为2.6万亿卢布。是的，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心里明白。

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同盟国在这一问题上又想出了个新的方针，并在根据这一方针行事。而其用意恰恰是不让受战争严重破坏的苏联经济迅速得到恢复。

当然，罗斯福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含蓄。他准备讨论可能给予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费问题。但根据他的想法，就数额而言，这个赔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

会议在讨论赔款问题时，三国代表团团长都发了几次言，讲得最少的是总统。他发表了一项声明，是一个有利于苏联的姿态，然而，他未说出可供讨论的具体数字。罗斯福也避免和丘吉尔进行直接的辩论，而在关于可能给苏联赔偿的问题上，丘吉尔甚至连一个象征性的暗示都不愿意做。

当与会者对所讨论的问题都表明了立场以后，斯大林向我俯过身子，低声问道：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罗斯福，他是真的不同意丘吉尔的立场，还是一种策略手法？”

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我是这样答的：

“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总统对待英国首相的态度太讲礼貌了。可是他本可以在保持这种礼貌的同时，向丘吉尔施加点儿压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未必是偶然的。”

看来，我的估价与斯大林的不谋而合。当与会者离开会议大厅时，斯大林一面起身，一面声音不大，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不排除美国 and 英国已互相分配好了角色。”

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这一推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在那里，不仅是英国人，连美国人也不愿认真讨论赔偿问题。当时，苏联遇到了来自两大国的抵抗。他们采取的这种共同立场反映了丘吉尔当年在克里米亚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

不错，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已经不是罗斯福，而是杜鲁门了。但是，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不够坚决的发言，未必会给他的继任者在波茨坦造成什么不便。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开始在英国执政的工党政府也采取了丘吉尔的立场。然而，在此之前，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贝文——还对苏联说了不少好话，谈到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人员牺牲和物质损失。但是，在波茨坦会议时，英国新首相和外交大臣却噤若寒蝉，不再说这种话了。他们用的是另一些词汇。已经刮起了冷风，这股风也吹到了波茨坦。

苏联信守诺言

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斯大林住在离里瓦基亚宫不远的克里米亚一个叫克烈伊斯的小区的尤素波夫宫。那儿有他的办公室，他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举行苏联代表团的会议或者是接见代表团成员。苏联驻英国大使费·塔·古谢夫和我住在紧挨尤素波夫宫的厢房里，因此，我们经常有机会到这间办公室去。

每天晚上，会议结束以后，有时是每天早晨，安东诺夫都要到这里来。在莫斯科时，他经常与斯大林见面，并同他一起讨论前线的局势问题。在这里也继续这样做。作为代表团成员，我曾出席过一次这样的汇报会。

我第一次观察到斯大林是如何关注着前线局势的。从他平静的表情上，我可以判断出，没有发生任何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他向安东诺夫提一些问题，安东诺夫当时担任代理总参谋长。斯大林对具体的集团军的情况很感兴趣。从所提的问题中可以明白，我军的进攻计划早已考虑成熟并已被批准。总司令提到了几个新组建的部队，询问了它们的武器装备情况。从他对安东诺夫的回答的反应上可以看出，最高统帅对工作情况是满意的。

关于我们的损失情况汇报者和斯大林都未谈及。但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知道，敌人在撤退，而且撤得非常快，而苏联军队每天都在收复许多新的领土。为最后解放波兰我军还要进行许多残酷的战斗。

斯大林问道：

“为发起最后解放波兰的进攻战役，我军的一切军需保障情况如何？”

看样子，安东诺夫预料到了这个问题，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部队有充分的保障。我们知道，敌人将破釜沉舟，进行反扑。他们懂得，失去波兰对希特勒的统帅部将产生悲惨的后果。”

斯大林，同其他与会者一样，对这一切充满了信心，坚信希特勒德国最后垮台已成定局，这一天在日益接近。

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都没再提什么别的问题，因为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挺进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给人的印象真是太强烈了。斯大林一反常态，没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是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将军的报告。

每一个听到那次战局情况报告的人，都受到一次强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而这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恰好是迫切需要的。在里瓦基亚宫的会谈中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有一次，会晤结束后，古谢夫和我到外面去吸点儿新鲜空气。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说道，在这里，在雅尔塔，在这座昔日的皇宫——里瓦基亚宫，正在以大字来书写历史。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情节。事情发生在一天清晨，在准备离开卡列伊斯去里瓦基亚宫时——那是美国代表团驻地，同时也是举行全体会议的地方。罗斯福通过专门的通讯员给斯大林送来一封信，向斯大林紧急报告总统的特急文件。

此时，我正在厢房中。听到了立即到斯大林那里去的召

唤。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房间里只有斯大林一人。问过好后，我问道：

“自从紧张的会议开始之后，您感觉怎么样？”

斯大林回答说：

“完全正常。”

然而我发现，斯大林正在想另外一些什么事，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感觉。

斯大林递给我一张纸，说道：

“这是罗斯福的信，我刚收到的。”

然后，稍为迟疑了一下，补充说：

“我想让您把此信给我口译出来。我想在开会之前哪怕先听听，知道它的内容。”

我开始边看边译。斯大林在我翻译过程中，还要我重复一些句子的内容。信里谈的是关于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问题。罗斯福通知说，美国政府承认苏联对日本侵占的萨哈林岛的一半及千岛群岛所拥有的权利。

斯大林对这封信甚为满意。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并重复说：

“好，很好！”

我说道：

“美国目前的立场似乎是为改变我们的看法，替自己恢复名誉，因为他们在1905年是同情日本的，当年俄日战争之后，在朴茨茅斯，日本代表团同由维特伯爵^①率领的代

^① 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交通大臣（1892），财政大臣（1892年起），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年起），大臣会议主席（1905—1906年）。——译者

代表团进行了和平谈判。那时，美国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从俄国手中夺走了它的领土。”

看得出来，斯大林完全同意美国想“恢复自己名誉”的意见。

他沉默了几秒钟，在思索着信的内容。然后，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声来。他说：

“这封信很重要。现在美国承认了我国关于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立场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美国人大概将坚持自己关于苏联可以参加对日作战的立场。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看来，对这一问题还要进行讨论。”

总的来说，我觉得斯大林对这封信很满意。他曾直言不讳地说：

“罗斯福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好。”

斯大林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场谈话：

“美国采取了很好的立场。从今后与美国的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斯大林除了不加掩饰的高兴外，我从他的表情上发现，他还在为什么事有些不安。

于是，我问道：

“斯大林同志，看来我现在可以走了？”

但斯大林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您说，据您看，罗斯福是个聪明人吗？”

我对这个问题毫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斯大林并不是向我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而且根据我在华盛顿多次向总统转交的那些信中，能感觉到，斯大林对罗斯福是很尊敬的。甚至当斯大林不同意总统所坚持的某些立场时亦是如此，

他总是这样阐述自己的想法，以便让罗斯福知道，莫斯科对白宫主人观点的细微差别都很重视。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罗斯福是个非常聪明和能干的人。他能第三次连任总统，以后还会第四次连任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在美国，可以说，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传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选一个人当总统。它已是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遵守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突然，罗斯福把它打破了，而且打破得那么令人赞叹不已。当然，国际局势对此是有所影响的。既然谈到1944年，具体地说，苏德战场上的形势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人，包括美国人在内，都已经看到，希特勒德国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除这个因素之外，民主党人在宣传罗斯福方面所做的巧妙的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他通过电台发表的题为‘壁炉边的谈话’的节目也给千百万美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简洁地指出：

“他做得多么巧妙啊。是的，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

说这话时，他脸上浮现出沉静的、善良的微笑，我倒想把它称为“赞许的微笑”。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每当他产生赞赏之感、当谈到某个他有好感的人时，他脸上就会出现这种表情。

当斯大林说“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时”，毫无疑问，他是怀着友善的感情对待罗斯福取得的成功。而且，在此之前，他也不止一次地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我不想隐瞒，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我想过，斯大林的情绪，他对罗斯福在信中所阐述的美国政府立场的满意心情，

对克里米亚三方会晤，也包括对大约一小时后就要开始的会议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得知，莫洛托夫也知道罗斯福信件的内容了。

在收到罗斯福的信之前，曾发生过一些事件。

还在德黑兰时，罗斯福就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援助美国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华盛顿把盟国在西方开辟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同苏联是否准备在东方援助美国联系在一起。当时，美苏之间就这一问题原则上取得了共同的谅解，但并没把它看作是协议。在德黑兰对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做共同的书面记录。

双方对此问题的最后意见是在雅尔塔定下来的，即当罗斯福用这封信正式通知斯大林，说日本占领的萨哈林岛的一部分和千岛群岛应当归还苏联以后才定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斯大林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以后，手里拿着这封信，依我看来，显得特别满意。他拿着信，在他那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来回走了好几次，好象不愿放弃已到手的東西一样。我离开他那里时，他手中仍拿着这封信。

那一天，我更加仔细地观察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我想，大概他们俩人都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条重要的界限。

当然，罗斯福仍然心存疑虑：斯大林能恪守自己关于在远东援助美国的诺言吗？众所周知，苏联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可以说，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在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问题，以及关于第二战场问题上的立场在不小的程度上能够解释斯大林对罗斯福以及对他为人的态度。

后来，在会上原则上商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苏联政府宣布，我国在欧洲战事结束两三个月后，就开始在远东的军事行动。

在斯大林宣布这一日期之前，以安东诺夫为首的苏军总参谋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要在红军统帅部所掌握的材料的基础上，确定击溃关东军需要多少兵力，从何地、何时调来苏军。所有这一切都做得神速而又符合军事要求。

再谈波兰问题

会议在研究波兰问题上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讨论的议题首先是波兰未来的边界以及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

会议决定，苏波边界基本上应该以所谓的“寇松线”^①为界，在若干地区应稍微作出对波兰有利的逸出。在承认必须在北部和西部给波兰增加领土的问题上，会议的参加者之间也没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当涉及到给波兰增加多少领土的问题时，分歧便立刻产生了。

苏联代表团提议波兰西部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为界。美英代表团则反对我们的建议。他们还提出不堪一驳的论据，似乎波兰人民不善于开发所增领土上的资源。这种立场当然是不公正的，欺骗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也未能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由于苏联采取始终一贯的立场，这个问题在随后举行的波茨坦会晤

^① 1912年12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建议的波兰东部边界线的约定名称。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寇松于1920年7月波苏战争期间要求苏联红军在这条线上停止进攻，因此称为“寇松线”。——译者

中得到了明确和彻底的解决。

这次会议在讨论波兰政府问题时，斗争非常尖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位于欧洲重要战略地区正在复兴的波兰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问题。

苏联所持的观点是，波兰的未来不应该由那些使波兰蒙受民族浩劫的势力来负责，而应该由健康的民主力量来负责，由那些为反对希特勒侵略者、争取祖国的解放和独立、恢复波兰国家机构而忘我奋斗的爱国者来负责。因此，苏联承认了在波兰建立的、代表民主力量以及全体波兰人民利益的临时政府，这是十分自然的。1945年4月21日，我国同它签订了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西方大国对临时政府不屑一顾，但是，它们也知道提出让流亡政府从伦敦返回波兰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建议同时解散当时的两个波兰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和人民政府，并且建立新的波兰临时政府，其中包括流亡国外的反动侨民中的主要成员。西方的两巨头——罗斯福和丘吉尔顽固地坚持这一立场。他们明白，对西方来说这虽然将是一场后卫战，但却是相当激烈的战斗。

为了达成协议，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一定的妥协。但是，仍坚持上述政府还应在现今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苏联和波兰的民主力量同意充实波兰临时政府，吸收在波兰国内和流亡在国外的波兰侨民中行为端正的政治活动家参加。

正是这种立场构成了在克里米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建立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决议的基础。按照这一决议，美国和英国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并且同流亡政府断绝了关系，从此

流亡政府就不再存在了。这是由于达成妥协而取得的伸张正义的重大胜利。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我国在对待邻国波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做了如下声明：

“问题不仅在于波兰是同我国毗邻的国家，这当然有意义，不过问题的实质要深得多。历史上，波兰从来就是敌人借以进攻俄国的走廊……为什么敌人至今能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波兰呢？首先是因为波兰是个弱国。波兰走廊不可能只依靠俄国人的力量简单地从外部加以封锁，而只有依靠波兰自身的力量从内部才能牢靠地封锁住。为此就得让波兰强大起来。这就是苏联关心建立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原因。”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所表明立场是始终一贯的，今天仍然如此。一个强大、独立、对苏联友好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是波兰国家生存的保证。

在这次会议上还就建立联合国这一新的问题爆发了一场新的唇枪舌战。虽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解决了其中的许多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还遗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有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和特别权利问题。

经过讨论，三国领导人就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将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最后文本。

雅尔塔会议的成果

雅尔塔会议刚结束，全世界就知道了会议上所讨论的问

题。得知，会议认为中心问题是德国的未来问题，三大国首脑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他们就怎样强迫希特勒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问题达成了协议。同盟国把在这个国家实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措施作为该国未来的基础。

与会者庄严宣告（苏联坚持这一点），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是，他们再次重申，只有当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得以彻底根除之后，德国人民希望过真正的生活和在各国的共同体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的愿望才能实现。

克里米亚会议的总结性文件是“在建立和平时同在进行战争时一样保持一致”的声明。三大国首脑同意在未来的和平时保持和加强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合作。

这次会议是在尽快结束战争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会议的结果意味着希特勒德国指望同盟国阵营内部发生分裂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分裂的不是同盟国阵营，而是“第三帝国”自己，在这场战争的大火中它被烧成了灰烬。

在某些地方有人企图将雅尔塔会议的决议说成是各大国将欧洲划分成势力范围的一种同义词。但这是杜撰的结果。

罗斯福总统似乎预见到了将来可能会有人对克里米亚会议进行诽谤，因此，在评价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时，他在美国国会明确地指出：

“这次会议应该是单方面行动体制、排他性同盟、势力范围以及数百年屡试无效的一切其他政治阴谋的终结……”

说得很好。

如果现代政治家愿意在评价这次会议的成果时采取客观的态度，那么，他们不可能不看到它对欧洲和整个世界所具

有的历史意义。在雅尔塔会议召开的那些日子里，侵略成性的希特勒帝国目睹的黄昏已来临，而接着也必然将是它的末日。正是在1945年2月那一个难忘的星期里，三大国对它们的部队和人民在把欧洲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做的一切从军事上进行了总结。三大国在未来的行程上也树立了一些主要的路标。

会议的参加国就下述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军事上彻底打垮法西斯德国；

促进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以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确立在解决保障和平的根本问题时各
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

通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宣言中强调三大国在解
决欧洲问题时力求协调行动的愿望；

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如何处置它的问题，其中包括公
正和迅速惩治战犯的问题；

关于在德国建立三大国（雅尔塔会议的与会国）以及法
国的特别区；

关于远东问题。

这样，三大国在雅尔塔郑重商定，无论是在把战争进行
到胜利的事业中，还是在战后的和平建设事业中都将本着合
作的精神采取行动。

众所周知，在一系列问题上，比如在向德国索取对苏联
有利的赔偿、在波兰问题以及波兰边界问题上还未达成最后
协议。然而，在雅尔塔进行的讨论还是发挥了自已的作用。
特别是对在波茨坦解决波兰问题时起了作用。

令人愤慨的是，西方国家有些人士声称，似乎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对苏联做了不适当的让步。让他们再读一读其父辈们在战争年代所说的和写的东西吧，苏联人民为战胜共同的敌人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所作出的牺牲曾经使这些人肃然起敬。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苏联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盟国义务。

斯大林在会议上

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以及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我曾有机会接近斯大林，在他身边工作。简单谈谈他的情况，也许会使人感兴趣。我想谈谈他性格、举止方面的一些特点，他待人接物的某些方法。首先是透过会议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病了，斯大林想前去探视。他请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和我陪同前往。

那天，会议被取消了，于是，我们便前往总统下榻处，从前皇后曾在那里安息过。卧室就在里瓦基亚宫的二层楼上。凭窗远眺，美妙的海上景色尽收眼底，令人赏心悦目。

总统躺在床上，一看见客人，便笑逐颜开。我们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他看上去很疲倦，如常言所说，面如土色。严重的疾病消耗了他的体力。罗斯福当然很痛苦，但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即使不是心理学家，也会看出这一点。

我们在他那儿坐了一会，大约20分钟左右。斯大林彬彬有礼地同他谈论健康、天气和克里米亚的美景。我聚精会神

地观察着总统，望着他，心里想道，罗斯福的目光有些无神。他似乎是在望着我们，然而同时又象是在看着远处。

我们从他的房间出来后，沿着狭窄的楼梯下楼。斯大林突然停住了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烟斗，不慌不忙地往里装着烟丝，并用象似自言自语、但又能使莫洛托夫和我都听得见的低微的声音说了一句：

“你们说说，这个人哪点比别人坏，为什么老天爷要惩罚他？”

当我们下到一层以后，斯大林问了我一个问题：“人们都说这位总统的出身不是英国人，确实如此吗？”

他似乎在出声地思索，又继续说道：

“但是，从他的举止和言谈风度来看，他比丘吉尔更象英国人。丘吉尔不大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而罗斯福则相反，为人谨慎，少言寡语。”

感觉得出，斯大林不反对听我讲讲我对罗斯福家世的了解。于是我说：

“这位美国总统的祖先是荷兰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普通的美国人似乎对这一题目不特别感兴趣，而这方面的文献材料又很少。”

第二天，罗斯福又恢复常态，于是会议复会。但是，罗斯福的脸上仍有明显的倦容，直至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一直如此。

当时，距罗斯福离开人世总共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

坦率地说，斯大林对罗斯福这个人很有好感，在同我们谈论总统病情的时候，他向我们明确做了这样的暗示。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斯大林对另一个社会世界的

活动家很少表示过好感，更少谈它了。

也有过另外一种斯大林对有些人表达感情的情形。例如，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在—项正式午宴之后，斯大林当众亲吻了刚刚做了精彩演出的小提琴家巴利诺娃和钢琴家吉列利斯。

斯大林尽管性格严厉，但也有时流露出人的正常的感情。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或许，根据我的记忆，较详细地把斯大林作为一个活动家，也作为一个人加以介绍，是适宜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与他会见的印象、会议期间我个人观察的总结（会议期间我曾就—些问题向他做过汇报）、我尚记得的会议期间以及外国国务活动家访问苏联期间举行会谈时的一些情节——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形成了这个人那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诚然，我这样做并没想研究斯大林是何许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不过在履行公务、从事某些具体工作时，对他进行了观察。在我头脑中形成的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副产品，我决不想将其作为不容争辩的真理。

军人们都知道，打仗时常常有这种情况：同时投入两支登陆队，—支为主，另—支为辅、为次，负责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战事在发展。突然，那支次要的登陆队的作用逐渐增强，有时变为重要的，最后变为主力了。这种情况，不仅仅在战争期间有，就是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你同时做两件事———件是本职的日常工作，除此以外，还顺便做—件别的事。然而，你曾经认为是个人的，也可以说是隐秘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不寻常的、有意义

的，对别人来说也是需要的了。因此，我现在觉得，介绍一下斯大林的非标准形象，特别是那些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回忆是会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们还将不止一次地谈他的问题。

很可能，我的某些印象与其他人所说的、所写的和可能将要写的关于他的情况不尽相符，然而他所独有的特点，在不同情况下，在不同的会见中，表现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事实。甚至可以肯定，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归根结底，任何原型的東西总比经过复制的更逼真，特别是当谈到象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这么一个具有戏剧性命运的人物时就更是如此。

当然，所有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或者一度与他接近过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当时比较年轻的人，总是注意对他进行观察。任何一个在场的人，都在捕捉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对此谁都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的。要知道，暴风雨前的乌云越暗，人们就越是胆战心惊地看着它。

对于斯大林的同代人来说，能同斯大林并肩而立，特别是能同他谈话或是参加同他的谈话，在小范围内听他谈话，都是非同寻常的事。要知道，凡是目睹过斯大林一言一行的人都会意识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甚至世界的命运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他面前这个人的意志。

这一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观点毫不矛盾。杰出的人物总是一定的具体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人物本身对事物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能够并且也在产生着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在其哲学著作中对此都有过深刻的论证。

第一眼看见斯大林时，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论你在哪儿见到他，都会使你首先注意到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我从未发现过，他说的话不表达他对所讨论问题的某种态度。他不喜欢插入语、长句或者空洞无物的声明。如果有谁说起话来长篇大论，然而又使人无法抓住他的思想，弄不清他究竟想要说明什么，斯大林就会表现不快。与此同时，当有人由于水平所限，不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斯大林能够耐心地听，甚至宽宏大度地对待他们。

每当斯大林在发表自己意见时，我看着他，心里总在想，连他的脸都在讲话。他的两眼非常富有表达力。他不时地将眼睛稍稍眯起，使得他的目光更加炯炯有神。但是，这种目光也蕴含着上千个谜。

斯大林有一张微胖的脸。斯大林去世以后，我多次听到过和读到过一种说法，说斯大林的脸上有麻子。虽然我多次在很近的距离看过他，但我没有这个印象。就算是有吧，大概也极少，以致我直视这张脸时什么也没发现。

斯大林有个习惯，比方说，他在抨击某个外国活动家或者同这个人辩论时，他会专注地看着他，在一段时间内目光不移开。应当说，被他盯住的对方这时都感到很不自在。这一目光使人发悚。

当斯大林坐着讲话时，他就稍稍变换一下姿势，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偏向另一边。有时轻轻地做个手势来强调他所要突出的思想。但总的来说，他不大爱做手势。他很少提高声音讲话。总的说，他讲话嗓门不高，语调平稳，声音低沉。何况，不论他在哪儿谈话和讲话，不论有多少人参加，那里总是保持着绝对的肃静。这更加助长了他这一特点。

斯大林有独树一帜的讲话风格，他思想严谨，然而更主要的是，他的思维与众不同。

至于外国活动家，那么应该补充说一句，斯大林对他们并不厚爱。仅仅是这个原因，就使他们把看见斯大林和听见他讲话视为一件大事。

斯大林的举止总是从容不迫。可以说，我从未见过他明显地加快脚步，来去匆匆过。有时，人们认为，考虑到出现的形势，斯大林应该尽快地召开某个会议，讲话加快些，或者催促别人，以节约时间。然而，这种情况我从未见到过。当这个人干一件事的时候，好象时间本身都停止不动了。

在参加小范围会议时（这样的会议有时也请一些别的同志去汇报情况），斯大林常常在会议室里慢慢地踱来踱去。他边走边听别人发言，或者谈自己的想法。走上几步，便停下来，望望发言的人和与会者，有时走到他们身边，想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接着又开始踱来踱去。

然后，他便回到桌旁，坐到会议主持人的位置上去，坐上几分钟。也有过这种情况，出现一段间歇。这就意味着他在等待着看所谈的问题对与会者产生什么印象。或者他自己发问：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与会者的发言一般都很简短。尽量避免说多余的话。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在与会者发言和谈看法时，他不时地插话。

斯大林去世多年之后拍摄的一些电影里，有时这样描写政治局开会的情形：斯大林总是起身踱步，其他与会者则稳坐不动。是的，如果是指召开研究国内问题的会议的话，那

么，情况是这样的。

但是，我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看见斯大林。那时他总是坐着，认真地倾听发言。只有在宣布休息或者休会之后，他才从桌边站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从不携带任何文件夹子。不论是参加会议，或者主持各种会议都是这样。即使参加国际性的会议，比如参加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亦是如此。我从未看见他在那些会议上手里拿过铅笔和钢笔。他在人前从不做任何记录。

通常，他所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在手边，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在夜间也工作。他夜间比白天工作得更好。

他参加各种国际会议都有充分的准备。当代表团同他一起去参加会议时，都知道他在会上将讲些什么。几乎一直是只由他来代表苏联讲话。在外交事务方面，他主要依靠的是维·米·莫洛托夫。必要时，斯大林偶尔也俯身桌上，同代表团的某个成员商量，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这发生在一次会议上，我就与战争后果有关的某些国际问题做了汇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谈到，希特勒分子企图利用巴尔干国家为自己效劳，与这些国家的上层统治集团调情。他们不懂人民和统治集团是不同的。

其中，也谈到了保加利亚，说希特勒分子看不起保加利亚人民，认为他们落后。但是，他们却去恭维这个国家的君主统治集团。于是，斯大林说道：

“希特勒对保加利亚奉行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把保加利亚变成他的盟友。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普鲁士人的夜郎自大也

是制定这种政策的基础。德国人认为，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落后的保加利亚人拉到德国需要的方向上来。”

这时，斯大林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接着说道：

“只有普鲁士人的狂妄自大，才能解释他们对保加利亚的这种态度。”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

“历史事实证明，保加利亚人民总的发展水平一点也不比德国人低。很早以前，当德国人的祖先还生活在林莽之中时，保加利亚人就拥有高度的文化了。”

与会者都十分欣赏斯大林关于保加利亚人这段话，并赞同他的观点。

有一次，大家在谈论法西斯已经输定了，只有瞎子才会对此视而不见，战争已近尾声，希特勒指挥机关的负隅顽抗和德国军队的抵抗已经毫无意义。好几个人都谈了这种看法。斯大林认真地听着大家的议论，然后，好象对这个问题做总结似的，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些都对，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同时又不能不指出德国人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德国士兵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在战争中已不止一次地显露过这一特点。”

他当时还谈了这样的看法：

“历史表明，最顽强的士兵是俄国士兵，其次是德国人，第三是……”

他沉默片刻，然后补充说：

“波兰人，波兰士兵，是的，是波兰人。”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一致认为他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我

个人对这个评价印象颇深。实际上，德国军队已被击溃，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似乎，斯大林应当用最激烈的言词，并从士兵的个人素质方面来评价这支侵略者、强暴者、掠夺者和刽子手的军队。然而，他能不带感情色彩，从历史的角度，依据事实，来评价德国士兵。

斯大林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从不因前线的某种挫折而惊恐不安，不能清醒估计形势，失去对共产党、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和潜力的信念。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及其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义愤使党、党中央和斯大林具有最终战胜敌人的信心。没有这一点，胜利是不可能的。

后来才得知，战时的紧张状态和巨大的困难不能不消耗斯大林的体力。真不能不令人惊奇，斯大林尽管被工作搞得精疲力尽，但他还是活到了胜利。

然而，有多少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却心衰力竭，被战争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殉职在后方！例如，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如此。他在1941年7月至1942年5月这段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是苏军高级军事首长，他是我国唯一没有活到胜利那一天的元帅。就在胜利的前几天，他与世长辞了。著名的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也是如此。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仅活了44岁，当胜利到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埋葬了……。

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自己的健康呢？举例说吧，在三大盟国开会期间，我从未见过他身边有医生。我不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是故意逞强。斯大林不喜欢长时间散步。他住在别墅时，

出去吸点新鲜空气，不能算是医生通常建议自己的病人所进行的那种真正的散步。

至于谈到他的外貌，他是中等身材。有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斯大林本来就胖，这是不正确的。当然，他作为一个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可能有些胖，但是他尽量保持适度。我从未见过斯大林在饭桌上挥舞刀叉大吃大喝过。甚至可以说，他有点儿食欲不振。

斯大林从不喝烈性酒，我也未见他喝过。他一般喝干葡萄酒，而且总是亲自开瓶。他走到酒桌前，仔细端详着酒瓶上的商标，似乎是在评价商标的艺术价值，然后便把酒瓶打开。

引人注目的是，他表面看上去总是面带倦容。我不止一次地看见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踱步。做工精巧的元帅服对他很合适。看得出，斯大林很喜欢这身衣服。如果他不穿军装的话，就穿一身军便服。他没有过穿戴随便、衣着不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斯大林自己同任何人，包括同外国人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的情况。外国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过这一点。他们甚至问我：

“这是为什么？”

国外发表的关于斯大林同妻子、孩子及亲属的关系，其中很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无聊的臆造。

每当谈起斯大林，人们有时总要问：

“他对艺术、文学、特别是对文学作品态度如何？”

我认为，未必有谁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我个人的印象是这样的：

斯大林喜爱音乐。凡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音乐会，特别是有歌唱家参加演出时，他都兴致勃勃地出席，并为演员们鼓掌。他更喜欢听雄浑有力的男女声。我曾亲眼见过他着迷地听着我国著名钢琴家埃米尔·吉列利斯演奏的古典音乐。斯大林还对大剧院的某些独唱演员，例如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①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我记得，在一次音乐会上，科兹洛夫斯基正在演出时，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大声要求他唱一首欢快的民歌。斯大林安详地，但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见地说：

“干吗向科兹洛夫斯基同志施加压力呀。他自己愿意演什么，就让他演什么好了。可他愿意唱柴可夫斯基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

大家都笑了起来。科兹洛夫斯基也笑了。他当即唱了连斯基咏叹调。斯大林的这个幽默使大家很高兴。

至于谈到文学，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读过很多书。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讲话中。他很熟悉俄罗斯古典文学，特别喜欢果戈理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至于他对外国文学了解得如何，我就难说了。不过，根据我的一些观察，斯大林熟悉莎士比亚、海涅、巴尔扎克、雨果、居伊·德·莫泊桑的作品，尤其推崇莫泊桑。他也熟悉西欧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从各方面情况判断，他也读了不少历史书籍。他在讲话中常常引用一些例子。这只有在了解其历史典故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总之，斯大林是位有学问的人。很明显，任何形式上的

^① 苏联抒情男高音歌唱家。——译者

教育都不能使他具有通过自修所获得的知识。这种自修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斯大林式的语言以及他善于将复杂的思想简单通俗地表达出来。

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斯大林的举止中有一种不显眼的礼貌。他从没有过那种不拘礼节的行动，如拍别人的肩膀或后背，尽管有时人们认为这些做法是善意、平易近人和宽宏大量的表示。我也注意到，斯大林即使在发怒时，一般也是有节制的，不出格。他从未讲过不堪入耳的话。

我曾多次观察斯大林同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交往的情况。斯大林对他们中每个人都区别对待。在同斯大林交往中，只有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两人有时对斯大林采取无拘束的亲昵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对这两个人比对其他人更了解，而且早在革命前地下工作时期他就熟悉他们了。

在午饭桌上，不管客人或者主人是什么人，斯大林都显得很随便。

在会议期间的礼宾活动中，斯大林不断地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些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提问，他自己也很愿意回答。除政治外，他们也谈论一些纯属生活琐事的话题，直至评价某道菜、某种饮料的好坏，搞清它们在各国的知名度。

例如，在雅尔塔，斯大林称赞了格鲁吉亚的白葡萄酒，然后问道：

“你们知道叫‘查查’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吗？”

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对“查查”酒连听都没听说过。于是，斯大林继续说道：

“依我看，这是各种白酒中最好的。当然，我自己不喝这种酒。我更喜欢喝低度白葡萄酒。”

丘吉尔立即对“查查”酒产生了兴趣：

“那么，怎么才能尝到这种酒呢？”

“我尽量让您能尝到这酒。”

第二天，作为礼物，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都送去了“查查”酒。

一项指示的由来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将要就一系列问题做汇报。于是，我打开了自己的夹子，里面装有准备好的材料和文件。根据我现在的回忆，当时我需要谈23个问题。这个机构不常开会，因此积累了很多问题。我将文件依次放好后，就开始汇报。这时，维·米·莫洛托夫提出意见说：

“葛罗米柯同志，这个问题可以放在最后谈，因为有另外一个问题应该首先进行讨论。”

老实说，我有点儿吃惊，为什么当时已不是外交部长、而成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维·米·莫洛托夫，一定要改变问题的顺序呢？我觉得，他提此意见只不过出于个人兴趣而已。

但是，斯大林立即制止了维·米·莫洛托夫。他说道：

“怎样安排问题的先后次序，这是报告人的事情，就让葛罗米柯同志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次序汇报吧。”

不言而喻，我是这样做了。对所有的23个问题都做了汇报。当然，汇报得很简单，按惯例每个问题只讲2分钟，至多不能超过3分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50年，南朝鲜傀儡政权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战争。

朝鲜的战火使国际形势严重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清楚，这场战争潜伏着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已形成的局势。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要决定苏联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应采取什么立场。谁也不怀疑，应该严厉地谴责侵略行为和作为侵略帮凶的美国的政策。但是需要决定的是：苏联代表是否应该参加为讨论美国提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而召开的会议。在这封信中，美国对这一战争提出了一些不实之词，其语调是挑衅性的，甚至是污辱性的。

斯大林看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亚·马立克从纽约发回的电报后，晚上打电话给我说：

“葛罗米柯同志，您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下达什么指示？”

我说：“斯大林同志，外交部已起草了一项指示，正在送您审批。这项指示的实质是：第一，坚决驳回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指控，并且同样坚决地控告美国参与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第二，一旦有人建议要安理会通过旨在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者反对它和苏联的决议，马立克就应该使用否决权，阻止通过这类决议。”

说完这些，我就等待斯大林的反应。他说：

“我认为，苏联代表不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

接着，他用激烈的言词谴责了华盛顿写给安理会的那封敌视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信。

我不得不提请斯大林注意一个重要情况：

“如果我们的代表不出席会议，安理会就可能通过任何决议，直至打着‘联合国部队’的旗号从其他国家派遣军队到南朝鲜去。”

但是，这一理由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特别的印象。我感到，他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

然后，斯大林实际上口授了一项指示，虽然他通常很少这样做。40分钟后，这项指示就发给了我国驻安理会的代表。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提醒过斯大林的事情发生了。安理会通过了华盛顿强加给它的决议。被派往南朝鲜的各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被贴上了“联合国部队”的标签。当然，在这个事件中斯大林明显地感情用事，没有很好地权衡自己的行动。这似乎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但事实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讨论国际问题时，斯大林谈到了国家机构以及必须完善这一机构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政治局的一位委员谈到某些国家机构的活动时谈起的。这些机构虽然基本上是负责国内事务的，但有时也与国际事务有关。与会者渐渐地都转而议论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大家对城市，特别是首都莫斯科市政权机构的工作展开了讨论。有些人说，莫斯科市苏维埃解决问题不力，办事拖拉，不必要的争论过多。有人说，甚至莫斯科代表苏维埃这一名称本身就是让人们去开会，而不是去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

忽然，斯大林说道：

“为什么不恢复过去的某些东西呢？以前，有段时期政权曾经掌握在‘首脑’的手中。在解决本市范围内的问题时，

这位‘首脑’就是最终一级。”

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支持这个想法。莫洛托夫表示怀疑。其余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避明确的表态。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犹豫不定。

斯大林没有坚持要做出决定。看来，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据我所知，后来再也没有打算讨论过“城市首脑”的问题。看来，斯大林自己也觉得，应该维持原状不动。

这件事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暴露出，并让人看清了这个人的一个典型特点。个人专横和行政命令的思想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斯大林，而这和个人崇拜是同出一源。

写这本回忆录时，我认为必须谈谈斯大林，我是从下述考虑出发的：

第一，我是他的同代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我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主要是在对外事务方面，多次对他进行过观察。

第二，人们公正地提出并且以后还会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应该怎样看待斯大林这个人呢？他是怎样做到了将各种完全相反的品质集于一身的呢？”

斯大林这个人物在现在和今后的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内，都将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包括相互矛盾的看法。他这个大人物，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现象。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领导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在领导这个大国实现其宏伟的发展任务

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许多问题。在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们是呼喊着重大的名字去流血牺牲的。

但是，如果只看到斯大林身上积极的一面是不对的。斯大林还是一个非常矛盾、悲剧性的矛盾的人物。

在很长时期内，他在苏维埃国家中是第一把手。共产党和历史基本上已对他做出了自己的结论。

一方面，他是智力发达、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不战胜危险而强大的敌人誓不罢休的领导人，善于在战争年代与同盟国寻求相互谅解，在战后世界中捍卫自己国家应有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为人残酷，不考虑为达到既定目的而使多少人成为牺牲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使许多苏联人丧生，——这一切就是对他个人崇拜的恶果。他大规模屠杀无辜的、热爱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国家和人民当然永远不会原谅他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

受害者的名字将永远不会从史册中抹掉。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斯大林所做的评价是很有分量的。它表达了苏联人的思想和感情。

伟大战役中的伟大胜利

天气晴朗。此时在莫斯科已经夜深人静，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却阳光灿烂——旧金山和莫斯科之间的时差是11个小时。我们正在参加制订联合国宪章的会议。外交人民委员

维·米·莫洛托夫已返回莫斯科，我就成了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忽然，有人叫我听电话：

“是葛罗米柯先生吗？”

“是的，是我。您是谁？”

“我是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我祝贺您，你们伟大的国家战胜了德国。”

我们大家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都在为之做准备。可这一天的到来还是出乎人的意料。著名艺术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是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并告诉我胜利消息的人。

于是，祝贺便开始了。胜利的日子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就是无穷无尽的祝贺。它们从各个方面涌来。各种各样的人都打电话来祝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其中包括尤金·奥曼迪、查理·卓别林、外交官、国务活动家、美国各种社会组织的代表。当然，还有那些经常到使馆来的爱国之心尚未泯灭的我国侨民。

过了一会儿，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打来电话（她当时正在华盛顿），用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无穷无尽的人向我们使馆涌来，大门那儿已排上了长长的队伍。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祝贺我们。几千人在等你出去向他们讲话。我们解释说，大使不在，他在旧金山。可他们还站着不动，并且说：‘让俄国人出来吧，我们要祝贺他们。这个胜利是我们共同的巨大欢乐。’”

1945年5月9日。这个日子要用金字永远地载入人类史册。在这一天，全体苏联人民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所有与法西斯斗争过的各国人民的节日也来临了。

全世界都知道，为赢得这次光辉的胜利，我们作出了巨

大的牺牲，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但是，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全体苏联人民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义务。

谁也不会争辩，在争取胜利的事业中也有苏联外交家们的一份贡献。在克里姆林宫里为红军指挥员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斯大林指出：

“一项好的外交政策比在前线上的二三个军团更有价值。”

苏联人民为打垮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为把欧洲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拯救世界文明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为地球上的和平及生灵创立了这一丰功伟绩。

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以及其他反希特勒同盟国的人民和军队也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的军团战士和游击军以及游击队的战士们，还有包括德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参加者们也忘我地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斗争。

在那些日子里，在美国的苏联人感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所表示的热情欢迎。我仅想举一次聚会来说明。这次聚会是1945年5月28日旧金山会议期间在美国俄国研究所为欢迎苏联、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代表而举行的。参加聚会的有500多人，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人士。

所有发言的人都指出，为了未来的和平，必须保持和巩固苏美友好关系。我在代表我们3个代表团的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苏联和美国两大国之间的合作对战后世界的重大意义。

美国总统罗斯福未能看到庆祝胜利的场面，他为取得战

争胜利做了那么多事情。命运却按自己的意思做了安排……

我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看法，即罗斯福非常尊重苏联和斯大林本人。大家都知道，以艾伦·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情报部门曾在瑞士同希特勒帝国的某些领导人进行谈判，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就是德国将军沃尔夫。

斯大林得知这次谈判后，就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对美国特务组织的活动表示愤慨。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签署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其中谈到他对加强美苏合作的态度坚定不移。这是罗斯福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也是这位总统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当天傍晚时分，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与世长辞了。

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它在国际上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过去的副总统杜鲁门在美国掌了权。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此之前所发出的光象月亮一样是反射光。苏美关系中几乎立即就出现了极其紧张的气氛。

在罗斯福的许多行动中都可感到他对苏联的善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邀请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出席1945年春在旧金山召开的会议。莫洛托夫接受了这一邀请，飞到了美国。他是途经华盛顿去的。

但罗斯福已不在人世。于是，已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杜鲁门会见了苏联客人。作为大使，我陪莫洛托夫前往白宫去进行这次谈话。

在此之前，我也见过杜鲁门。有一次，副总统杜鲁门（这还是在罗斯福逝世前2个月）邀请我看一个纪录片。银幕上出现的是一些美国人在太平洋上作战的镜头。然后放映了介绍苏德战场作战情况的苏联新闻片。在小小的礼堂里，除了

我和副总统之外，还有他的助手们。杜鲁门坐在我身旁。望着银幕，他几乎在喊叫：

“真令人惊叹！我感到震惊！人们是多么英勇啊！军队真有威力！”

银幕上出现的镜头我没见过，我们使馆还没收到这部新闻片。美国人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弄到的。我想听听为影片配音的播音员的声音，但是我的邻居却一刻不停地说个没完。

看完电影后，杜鲁门还继续对红军、对它的英雄气概、对苏联为取得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的贡献赞赏不已。他说话时用的尽是一些最高级的赞美词。可是，要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在战争刚开始，当希特勒德国刚进攻苏联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名噪全美、国外也颇为闻名的声明的那个哈里·杜鲁门。这个声明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将要赢得战争时，我们应该帮助俄国；而一旦俄国要取胜时，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残杀得越多越好。”

在胜利日那天，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电视上发表讲话。他也谈到了胜利，但说得有些干瘪，打官腔。人民在欢欣鼓舞，美国上下一片欢腾，而在新任美国总统表情呆滞的脸上却显出冷淡的痕迹。后来，他同丘吉尔一起开始竭尽全力来破坏苏联和美国在战争年代建立起的联系和友好同盟关系，这是毫不奇怪的。

就这样，莫洛托夫和我走进了白宫。

我同杜鲁门只有几个星期没见面，但我几乎认不出这个不久以前还非常殷勤和气的人了。现在，在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谈话时，杜鲁门态度生硬，他的每一个姿势都透着一股

冷漠之情。不管你向他提什么建议，无论谈什么问题，新总统一概表示反对。他有时似乎根本不听对方讲话。

当时谈的是即将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问题。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准备就某些问题同美国联合发言。莫洛托夫受权同杜鲁门商定这个问题。但是未能谈成。

分析一下这次会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杜鲁门这次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当时他刚刚当上总统，他作为一个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得到报告说，美国即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新的、具有骇人破坏力的可怕武器——原子弹的国家。杜鲁门显然觉得，一旦手里有了这样的武器，美国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苏联。

这次谈话给我们留下了不愉快的感觉。无法和杜鲁门达成任何协议，他实际上不愿做任何妥协，甚至在很小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杜鲁门故意企图使这次会晤尖锐化。一切迹象表明，他对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有关联合国及其活动的某些原则的决议不完全满意。总统表现出一种好斗的情绪，几乎对苏联方面关于这一未来的世界性组织的意义所说的意见和关于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的任务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吹毛求疵。使人感到，杜鲁门已经把弦拉紧了。

不仅如此，完全出人意料的是，当我们觉得谈话正进行到中间时，他突然间几乎站起来，做了一个表示谈话已结束的手势。我们起身离去。结果，这次在白宫的会晤实际上夭折了。莫洛托夫对会见很不满意，我也有同感。

以前，当战争还未结束、罗斯福还在世时，杜鲁门还想使莫斯科对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在同莫洛托夫谈话

时，他好象判若两人。新总统具有非凡的在政治上玩弄权术本领，这种本领很快便公开表现出来了。

自然，斯大林得到了有关这次会晤情况的报告。当我在场时，他从未谈及过这件事。但是我相信，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继任人非常注意。此人不善于，也不愿意掩盖自己对为战胜共同的敌人作出了最大牺牲的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不友好态度。

最后是波茨坦会议

法西斯德国刚被推翻后，总结战争结果并为此目的召开一次新的三大同盟国领导人会议问题便立即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不言而喻，雅尔塔会议之后，三国的首都都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会议是在罪恶的“第三帝国”硝烟还未散尽的废墟上召开的。当时，我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也是我国代表团中的一员，这次会议在我个人的政治生涯中可能也是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苏联在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在莫斯科，有幸直接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筹备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确定的。斯大林对将在波茨坦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视。苏联代表团准备得很充分，本着谋求达成协议的愿望前去赴会。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苏联士兵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因为红军驻守在法西斯过去的堡垒——柏林，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对将他们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军队深怀好感。这次会议就是在欧洲及全世界的进步思潮由于取胜而大

为高涨的条件下召开的。

美国的代表是杜鲁门。对斯大林来说，杜鲁门是个不太知名的活动家，斯大林对他个人则完全不了解。丘吉尔对杜鲁门的政治面貌当然比较清楚。所以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当丘吉尔还参加会议时，每个与会者都看得出，他们仅靠只言片语就能心领神会。

艾德礼代替了丘吉尔接任首相和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团长。新的英国工党领袖完全接受了此前丘吉尔和保守党党员们在这次会议上所奉行的路线。杜鲁门同艾德礼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共同语言。

会议本身气氛的某些方面也值得提一提。虽然某些外国的会议参加者对此已做过描绘，但是不准确之处不胜枚举。

由于波茨坦位于苏联占领区内，所以，维持秩序，保障代表团团长及其他与会者的安全等事物就由苏联方面负责。大家一致公认，所有这一切的组织工作都是最高水平的。

苏联代表团住在巴贝尔斯贝格镇——这是个离波茨坦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小城，是过去德国国王们的官邸。会议期间的各种会议在塞西林霍夫宫举行。

我记得，当苏联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到达宫殿时，斯大林对他所看到的东​​西做了这样的评论。

他环顾四周，看着楼梯和走廊说道：“是啊，总的说来不算特别奢华。宫殿很朴素。俄国的沙皇们比这要气派得多。宫殿象宫殿！楼梯象楼梯！”

我们大家都理解他的话，因为它们准确地概括了实际情况。

从巴贝尔斯贝格镇到塞西林霍夫宫的路上，斯大林的汽

车以及其他汽车一直在两排警卫中间行驶，每隔5至6米之间站着—个士兵。除此之外，在这一警卫线的两侧大约50米远的地方，还有一行警卫线，只是排得没那么密了，士兵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

斯大林经常将莫洛托夫请到自己的车上。有时也叫我去。看来，这是因为他在动身去开会之前一般总要产生一些需要询问苏联驻美大使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杜鲁门的立场、美国政界的情绪等。

最初，我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特别是当斯大林坐到自己“吉斯”牌汽车的折叠椅上，而我和莫洛托夫则坐在主要座位上时更是如此。但后来我明白了，斯大林只不过是喜欢这个座位而已，因为它在汽车的中部，较少颠簸，而他不喜欢颠簸的。

在汽车通过的所有的十字路口、大小广场上，都站着手执小旗的苏联女调度员。姑娘们身着漂亮的新军服，穿着整齐，无瑕可挑。她们挥动小旗的姿势以及所有的动作显得那样优雅，以致让人觉得，她们几乎个个都象是芭蕾舞演员。有人告诉我们说，大家一致赞赏她们，也许参加大会的英国人和英国人尤其如此。

在第三帝国巢穴的废墟上

在波茨坦会议开始工作的前一天，古谢夫和我决定在柏林城里转—转。我们的军人建议我们这样做。这一建议正好同我们自己的愿望—致。

我们已不是从飞机上，而是在陆地上看到了希特勒帝国

首都的废墟，而没有毁坏的或甚至是半毁坏的房屋都很少看到。完整的基本上是在郊的小房。记得，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费了好大劲儿才能在菩提树下大街上向前移动。颓垣断壁堵塞了整个街道。砖，到处是砖，破碎的砖块堆积如山……

陪同我们的军官建议我们首先看一看元首原先的办公大厦。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那儿。倒塌的楼房、废铁和钢筋混凝土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上。所有这些废物还需要有人来清理。汽车无法开到办公大厦的入口处。只有步行才能走到那里，我们只好走过去了。

到处都有苏联的巡逻兵，他们很有礼貌地，象传接力棒似地把我们从一个哨兵处送到另一个哨兵处，直至正门入口处。这个正门当然看起来已经不象样子了，因为办公楼在战斗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毁坏。残留下来的墙壁也是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只有个别地方的天花板才幸免于难。窗户变成了黑洞洞。

总之，办公大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点儿古怪。大概，确定这座大楼建筑式样的那些人的构思首先是想使任何一个走近这幢大楼的人产生一种敬慕和恐惧的感觉，魔鬼般阴森的感觉。

办公大楼的外观无论如何不会引起人们的好感。它在被毁以前看起来就阴森可怕，这一点许多德国人都对我们谈起过。如果想象把这座希特勒的堡垒缩小许多倍，其比例和建筑式样不变，那么它在某方面有点儿象座古墓。

我们在希特勒及其统治集团的最高决策人士用作聚会和举行仪式的几个大厅里走了走。由于某种原因，正厅受损程度轻一些。厅内毁坏得最厉害的是天花板和地板。门、窗和

吊灯上留下了战斗的痕迹，它们大部分都被打坏了。其它几个厅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们被带到办公大厦的底层，有着好几层的地下室，其中一层是独立使用的发电站。

陪同我们的军官指着电站的废墟说：

“一旦需要，它可保障整个办公大厦的用电。整个柏林可以处在黑暗中，但这里仍可灯火通明。”

办公大厦的几层地下室是一片混乱，看来这座堡垒的警备队进行过疯狂的抵抗，这里中了不少炮弹、炸弹和榴弹。周围是一堆堆枕梁和楼板，有金属的和木质的，还有大块大块的钢筋混凝土。

狭窄走廊的两边是一些都炸变了形的隔间。走廊本身相当长，大约和整个帝国大厦的长度相等。穿过走廊时不得不非常艰难地在特地铺上木板的通道上行走，以免掉到水中。水相当深，看来是由于自来水管炸裂所致。

这一切给人一种阴郁、沉重的印象。如果希特勒堡垒这个混乱的地下室有照片的话，它们则会成为但丁^①《地狱篇》中的合适的插图，只是需要挑选一下，看看适合于哪一部分。

当我们走出这座不久前还是法西斯首犯的巢穴的大楼时，觉得心情轻松多了，我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这座大楼的外表象是一个掩蔽工事。

然后，我们看了另一个地方，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如果要树立一个纪念物，作为对与希特勒主义有关的一切罪恶的和仇视人类的東西进行诅咒的象征，那么这个被毁坏的地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创作的顶峰是长诗《神曲》，分三部分，即《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译者

下避弹室完全可以充当这样一个纪念物。

我们眼前看到的好象是从山岩上凿下来的一块高约10米、直径约5—6米的圆柱形巨石。入口通向地下室，那里几乎灌满了水。从地下避弹室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道被乱七八糟的钢筋混凝土巨块堵塞了。可以感到，我们的战士干得不错，捣毁了这个疯狂元首的最后一块藏身之地。通过猛烈的爆炸彻底摧毁了地下避弹室四周的地面，炸出了深坑。

被摧毁的帝国大厦和地下避弹室的景象似乎象征着法西斯德国及其罪恶制度的崩溃，给参观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代表也参观了帝国大厦和地下避弹室的废墟。但是，人们注意到，他们并不乐意参观这些地方。至少，我们在那里没见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人。

人们还带我们去看了称为戈培尔^①官邸的那块地方，因为这座房子已被毁坏得几乎没剩什么东西。苏联军官告诉我们，当在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戈培尔6个孩子的尸体时，就把他们抬到街上。不久就在离地下避弹室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戈培尔本人和他妻子的尸体。把所有这些人的尸体放成一排，用东西盖上。只允许有限的几个人来观看和辨认他们。这个过程也拍了照，这些照片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人们留下的沉重而又简直是可怕的形象是难以表达的。

这个通过广播拼命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人物是自杀身亡的，并在死前下令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杀死。

^① 法西斯德国主要战犯之一。1933年起是法西斯德国宣传机构的头子，1944年全权掌管帝国的军事总动员。——译者

他死后，作为凶手的母亲对孩子们说：

“别怕，现在医生来给你们注射疫苗，所有的孩子和士兵都要打这种预防针。”

纳粹分子医生按照玛格达·戈培尔的命令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他们随即进入半睡眠状态，于是戈培尔太太亲自给每个孩子的嘴里倒进事先压碎的1小瓶氰化钾。然后，她也自杀了。

就颓废和残酷程度来说，历史上很少有罪行能与这对地地道道的凶手所犯的罪行相比。也许只能把他们同处于走投无路状态的蝎子相比，自己螫自己，自杀了。

缺少热情

我带着对柏林的最新印象来到了会议桌旁，会议的工作始终是在充满活力的节奏中进行的。三国领导人轮流主持会议。当时公布了许多有关会议及其决议的材料，其中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

不妨简短地谈一下我所观察到的直接笼罩着会议的总的气氛。盟国领导人的会见本来似乎应该是凯旋式的，因为敌人已经放下武器并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些领导人本来应该不是出于礼节，而是通过友好的握手（这不是表面上装腔作势的行动）来巩固战争和胜利中结成的伙伴关系，应该相互庄严地许下诺言，将竭尽全力以使法西斯永远不能再抬起头来。这本来应该有些类似苏美两国战士在易北河会师时的那种自发的情绪，当时他们相互拥抱，为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感情所激动。

在波茨坦全是按礼宾规则办事的。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正常。首脑们相互表示欢迎，对会见表示满意。但在“圆桌”会议上缺少热情，一种历史性时刻所要求的热情，全世界人民、盟国军队的战士们所期待的热情，为纪念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需要热情。要知道，法西斯企图让被征服的世界躺倒在它的脚下。但结果却恰好相反：人民击毙了法西斯野兽。它躺倒了。胜利者会师了，但是……

会议的工作一开始，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方面就已经在表面的彬彬有礼背后处处显露出警惕性和政治上的冷漠，而且时间愈长表现得也就愈明显。几乎在当时所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上，盟国的立场都有分歧：关于德国的未来问题，关于现在怎样处置被摧毁后的德国问题，关于在克里米亚未能解决的赔偿问题，关于德国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实际步骤问题，关于波兰问题，还有关于如何处理德国武器问题。

大部分的谈话都进行得相当紧张，尽管谁也没用拳头敲桌子。会议一开始，所有与会者就都清楚了，达成协议的道路十分艰难，而对有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苏联代表团一方面坚持原则立场，同时力图使人们对会议增加些信心和改善些工作气氛，对西方谈判伙伴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制造的那种气氛。

我们，所有苏联代表都仔细地观察杜鲁门。因为，自从他当总统之后，我们还没有机会同他在最高一级讨论原则问题，尽管杜鲁门和斯大林之间已经交换过信件。我们力图弄清楚，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华盛顿在欧洲事务上，特别是涉及德国问题上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在整个国际政治中的目标是

什么。

我们的共同看法是，杜鲁门到波茨坦来，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尽量少迎合苏联，尽量争取更多的可能性来把德国拴连在西方经济上。从一切迹象来看，他是通过这个角度来估价在波茨坦可能达成的协议的意义。

不言而喻，在这方面丘吉尔是他可靠的和久经考验的盟友。杜鲁门在某些问题上“稍稍修正了”罗斯福的立场。他认为，罗斯福在克里米亚对斯大林要求德国赔偿的建议上表现得有些过分体谅苏方立场。他的这些修正导致从德国的西方占领区，即最发达的工业区获得赔偿的问题未获解决。

引人注意的是，甚至在辩论一些并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时，杜鲁门故意制造一些紧张因素。使人感到，在来柏林之前，他就已准备掀起某种风浪。

应当指出，远在会议之前，美国就竭尽全力加速完成制造原子弹的工作。美国的统治集团早在那时就已制定了利用这种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作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其阴谋的政治工具。他们同时打算在波茨坦会议上也采用这种手法。

美国总统千方百计地想拖延举行波茨坦高级会晤的日期，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原定的制成原子弹的日期没能兑现。这样，根据杜鲁门的建议就把最高级会晤开始的日期从6月改为7月。

甚至很多接近美国总统的人士都不能解释那时华盛顿的策略。而且关于这些策略的真正目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其他国家都是不知道的，可能只有英国是例外。

把原子弹当作“王牌”

当后来有关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许多事实被披露出来，已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前及会议期间的行为便清楚了。美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华盛顿认为，必须拖延解决战后的欧洲问题和其他问题，直到美国手中得到核武器这张决定性的“王牌”时为止。

随着原子弹试验日期的临近，美国领导想在国际事务中利用这一因素（无疑是一个讹诈的因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杜鲁门急切地等待着试验结果，在得到试验已在1945年7月16日，也就是在波茨坦会议开始前一天进行的消息后，他便认为在柏林讨论问题时必须表现出强硬态度。

这种强硬态度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涉及东欧的问题上。美国总统提高声调无根据地声明：

“苏联方面没有履行三大国在克里米亚商定的有关义务。”

苏联代表团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并拒绝了华盛顿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出，华盛顿对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抱有扩张主义野心。

在波茨坦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击后，美国被迫承认，他们的“强硬”立场一无所获。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和英国代表团精心设计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场面，内容是如何把美国人有原子弹一事告诉斯大林。这一戏剧场面是这么演出的：7月24日会议结束后，当斯大林朝门口走去时，美国总统拦

住了他，并说道：

“我想告诉您一个秘密消息。”

斯大林停住了，杜鲁门告诉了他下述消息：

“美国制造了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我们打算对日本使用这种武器。”

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时是平静的，没有表现出在感情上有任何激动。后来得知，美国总统对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反应很失望。

丘吉尔焦急地等待着杜鲁门同斯大林结束谈话。谈话一结束，英国首相急忙去问美国总统：

“怎么样？”

美国总统答道：

“斯大林没有向我提出任何一个要求弄清情况的问题，对这一通报仅仅表示感谢。”

回想起这一谈话时，杜鲁门以后将会肯定地说，从他上述关于新武器的几句极其概括的话中，斯大林似乎未必能做出应有的结论。而实际上斯大林立即从波茨坦给苏联物理学家伊·瓦·库尔恰托夫^①下达指示，加快制造原子弹的工作，这一指示大大地推动了我国一整套与此有关的工作。在美国已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情况下，这当然是唯一正确的决定。苏联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

由于核武器的问世，世界军事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① 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学和技术工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原子能研究所的创建人和第一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核反应堆，制造了苏第一颗原子弹、世界第一颗热核炸弹，建造了世界第一座原子能电站。

过去的任何重大发现都没有象制造原子弹那样，对整个国际生活产生这种影响。

美国是第一个在军火库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也是第一个使用了这种武器。

正是美国开始了至今还在威胁着全人类的核军备竞赛。

在克服了波茨坦会议上由于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立场而造成的许多困难之后，我国终于促使会议通过了一些重要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会议关于德国的民主化、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问题的决议是原则性的。但是，西方大国的政策很快就表明，它们不愿意执行这些决议。

华盛顿、伦敦及跟随它们的巴黎先是设法建立双联占领区和三联占领区，尔后是成立一个单独的西部德国。这些行动表明，它们拒绝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民主的、非军事化的德国。后来苏联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总是不断地遭到拒绝。结果，经过一系列过渡阶段，终于出现了两个独立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谁应对波兰的前途负责

还有一些与波茨坦会议有关的方面值得提一提，因为正是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消息经常是不确切的。

如同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一样，就波兰问题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去参加会议时，三个领导人都清楚，波兰问题今天还得讨论。而且这个问题的确几乎天天讨论。需要指出，在波茨坦会议开始前不久，根据在雅尔塔制定的决议成立了以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首的波兰全国统一

临时政府。美国和英国被迫同这个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拖延彻底解散波兰流亡政府的日期。这种独特的两面手法合乎他们的心意。

在详细地讨论了与建立全国统一政府这一事实有关的问题之后（同时听取和考虑了应邀到波茨坦来的以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为首的波兰代表团的意见），三国领导人通过决议，对成立这一政府表示满意。声明中还指出，美国和英国同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结果乃撤销对于前伦敦波兰政府之承认，该政府已不再存在”。

该声明的通过符合波兰的利益，排除了美国和英国今后可能用以干涉波兰人民内政的借口。它还有助于巩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的地位。

然而，应该指出，参加该政府的成员中，也有象斯·米科瓦伊奇克^①这样的人，他们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他们把波兰的民族利益置之脑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导致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美国和英国意识到，随着波兰全国统一政府政权的巩固，他们想把这个国家变为反对苏联的“防疫线”的希望将会落空，因此，他们企图回避在波茨坦解决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但这一点他们未能做到。

最后，面对斯大林的无法反驳的理由，面对着波兰代表团从历史的和经济的以及从安全的角度无可争辩地证明自己关于西部边界的建议是公正的有力论据，同时注意到交给波兰的这片土地上的实际情况，丘吉尔和杜鲁门同意在波茨坦

^① 1943—1944年波兰流亡政府总理。1945年起为人民波兰临时政府成员。1945年创建反动政党——波兰人民建设党。——译者

会议上把上述边界最后确定下来。诚然，他们同意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苏联代表团接受他们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立场。

德国应该进行赔偿成为波茨坦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苏联要求赔偿损失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从我国的西部边界到北高加索，到伏尔加河流域，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战后留下的实际上是一片焦土、城市和村庄的废墟，在过去是企业、行政大楼和住房的地方现在看到的是一堆堆砖块和废铁。还不止这些。希特勒的飞机在战争年代轰炸了位于莫斯科和乌拉尔之间的一些城市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一切都需要修复，许多地方还要重建。但无论是丘吉尔、艾德礼、还是杜鲁门，从他们的表现来看，谁都不打算替苏联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坚持认为，德国不应进行任何赔偿。

有一次中间休息，当谈到这个话题时，斯大林对自己周围的人说：

“英国人和美国人想卡我们的脖子。但是，没关系，我们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的年代都经历过这些了，现在我们也一定能闯过这一关。”

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是苏联在赔偿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从而使波兰西部新边界的问题得以按照波兰提出的并得到苏联代表团支持的建议方案，即以奥得—尼斯河为界达成协议。这样，在波茨坦，第一次在波兰历史上彻底和公正地解决了波兰的国界问题。

后来，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在波兰同民主德国的条约（1950年）、同联邦德国的条约（1970年）、苏联同联邦德国的条约（1970年）中，以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1975年）中都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

波茨坦会议的工作不仅仅限于召开许多会议。代表团的首脑们相互还做出了一些礼节性的表示，安排共进早餐，设午宴，照相留念，而且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后来是艾德礼都经常给记者们提供拍照的机会。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杜鲁门设午宴。当客人们从桌旁站起来之后，他在钢琴前坐下，演奏了一段音乐，看来事先练习过。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弹钢琴“消遣”。他弹奏完之后，斯大林称赞了他并说：

“是的，音乐是个好东西，它能从人的身上驱除兽性。”

莫洛托夫、古谢夫和我听了斯大林的话，都笑了。

杜鲁门也很喜欢斯大林的这些话。因为到底也弄不清楚，斯大林的话是指谁说的，此刻，音乐是从哪个人身上驱除兽性。

波茨坦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降下了帷幕，把欧洲经历的战争悲剧同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的在和平条件下生活的前景分隔开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主要是表达了三个战胜国不允许德国的土地再次成为侵略策源地的意志。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很有力。即使波茨坦协议只宣告这一目的，那这次会议在当时也仍会被列为突出的世界大事。当然，只有大国都按照他们所达成的协议行事，这一切才会是正确的。

谈判桌旁的“三巨头”

在我的记忆中好象已深深地印下了“三巨头”在波茨坦谈判桌上的照片。这张照片具有普通像片所没有的独特之处。显然，这与整个激动人心的氛围有关。所有与会者都意识到，

他们应该对把欧洲变成血海的侵略国进行公正的审判。这一审判是最高的政治审判。另一个将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对希特勒德国的主要战犯的审判必须符合在塞西林霍夫宫这里举行的崇高政治审判的精神。

坐在波茨坦宫圆桌旁的所有人的神经都相当紧张。无论是从他们的举止还是从他们眼神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坐在第一排的人更加明显。第一排集中坐着3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由于每个人需要敏锐地对所有其他人的举动作出反应，这就加剧了这种紧张。

所有参加者都全神贯注。这在一开始还表现在没有一个人露出笑容这一点上。只有认真地理解那些历史性日子的意义，才能明白为什么许多次会议的情景直到今天对我来说还历历在目。尤其难忘的是会议的第一天和第一次会议。艾德礼和贝文在大选中获胜后也参加了会议。

杜鲁门端坐着。他极力保持镇静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几乎所有重要的发言他都预先准备好了，他只需照稿子宣读，这一点当然也帮了他的忙。虽然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他也即席发言，但这些发言通常都很短。有时觉得他好象马上就要笑了。但这仅仅是好象而已。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们不停地交头接耳，有时还暗中给总统递字条。

我感到总统的举止有点儿紧张。显然，这也与他还没有参加这种级别会晤的经验有关，况且又有斯大林在场。但也应当给他一个应有的评价：杜鲁门没有做出什么粗鲁或无礼之举……

总的来说，几乎在整个会议期间，总统坐在那里象是戴了一个面具。

……现在说说丘吉尔。这位老政治家在会上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发表的声明一般都很短。他时常喜欢把个别字拉得很长。他这样做显然是故意的。从他讲话和声明的速度就不难看出，他想特别强调什么。他说这几个字时听起来好象更尖锐，话里柔中带刚。

他讲话几乎从来不用准备好的稿子。不过，据说，他喜欢把一些声明背下来……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老练的演说家。娴于辞令，能言善辩，讲起话来镇定自若，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尽管可以感觉到他的神经是绷得紧的。正如英国人所说，他总是戒备着。

再来说说艾德礼。我们直到他以首相身份参加会议时才听到他的声音。然而，他所使用的政治语言同丘吉尔毫无二致。我们代表团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大家认为，如果工党上台，英国政策实质仍将是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那一套……

在英国大选之前，艾德礼表现出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人。也许，在代表团讨论内部问题时，他已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工党的意见。但在会上，艾德礼当时没有发言。不排除这位有经验的工党领袖担心，他在波茨坦的某些讲话会被捅到报刊上，从而使工党的选票减少。

……还要讲一讲斯大林。他显得泰然自若，从容不迫，整个苏联代表团在会上也是这样。

显然，苏联代表团中的平静和充满信心的气氛不是根据什么指示形成的，而是自发产生的。苏联政策和十月革命思想的全部真理和历史的正义性，我国在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都对这种气氛产生了影响。

苏联代表团无论是在波茨坦还是在同盟国之间的其他会议上，所以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表现出坦然的自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世界都知道——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侵略者遭到象法西斯德国在1945年所遭受的那种失败，而且，苏联在摧毁希特勒战争机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对于所有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来说都是起码的常识。须知，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之前，战争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苏联士兵已经进入侵略者的老巢——柏林。在帝国国会上空飘扬着苏联胜利的旗帜。

事，在思想上不能把这个波茨坦大厅及其在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同在希特勒命令自己的部队进攻苏联的那个夏夜里所发生的一切隔离起来看。那次阴险的突然袭击本身就孕育着侵略者的彻底溃败和对侵略者取得具有最伟大意义的胜利。

根本上出自对苏联的尊重

在快结束我对有三大盟国首脑参加的会议的回忆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我每次都注意观察，发现斯大林深受自己同行的敬重。无论是罗斯福以及后来的杜鲁门，还是丘吉尔及其继任者艾德礼都尊重他。

这种尊敬既表现在正式会议时的谈判桌上，也表现在非正式的会晤中。它还表现在除三大国首脑外，还有三国所有重要代表参加的会晤上。

从这方面看，也许最有意思的还是在他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这时对他们三人来说既是工作，又象是一种短暂的休息。他们手中掌握着钥匙，必须将其插入门上，把世界上最大的

战争灾难和未来的和平发展时期隔开。

无需心理学家就能发现，3位首脑中的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当然，在会上，他们代表着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但是，三国都面临着要讨论的问题是：需要尽快结束战争，而且要达到三个盟国所期望的结果。但是，由于各国的愿望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非常吻合，这就需要在这个方面求得一致。

当美国总统讲话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们跟踪着他的思路及其变化，仔细回味他的准确见解和玩笑。大家都明白，他表达的思想对于即将进行的和平大厦的建设有着巨大的意义。

英国首相做了发言或插话。他恰当地、甚至巧妙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还善于在讲话中忽然插进一两个笑话。看得出，他不仅对政治很内行，而且也通晓历史，特别是现代史。要知道，早在20世纪初他就参加过南部非洲的英布战争^①。

然而，所有在场的人——主要的和次要的与会者——不知怎么都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集中在斯大林身上。甚至在另一个人讲话时，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注意看斯大林，注意他脸上的表情、眼神，极力猜度斯大林是怎样评价自己同行的讲话和思想的。

斯大林低声地、好象是顺便插话似地开始讲话了，看他那讲话的样子，似乎除了他之外就只有两个人在场。他讲得无拘无束，丝毫不想哗众取宠，思想表达得流畅、自然。他每个字都用得恰到好处，好象专门为在这种场合、这个时

^① 1899—1902年英国对南部非洲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这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译者

刻讲话准备的。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讲话时，甚至讲的并不是崇高的政治，罗斯福也常常极力表示他对苏联领导人讲话的态度——或者点头，或者坦诚地望着斯大林。

不仅是我这个大使，而且其他苏联同志在这样的会晤结束后交换意见时都认为，会晤时的中心领导人物无疑是苏联领导人。

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当斯大林刚一出现在里瓦基亚宫的走廊里时，他所要去的首脑会议大厅不知通过什么途径霎时间就知道了。联络员的工作真可谓是超效率的。

当时，同盟国的会议和会晤，其中也包括最高一级，是经常举行的。就在那时，每一个稍有观察力的人都不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享有如此的威望？美英领导人又为何这般尊敬他？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强调主要的一点：这当然就是挺身保卫祖国的苏联人民所作出的卓越功勋。就在战争初期，苏联军人同侵略者在前线进行着殊死搏斗，当有关前线战况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就对苏联人民在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感到不胜惊讶。

这些消息同当时在美国，也不仅仅在美国，广为流传的似乎苏联抵挡不住法西斯的入侵、希特勒将赢得胜利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显然，对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不友好的宣传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美国的社会舆论。

我清楚地记得，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的最初几天

里，许多美国人不断地向我和其他苏联代表提出问题：

“前线的形势怎样？”

“苏联有没有把握顶住？”

我们答道：

“是的，有把握。”

听众怀着对我国友好的感情，表示理解这个答复，但很克制，而且常常是带着很大的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得知希特勒军队遭受巨大损失时，美国舆论的情绪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过去对苏联能否顶住强大敌人的进攻所持的怀疑态度，甚至悲观情绪开始被不断上升的乐观情绪所取代。

甚至在官方人士中间，在政府里认为苏联的抵抗能力没有削弱，相反正在加强的看法开始形成。

1941年底苏联军人在莫斯科城下给予希特勒部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这一点尤为明显。

越往后越明显：先是希望越来越大，后来是信心越来越足，坚信战争会发生有利于苏联的转折。

这时，政府代表，特别是华盛顿军事人士这样说：

“这可真是奇迹?! 苏联从哪儿搞来坦克、大炮、飞机？要知道它的重要工业区被占领了啊！”

当苏联方面出动大量坦克进行坦克战时，给人的印象尤为强烈。

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这是在1942年初夏。当时，维·米·莫洛托夫飞往华盛顿签署有关租借法案^①的协定，在他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同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译者

逗留期间，有一天我们驱车到郊外的阿巴拉契亚山脉^①，车上除司机外就我们3人——莫洛托夫、李维诺夫和我。交谈中，莫洛托夫告诉我们说：

“我们已建立了足够数量的坦克军，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一定能取胜！这些坦克军将在近期内大显身手。”

果真如此。

苏联的炮兵部队和苏联空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瞧，这时懂行的、善于观察的人士想起来了：

“要知道，早在战争前苏联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由此看来，这是一个重大之举。”

要生产大量武器就得有地方、有原料、有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同时，还需要对全国和武装力量进行有效的领导。

那时，对我国以及成功地建立了重工业的我国领导所作出的伟大功勋是普遍公认的。

苏联人民所表现出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也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一致奋起保卫祖国，反抗强大而残忍的敌人。

举世皆知，集体农庄庄员也同工人阶级一样奋不顾身地保卫了国家。

当时，许多美国人指出：“是的，农业集体化和将农业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农民和工人能一起保卫苏维埃俄罗斯的原因。”

发表这些议论的也有十月革命后立即离开俄国移居国外的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① 北美洲东部、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系。——译者

“这就是说，苏联领导人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知道集体化的重要。”这些人在高等学府里这样说。

报刊上有时也这样写。就连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承认这一点。

您瞧，国内进行的这些伟大变革——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加上人民和共产党、和列宁的党，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原因。

斯大林是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尊敬是对我国、对苏维埃国家所做的一切的一种反映。这也是对苏联在战争前已实现的和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一切的尊重。

我国和我国领导人严格遵循了列宁关于必须实现工业化、建立大机器工业的遗训。

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1923年11月，列宁身体不太好。有一天格卢霍夫市^①的几位工人来看望他。他们谈得很亲切。客人中有一位叫库兹涅佐夫的老工人。在同伊里奇告别时，他说：

“我是一个锻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将把你计划的东西全部锻造出来。”

这几句话即使今天听起来也是那么有力。

我国劳动人民锻造了工业、社会主义农业、人民的团结——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连希特勒这只侵略的鹰也在它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过去是军国主义和侵略势力的堡垒，现在成为新的民

^① 苏联苏梅州城市。——译者

主德国的首任——柏林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脑海里也闪过过这样的想法。

在威廉·皮克^①处做客

要将废墟和瓦砾从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清除出去需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在这里，所向无敌的苏联军队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曾同罪恶的希特勒军队的残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会战。

正如我已经说过，城市损失惨重。到处都能见到颓垣断壁。可能还没有一次自然灾害带来过如此严重的后果，世界上也没有一座大城市遭到过这么大的破坏。使德国陷入这种境地的也是法西斯。它的头目们梦想取得胜利，获得“生存空间”。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失去了在地球上拥有生存空间的权利。

几年后，我有幸再次造访民主德国的首都柏林。这里已经做了的事情使我感到十分惊讶。街上已见不到垃圾。需要恢复和修理的一切都已基本上修复一新。当然，在街巷里有的地方还露着空地。只有在那些因该城高大建筑被毁而留下的空地上未来得及盖新房，这座城市的石块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德国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

在访问期间，我应邀会见了皮克总统。坦率地说，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总统府的小别墅的，虽然在此之前我同他在莫斯科，在较大范围的会晤时见过面。这一次，我们讨

^① 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49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统。

论了几个政治问题。

交谈中，皮克强调：

“必须巩固新型的德意志国家，这个国家应当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西方大国当然是不会允许被他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走这条发展道路的。”

然后，他说：

“那又怎么样，我们将在东方建立自己的、新型的德国。”

这位白发苍苍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坚定的共产党人发表如此明确的见解使我感到惊奇。

在交谈时，我注意到我们所在的房间里立着许多装满了书的柜子。老人发现了我注意着书籍，便把我带去看他丰富的藏书。我们慢慢地挨个地看了一遍书橱。

他说：“这里是歌德的全集。大约有150卷。”

天才的诗人和学者的这种全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皮克说：

“我常常探察‘歌德的思想’。”

然后，又补充道：

“当然，歌德和纳粹主义是两个不能并存的概念。纳粹主义是思想的空虚和兽性的表现。而歌德则是智慧的源泉，虽然他也是时代的产物。”

离开皮克时，我心想：“幸好这位杰出的德国人——威廉·皮克还健在！单是他的名字就有很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对于德国人而言。”

关于威廉·皮克可以写很多。他参加过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作为共产党人的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积极活动，在战前和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在共产国际执委

会中工作过，领导过吸收德国人民的健康力量并走上同法西斯做斗争道路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只要回忆一下这些事就足够了。此外，还可回忆在战后困难时期，当威廉·皮克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务活动家时，他所从事的热烈而紧张的活动。

他在1960年与世长辞。

威廉·皮克的名字在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奠基人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统为自己留下了芳名。

现在，在曾经是我们战时的盟友的国家里，有一些活动家主张两个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他们指责苏联反对这种统一。

这些人士的立场是不光彩的。他们实质上是企图让另一个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自己以及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正是西方大国粗暴地破坏了有关德国未来的波茨坦协议精神和字义，将联邦德国拉进北约军事集团，不允许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德意志国家。

整个这一问题还具有另外一个方面。每个德国人，不管他住在何处，都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就是只有苏联当时不允许将德国肢解成若干小国。正是美国和英国在三大国首脑的盟国会议上建议分裂德国。它们仿佛看到德意志国家已经是几个单独的小国了。中世纪的幻景——许多小德意志国家——这就是他们梦幻中的德国人的未来。

现在西方不习惯回忆这一切。但历史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它不允许忘却过去的一切。

——第五章——

旧金山：在“金门”^①桥畔

为一致原则而斗争 主要问题是在这里解决的 会议之后 无声的场面 华盛顿的恶劣态度 斯退丁纽斯与范登堡议员 哈利法克斯勋爵和保罗·邦库尔 史末资元帅的话：“我主张把上帝写入联合国宪章。” 会议拾零 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 在东河岸上的大楼里 联合国历届秘书长对马努伊尔斯基的亲切回忆 难忘的一日

早在战争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大国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以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联合国。可以说，这一思想是在反希特勒同盟三个主要大国的领导层中自发地产生的。这个组织的轮廓尚不完全清楚，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应当比那个无力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联盟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国际联盟在政治上的垮台反映了那些将国际联盟变为自己政策工具的西方大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所奉行的方针的破产。美国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是，它的行动表明，它在国际事务中所推行的路线未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国际联盟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门湾的吊桥，建于1937年。 ——译者

沉溺于无休止的空谈，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的备战活动。而美国却没做一点事来加强它的活动。不仅如此，美国大资本家还参加了德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实际上积极帮助了纳粹德国铸造侵略武器。

同盟国就建立世界性组织的想法事先交换了意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转入有关该组织的性质、结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谈判。

为一致原则而斗争

我有幸代表苏联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次会议是于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举行的。会上完成了为新组织制定宪章草案的基本工作。

苏联对这一组织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个组织应该建立，它必须能进行有效的活动。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美国副国务卿爱·斯退丁纽斯回忆道：“在敦巴顿橡树园同葛罗米柯和俄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会谈使我确信，苏联领导人对建立国际组织非常感兴趣。”

苏联、美国和英国这三大国的代表在美国首都郊外一座宁静舒适的别墅里开始了谈判。

各国代表团的成员是人所共知的。苏联和英国代表团由这两个国家驻华盛顿的大使率领，而领导美国代表团的是第一副国务卿。

大会开幕式是在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参加大会的美国主要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整个会议期间，工作一直很紧张。全体会议、工作小组、代表团团长的会晤以及其

他各种各样的会晤都在积极进行。与会者都明白，必须达成协议。

与联合国宪章的结构和内容有关的重大问题讨论得非常仔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这个新的世界性组织不辜负各国人民的期望，有助于维护和平和防止新的战争。苏联军队势不可当的西进浪潮，希特勒帝国日益临近的彻底崩溃使盟国这项着眼于未来的政治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个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通过协商决定的。除了苏联以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也将是这个新组织的成员，这一点也达成了协议。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可以说与建立联合国有关的90%的问题都已商定。没有商定的主要问题是：在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大会划分权利和权限时，安理会应拥有哪些权力。而这一切又集中反映在与会国对待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问题的立场上。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于对维护和平应负主要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的程序问题。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表现在它的建议中，该建议规定，当安全理事会某一成员国自己卷入争端时，安理会在作出有关决议时就不应当考虑该国的意见。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美国的建议孕育着导致大国相互对立，从而破坏它们的合作的严重危险，而如果没有这一合作，联合国这个包罗万象的国际组织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甚至根本就建立不起来。美国所建议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没有提供必要的保证来防止把联合国变成一种工具，使一个集团的国家可以将其意志强加给另一些国家，首先是强加给苏联。

这个程序使西方大国有可能从其狭隘的利益出发，通过关于实行制裁，其中包括实行军事制裁的决议。在安理会中拥有多数的大国就将乐于诉诸武力，而不去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这蕴含着使世界陷入新的灾难深渊的直接威胁。

苏联一贯主张联合国应真正地为国际安全事业服务，因此，坚决反对美国的建议。它坚持有关保卫和平、维护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只有在取得三大战胜国（苏联、美国和英国），以及法国和中国（根据共同的意见它们也应享有这种权利）的同意后才能作出决定。也就是说，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即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应成为有效活动的基础。

三大国的首都都意识到，必须克服这个困难的障碍。人们相信，法国和中国不会制造问题，它们会接受苏、美、英三国商定的解决方案。可是，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方案？怎样才能找到此方案？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随着打败法西斯的胜利曙光在地平线上日趋明亮，刻不容缓地要求寻找建立新的世界性组织的途径。

考虑到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意义，罗斯福决定同苏联大使进行会谈，为此把我请到白宫去。

一向精神专注、彬彬有礼的罗斯福善于在谈话中把礼貌和求实风格揉和在一起。我们这次会见也不例外。相互寒暄之后，罗斯福说：

“在有关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某些问题上缺乏相互谅解，这使我很不安。”

接着，他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的活动中的意义。

我就此对总统说：

“您的总的看法同我们对这个联合国机构的作用的理解完全一致，但是，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在这个原则问题上。”

罗斯福立即阐述了美国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所坚持的对有关一致原则问题的立场。当然，他是想对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施加影响。然而在交谈中，我感到总统并没有过分激化这个问题。他更多地是在琢磨、分析问题，寻找消除困难的办法。

我只好向罗斯福陈述我们的理由，维护苏联的立场。

我指出：“正象我们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无法后退一样，我们已经没有从这个阵地上后撤的余地了。当我们的军队知道不可能再向伏尔加河以东撤退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会谈的结果在当时并没使人有根据认为华盛顿已准备改变态度。但是，从总统对全部问题做了分析、思考这些问题，琢磨怎样调和这两种立场的情形可以看出，将继续寻找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的办法。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到底也未能突破阻碍解决否决权问题的防线。我们当时开玩笑说：

“三大同盟国竟然不能打破这道防线，而它们的部队却顺利地突破了法西斯军队一道又一道坚固的防线，在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然而苏联方面仍然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修改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不会不明白，如果不这样做，也就不会有联合国。结果正是这样。否决权问题在克里米亚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罗斯福亲自提出建议，其提

法基本上符合苏联一开始就坚持的立场。

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除了程序性问题外，安理会必须在所有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就所有重大问题作出决议。这一点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关于罗斯福为什么会迎合苏联，西方谈论很多。也有不少人对他提出责难。但他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他能够比华盛顿和伦敦其他一些政治家更清醒地估计局势，意识到苏联不会放弃在安理会通过重要决议时五大国一致的原则。这正是总统的一个很大功劳。

主要问题是在这里解决的

为了就否决权问题达成原则协议还需要商定，在安全理事会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中，由谁来划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程序性的。虽然在克里米亚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但能达成上述协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上（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还可以继续进行协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程序性问题就是那些在这几个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对它们是程序性问题表示怀疑的问题。

事有凑巧，肩负着建立联合国重任的旧金山会议是在苏军在德国易北河上的托尔高市^①地区同美军会师的那个历史性日子开幕的，这个国际组织的使命是联合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力量来维护普遍和平。

^① 民主德国莱比锡专区城市，易北河岸港口。——译者

会议举行期间，由于粉碎了希特勒德国，全世界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从国际联盟时期以来，这次最大的国家集会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为了给新战争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世界各国的代表第一次在美国的太平洋岸边集聚一堂。大家都向自己提出问题：

“这个屏障应当是什么样的？怎样衡量它的牢固性？它的基础应当是什么？”

遭到残酷的战火洗劫最厉害的欧洲国家的使者们为在解决上述任务方面作出贡献负有特殊责任。当然，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首先集中在苏联代表团身上。

苏联人民对人类作出的历史功绩无需宣传。关于红军的胜利及其在粉碎法西斯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人人皆知。我们苏联代表从到达旧金山的第一天起就看到和感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对我国的感情和对我国在会上提出的具体建议和所做的努力的反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及一部分拉美国家的代表对苏联的立场不够理解。战火并没有直接蔓延到这些国家。它们的损失无法同苏联人民的牺牲相比。另外，有些亚洲和北非国家也显得比较拘谨。

至于我们战时的同盟国——美国、英国、法国，则它们的政策常常使人感到它们似乎有两重心理。一种心理是承认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人类文明从法西斯暴徒的铁蹄下拯救出来的历史功绩；另一种心理则反映了它们特殊的狭隘的利益，并驱使它们在大会上讨论最重大的问题时寻找那些能确保西方大国在世界政治中拥有统治地位的解决方案。这种两重心理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几天杜鲁门同莫洛

托夫在华盛顿进行的那次谈话（前面已经提到过）本身就令人警惕。

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样一些与会国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表示了同我们的观点相似的看法，虽然那时这些国家内部的复杂形势还有影响。总的来说，我们同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建立了友好的事务联系。我们几乎每天同它们的代表会见。

大会期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总是坐无虚席的全体会议的会场。那里通常笼罩着一种紧张期待的气氛。报刊可以说是竭尽其能事地对会议作了种种预测、推断以至干脆臆造。电视当时还立足未稳——它是后来才开始向人们大量传播信息的。

尽管如此，如果将在旧金山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气氛同今天在国际会议上讨论有关问题时剑拔弩张的情形相比，则当代的会议并不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这也包括联合国的会议。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代表的词汇里还没有诸如“实力地位政策”，“冷战”，“反共十字军远征”，“苏联是邪恶的帝国”等这样一些修饰演说艺术的“瑰宝”。但那时，在讨论个别尖锐的问题时，譬如否决权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代表的神经就已经出了毛病。

苏联代表在各种不同级别上开展的活动中一直都表现得庄重得体。事实、论据和生活逻辑、导致希特勒帝国崩溃的世界事件不可逆转的进程——这一切决定着苏联在旧金山会议上讲话、声明和建议的内容。

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不是在其全体会议上，也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里，包括领导委员会在内，

而是在大国代表的会议上解决的，这种会议实际上每天都举行。参加这种会议的有各国代表团团长和每个代表团的二三名（很少超过）成员和顾问。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是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此时他已当了国务卿。苏联代表团在莫洛托夫离开后（他只参加了不长一段时间），由我作为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来领导。英国、法国和中国的代表团一开始由外交部长率领——他们分别是安东尼·艾登、乔治·皮杜尔和宋子文，后来接替这些代表团团长的是当时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好象还有同他地位相当的一位高级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法国政治活动家约瑟夫·保罗—邦库尔和当时中国的大外交家顾维钧（全世界都管他叫惠灵顿·顾）。

会议之后

各大国代表团团长的活动在大会上占有特殊地位。这次大会的政治脉搏，甚至大会最终能否就所审议的问题通过决议都取决于他们相互能否达成谅解或达成谅解的程度。

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提出问题、克服分歧和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苏美两国代表团。如果有谁特意观察一下那些参加小范围会谈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会场的话，那么，在他面前就会出现一幅有趣的图景。假如达成了协议，他们就会有说有笑地分手，有时甚至还可以听到一些愉快的评论，他们的脸上也露出矜持的微笑。

只有中国代表脸上的表情叫人捉摸不定。蒋介石集团摇

摇欲坠的地位也影响了中国代表的活动和情绪。就连旧中国外交界的老将顾维钧看上去也总是一付惘然若失、孤独乖僻的样子。开会时他多半都沉默不语，而且常常是面带愁容，就连美国代表对他和他的同事所表示的好感和尊敬态度也未能驱散他的愁云。

当就某个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与会代表通常都是默默无言，心思重重地散去。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好象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手势语言，这种语言能充分表达他们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可恶的”反对派的想法。

至于说当晚的睡眠，毋庸讳言，许多与会者都夜不能寐。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代表也不例外。考虑到必须完成大会所面临的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卫和平的国际组织的任务，我们都知道那些应当达成协议的问题的重大意义。

上面提到的参加小范围会议的那些人无论从性格，还是从他们的行为举止、表达自己思想和听取他人意见的风度上看都迥然不同。似乎天意让他们之间少一些共同点，多一些非他莫属的独有的特点。

显然，“五大国”的会晤和他们在大会上的领导作用并没有公开地渲染过，但所有与会者对此都明白并且总的来说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战争教会了人们许多东西。

如果客观地评价这些会晤的意义，那么应当说，举行这些会晤的动机不仅是因为这样做是适当的，而且也是必需的。要想在所有代表团都参加的各种各样范围广泛的会议上，每天听着许多常常是空话连篇的发言的情况下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会困难得多了。这类发言，特别是关于否决权和联合国大会权限问题的发言本来就够多的。

在旧金山会议上成立的各国代表团团长都参加的领导委员会的会议同一般的全体会议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当代表团团长出席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一个国家对所讨论的问题所采取的政治方针。此外，在委员会中与同行们谈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要容易些，原因很简单，因为谈话人都拥有较大的权力。

顾问们和专家们常常会把讨论引进死胡同，使人感到已经走投无路了。后来发现出路还是有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只有代表团领导人知道这个出路。应当说，这种做法在当今的国际会议上也在使用。

在整个会议期间，苏联代表总感到西方代表（除少数人之外）都是用另一种方式思维的另一个世界的人。而且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最无礼地反对我们意见的人与其说是西方大国的代表，勿宁说是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国家的代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当时英国自治领的代表所奉行的路线。那时他们在政治上还不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澳大利亚的赫伯特·伊瓦特^①、新西兰的彼得·弗雷泽^②、加拿大的金·麦肯齐^③等这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在会上看上去很可笑。正是他们玩弄种种花招，喋喋不休地发表议论，力图葬送否决权。

我们知道，英国人在利用不列颠联邦中这些忠实的伙伴，因为英国人认为自己不便于公开站到台前来反对大国一致原则。

① 澳大利亚政治家、法官 曾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译者

② 新西兰政治家，内阁总理。曾参加建立联合国和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工作。

——译者

③ 曾三度出任加拿大总理，是加拿大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译者

大会充分证明，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决定对外政策的人的阶级利益通常都被置于所有其他考虑和动机之上。联合国成立后仅仅4年就建立了北大西洋联盟，这难道不是对此很好的证明吗？

关于在“五大国”小范围会议上预先讨论一切重要问题的协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达成了。而且大国这样做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五个代表团的一致同意，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此外，“五大国”也都明白，大会的成功取决于苏联和美国的立场，它们两国的协调一致，对所有其他国家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除了“五大国”代表团团长的会晤外，时而又举行更小范围的会晤：有时是“三大国”——苏、美、英，但更多的时候只有苏美两国。在苏美两国代表会晤时，达成的协议是最多的。通常这类会晤表面上看上去好象事先未商量好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其中有一次是我同斯退丁纽斯的会晤。这次会晤可以说是在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联合国大会的权限以及殖民地今后的命运等问题讨论得最激烈的时候举行的。这些问题几乎自始至终一直是与会代表所关注的中心。

讨论这些问题的方针大体上已经确定。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尚未形成文字写进联合国宪章。大家都明白，在文字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提法，有的能够促进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组织，有的则将导致通过一个今后将无法改正的松散的宪章。

我同斯退丁纽斯的交谈是一一对一地单独进行的。

当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是“老相识”了——关于否决

权问题。事情看起来很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早在旧金山会议之前的克里米亚会议上就已经解决了。但是，白宫的新主人——杜鲁门对由罗斯福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远不是都赞同的，所以华盛顿仍然企图动摇已经达成的协议。虽然还不能说美国当局已经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埋葬一致原则。

在同斯退丁纽斯的交谈中，我提请他注意以下各点：

“美国代表在各种委员会中没有坚决维护克里米亚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否决权问题的提法。从雅尔塔协议后退是办不到的。苏联不会同意这样做。它认为，如果不按照雅尔塔精神适当地解决否决权问题，就不可能建立国际组织。所以，我们希望美国以及“五大国”的其他国家不是形式上，而应从实质上维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

斯退丁纽斯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我的话。他说：

“我同意，动摇雅尔塔协议是个巨大的冒险行为，我保证过问一下，让美国在各个委员会以及各种工作小组中的代表不要去动摇这一协议。”

这段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斯退丁纽斯本人也需要克服对自己立场的动摇。美国国务卿出于内心的信念要继续支持罗斯福的路线。但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他对杜鲁门政府中那些对上述问题摇摆不定的人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然而，应当承认，斯退丁纽斯在后来，尤其是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做了不少努力以避免这次大会遭到失败。

无声的场面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安理会应审议哪些事项，联合国大

会应审议哪些事项，也就是说，对哪些事项可使用否决权，而对哪些则不能。

自然，苏联主张，所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要问题都由安理会解决。华盛顿和伦敦则坚持应这样划分这些问题，以便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权限。美国政府极力想从安理会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并把它们移交给联合国大会，这是由于它相信在大会上更容易得到必要多数的支持，并通过对其有利的决议。一系列国家的代表（主要是小国代表）一般都坚持赋予联合国大会几乎同安理会一样大的，甚至更为广泛的权力。

十分清楚，这种倾向的内涵是：通过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和缩小安理会权限，实际上把负责维护和平的政治中心转移。这样，划分联合国这两个机构职能的问题便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

此时，关于赋予联合国大会审议实际上是所有问题（涉及对某国施行制裁的问题除外）的权力的建议便象雪片般地飞来。因此，苏联方面声明，不允许在联合国民主化的借口下，从背后打击安理会。

在同斯退丁纽斯谈话时，我也不得不这样地提出问题。

“在损害安理会权力的情况下要求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这一假民主的外衣同雅尔塔协定也是矛盾的。”我声明说。

斯退丁纽斯总的说来是理解苏联的立场的。他说道：

“当然，应当再研究一下，如何公正地划分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权力。我愿参加这项工作。”

经过一番不轻松的谈判之后，出现达成谅解的可能性：

联合国大会可以讨论，也仅仅是讨论某一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提出的任何问题，但它无权通过有约束力的决议，换句话说，只能表达参考意见，而安理会在其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有权作出各国必须执行的决议。

接着，苏联代表团声明：

“我国不会同意在国与国之间埋下新的军事冲突祸根的联合国宪章。”

我记得，在我们方面作出这样的声明之后，在五大国的一次会议上笼罩着一片紧张的寂静。这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投向美国代表团团长，等待着他如何回答。

斯退丁纽斯显然不知所措。一方面，他衷心地支持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承认了否决权的必要性的罗斯福路线，拥护同苏联合作的总方针；另一方面，白宫的指示使斯退丁纽斯必须设法在否决权问题上安钉子。美国代表团成员范登堡参议员也沉默不语。

这种无声的场面持续了大约10分钟。事情的结局是，大家在一点上达成了谅解——中断会议，分头去考虑形势。所有与会者都耷拉着脑袋散开了，这大约可以称之为“走动的无声的场面”（请那些严厉的戏剧家们原谅我使用这一新的术语）。因为走廊很长，一伙伙散去的代表是接踵而行的，看上去，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送葬的行列。

大概，只有一个与会者嘴角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微笑，因为他知道，协商一致的原则最终将占上风。此人就是利奥·帕斯沃利斯基。他是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问题的智囊。

在大会期间，“五大国”举行的几次新的会晤也是紧张的。这种紧张气氛在逐渐加剧。事情已经明明白白，除非有

一方让步，否则美英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分权问题上的立场同苏联的意见就无法达成妥协，此时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很清楚，杜鲁门总统给美国代表团下达了与雅尔塔协议背道而驰的指示。会议的所有参加者一下子都感到了华盛顿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美国代表团成员范登堡议员尤为卖劲。他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十分有影响的人物，因为范登堡是参院共和党反对派的首领。

苏联代表团再次表示了坚定不移的态度：

“用疲劳战术折服我们是办不到的。不要把美国国会内部的工作准则强加于我们。联合国是国际组织，其宪章必须为所有国家，也包括苏联所接受。”

在此之后，反对否决权的人才让了步。

在讨论联合国大会权限问题时，虽然美国代表团仍在进行“后卫战”，但坚冰业已打破。关于联合国大会的妥协方案渐具雏型，根据这一方案，联合国大会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但不能通过对联合国成员国有约束力的决议。这已接近于达成协议了。

所有与会者都活跃起来，善意的玩笑也多起来。一位代表在谈到就宪章问题将达成协议时说道：

“此前忽明忽暗的星辰现在已是银辉朗照。”

几天之后，会议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制定了联合国宪章第四章第十条，把联合国大会的权力限定于只能制定建议性的、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最后关于否决权问题正如克里米亚会议的协议所规定的那样得到了解决。

华盛顿的恶劣态度

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国际托管、确定被托管领土的地位问题讨论得十分激烈。被托管领土即过去的一些殖民地，此前是根据国际联盟的委托进行管理的。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解决这一问题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苏联从自己的原则立场出发，主张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西方强国，尤其是英国，总的说来是奉行保持殖民统治体系的路线。可是，美国的态度显得很特别。华盛顿倾向于把历史形成的殖民帝国看作是旧时代的残余，并且毫不掩饰，如果逐步把它们“消除”，美国是不会感到伤心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为其开创新的（包括政治的）机遇。

在讨论托管领土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代表对苏联代表的态度很客气，考虑到苏联的原则立场，他们想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即殖民大国在其领地上作威作福已经够了，他们该收场了。起码这些老主人可以收敛一些了。尤其是斯退丁纽斯在上面提到的谈话中对这些国家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依照华盛顿的看法，这些国家自己也应当明白，时代变了，他们不得不同殖民地分手了。

关于殖民地领土及其将来的命运问题，我不止一次地同美国代表团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哈罗德·史塔生讨论过。就这一题目苏联代表团成员阿·拉夫连季耶夫和科·诺维科夫两位大使也同他进行过交谈。

但十分清楚，苏联和美国的立场就其实质来说是有分歧的。我国主张国际托管应有助于创造相应的条件，以使上述领土上的居民以后能获得独立。

正是由于苏联的积极努力，才使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国际托管的目的不仅象美国方案中提出的那样是为了实现这些领土的自治，同时包括使其获得独立。起初美国反对这种提法。

在所有这些争论的过程中，美国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从过去殖民地的新地位中，华盛顿首先应当得到好处。他们在酝酿攫取某些托管领土的计划，首先是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也就是后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相应的决议而实际上弄到手的那些群岛。凡是昔日在联合国成立时看来象暗示以后将采取行动的那些环节，如今都变成了公开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胡作非为。

所有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主张遵守协议的国家，不能不强烈谴责华盛顿对上述领土所奉行的政策。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踏了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最终也践踏了自己关于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太平洋许多群岛上居民的权利的庄严允诺。

还应当谈谈在旧金山会议上激烈争论的另一个题目。

无论是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还是在克里米亚会议上，都没有讨论过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国如果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继续留在该组织内时，是否有权退出该组织的问题。问题看来很简单，但同时也很复杂，因为这涉及国家的主权原则。

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退出这一肩负着保障世界

和平的使命的组织。另一方面,如果某一国家认为,这一世界性组织没有履行其职责,那该怎么办呢?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不应该有权放弃自己的成员国资格吗?最后,如果某一国家决定不再做联合国成员而采取中立的立场,那么,应当剥夺它这种权利吗?这些问题不可能不产生,而且也确实产生了。与会者需要对此问题确定自己的立场。

美国、英国、法国表面上似乎担心这些或那些国家的退出会削弱联合国组织。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它们在竭力打击国际关系中最神圣的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动摇这一宪章原则,那就是说从其胚胎时期就种下了一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内政的祸根。不仅如此,它也为这一国际组织本身干涉联合国成员国内政创造了条件。

苏联对此坚决反对,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在会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并将其载入会议记录。

多数代表团陆续采取了类似苏联的立场。宪章中列入了一个专门条款(第一章第二条第七款),其内容是:联合国宪章不给联合国组织以任何干预实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政范围事务的权利。

回过头来评价当年在旧金山对这一问题进行的争论,不难看出,早在40多年前西方强国的代表们已就国家主权原则问题放了不少空炮,这同华盛顿及其盟友当今对这一原则采取的态度是遥相呼应的。

历史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局势的某些现象。反之亦然。

斯退丁纽斯与范登堡议员

在会议期间，我同斯退丁纽斯见面的时候特别多。罗斯福逝世后，随着美国政策中出现前面提到过的新动向，他那一圈子里的活动家们绝大多数离开了所居职位，有的根据本人的愿望，有的是被撤换了，但斯退丁纽斯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这里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国务卿是美国实业界垄断集团的代表。他同美国钢铁公司的联系也起了作用。战前他一度担任过该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这个钢铁帝国是由这样一些实业界人物构成的，任何一任总统，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敢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尽管如此，罗斯福逝世3个多月之后，换班也轮到了斯退丁纽斯。他被詹姆斯·贝尔纳斯所取代，此人在政治上更合杜鲁门的胃口。

斯退丁纽斯的形象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会议期间他坐在大国代表的席位上，满头银发，用眼睛环顾着与会者。当他发言时，对每个代表团团长都能说上几句合适的话。他讲话语调平稳，从不抬高嗓门。但是，他所引用的论据不知为什么听起来总是只有一个简单的涵义：这是黑的，而那是白的。他尽量不去更深地探讨这些问题，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他宁愿让帕斯沃利斯基，或者范登堡议员去讲。

我总有一个感觉，而且不仅仅是在旧金山会议期间，那就是他不喜欢就复杂的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虽然他也认为这些辩论是必要的，但却觉得这是不愉快的事。看来，他多年

在钢铁工业界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给他的性格打上了烙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精神气质。

斯退丁纽斯在辞去国务卿职务之后，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后来他未再担任国家职务。1950年，他发表了《罗斯福和俄国人。雅尔塔会议》一书，其中阐述了他对苏美关系问题的观点。

除上面已讲到的斯退丁纽斯的特点外，还应补充的是，在同苏联代表会面时，他从不把关于私人企业、美国的民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的谈话强加于人。他要这样做是有机会的：例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有一次围绕纽约中心区曼哈顿游船就是个机会。

斯退丁纽斯邀请了我、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及儿子阿纳托利去游船。陪斯退丁纽斯一起游船的有他的妻子弗吉尼亚和两个儿子。那天天气晴好。我们打算参观曼哈顿的名胜古迹——桥梁、纪念碑及其他。

我们乘游艇绕岛而行。斯退丁纽斯十分内行地做着讲解……忽然，他说道：

“看，那就是华尔街！”

他没有讲这条大街意味着什么，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但那时我大约是头一回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曼哈顿石头砌起的庞然大物的衬托下，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大楼，换句话说，在这条大街上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看上去并不富丽堂皇，相反显得十分简朴。这条街的一端伸向大洋，所以从船上望去是那么清楚，而另一端通向墓地。

我们的主人想让我们从近距离观看自由女神塑像。她耸立在从大西洋进入纽约港的入口处。在这里我们从不同角度

观看了这位著名女神的丰采。我们看到，女神塑像确实十分宏伟博大。甚至不必沿着这座巨大雕像里面的楼梯爬上去，就能体验到，它是多么庞大。

在观看自由女神像的时候，我多么想提及西奥多·德莱塞那切中要害的见解：他说在这座塑像的底座上刻上但丁《神曲》中的话更为合适：“凡是到这里来朝觐的人，都把希望奉上。”用以取代底座前厅在金属板上刻下的女诗人拉扎勒斯所写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啊！女诗人有着多么崇高的追求。但她的理想距新大陆的严酷现实又是多么遥远。这里一切崇高的和有人性的东西常常成为垄断资本利益的牺牲品。

在即将结束对斯退丁纽斯的印象的回忆时，我想说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尽管他是另外一个社会天地的代表，但他是可以与之交谈、能够与其达成协议的那种类型的外交家和人物。

在旧金山会议上，阿尔图尔·范登堡参议员对美国代表团有明显的影晌。他是属于西方国家代表团中主要参加内部工作的那一类人。在小型或大型会晤中更喜欢缄默不语。

自从罗斯福于1932年当选总统之后，范登堡就成了在野的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首领。他反对承认苏联，并且在自己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要求同我国断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范登堡捍卫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危险并不威胁西方强国”。当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发表声明说，“这场战争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而1941年2月，他又反对租借法案。

在整个战争期间，范登堡一直反对罗斯福的政策，抵制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主张美国把军力集中在太平洋地区。尽管如此，罗斯福考虑到范登堡在共和党中的影响，仍请他参加美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这位参议员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制定的这一未来国际组织的宪章草案提出了修改和补充意见，其目的在于削弱安理会的作用，破坏大国在建立联合国方面进行的合作。但是，考虑到美国公众舆论的情绪，在旧金山会议结束后，范登堡在参议院的讲话中主张批准该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宪章。

罗斯福逝世后，这位参议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加强了。他实际上成了前面提到过的取代斯退丁纽斯的贝尔纳斯的左膀右臂。范登堡的表现说明，他是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战后合作的顽固反对者。

哈利法克斯^①勋爵和保罗·邦库尔^②

现在我要谈谈哈利法克斯勋爵。自艾登离开旧金山以后，英国代表团由他率领。与会者开玩笑地将勋爵称做“了望台”。^③他的身影似乎还是那样历历在目，好象我几天前刚同他见过面。

其实，如果确切地说，他的爵位应称做“欧文勋爵”，

① 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1881—1959），1938—1940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译者

② 法国外交家，多次出任部长（包括外交部长）（1873—1972）。赞同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抵抗德国侵略的组织。——译者

③ 原文有两个含义：一是了望台，一是大高个儿。这里近似绰号，有双重含义。——译者

他是在1926年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五世派他去印度作总督时得到这一爵位的。爱德华·弗雷德里克·伍德·哈利法克斯自1910年为下议院议员，出任过许多部门的大臣。在政治舞台上，他成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以致于人们不称他为“欧文勋爵”，而称他为“哈利法克斯勋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哈利法克斯勋爵曾经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过很大的影响，并且与那些力图在反苏基础上同德国达成协议的人们持同样的主张。他作为外交大臣参加了慕尼黑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张伯伦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丘吉尔开始在英国的联合政府中执政，哈利法克斯继续留任这一职务。但他优柔寡断，在对待希特勒的问题上经常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勋爵不得不同外交大臣的职务告别。

哈利法克斯奉行的对侵略者实行绥靖的政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是，在195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哈利法克斯却试图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到不列颠和欧洲其他的政治家身上，说他们似乎“忽视”了德国所发生的事变。他力图使人相信，慕尼黑协定虽然是一件“可怕的和令人悲伤的事情，但却是两个祸害中较小的一个”。甚至后来，当各国人民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里受尽磨难之后，哈利法克斯仍然认为，更大的祸害就是对希特勒德国组织坚决的抵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承认苏联为防止战争而竭尽全力的做法在历史上是正确的。

我是在华盛顿认识哈利法克斯的。从1940年12月起，他就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不能说哈利法克斯是属于那种容易接触的人。看来，身

体上的缺陷使他有些不便：他有一只手天生就失去了机能。

再说，他是一个十足的贵族，养成了一种只在“当今世界强者”的圈子中周旋的习惯，而他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强者。这常常使美国人，而且不仅仅是美国人发笑。许多人常在背后善意地取笑他。

我同哈利法克斯的交往总的来说是正常的。他甚至出席美苏友协举办的群众集会，有一次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的群众集会上，他也和其他人一样登台发表演说。

见面时，哈利法克斯很愿意谈论有关前线形势的一些问题。他也喜欢谈他在华盛顿“官场”听到的消息。但是，我常常发现，他在讲到美国时，总是稍微带点儿嘲讽的口吻。看来，他是以此向美国人进行“报复”，因为美国人对她以前任外交大臣时所持立场的评价并不太佳。有时，当美国代表在场时，他引用伦敦上流社会沙龙中的一些说法同他们开玩笑。

但是，哈利法克斯讨厌人们提到他在战前对德国所采取的立场。人们对他很宽容：通常有他在场时，大家都只字不提与此有关的事。我也尽量不在这方面给他难堪。

同他谈话是很有意思的。当谈话涉及到同战争、总统、政府、国际会晤、希特勒分子对中立派所要的阴谋、外国外交官们的窃窃私语等有关内容时，他对这一切都注意地听，发表评论，或者赞成，或者反对。他的脖子本来就长，而每当他专心地听什么的时候，他的脖子似乎就显得更长了。但是，有些话题，诸如经济、失业、垄断集团的利润、工会等就不值得同他谈了。就其观点来说，他是贵族中的贵族。

大概是由于哈利法克斯以前当过外交大臣，所以有时委

托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同盟国的会晤，虽然按地位来讲其他代表可能比他高。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时就是如此。

在旧金山召开的“五大国”代表会议上，有时让人感到，哈利法克斯对所发生的一切漫不经心，几乎是心不在焉。当他想说点儿什么时，他总是事先同贾德干^①商量好，表达时用词故意文绉绉的，以致于有时很少有人能理解他说的意思。

这一切使人感到，哈利法克斯经常不掌握所讨论问题的具体情况，而且他也不喜欢知道具体情况。在讨论问题时，他不是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不是一个希望会议能够开成功的人，而是一个更习惯于非正式会晤气氛的人，因为在这种会晤中常会有许多上流社会中散布的流言蜚语。

哈利法克斯在许多问题上拿小国的“利益”和“固执”作挡箭牌，而这些问题不解决，旧金山会议就不能如期结束。与此同时，在谈判过程中，不得不回到以前我们曾同他进行过的谈话上去。不能说他总是信守自己先前说过的话，信守上次会晤时所许下的诺言。在同哈利法克斯以及英国外交界的其他代表交往时，其中包括在旧金山会议上，我们从来就不能确信他们会履行自己所许下的那些诺言。

在同苏联代表团接触中，哈利法克斯不说对我国不友好的言词。我并不认为，他的信念发生了转变。但是，盟国的义务还是迫使他保持礼貌。

我同哈利法克斯从未讨论过苏联的政治体制以及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认为自己

^① 当时的身份是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他曾参加过德黑兰会议（1943）、克里米亚会议（1945）、旧金山会议、波茨坦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译者

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但有一点他知道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不同。总的来说，他对哲学宁愿避而不谈，因为他对这门科学所拥有的知识只是一种相当模糊的概念。

哈利法克斯希望英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他总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只有希特勒的军事机器被彻底打垮后，英国才能生存下去。而苏联在这方面的作用，哈利法克斯是非常清楚的。

1946年中，哈利法克斯不再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工作了。回到英国后，他再也没有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

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是哈利法克斯在外交界最后一次“出头露面”。在此之后，他就在绿色草坪的陪伴下过着孤寂的生活，直至1959年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为止，享年78岁。在晚年时，哈利法克斯似乎成了一件博物馆的展品。我认识的一些英国人同我谈起过这事。当路过他的别墅时，他们通常指着这幢房子说：

“这里面住着一位贵族、昔日的大臣和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对这个人物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趣了。对他的反感已经消失，而好感并没有产生。

总的说来，哈利法克斯的政治生涯中消极的东西更多一些。在需要奋起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阴谋采取坚决态度时，他却同张伯伦（那时他是其政府成员）一起对希特勒卑躬屈膝……

在我谈到旧金山会议期间所举行的会晤时，如果不谈一谈法国代表团团长约瑟夫·保罗·邦库尔，哪怕是简短地谈

几句也好，那么，我对这些会晤的“素描”将会有个非常重要的缺陷。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保罗·邦库尔是一个法国人中的法国人，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被他精心梳理成往上直竖的发式，穿着雅致，但并不标新立异。让人觉得，这个人似乎是刚从巴尔扎克小说中走出来的。

在我们认识以前，保罗·邦库尔就已经具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丰富经验。他仕途辉煌，青云直上。当他25岁时，就担任了总理办公室主任，后来不久当选为众议员，38岁时出任部长。他总是在最高决策集团中，担任过陆军部长、总理和外交部长。他多次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于1972年去世，离百年大寿只差一年。

虽然西方国家那时仍然是我们战争中的盟国，但是，当谈话涉及苏联同这些国家的立场有分歧的问题时，保罗·邦库尔自然总是支持美国和英国的。但尽管如此，在阐述法国对某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时，他采取的方式比美国和英国人更为灵活。法国代表所采取的温和方式曾帮助人们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

总的说来，保罗·邦库尔为人谦虚。他在这方面完全不像曾经担任过几年法国外长的皮杜尔。

在一次谈话中，我们在就会议的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以后，我问保罗·邦库尔：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您对法国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他的回答与众不同并且相当大胆：

“法国一定能崛起并成为独立的国家。戴高乐了解国家的心愿，因此，我们国家会跟着他走的。”

我的谈话伙伴回避对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作出预测。但在谈到法国在欧洲和世界的作用时，他总是持乐观态度。

我觉得，保罗·邦库尔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儿故作自信、甚至傲慢的姿态，而皮杜尔外长在谈到法国的未来时，恰恰是这样。

在旧金山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代表团是由保罗·邦库尔率领的。还在战前，他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就已经身经百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罗·邦库尔不知怎的，没有立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他没有卖身投敌。由于战争刚结束，法国新兴人物还未来得及在外交舞台上施展身手，所以保罗·邦库尔被派赴参加旧金山会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保罗·邦库尔对美国和英国的对外政策了如指掌，他以这些国家的立场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但是，整个会议期间，在重大问题的声明中他总是表示希望各方立场相互接近。他这样做也是由于当时法国本身的政治生活尚未稳定下来。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也有影响，而这一点在法国和美国代表团接触时无疑会表现出来。至于谈到美国新总统杜鲁门，那么，总统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对那个固执的将军将采取何种态度。就是这位将军，当他认为法国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时，会不顾一切地向华盛顿说个“不”字。

保罗·邦库尔和法国代表团在“五大国”会议上的表现不是特别积极，尽管从总的来说，他们对创造一种建设性的气氛还是起了促进作用。美国人并不总是很欣赏保罗·邦库尔的矜持态度。

史末资元帅的话：

“我主张把上帝写入联合国宪章。”

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中，显得很突出的是率领南非联邦（后为南非共和国）代表团的史末资元帅这一独特的人物。他有些象旧时代的残余，而且越来越成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人物。可以说，苏联代表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简·克里斯琴·史末资是南非的一个荷兰大农场主的儿子，他在英国的剑桥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回到南非后，年仅25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德兰士瓦省的总检察长。1899—1902年间，在布尔人^①争取独立、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桎梏的斗争中，他是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尽管他根本不维护，也不代表在南部非洲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黑人的利益。1905年，他被派往英国参加有关给布尔人以自治的谈判。谈判回来后，他成了一位主张同大不列颠合作的人。他多次担任过各种部长职务，不止一次地出任南非联邦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他抛出了委任统治制度的主张，帝国主义企图借此掩饰其对“非自治领地”的统治。

1939年，他出任总理，更换了亲德的南非联邦政府。担任总理后，他同时还兼任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1941年，不列颠王国授予他不列颠军队元帅的称号。

^① 非洲南部荷兰移民的后裔。——译者

我们在旧金山见到这个人时，称他为“最后的莫希干人”，^①因为那时史末资大概是过去布尔人起义的领导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您要知道，葛罗米柯先生，”有一次他以颇为信赖的口吻对我说，“在英布战争^②期间，我曾经俘虏过丘吉尔本人。”

我指出：

“但这并没有妨碍您后来成为他政策的俘虏。”

元帅没有觉察出这句话的讥讽之意，因此他并没有反驳。

苏联代表团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成了我同元帅会晤的地点。是什么促使他来同我进行这次会晤的呢？

我们刚互相握过手，说了几句通常在这种场合讲的对这次会晤表示满意的话以后，史末资就开始陈述迫使他来找苏联的原因。他说：

“规模这么大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当然，全体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发生的多数事情我还是理解的。但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随后，他又补充说道：

“至于说到会上讨论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否决权问题，那么，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信赖五大国，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当然，他避而不谈南非联邦支持那些企图动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的人。史末资说：

① 原为美国作家库珀的小说名，喻某衰亡种族最后的残余者。——译者

② 亦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1899—1902年）。是英国对南部非洲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译者

“但是，我的代表团和我本人忧虑的是，现在正在讨论的、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协商同意的联合国宪章草案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上帝。”

我又追问这位满头银发的元帅：

“‘没有提到上帝’是什么意思？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我的谈话伙伴十分平静地解释道：

“这成何体统？无论是讨论联合国宪章的哪一条规定——是建立联合国的原则，还是宪章中阐述联合国机构权力的个别章节；是确定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还是确定国际法庭的权力——哪儿都没有讲到，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应该有上帝的存在。国家应该象人一样惧怕上帝，听从它的命令，而这一点应该在联合国的宪章中得到反映。”

史末资十分明确地暗示，在他看来，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各国没有听从上帝的意志。

我看着他，尽力想搞清楚，他是否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看着他在说这些话时那副兴奋的样子，并使劲地强调自己那冗长的谈话中的某些字眼，我明白了，他确实相信他所说的话。

史末资的话道出了那些象堵墙一样把信教的人的理智和感情同现实世界、大自然以及科学隔离开来的秘密之一。而要摧毁这堵墙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同这位老元帅交谈时，我再一次确信这一点。

史末资说完后，开始等待我的反应。我首先指出：

“联合国将代表各种不同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占主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都各不相同，其中也包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他专心致志地听着，我继续说道：

“您大概知道，苏联人民及其领导力量——共产党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科学学说。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和超自然的力量学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意识形态的性质来讲，尽管我国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我国是无神论国家。联合国宪章应该是完全谈有关人间的的事情，我们怎能在这—宪章中去谈论上帝并将此几乎作为该组织的一个原则呢？宪章应该使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为禁止新的战争、保障各国人民间和平的目标而奋斗。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都应该从这一点出发。”

我的话使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和感情，从他面部表情上很难看出来。史末资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说：

“虽然我并不同意您对是否应该在联合国宪章中写进有关上帝的条款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但是我当然明白您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所谈的见解是合乎逻辑的。看来，我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史末资来找我们谈这个问题，多半是同西方国家代表中的某些人商量过的。但是，他并没有公开在会议上提出“上帝的问题”。而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就更不敢将“上帝问题”作为严肃的议题，因为本来还有一系列重要的人间问题尚待解决。

我同元帅虽然谁也没能说服对方，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告别了。就其言行和举止来讲，史末资从来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虽然他在争取独立斗争中所领导的力量曾经在英国殖民地的敏感地区抗击过英国。

在旧金山会议上，史末资很少发言。看来，他认为发言

这种方式对自己不合适：他更为在行的不是发言和发表声明，而是摆弄步枪。

史末资喜欢坐着敞篷汽车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当众人认出他并向他表示欢迎时，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向人们挥手致意来作为答复。据我们观察，他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在政治方面，史末资，还有他所代表的国家，当然是英国、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可靠盟国。现在，南非共和国仍然是这些国家的盟国，所不同的只是，它现在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赤裸裸侵略性的了。而这种政策不止一次地受到了正是史末资曾经希望其能同上帝直接联系的那个国际组织的抨击。至于南非共和国的对内政策，那么，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始终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残酷性和荒谬性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会议拾零

倘若谈一下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做的各种安排，那么，总的来说，美国当局为大会工作提供的条件至多也只能说是过得去的。美国人为各国代表团成员安排了住房和办公用房。苏联代表团的处境较好些，那是因为在旧金山有一个领事馆。在这里，那些租用的房间需要“立即付款”，而且数额还相当不少。

在城里，不允许有任何敌视苏联人的行动，这同美国当局目前的做法很不一样。现在，华盛顿的决策阶层对那些刁难苏联代表的措施，对常常威胁到我们人员生命安全的直接挑衅行为看来是甚为满意的。联合国所在国家的当局在对待

苏联公民时，竟然粗暴地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有时干脆无视这些准则。

美国作为东道国本应举办一些起码的礼仪活动，以创造一种有利于战后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成功的气氛。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它对这次大会的关心基本上仅限于沃伦州长和莱费姆市长这个级别，他们两人总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杜鲁门总统没有前来参加大会开幕式，尽管召开大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但是，考虑到在战场上同法西斯的战斗仍在继续，对大会采取这种“矜持”态度有可能带来不利的政治后果，于是美国总统在旧金山会议开幕那天向与会代表发来了贺信，信中特别强调了联合国家为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所做的努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贺信中说：“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会议或会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过我们今天在旧金山召开的这次大会。”

当然，杜鲁门是在整个世界因盟国胜利在望而出现的高涨气氛下不得已才讲这番话的。这些言词同他的政府所推行的实际政策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联合国刚成立，美国就加紧活动，力图从多方面来束缚这个组织的工作。

美国对旧金山会议的召开所采取的“矜持”态度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杜鲁门当局已经从政治上和道义上准备在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盟国三大国首脑会议上采取行动，但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德国有可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是与之相反，要与苏联的旨在使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欧洲和全球和平的建议相抗衡。

旧金山这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当局对代表和

对这样的大会所采取的不够重视的态度。

我们无论是乘车还是步行，几乎每天都能从各个角度见到那座横跨海峡两岸、连接着城区和市郊的“戈尔登盖茨勃里奇”大桥，即“金门”桥。在阳光明媚的晴天，大桥看上去尤为壮观，这个工程师创造出来的奇迹似乎在微笑着说：

“瞧，人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事物来！”

我们也很想回答说：

“是的，如果人能理智行事、不让破坏意识和杀人欲望占上风，那么，人不仅能够，而且将来一定会造出更宏伟的建筑来。”

凡是到过旧金山的人都知道，城里的街道，至少有许多条街道由于高低不平，给行人带来诸多不便。而身体伤残的人只有乘汽车才行。在城里地势低的地方一年总有一段时间弥漫着浓雾。开会期间恰好碰上了：汽车勉强向前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街上行车叫做“街上停车”，我们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美丽城市中的怪事。

没有一位与会代表可能会放过机会去参观红木公园，即古红杉森林。那里有些树木，根据科学家判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当我们苏联代表走进森林时，我们好象掉进了一只巨大的圆桶里，里面听不到尘世的喧嚣。我们看到树梢在晃动，说明刮着风。而下面却是一片寂静。体验到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我们还看到了一棵巨杉，树干上有一个大洞，可以通过一辆小汽车。为了使参观者确信无疑，树下面还放了一辆真正的小汽车。在这个奇异的森林里，参观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整天川流不停。

红木公园之行使人神清气爽，摆脱激烈的争论，得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虽然只有几小时的时光。在那些激烈的争论中，只能偶尔听到有人对周围的环境说出几句好话。后来，这些问题闯进了政治会议的大厅并迫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地球上刮起一股核旋风，那我们整个地球以及我们自己将遭到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

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地址问题在旧金山会议上曾通过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各个大国之间实质上达成了谅解。

考虑到一系列因素，首先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与美国盟友的齐心协力，另外华盛顿曾多次保证将进行合作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因此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同意选择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的地址。苏联对华盛顿作出了友好的姿态。

现在才明白，对苏联的支持，美国采取了忘恩负义的态度。根据联合国40多年活动的经验。可以说，如果现在面临着选择联合国总部的地址问题，那就要认真地想一想，总部是否应设在美国这个国家里。

尽管已经按照一切规定完成了有关程序，但是，事情并未完结。为此，在旧金山会议上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有14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委员会订于1945年8月15日在伦敦开始工作。

8月15日，委员会如期开会。会议是在英国圣公会教会的旧址、古老的教会官里举行的，这座建筑就在伦敦市中心，紧挨着英国议会所在的广场。

旧金山会议事先规定，在联合国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将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是该委员会成员。这两个机构将负责解决与联合国开始行使其职能有关的许多组织问题。

显然，在通过关于联合国组织地址问题的原则性决定时必须遵循一切规矩，例如，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国均有权表示赞成某个方案，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在旧金山会议结束后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一直在考虑，应当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远不是所有国家都赞成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且起初赞成这个方案的甚至连形式上的多数都没有达到。许多国家，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提议设在欧洲。争论相当激烈，尤其是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里。

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国家的首都。欧洲国家中主要有3个：哥本哈根、巴黎和日内瓦。是的，有一次甚至还提到了摩纳哥这个国家。同意设在哥本哈根的票数够不上必要的多数。谁也说不出来反对这座城市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也没有人出来发表热情的演说来支持它。

巴黎或者法国的某个其他城市曾受到过许多人的青睐，但有几个西方大国都对此不屑一顾。不管怎么说，这会意味着巴黎或者法国某个其他城市将被置于优先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地位。罗马没有排上号，因为意大利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被排除在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外。

也提到了日内瓦。有人极力为之辩护，但反对者似乎更多一些。赞成日内瓦的人提出的理由是：瑞士是个中立国，该城市拥有适合于建立联合国总部的各种便利条件。

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新的机构不应设在过去的国际联盟所在地。他们断言，在人们的记忆中，日内瓦会使人联想到国际联盟的软弱无能，因为它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是，发表这种见解的人只不过不愿公开说出来，这跟日内瓦本身毫无关系，国际联盟失败的过错在伦敦、巴黎，还有华盛顿的政客们身上。美国虽然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它本来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国联克服软弱无能以反对希特勒的侵略。但美国并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真正的意愿。

争论基本上是在欧洲和美国的代表之间进行的。而这恰恰又反映了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联合国主要机构所在地的城市和国家将从中受惠。首先，由于为众多的外国客人提供服务，大量外汇将源源流入；其次，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有机会安排大批本国公民就业，为联合国主要机构服务。

但是，这两个重要原因被搁在一旁避而不提，大家不去公开谈论。而大声喧嚷的却是一些其他理由。

一部分人说：“欧洲离亚洲和非洲更近。”

另一部分人附和着说：“欧洲已经有国联大厦，战前国际联盟就一直在那里开会。”

第三部分人又慷慨激昂地争辩说：“欧洲大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所以安全问题对于欧洲尤为重要。”

第四部分人又说：“欧洲是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反欧派”又做了这样地回答：

“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是反希特勒同盟国家对于美国参加反“轴心”国战争的一种报答。”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个理由的是几个拉美国家和菲律宾的代表，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自己的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美国代表没有正式发言。但是，他们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美国11个州的代表来到伦敦建议把联合国总部设在他们的国家。

美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在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总共只做了一次发言。他宣读了由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一致通过的关于邀请联合国定址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决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举行投票表决。投票不是秘密的（秘密投票的建议被否决了），而是公开进行。先表决主张联合国应设在欧洲的建议，结果是23票“赞成”，25票“反对”，两个国家弃权。

然后表决主张联合国应设在美国的建议。有30个国家赞成该建议，14个国家反对，6个国家弃权。就这样，委员会以多数票决定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

但在投票表决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才最后决定联合国的具体地址。需要明确的是，究竟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设立联合国主要机构。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成员遍访各州并现场研究有关建议。地方政府的代表们积极性很高。尤其是旧金山的地方当局特别热心。它们非常希望联合国能设在他们的城市。

筹备委员会就联合国是设在西海岸好还是东海岸好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再次采用了投票表决方式。

有25个国家赞成设在东海岸，只有5个国家赞成在西海岸，10个国家弃权。

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最终决定了联合国总部的具体地

点问题。大会于1946年初在伦敦召开。有51个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今天联合国已拥有159个成员国，今昔相比，参加第一届联大的代表团的数目并不惊人。但在那些日子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令人难忘，那么庄严隆重。世界对这个国际安全组织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

所以大约有400名新闻单位的代表前来报道这次大会。会议在古老的中央大厅举行。

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每个国家都有权委派5名代表和5名副代表参加会议。在桌旁相应地放了5把椅子，后面也是5把。苏联代表团也在自己的席位上就坐。我受委托在会议开始率领苏联代表团并在一般性辩论中代表苏联发言。

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发言中，我就着重谈了巩固和平以及消灭战后遗留下来的法西斯策源地问题。

正是在这一届大会上，美国代表宣布，他的国家政府已选定了联合国组织的所在地。建议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当时对此没有什么异议。

在最初的三四年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所必需的机构设在离纽约40—45公里远的地区——位于纽约市郊的长岛成功湖。安理会在这里的办公楼是由“斯佩里”航空公司建造的几幢巨大的楼房。为联合国大会安排的大楼位于纽约郊区弗拉辛—麦道。对国际机构的工作来说，这两个地区都缺乏一些必需的设施。

但是，大家当然都知道，联合国总部的永久地址将设在纽约的市中心，在曼哈顿。洛克菲勒慷慨相助，他把市中心的一块地皮捐赠给了联合国。洛克菲勒凭他特有的嗅觉感到，他因此而蒙受的数目可观的损失今后将会得到补偿，因为联

联合国总部周围整个地区的地皮价格将上涨，结果巨额利润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保险柜。到那时，他将财运亨通，因为他在这里拥有的地皮不止一块。情况确实如此，至今这些地皮的价格还在不断看涨。

联合国主要机构召开会议用的大楼相当快地就建造起来了。几乎以同样快的速度修建了联合国秘书处用的摩天大楼。联合国总部周围是众多的住房，那是供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机构用的住房，有的是为它们修建的，有的是为它们购买的。

这两幢主楼刚建成就立即变得象一个蚂蚁窝。因为每天总有联合国的这个或那个机构在那里要召开会议，有时同时要举行几个会议。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议多得数不清。

在东河岸上的大楼里

每个国家都认为有必要赠送给联合国一件礼物：任何一件艺术作品，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贵重的物品。苏联赠送了一件叶·维·武切季奇^①的雕塑《铸剑为犁》，这座雕塑就放置在主楼的前面。法国人送的是富科^②摆。在走廊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一些国家送给联合国的珍贵的绘画和装饰用的手工织品。

看似奇怪，但又确实如此：进入主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如果没有那些讲演者，你会觉得好象走进了一座与世隔绝的中世纪城堡，外面的声音传不到里

^① 苏联雕塑家。《铸剑为犁》创作于1957年。——译者

^② 法国物理学家。1851年完成摆锤试验，即富科摆。——译者

面来。到处都铺满了大小地毯。听不到任何脚步声。开门关门悄无声息。没有一件会发出声音的物品。家具及其他设施都是专门定做的。

大楼的走廊很长很长。备用房间可供工作之需，适用于代表们进行密谈和单独会晤。很难找到更为合适的地方了。外国活动家，只要愿意，可以不出联合国大楼连续举行几场会晤，如果需要，还可以在那里安排工式的早餐或午餐。即使如此，所有的外国活动家，所有的代表都具体地感到他是在美国，而且是在纽约，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只要向窗外看一眼或者出门上街就会发现，纽约就在这里，就在身边，它问题和灾难成堆，不断向高空延伸，向四周扩展，早已越出了它的摇篮曼哈顿岛。它是地球上一座普通的现代化巨城。

联大例会的全体会议历来被认为是联合国最有意思的会议，特别是在前两三周进行一般性辩论和为代表团团长就其国家的政策发表原则性声明的时候。有大国代表发言的会议以及议程上有某个迫切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一向是众所关注的。

当今国际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迅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单位时间里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在和平时期（虽然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时期），人们也是空前活跃，各种往来不断。即使处在国家领导岗位上的活动家们也不例外。

在这一方面过去和现在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是设立了各类国际机构，包括全球性国际机构，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是联合国。由于每个会员国都极力想使自己的利益在这类机构中得到真正体现，因此，国务活动家们就不仅能够荣幸地阐述自己国家的政策，听取他国的政策声明，而且还可以进行

个人接触和交往。其实，这不过是整个对外活动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根据个人经验，我想做出如下结论：象联合国这样的“高级蚁穴”是应该存在的，当然，还要看它是不是服务于有益的目的和为和平利益而工作。

甚至就是经验丰富的人，当他们在联大会议大厅里见到几十名重要的、而且常常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并聆听他们发言时，也会感到难以忘怀。就是在19世纪，也根本见不到可与此相比拟的情况，更不用说离我们更远的世纪了。

无疑，联合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从一开始，即从旧金山的制宪会议以来它就是这样，一直至今。

联合国历届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缔造者的理由充分的设想，这个工作机构必须由一位有声望的活动家来领导。对这一点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疑问。但是，一落实到宪章中的有关条款，分歧立刻就出现了。早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①上，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就坚持认为应该赋予这个活动家广泛的权力。经过更确切的了解后得知，这些权力几乎超出了一个大国的权力。我们想弄清楚，主张授予联合国秘书长这种权能的两个大国政府的立场究竟严肃到什么程度，我们问道：

“到哪里去找一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能信赖的活动家呢？”

^① 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草拟联合国章程。——译者

我们没有得到答复。

最后，我们会议上的对手同意妥协。妥协的实质是：秘书长作为一个主要的行政官员，必须负责履行联合国秘书处的职能。他也可以提请联合国，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注意那些在他看来需要讨论、调解的局势。但是，他无权委派各种委员会和小组来调查情况。这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职权中的允许和不允许的界限。

这个妥协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所有与会国都能接受的。它也被旧金山会议接受并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所达成的协议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贬低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它只不过是清醒地和切合实际地规定了秘书长的职能。如果授予他作出政治决定的权力，就必然会引起冲突。联合国宪章排除了这种危险性，而这也是符合该组织本身的利益的。

挑选联合国秘书长可不容易。须知，要找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当联合国第一次寻找适合这个位置的人选时，感到格外困难。最后这个人选落到了挪威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法学家特里格夫·赖伊的身上。

1945年春天，挪威解放后，特里格夫·赖伊回到了奥斯陆，成为盖哈德森^①政府的外交大臣。他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的工作，1946年又率领挪威代表团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苏联赞成特里格夫·赖伊为候选人，认为他作风正派，但是，这种作风保持的时间很短。这里不仅有他自己的政治

^① 挪威社会民主党领袖，1945—1951年和1955—1965年（中间有间断）任首相。

——译者

观点的影响——他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也是由于在秘书长的机构里塞进了许多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放在特里格夫·赖伊桌上的所有文件、资料、建议都在美国筛子上过了一遍。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的特点是性格不坚强。他也会大声吵嚷一阵，这时候他那重量级运动员的身材看上去很威严。但比较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那一股反对的劲儿，甚至是一股怒气，立刻就会被一种心平气和、怡然自得的情绪所取代，不过这种情绪也可能持续不了多久。

在我同特里格夫·赖伊在伦敦和纽约的许多次会见中，他差不多每次都做保证说自己对苏联怀有好感，强调红军在粉碎希特勒德国、把挪威北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功勋。可是，当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发生尖锐交锋时，从政治意义上说，他几乎总是被刮到大西洋西岸去。

特里格夫·赖伊越来越屈服于美国统治集团的压力。在1948年9月发表的关于联合国活动的年度报告中，他实际上给美国和英国推卸了破坏执行联合国重要决议的任何责任，百般吹捧扩张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而在美国公然侵略朝鲜人民时，联合国秘书长利用自己的职位，积极支持美国侵略集团的行动，帮助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来掩盖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

如果有人问我，特里格夫·赖伊当联合国秘书长究竟称职不称职，我会这样回答：

“他没有经得起考验。”

看来，由于他采取了片面的、亲西方的政治立场，他无

法胜任这个职位要求他担负的重要而微妙的工作。

起初，我甚至很同情特里格夫·赖伊这个人，尤其是当他想叫我相信他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是友好的，当他声称完全理解我们理所当然地关心维护自己的安全时更是如此。但是，他所采取的性质截然相反的实际行动把他的保证化为乌有，以至人们无法再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总的来说，赖伊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时的活动证实了这一结论。

寻找特里格夫·赖伊的继任者很伤脑筋，费了不少时间。候选人提了不少。但范围也在渐渐缩小，最后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一致同意其中之一——达格·哈马舍尔德，他曾在瑞典政府里担任过多种职务。由于五大国意见一致，这个问题就预先解决了。1953年，哈马舍尔德就任联合国秘书长。

大家都仔细地观察这个重要岗位上的新人。我们对他不冷不热、善意相待。但是没过多久，哈马舍尔德就完全变了样。尽管秘书长在表面上尽力使自己保持客观，但是他的实际行动路线却离客观现实越来越远。而当最猛烈的“冷战”风刮起来时，哈马舍尔德被吹起来卷走了。试图将这位联合国活动家的活动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努力毫无结果。看到秘书长如此卖力地给北约国家打气，有时连华盛顿和伦敦都感到尴尬。但是，哈马舍尔德仍继续偏离航线，往那个方向越走越远。

不能说哈马舍尔德没有意识到他作为联合国主要官员的所作所为。对此他是一清二楚的。他也知道，下次联合国秘书长改选时，他不可能指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但看来这一点并没有使他特别不安。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在华盛顿和

北约其他国家首都的吹捧下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只信奉一条原则：“反正我再也不会呆在这幢大楼里了，管它什么客观现实呢，只要能混到下次改选就行了。”

记得我同哈马舍尔德在联大开会期间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那是在1961年，在他那次致命的非洲之行前不久（他就死在那次空难中）。当时我是同我们常驻联合国代表阿·亚·索博列夫一起见他的。那次哈马舍尔德显得异常健谈。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试图让他哪怕是沉默一会儿。我们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达到这一目的。他简直是兴奋到了极点，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高谈阔论之中。哈马舍尔德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当然，我们还是把我们想说的话说了，阐述了我们关于必须给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以切实帮助的立场。我们说：

“必须保护它们，使它们免遭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和压力之害；这特别是指过去的比利时殖民地。”

会见后，索博列夫在总结同哈马舍尔德会谈的印象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

“在开始同我们谈话之前，他究竟吞了什么药片，怎么那么兴奋？”

哈马舍尔德喜欢装腔作势。在1960年9月第十五届联大召开期间，当他因帮助殖民主义者而受到抨击时，他声称：

“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给联合国带来益处的话，那么我一天也不会呆在自己的岗位上。”

当然，他在实践上做的又是另一套。说是一回事，而做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作为政治活动家，哈马舍尔德显然是想让自己看起来象

社会名流。但是，他未能如愿。在他的生命悲惨地结束之前，他在政治上已身败名裂。

在位于东河岸的联合国主楼的入口处，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其形状是一颗被什么东西穿透了的心脏。也许就是这样。艺术家的创作秘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有时显然连艺术家本人也未必清楚。这块碑我见过多次，望着它时，我从未联想到它是残缺的或者是完整的心脏。只不过是一块中间有个窟窿的花岗石而已。

特里格夫·赖伊，特别是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教训使一些人学会了一些东西。首先是懂得了，要找一个作风正派的人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而且此人只有公正、客观才能履行职责。

挑选一位新的联合国秘书长颇费周折和时日。其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同过去俄国沙皇特别仔细地为自己挑选终身伴侣差不多。

人们把莫斯科君主古老的结婚方式叫做全民选妃是不无原因的。诏书发到俄罗斯大地上所有城乡的官吏手上，命令他们将其年龄合适、品貌出众的闺女带到城里“相亲”。诏书中写道：“胆敢匿其女，拒不见吾选妃大臣者，君主褫其官职，处以极刑……”派往各个城市的御前侍臣或贵族带着侍从兼文书与当地官吏一起先预选，中选的女子便送往莫斯科。被选妃大臣们看中的美女中的美女（这样的美女只剩下10名）再交给新郎亲自“过目”。沙皇送给每人一块用金线和银线绣成的、缀满珍珠的头巾，再从中挑一个他所喜欢的美女，其余的则赏赐领地和金钱，打发回去。

当然，在联大上落选的候选人是得不到领地和金钱的，

但是，当选的秘书长却能获得联合国各成员国，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信任。可见，这两件事还不完全相同。这显然有利于秘书长。

这次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大家都选中了缅甸外交官吴丹。起初，1961年联合国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推荐，曾选举他为代理秘书长，后来，1962年他当选为秘书长。

早在吴丹就任这个职务之前，我就认识了他。当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同当时的缅甸总理吴努关系密切的活动家，吴努为促进苏缅关系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吴丹具有欧洲人的风度，他是一个按英国人的方式生活的外交官。

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约5年后，他在同我交谈时承认：

“我在这个机构里的‘蜜月’时期看来快要结束了。”

我当时感到有点儿奇怪，因为从他的行动来看，谁也没有感到这一点。而吴丹说：

“有一大帮美国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其中有许多人是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总说我对美国不公平。”

为此，他感到很沮丧。

“其实呢，”吴丹说，“根本没这回事。他们就是想叫我不客观地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类似的思想吴丹后来也说过。但是，由于他为人谨慎、保持中立，所以他得以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71年，即在他得了不治之症后才退休的，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

由苏联参加签字的条约所确认的公认中立国奥地利的政治活动家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成为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出现在这个组织的领导岗位上之前，他已有对外事务的丰

富经验：他曾任本国驻联合国代表和奥地利外交部长。

第五任联合国秘书长、秘鲁外交家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正在这个职位上干第二个任期。他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里还有一段航程，海洋里的危险暗礁要比平静的港湾多。但他却走得顺利而稳当。

对于秘书长来说，一个重要的活动范围就是遵守联合国宪章。这本身就是一项责任重大的重要任务。

前面已经说明，围绕着制定联合国宪章一事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多么严重。尽管经过激烈的争论就某些问题已经作出过决定，但这些问题偶尔仍会冒出来。

我们不止一次地问那些反对一致原则的人：

“如果大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投票表决时，立场不一致怎么办呢？难道应当认为那些没有获得必要多数票的一个或几个大国，即使他们是正确的，也必须屈从让步吗？”

对于这些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者不予理睬，或者这样回答：

“是的，要知道，那些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票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执行由多数票通过的决议。”

“而如果处于少数的大国不同意这个决议，那又怎么办呢？”我们问道。

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对这个问题就答不上来了。为什么答不上来了呢？因为那样一来就有可能爆发战争。因为多数票不仅会决定采取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也会决定采取强制手段解决问题，其中包括使用武力。联合国如果确立这样一种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它将失去生命力并连同自己的宪章

一起毁于战火之中。

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个对批评现宪章的人不利的一面。众所周知，采用一致原则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过许多冲突和争端问题，这些冲突和争端的当事国多数是没有否决权的国家。这些国家多次请求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要把一些不公正的决议强加给它们时出来保护它们。在讨论近东问题时，这种情况尤为常见。

苏联维护这些国家人民的合法要求，它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须知，一些向苏联求助的国家在此之前还曾用最难听的话诅咒过一致的原则呢！

联合国的活动和安理会讨论问题的实践表明，否决权是联合国必不可少的。没有它联合国早已变成了一堆废墟。在雅尔塔就有关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达成协议的三大国首脑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对马努伊尔斯基的亲切回忆

不论是参加旧金山会议及前四届联合国大会还是参加一系列其他国际会议，苏维埃乌克兰代表团始终是由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马努伊尔斯基率领的（直到他 1953 年退休）。我有幸同他在一起工作过。

这位有声望的、在十月革命前就参加革命的党的活动家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多年，乌克兰外交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该共和国外交部长。

我个人同马努伊尔斯基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我非常敬重他。每当回想起他，我总有一种亲切感。他是一个原则性

很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经留下了他的芳名。

马努伊尔斯基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谦逊。与其他苏联外交家相比，他有渊博的社会政治科学知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马努伊尔斯基1911年毕业于巴黎著名的索尔奔纳大学——他一辈子都对科学理论工作很感兴趣。由于他对科学的巨大贡献，他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我同马努伊尔斯基最初的几次会见和工作接触是在旧金山会议期间。

马努伊尔斯基是我们3个代表团的领导核心成员。这个小组分析会议的形势，拟定如何完成中央指示的策略和其他方案。马努伊尔斯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是不过分注重局部问题的研究。他不喜欢数字和无关紧要的事实的堆砌，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使用它们的。提出原则性的见解并对问题进行可说是宏观分析更符合他的心意。在这方面，他觉得自己更有信心，而且善于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博的知识。

我想指出的是，马努伊尔斯基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富有幽默感的谈话伙伴。他能三言两语地把他所见过的人描绘得惟妙惟肖。有时，看起来正在谈论严肃的政治话题，马努伊尔斯基忽然会回想起有关他在某个国家逗留时发生的某件事。当他想起某件有趣的往事时，便能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起来，而且讲得很幽默。

有一次，马努伊尔斯基谈起他参观巴黎相当有名的格雷万陈列馆。这是一个蜡像馆。里面展出了许多精心制作的杰出活动家的蜡像。他们都以其独特的贡献而驰名，不仅为法国人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怀念。在制作这些蜡像时，雕塑

家力求保证人物原来的比例，尽量使雕像与原型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伦敦也仿效该馆建了一座它的姊妹馆——蒂索夫人陈列馆，其声誉与之不相上下。

在格雷万陈列馆——这时里面的人不太多——马努伊尔斯基决定跟两位前来参观的女士开个玩笑。他赶过她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一排蜡像中，等到女士们走近时，他一动不动。特别要当心胡子：主要是不能让胡子抖动，而且眼睛也不能眨。

瞧，女士们径直走到马努伊尔斯基跟前，好奇地盯着他看。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瞧，还真象个活人哩。”

这时，马努伊尔斯基故意动了一下胡子，说道：

“女士们，我想复活。”

两位女士都吓得叫起来，往后退了足足有10米远之后才醒悟过来，猜到是怎么回事。

马努伊尔斯基向我保证说：

“是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事情的经过的确是这样。”

难忘的一日

战胜国中的大国在旧金山所做的一切，它们最终协调一致的工作保证了这次会议的成功。苏联的建设性立场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苏联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

“苏联代表团在整个会议期间致力于为国际组织制订一个能够保证有效实现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宪章……有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的国家的人民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不允许再发生新的战争。”

旧金山会议的结果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是一个全面的国际性条约，条约中联合国宣布了自己的基本目标：“保全后世免遭战祸。”^①苏联领导委托我代表苏联在这些历史性文件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我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使命，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我意识到它的崇高责任。联合国宪章的签字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不过杜鲁门认为需要由他本人在会议闭幕日向与会国代表发表一份呼吁书。呼吁书中说：

“你们方才签字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历史将为此感谢我们。在欧洲取得胜利和对日本取得最后胜利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在作为历次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之一的这场战争中，已经战胜了战争本身。”

这就是1945年美国总统所说的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张。然而，各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墨迹未干，他就挽起袖子，着手拼凑排他性北大西洋公约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这个集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联合国的巨大打击，对各国人民希望保障这一代和以后数代人和平的巨大打击。

当会议大厅的灯光熄灭后，所有的与会代表很自然地相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每个人也这样问自己：

“下一步会怎么样？到底何时才能真正建立起在敦巴顿

^① 译文引自《联合国宪章》中文法定本。——译者

橡树园、雅尔塔、旧金山为之紧张工作的和平大厦？”

我们苏联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可答案却各不相同。

我们盟国中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是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的：

“还要解决一项重大任务——使日本投降。苏联应当帮助实现这一项任务，否则美国将难以完成。”

对第二个问题可以听到欧洲盟国代表的这种回答：

“和平大厦是否牢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近将举行的盟国会议和即将同前敌对国签订的和约的性质。”

两个回答均有道理。不仅是研究对外政策的人，而且那些尚未脱下军装的男女士兵都清楚地意识到，战胜国中的大国必须就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复仇之剑插入剑鞘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协同一致地行动这一问题发表决定性的意见。

现在回顾40多年来发生的事件，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接近尾声时，人们还是不能确信这是最后一次悲剧。内心深处可以听到这样一种低沉的声音：

“且慢，世界上有两个世界，它们对未来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后召开的盟国会议将会在很多方面说明这一点，而更能说明它的将是它们所采取的实际方针。”

如果同盟国和其他国家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不立即组建联合国，那很可能它就再也建不起来了，对此，现在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会提出异议。

苏联及其国家领导人是问心无愧的。为在战胜了狡猾而又强大的敌人的基础上为大家建立一个坚固而有效的安全大

厦，他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苏联在战争期间和在战后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就是佐证。

联合国的工作对任何一个级别的外交官都是很好的锻炼。自联合国建立以来，苏联各方面的代表在该组织中作出了不少努力。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瓦·亚·佐林和亚·亚·马立克这两位著名的苏联外交家。他们两人都在纽约工作了很长时间，出色地维护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利益。奥·亚·特罗扬诺夫斯基10年来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岗位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理智必胜

一百多项苏联倡议 第一次战斗 巴鲁克及其“计划” 与百万富翁的最后一次握手 我熟悉的人物——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约里奥—居里 有利可图的生意…… 与白宫通话 哈里曼——商人兼外交官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上的别墅 其他协议 倒退 华盛顿的弥天大谎 让他们把耳朵贴近地面听一听 威胁为什么不能消除？ 所有的人的义务

有近40年时间，我从事了在某种程度上同广泛的裁军问题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国和我党自列宁时代起就极为重视这个问题。

在我眼前闪过了各种会议，有大会、也有小会；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我曾以各种不同的身份亲自参加过其中的许多会议。这里还应加上同其他国家代表就一些问题进行的难以计数的双边讨论。

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叙述有关这方面的大事年表，哪怕是最重要的事件。我的目的也不是介绍问题的所有方面和全部细节。

我要涉及的仅仅是与会谈和谈判相联系的个别史实，这

些事实表明，苏联的立场同西方国家的立场相差多么悬殊。但是，这些事实也只能作为说明某种政治论断的例证。

我想谈的主要是通过列举事实来评价各方对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这么做有两个理由。

第一，要想正确理解那些在我们今天也具有很大意义的细节问题，就必须熟悉有关原则；第二，在核武库和其他种类的军火库已经膨胀的情况下，原则性的评价各国的建议（比例、均势、包括距离在内的参数、联盟关系等），这简直复杂得象迷宫。作为回忆录只能对各方过去和现阶段的立场做一个总的评价。

1946年4月，我被任命担负了一个新的职务——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几乎是同时，我又就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从那时起，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或多或少地思考裁军问题。这包括谈判、会见及许多其他工作。

苏联始终不渝地信守自己在希特勒的军事机器刚刚被粉碎之后，在波茨坦所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的实质不会因为年久日深而被遗忘：为永远不再爆发世界大战而坚决斗争。

联合国的讲坛为我国提供了一个为数不多的机会，让世界各国人民看清西方大国的方针并向各国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的目标。裁军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伊·列宁就预见到“人类还会经受……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悲剧的可能性”^①，但尽管如此，他坚决反对用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生

^① 《列宁全集》1963年中文版，第23卷，第81页。——译者

活。同时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正在铺设通向唯一的能给受苦受难的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维埃国家至今仍为在地球上建立持久和平，为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尽自己一切努力。解决这一当代最棘手的任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遏止军备竞赛和裁军。

100多项苏联倡议

数字“100”在国际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尤其当它反映一个大国所提出的建议的数量时就更是如此。早在1946年，苏联就提出了全面削减和调整军备问题的建议。这项建议成为联合国关于全面裁军原则的决议的基础。在苏联的倡议下，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战争宣传的决议。

从那时起，仅仅在联合国，苏联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就提出了100多项倡议。举世皆知，关于全面和彻底的裁军同全面和彻底的监督相结合的建议就是我国提出的。而苏联为了限制和停止具体领域的军备竞赛提出过多少建议！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我在一次最初的发言中，曾受委托代表苏联向联合国成员国宣布：

“调整和削减军备是建立安全体系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那些想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有必要将此点重复10次、100次、1000次。”

40多年前，我国就把建立持久和平作为主要目标来讲，今天还在重申。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裁军政策的实质。在对和平的威胁进一步增加的新形势下，苏共二十七号文件也谈

到了这一点。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建议综合地讨论裁军问题的一切有关方面。”

回想起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代表苏维埃国家谈裁军问题。他实际上讲的是列宁的话。

“我国建议全面削减军备，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新的战争威胁。”

契切林是受列宁亲自委托发言的，革命领袖的超凡智力准确地阐明了裁军的任务，而苏维埃人民委员又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苏维埃国家的这个裁军建议在当时是第一次提出来。不出所料，共产党人的倡议立即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恐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企图用冷嘲热讽的微笑来掩盖自己的惊慌失措。

从那时起不少年过去了，讨论裁军问题时的讥讽和冷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裁军问题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对它的态度就象一张石蕊试纸，可以确定各个政党的性质和各国政策的实质。

难道地球上曾经有过哪个国家能象苏联这样如此始终不渝地为裁军而斗争吗？不，没有过！在通向主要目标——销毁军备——的道路上采取的所有的部分裁军步骤都是苏联倡议的。

1946年，战争的痕迹犹存，联合国就在苏联的建议下开始讨论裁军问题。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委员会在

伦敦举行了会议。

很快就清楚了，委员会成员国中只有苏联坚持必须裁军。只有这一个成员国。其余的成员国都一致抵制一切旨在实行裁军，甚至只是遏制军备竞赛的建议。

战后初期，该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是大外交家艾德莱·史蒂文森。在各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美国政府不能接受任何裁军建议。富尔顿精神^①当时已笼罩着委员会。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吃饭。在他的官邸里，这位美国代表直截了当地说，讨论裁军问题这一主张本身美国就接受不了。他在伦敦逗留期间第一次这样说道：

“离开军火生产美国庞大财团的生存就难以想象。在华盛顿，谁也不把裁军主张真当一回事。但我在会上不会正式这样说。”

谁也不可能比这位美国政府代表讲得更坦率了。

“那么，您认为在大国政策中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呢？”我问道。

“控制军备。”他答道。

说得更准确些，就是继续搞军备的方针。

后来，这位政治活动家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裁军问题方面到底还是没能提出对美国选民多少有点儿吸引力的纲领，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同那些推行扩大军火生产方针的大财团玩弄相互勾结的把戏，这并没有使他获得成功。他遭到了失败。

其实，史蒂文森在当时美国国际政治活动家中远不是最

^① 富尔顿——美国城市。1946年丘吉尔在该城市发表反苏演说，这一演说标志着西方反苏“冷战”的开始。——原编者

坏的一个。

战后曾就裁军问题举行过无数次会谈。这些会谈各种级别都有，其中也包括最高级。苏联提出了极其尖锐的问题，其中包括：

“为什么美国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建立这些基地或保留早已建立的军事基地是针对哪个敌人的？”

这些问题斯大林提出过，莫洛托夫提出过，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提出过。我也问过许多西方国家代表几百次。今天提出这些问题同40年前一样仍然是合适的。

我记得，西方国家首脑是多么顽固地不愿意讨论在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问题。1955年四大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的日内瓦会晤也是如此。在苏美、苏英、苏法的双边会晤中，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安全理事会、各种裁军委员会和分委会中也是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坐在自己的郊外别墅戴维营里，倾听赫鲁晓夫就此发表的讲话。总统面部表情呆板，目光在对方的头顶上扫来扫去，有时甚至望得还高……

当时，在我们面前的艾森豪威尔已不象是大肆宣传的那样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那个人了。这次谈到裁军时，他缄口不言。这是很有趣的情景。他的前任杜鲁门也是这副样子，至多重复一句话：

“美国的驻外基地是为和平服务的。”

在苏美维也纳会晤时，肯尼迪为了替建立美国基地进行申辩而搜寻“论据”曾经浑身直冒汗，因为我们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在欧洲有那么多基地和驻军？要知道它并没有敌人。”

肯尼迪否认美国奉行在欧洲增加美国驻军的方针。但是，他毕竟还是继续思考这方面的情况。

我想就这一点援引这样一个事实。

1963年9月我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来到纽约，为了同我见面并代表肯尼迪同我谈几个问题。他告诉我说：

“总统主张寻求机会同苏联改善关系并缓和紧张局势。”

接着，腊斯克又提出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城外去一下，继续我们上次的谈话？”

我立刻明白，在这个愿望后面隐藏着某种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回答说：

“行，我同意。”

我们分别乘车向纽约城外驶去。

在那里，腊斯克通报了总统的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

“肯尼迪正在考虑减少美国在西欧驻军的可能性。”

我们一边在路边散步，一边谈论这个问题。

腊斯克通报的情况无疑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消息当然是出乎意外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耸人听闻的。大概总统不是轻易地、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肯尼迪在他被杀前不久曾认为，削减驻欧洲美军是可能的，这种议论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在华盛顿也许有一种清醒的看法曾经占了上风。

腊斯克透露出的思想当然关系到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

问题几乎总是有形无形地出现在战后历次苏美会晤中。这些会晤涉及到北约集团的政策，涉及到已经走上重新武装道路的西德的形势等问题。

苏联始终认为，美国在西欧国家领土上的部队和基地是与和平利益相抵触的一个因素。所以，肯尼迪的思想自然就引起了苏联领导的注意。

然而，没过几天，凶手的子弹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一切。肯尼迪不复存在了。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到，肯尼迪的思想同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讲的话形成了某种呼应：

“美国为维护和平将采取一切明智的措施，但并不是以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的欧洲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代价。因此，美国的占领时间是比较短的。”

但是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不论是肯尼迪以前或以后的各届政府，都不愿意花费时间来讨论美国在欧洲，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地和驻扎的军队问题。

我把约翰·肯尼迪关于削减驻欧美军可能性的想法报告了尼·谢·赫鲁晓夫。他一下就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并说：

“如果总统有力量实现这个想法的话，那他就为欧洲、为全世界、为美国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好，我们先看看再说。”

他的这番话是正确的。

第一次战斗

外交官也常有激烈的战斗：苏联就已经为禁止核武器，为把它列为非法而战斗了许多年。

不应该使人类忘记，是谁第一个使用这种武器杀人的。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洗刷不掉犯下这一罪行的人身上的污点。

无论是在整个裁军问题上，还是在有关核武器的问题上，我们采取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是有原则的。世界各国人民清楚地记得：战火刚刚扑灭，苏联就第一个呼吁反对这种武器，要求加以禁止。

还在那时苏维埃国家就宣布，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是人类良心所不容的。苏联建议缔结一项关于永远禁止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国际公约，使之只用于和平的目的。这是我国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我奉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提出上述建议。

我当时代表苏联宣布：

“目前的情况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最初被物化为某种武器——原子弹。尽管原子能的这种用途是迄今唯一的、实际上已广为人知的使用方法，但是人类很快就将广泛和平利用原子能，以造福人民……这个发现的用途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用于生产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另一种是用它来造福人类。极其反常的情况是，人们对第一种用途研究得较深，掌握得较熟练。而第二种用途实际上还鲜为人知。但是，这种状况不仅没有降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的意义，相反，倒更加突出了这些任务的重要性。”

我代表苏维埃国家讲的以下的话给听众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原子能使用方法的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只属于一个国家……它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许多国家的财富……作为对这些一般原则的进一步补充，我现在受政府委托提出一些

具体建议，供委员会审议：

“1. 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

“2. 禁止生产和存放以使用原子能为基础的武器；

“3. 在3个月内销毁一切储藏的已制成的和尚未制成的原子武器……”

联合国所属的原子能委员会对苏联建议进行了讨论，该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包括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代表。委员会的核心自然就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五大国的代表。

所有与会者都激动兴奋地等待着，下一步将会怎样呢？下一步是苏联建议遭到了当时垄断着核武器的美国官方人士的敌视。我们一再证明，垄断是暂时的现象，而关于禁止核武器的协议将从各国军火库中永远排除这一武器。

国务活动家、外交官们当时费了不少笔墨和口舌。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些国家极力要保住核武器，确立美国的垄断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努力争取永远禁止这一武器。因此，协议未能达成。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咎于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拒绝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巴鲁克^①及其“计划”

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②工作期间，我们很自然地要经

^① 美国财政家，总统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9年在凡尔赛和会上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译者

^② 根据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加拿大的建议，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决议成立该委员会。参加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以及加拿大。1949年委员会解散。——译者

常同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打交道。他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一方面是由于人们都认为他是颇有声望和众所周知的商界巨头，同时也是由于他谙知华盛顿的官方体制。那时，这位同美国垄断组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富翁已年届75岁高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鲁克就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经济独裁者”的绰号。当然，那些称他为“独裁者”的人，编造这种绰号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确是颇有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总统的军事经济顾问。只需同他谈上一次，就能确信，他不仅了解国家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而且也深知其内在的缘由。他一向把考虑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且认为，这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

由于他向来信心十足，因此，他能经常出入于最高权力阶层，并得到本阶级的鼎力支持。他提出的建议帮助罗斯福政府找到了大商人的利益同战时需要趋于协调的合力。

我第一次见到巴鲁克是1941年在华盛顿。当时美国的青年们还在伺机观望——美国尚未参战。在这次会晤中，他对苏联表示了友好态度。当时，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而是出于对法西斯的反感。巴鲁克是持反法西斯态度的。他曾坚定地说过：

“美国和英国应该履行自己的盟国义务，开辟第二战场，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向总统做了汇报。”

应当考虑到，在那时，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在美国国家机器中身居要职的人，并不都敢谈论第二战场的问题。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为我同巴鲁克的会见提供

了官方的依据，因为我俩都被任命为本国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表。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促使巴鲁克接受这一丝毫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誉的职务。他积极维护华盛顿提出的、而苏联却无法接受的建议，这一建议被美国新闻界称为“巴鲁克计划^①”，虽然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五角大楼计划”。这一建议的实质在于保持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地位。根据这项建议做出的安排，我国以及全世界就只能寄希望于华盛顿，并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安危交托给华盛顿了。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美国的计划规定，要建立一个监督原子能使用的国际机构。然而，提出实行国际监督的建议就是为了要使人迷惑不解。实际上，华盛顿毫不隐讳地宣称，它要在这一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掌握有关生产和保存裂变材料等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并借口有必要进行国际监督来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不言而喻，这样的监督和核查用于核武器是不现实的。苏联不会接受这种意味着严重侵犯其国家主权、危害其国家安全利益的计划。

巴鲁克是否意识到美国提出的是无理要求，我不想妄加评论。不过，他很认真地听取了苏联方面所做的解释和提出的论据。但是，当他开始阐述并论证官方立场的时候，人们往往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同世界其他国

^① 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巴鲁克提出一份综合计划，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要把对原子能和原子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国际组织，以防核扩散；所有国家都不得制造核武器，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俟该组织成立，即销毁所有核武器。——译者

家一样，应当完全信赖美国的“道德威望”及其爱好和平的愿望。

即使巴鲁克这两者全都相信，那么，如果他活到今天，当他听到华盛顿目前发表的关于美国有权对苏联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言论之后，又会说些什么呢？要知道，这正是他当年在原子能委员会里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所发表的言论。

在具备象巴鲁克这样的气质和影响的人们的头脑中已深深地灌输了一种荒唐思想，即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是绝对正确的。这种荒唐思想不但过去在美国曾盛行一时，而且至今也依然被推崇备至。

古往今来，在真理和欺诈的斗争中，真理迟早会取胜。这已成为公认之理。它完全适用于核武器问题。难道没有听到，今天有千百万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反对核战争，要求限制、削减直至销毁核武器的呼声吗？尽管受欺骗政治蒙蔽的人依然为数不少。

美国方面大肆吹捧的“巴鲁克计划”最终竟是一个死胎。这是必然的，因为计划的内容及目标早就注定它会失败。

巴鲁克本人可能主观上认为，他维护了一件大好事。但这仍不能洗刷掉他身上的污点，即由于他坚持捍卫这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计划，而使自己被污点所“美化”。

与百万富翁的最后一次握手

在苏联和美国就核武器都发表了不同意见后，巴鲁克继续坚持必须制止德国法西斯复活的立场。他赞成波茨坦会议

通过的决议，并主张将这些决议贯彻执行，在同我进行的谈话中，他多次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

“从德国土地上不应再爆发侵略战争了。”

巴鲁克一贯支持最坚决地铲除德国法西斯的措施。几年以后，当他已不再担任官方正式职务时，他仍坚持上述观点。

巴鲁克已经80多岁了，他在纽约的一所面朝市中心公园的别墅中消磨余生。关于这座别墅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

“瞧，这就是那位聪明人巴鲁克的家。”

后来，我也曾有过机会同巴鲁克交谈。每一次交谈总是他主动建议的（在苏联代表团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有一次会见就安排在他的别墅里。参加会见的有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阿·索博列夫和主人的儿子，也是位实业家。

在谈话中，巴鲁克基本上是回忆同他那计划有关的事情。他对自己这一计划遭受的挫折甚至说了几句略带讽刺的话。而我们作为他的客人，也体谅了主人。但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他对杜鲁门执政期间认为美国所持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表示了怀疑。

最后，我问他：

“巴鲁克先生，从1946年我们那次争吵到现在，已差不多有15年了。您今天是如何评价您曾经捍卫的东西呢？”

他回答说：

“今天我所坚持的已经远非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那个计划的全部了。”

“不是全部了”……他说的这句话已经包括了不少的含义。

我和索博列夫都不愿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了。

他在谈话中抱怨说：

“今天的美国人开始体验到物价猛涨的苦头：甚至同战争时期比较，许多生活日用品的价格已经涨到惊人的程度，只有鬼才知道是多少。”

真怪，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百万富翁居然抱怨起物价的飞涨！但情况确实如此。他牢骚满腹地说：

“高昂的物价也影响到了我。例如，现在要雇一位家庭女仆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为了找一位新的巴特列尔^①，我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要摆脱我那龟儿子，他开始偷喝家里储藏的葡萄酒了。”

我和阿·阿·索博列夫对这位大富翁的这些苦衷只能报以嘲笑。他的儿子以一种似乎是乞求的目光望着他的父亲，但始终没敢当面阻止他。

我和巴鲁克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会见过两三次。我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时，刚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就摆出拳击运动员的姿态。我俩立刻就彼此明白了，他用这一有趣的姿式是想提醒我1946年在纽约举行的规模空前的拳击比赛。顺便说一下，我和巴鲁克一直把这场比赛的参加者——世界冠军乔·路易斯视为苏联的朋友。当时是巴鲁克邀请我们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们前去观看这场比赛的。

在谈话时，他态度友好，赞成发展苏美关系，坚决谴责敌视苏联的各种言论。临走前，他问我：

“葛罗米柯先生，您读过我写的题为《我是怎样成为百

① 在美国是这样称呼管家的。——作者

万富翁的？》这本书吗？不久前，我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本书给您寄到莫斯科去了。”

我答道：

“书我已经收到了，差不多读完了。”

“怎么样？”他立即颇有兴趣地问我，“您对这本书有什么意见？”

我开玩笑地说：

“我曾试图按书中的忠告行事。但却一无所得。”

我俩就此又说了几句俏皮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起身告别，握手互道再见。但却再也没有见到。

……伯纳德·巴鲁克去世了，享年95岁。

我熟悉的人物——爱因斯坦、
奥本海默^①、约里奥—居里^②

一切正直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会以各种方式反对让核武器这一出笼的妖魔鬼怪成为导致浩劫的起因。早在广岛事件发生前，很多人就看出了其巨大的危险性，其中有些人还与生产这种武器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禁止这一武器的要求得到了这样一些杰出科学家的支持，象艾伯特·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弗雷德

① 美国物理学家。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制造工作（1943—1945）。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主席（1946—1952）。1953年被指控为“不忠诚”，不准接触机密情报。——译者

② 法共中央委员。原子能委员会创建人及第一任领导者（1946—1950）。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任主席。——译者

里克·约里奥—居里。

1939年初，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在法国与在美国工作的匈牙利人利奥·西拉德^①和意大利人恩里科·费密^②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特定条件下能引起铀的原子核裂变的连锁反应，它将伴之以具有可怕能量的爆炸。

科学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法西斯德国在得出相同的结论后，也能制造核武器。结果上述猜想被证实了：纳粹分子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就禁止把在雅希莫夫开采的铀矿产品输出国外。

此时，艾伯特·爱因斯坦已定居在美国。在20年代，相对论的创建人在柏林领导了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实际上这个组织就是当时的德国科学院。希特勒上台后，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伟大的物理学家移居到了美国。

1939年8月2日，西拉德说服了爱因斯坦在致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名。这封信谈到了约里奥—居里、费密和西拉德的研究成果，并呼吁美国当局对这些研究成果予以重视，因为它们为制造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能量的新式炸弹开辟了途径。当务之急是要超过希特勒。总统在信上批示：“立即执行！”

然后，他签上了日期：“1939年10月11日。”

但一直到1941年12月6日，白宫才通过决议在美国着手制造核武器。一些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所取得的成绩推动了

① 匈牙利物理学家，在德国和英国任职，1939年移居美国。1942年参加建造第一座核反应堆。赞成禁止核试验。——译者

② 意大利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和中子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意大利和美国学派创始人。他建成第一个核反应堆并最先实现链式核反应。1938年获诺贝尔奖。——译者

此事朝这一方向发展。1942年8月13日，美国的计划被称为“曼哈顿计划”^①。它将制造新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全部工作都联合起来。

为制造3枚核炸弹美国投资20亿美元。为此动员了15万人。还需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建造两座新城市。

然而，当设计接近完成时，1945年3月25日，爱因斯坦和西拉德再次上书美国总统。5年前，正是这些科学家说服了罗斯福制造原子弹，而现在他们却又试图利用自己的威望，来制止它们的使用。

……我同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会见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次会见是在纽约，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同我一起前去那里的还有苏联外交官弗·伊·巴济金（后来此人任苏联驻墨西哥大使），他那时在我们驻华盛顿使馆主管文化和科技交流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过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其中有一次是在著名的美国科学中心——普林斯顿城，那里有一所有名的大学，科学家移居美国后，就住在那里。

引人注目的是，在身材本来就矮小的科学家（由于年龄使他佝偻，因而显得更矮小了）的身旁还站着一位年轻人。而爱因斯坦在谈话时却好象旁若无人。

我们稍许寒暄后，我说：

“我很高兴能见到您本人。关于您的事我读到的和听到的都很多。非常欢迎您，并祝您，杰出的科学家，不断取得成绩。”

“谢谢。”爱因斯坦简短地回答道。

^① 美国陆军部在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一项旨在利用核裂变过程来制造超级炸弹的计划。整个工程定名为曼哈顿计划。——译者

当然，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核武器上，或者说，按当时的叫法，是原子弹。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原子弹的使用问题：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的硝烟还没有完全飘散。我问：

“近来，报刊上越来越多地登载了有关美国向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是：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一位能清醒地认识到核武器将给人类带来严重威胁的科学家。他明确清晰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话的声调不高，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正是他特有的。

“我告诉过罗斯福总统，”他说，“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可能会面临不幸。我的这个意见现在已广为人知。但这里的小伙子们并不十分清楚，今天我们所有人，包括美国人在内，所乘坐的这艘圆形航船正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伟大科学家所说的“小伙子们”是指那些应当就原子武器的最终命运发表自己见解的美国的政客们，而所说的“圆形航船”，显然是指我们的地球。

他还说：

“如果一切都取决于科学界的人士，那么，依我看，绝大多数美国科学家们都会赞同禁止这一可怕的武器。”

这时，他举出了几位科学家的名字。对我来说，其中只有一人的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劳伦斯……可不是么！我很熟悉他。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是一位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早在1939年，他由于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诺贝尔奖金。

爱因斯坦没有提到奥本海默，看来不是偶然的。因为他

曾是战时研制原子弹科研中心的领导人。至于劳伦斯，则我当时就说了，我认识他本人。

“在紧张的战争年代，”我补充说，“苏联科学院委托我这个大使授予他选举他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的证书。他当时专程从旧金山赶赴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他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领导着一个实验室。这一证书是我授予他的。我记得，劳伦斯还非常热忱地感谢了苏联科学家对他的科技成果的承认。”

在那次谈话中，爱因斯坦的另一句精辟的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如果我知道希特勒搞不出原子弹的话，我就不会支持美国的原子计划。”

直至今日，他的这句话仍萦绕在我的耳畔，虽然，他说话时的神态仍象平常那样地平静。

当我同这位伟大科学家会见时，他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这是年纪大的缘故，但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与他接近的人都承认，他经常被这样的思想所折磨着：人类制造出核武器并开始不断积累这种武器之后，究竟将走向何方。

奥本海默是一位美籍德裔，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优秀毕业生，但后来却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去继续研究物理，尔后是在德国的格丁根大学。回到美国后，年轻的教授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他的著作及科研成果使他在科学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这位学者在科学上取得最初成果后，就开始引起军方的注意。美国当局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专家，因而委任他来领导实现曼哈顿计划的规模庞大的科研

集体，其中包括从燃烧着战火的欧洲移居美国的外国侨民。

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作为“原子计划”科研中心的地址选择了新墨西哥州一片干旱地区的小村镇洛斯阿拉莫斯。还在青年时期，这位科学家曾前去那里医治过肺病。广岛原子弹爆炸前，曾有6000多人在绝密的状态下生活在那里。

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早在战前就闻名于世。他同自己的妻子伊雷娜于1834年发现了人工放射性现象。还是在战前，约里奥—居里就帮助将法国贮藏的全部重水——原子研究工艺中重要的成分，运往英国。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戴高乐任命他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①的领导人。

我同奥本海默和约里奥—居里见过不止一次，至今仍记得同他们谈话的情景。前者当时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担任伯纳德·巴鲁克的科学顾问的职务。后者也担任科学顾问的职务，只不过是在法国代表亚历山大·帕罗迪的手下。有时同我一起参加这些谈话的还有我们的两位科技顾问——科学院院士德·弗·斯科别利岑^②和教授谢·巴·亚历山德罗夫。

我们这些苏联代表在那时就已经知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奥本海默的名字早在我们见面前就已饮誉海外了，虽然他这位人物的才能只是后来才在其他物理学家中充分显示出来。

① 1945年成立的机构。法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创办人和第一任领导人是弗·约里奥—居里。——译者

② 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核和宇宙射线物理学学派创造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译者

无论是奥本海默，还是约里奥—居里都清楚地意识到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他们不赞成生产和贮备这一武器，对业已形成的局势忧心忡忡，并认为必须禁止核武器。在历次谈话中，他们都要谈到上述思想。

但他俩在讲话的口气上又稍有不同。奥本海默在阐述关于将核武器从武器库中销毁掉的思想时，尽量回避那些可以解释为直接违背美国政府官方立场的措词，虽然，他的讲话的内在含义已经不言自明了。而约里奥—居里在涉及西方大国的官方政策时，虽注意保持一定的分寸，但能比较坦率地对西方大国会谈参加者所持的官方立场表示自己的否定态度。法国科学家的这种勇敢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西方各国当局很快就开始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两位科学家了。尔后，那些与核武器难舍难分的人竟开始不客气地谴责起这两位科学家来。在对待奥本海默的态度上，这显得特别突出。在我同他的几次交谈中，给我的明显印象是，他言谈举止总是相当拘谨。看来，多年来对他进行不停的跟踪监视，已经留下一定的痕迹，使他在同外国人会晤时产生一种经常性的条件反射式的警觉。

不言而喻，奥本海默本人不会把这种情况直接告诉我们。不仅如此，他在委员会工作期间，还竭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看不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然而不能说，他自始至终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总的来说，他并非胆小之徒。恐怕以下的事实能作为一个例证：后来他对美国当局中那些将自己的政策同核武器密切相联的立场勇敢而公开地表明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相反的观点。在我同他的一次会谈中，他坚定地宣布：

“我明确地赞成无条件地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他的这些话是很有分量的。他是“曼哈顿计划”的积极制订者之一，本来早在此之前就可以发表上述意见的。他的意见在决定轰炸日本城市之前也会具有很大的分量。但当时，他没有这样说。而当他讲出了这些话的时候，原子弹已经“走下了流水线”。

美国当局因这位科学家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而向他进行报复。1953年，奥本海默被指控为“不忠诚”，不允许他接触机密情报。显然，这是政治迫害。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本海默在原子弹问世后所坚持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总统未来得及阐述的思想。在罗斯福时期任职的一些国务活动家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后，这一点就真相大白了。

1949年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后，我只见过奥本海默一次，而且是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下见到的。这发生在1959年的华盛顿，在安葬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时候。我同当时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同事们，一起赶赴美国首都。在从教堂到阿林顿公墓的路途中，还在市区，一辆里面坐着奥本海默的汽车与我的座车并排行驶。他放慢了车速，挥了挥手，向我问好。我也以同样方式问候了他。在墓地我未见到他，他很可能就没到那里去。

奥本海默以及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当时在美国经历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他们被首先来自官方的华盛顿方面的一种敌视和侮辱的气氛所包围。

1950年3月19日约里奥—居里第一个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这份呼吁书中提到：“我们要求无条件地禁止核武器——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仅半年就有5亿人在呼吁书上签名。

伟大科学家后来的生活景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皮杜尔^①政府解除了他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的职务，他担任这一职务已达4年之久。禁止他参加法国某重要科研中心的工作，在此之前是他亲自在那里使法国第一台国产核反应堆开始运转。

此后约里奥—居里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了反对核武器、反对发动新战争的斗争，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当年那些西方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在他们权威性的发言中，提出要求永远禁止核武器——和当今生活在东西南北世界各地的科学界代表人士之间似乎维系着一座无形的桥梁。这些科学家们都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核武器应宣布为非法，应予以销毁，而原子核能只应用于和平目的。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在日益增多。他们在这场理智同疯狂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我坚信，谁也无法为美国的那些当权者所执行的拒绝禁止核武器的方针进行辩解。对于他们来说，统治世界的欲望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超过了那种认为必须从各国武器库中排除核武器的认识。

有人企图证实，好象美国方面从来就没有利用核武器的

^① 法国前总理，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译者

不良意图，这是完全徒劳的。在华盛顿还有些人，有时甚至是最级别的人士发表过一些言论，他们声称，似乎美国一度垄断了原子弹之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本来就可以迫使苏联接受他们的条件，但美国没有那样做是出于高尚的道德上的考虑。

我想建议那些乐于引用类似论据的人士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一下当年发生的事件是很合适的：例如，如果苏联不忠诚于自己的伙伴，不忠实于自己的盟国义务，那么在法西斯德国已经屈膝投降，而刚刚打断希特勒帝国的脊骨的强大的苏联军队能够向前推进多远呢？

试问，为什么那些今天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士要把谎话（即使是这种谎话已经过精心的伪装）当成真理并呈献于世人面前呢？

有利可图的生意……

苏联需要经常地了解，在那些曾同我们结盟的西方各国国内的风向如何。如果已经十分明显，风向暂时偏离裁军的方向，那么苏联代表就要不止一次地以本国名义劝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裁军问题应当引起东方和西方同样的关注。

战时，不论是罗斯福政府还是英国政府，根本就无意讨论上述问题的未来前景。当时，这或许还能理解，因为正在进行战争，主要任务是争取胜利。但在战争结束后，在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及联合国成立以后，西方实际上不愿意在裁军问题上采取任何措施，自然也

就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当然，西方各国一些身负重任的代表们有时也不反对讨论一下关于寻求削减武器和实行裁军途径的好处。然而，他们的这些谈话通常不过是一些华丽的词藻。事情仅限于设法把这一问题随便打发到某个委员会那里去，而在那些委员会里又总会有各种各样吹毛求疵的人会乐于把任何一项建设性的建议给埋葬掉。

有时美国和英国一些较为显赫的人物也会愿意就裁军问题高谈阔论一番，有时甚至会谈到裁军的好处。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把苏联提出的一切都一概加以拒绝。杜勒斯、史塔生、史蒂文森、巴鲁克都不止一次地登台表演。但实际上，他们对任何现实的裁军建议均持否定态度。

我同杜勒斯单就裁军问题进行过两次很有特色的谈话。一次是在旧金山，当时会议已进入尾声，联合国宪章实际上已经制定完毕。杜勒斯当时是美国代表团的非官方顾问，他对苏联武装力量发生了兴趣。他问我：

“葛罗米柯先生，请您告诉我，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是否还要继续长期保持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呢？”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美国曾竭力敦促苏联要在这场战争中给予它援助。

我回答说：

“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解决。但今天谈论此事为时尚早。”

而我也问杜勒斯：

“您是怎么看的：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美国将如何对待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的武装力量呢？”

杜勒斯回答说：

“我想事先说明一下，在杜鲁门政府内我现在不担任正式职务，所以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我认为，位于太平洋列岛上的以及位于日本本岛上的作战基地都应由美国军队来控制——我相信，日本将被打败。”

关于欧洲、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武装力量、海军人数问题，他全都避开不谈。

当时，他的这番议论好象是由于谈论了裁军问题，因而就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战后的年代。

此后不久，他就担任了国务卿这一关键性的职务。他上任后实际上是把自己原来阐述的思想变成官方的外交政策的语言。在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在裁军问题上的政策异常僵硬，凡是能有效地促进裁军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促成其解决的任何步骤全都被拒之于门外。

杜勒斯式的破坏精神在美国的裁军问题立场上至今仍阴魂未散。培植这种精神的土壤依然存在，当年杜勒斯的那些陈旧观念赖以滋长的也正是这同一土壤。至少在10—15年的时间里，美国对裁军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所持的几乎是一种轻视的态度。美国立场的实质，甚至美国代表参加相应讨论时采取的手法和参与这种讨论的方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华盛顿的代表们从未因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积聚储存而对国际局势表示过担忧。他们发表的言论全都是千篇一律的调子，其中充满了大量别有用心的宣传和对苏联杜撰的谎言。这些言论只不过更加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销毁核武器，美国早先就没有什么兴趣。而现

在华盛顿居然企图推翻那些在尼克松和卡特总统任期内双方得以达成的有关部分限制武器的协议。

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裁军问题并不属于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尖锐程度会趋于减弱的问题。它将逐渐产生更多新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有些资产阶级人士企图为他们信奉的军备竞赛政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硬说，人类无力摆脱因军备竞赛而造成的恶性循环，说这种竞赛在本世纪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类似的论调，其中包括英国代表的。四国外长在巴黎的玫瑰宫举行过会谈，英国代表当时曾发表过这种论调。他的发言使人觉得，甚至玫瑰宫的墙壁也会因此而感到脸红羞愧的。

在那次会谈中，昔日的英国官方代表塞尔温·劳埃德以保守党政府的名义宣布：

“将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的路线是有害的。战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人类天性的产物。”

当然，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甚至第三帝国里大概也会有人对塞尔温·劳埃德的英勇气概羡慕不已，他力图把那些主张军备竞赛并寄希望于核武器的人的哲学思想简明地表现出来。

这种“科学的”推断极其荒谬。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帝国主义企图把它们一手制造出的现象说成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

国际事务中的黩武主义是那些把军备竞赛视为能获得超额利润生意的人所执行的政策的产物。这早已是公认的定理。在谈到资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榨取高额利润时，卡尔·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英国政论家托·约·登宁的一段话：“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开始明白，同各国人民生命攸关的利益相比，军工生意追求暴利的狭隘利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人类的理智坚决反对把科学家的天才、工人的高超技艺、巨大的物质财富继续消耗在生产破坏和屠杀人类的武器上。各国人民有权要求结束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苏联一贯坚持不懈地号召一切珍惜和平的人们起来制止军备竞赛并要求实行裁军。

在西方，现在有不少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说，他们不喜欢我国在裁军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建设性倡议。然而，请问，为什么苏联就不应该提出这些倡议呢？我们引以自豪的正是因为这些倡议既反映了苏联人的心声，又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现在就要看西方各国的政府怎么办了。

与 白 宫 通 话

在60和70年代能够签定一系列限制军备竞赛，其中包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2卷，第265页。——译者

核军备竞赛的条约和协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在这之前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就是一项重大成果。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由我这个苏联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霍姆共同签署了这一条约。同年10月10日在该条约最早的三个参加国互换批准书后即告生效。

条约签定之前，1963年7月在莫斯科还举行了谈判。当时除了苏联部长外，参加谈判的美国方面代表是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而英国方面代表是科学大臣赫尔什姆勋爵。

在这次谈判中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拟订条约草案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仍有一个障碍一直阻挠着各方最终达成协议。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任何缔约国可以有合法的权利自愿退出该条约。

苏联建议，各缔约国为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如断定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有权退出条约^①。换言之，这样的措词就防止了某些人可能随意利用一切与条约无关的理由来设法退出，因而也就是破坏该条约。苏联的建议说明，我们关心的是要使将来的条约不是个暂时现象，而是国际生活中一个重要而持久的因素。

从哈里曼和赫尔什姆勋爵最初的反应来看，他俩对这样提出问题都毫无准备。不错，英国代表很快就得知伦敦方面原则上同意接受我国建议。然而美国代表却一直不赞成，借口说，他不能违背肯尼迪总统不许他这样做的指示。

^① 参见《国际条约集》(1963—1965)，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6—208页。

在休会期间，我建议哈里曼拿起电话（电话就在隔壁房间），并从位于阿·托尔斯泰大街上的苏联外交部别墅里直接打个电话给肯尼迪总统。当时，向美国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

“当前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议，因而最终商定条约文本的工作拖延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向总统本人紧急汇报此事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不会不理解这一正确行动的。”

哈里曼是理当称赞的，他接受了这个劝告并立即同白宫通了电话。肯尼迪马上指示他接受苏联的提议。

复会时，三国代表团都表示赞成苏方提出的条约中关于退出该条约的条件，即条约第四条的文字。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条约文本就草签^①完毕，于是谈判宣告顺利结束。

看起来，哈里曼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给总统打了个电话，汇报了问题的实质并得到了答复。但如果在他这个位置上是另一个人，一个影响和经验都有限的人，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而是与华盛顿通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还会组织一大批专家、法学家来研究一切“利”与“弊”，而且这种集体创作会导致一种什么意见，那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哈里曼——商人兼外交官

是的，艾夫里尔·哈里曼毫无疑问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

^① 在正式签定条约前有时实行的一种程序。草签时授权人在双方商定的草案文本的每一页上只签署自己的名字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这一程序表明，双方已商定条约的草案文本。——原编者

一位显赫人物，他能平步青云的跳板是由于他代表了美国大资本家中愿意以求实的态度来同苏联进行交往的那个阶层。

每一个美国的成年人都知道哈里曼的名字。著名的铁路资本巨头的家族都是这个姓。在美国恐怕很少人没有乘过火车沿着哈里曼的铁路或者从东向西，或是从西向东行驶过的，而这条铁路就是哈里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家业。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为一个富商就必需有一种勇气，而老一辈的哈里曼就具有这种勇气。在进行大笔交易的时候，他们往往要挺起胸膛，承受命运的打击，并坚定不移地迈步前进以迎接幸运女神的召唤。他们终于跻身于那些在本国经济中已彻底扎根的人们的行列。在继承了这笔可观的财产之后，艾夫里尔·哈里曼建立了一个至今仍对银行、铁路、冶金以及其他经济部门有很大影响的财团。

年轻的哈里曼在政治上并无多大野心。凡是熟知其经历的人在这一点上均持一致的观点：除了生意，还是生意，并且首先是铁路生意——这就是这位非凡人物擅长和喜好的事业。

哈里曼步入政治舞台仅仅是在30年代罗斯福当政的时候。美国政府中有一部分人，遵照白宫主人的意愿，选拔一些突出的和能干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实业界的这样一些代表人物，以便吸引他们同政府合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某种“智囊托拉斯”（这是从实业界人士的语汇中借用过来的非正式名称），该托拉斯集中了私人资本的代表、法学家和科学家。政府和总统本人都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

哈里曼虽未直接参加这个“托拉斯”，但在1933年—1940年期间他担任了一系列政府部门中的职务，包括任总统的工

业和财政顾问。

后来战争爆发了。由于局势合乎逻辑的发展，美国也卷进了这场战争。生活本身要求，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人选应当是一位有影响的，并且最好是实业界做大生意的人。

罗斯福是知道的，苏联领导人并不很欣赏战争初期在莫斯科工作的施泰因加特大使。他发往华盛顿的那些惊慌不安的报告，说什么苏联首都抵挡不住希特勒军队的进攻，苏联战线已开始崩溃，已经广为人知。就连他本人也不想为自己辩解。接替施泰因加特的是威廉·斯坦德利大使。他在莫斯科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儿（1942年4月—1943年9月），也未有多大的建树。

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哈里曼。当时，政府已开始委派他去完成过几次政治使命。例如，1941年3月他被任命为总统驻英国的特别代表以实施租借法案^①，而同年9月底，他又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的三国会议以讨论相互间的军火供应问题。

关于哈里曼有不少著述和传闻。但我却想向读者谈一下我个人对哈里曼的印象，因为我同他相识已经40多年。

哈里曼对于提议由他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甚为激动。他并不想对此保守什么重大机密。就连我这个刚到华盛顿不久的人也知道了这一情况。哈里曼惯于做大事：做生意，那就做大笔生意；搞政治，那就要搞大政治；如果要去国外工作，那就要到一个大国去。顺便说一句，早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年代，哈里曼就在高加索的恰图拉的锰矿产区获得了租让权。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反希特勒的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一种制度。——译者

哈里曼第一次来到苏联驻华盛顿使馆，是在他的新的任命已经预先决定之后。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他对苏联人民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备加赞扬，并强调指出：

“美国人民对苏联红军在广阔战线的各个地区取得胜利的消息都感到欢欣鼓舞。”

哈里曼还意识到，美国和苏联必须找到共同语言，直到最后粉碎法西斯德国。

1943年10月，哈里曼作为大使抵达莫斯科。他的女儿随同一起来到苏联的首都。苏联领导人接见这位新的美国大使相当频繁。有时，他带着罗斯福的信件前去会见斯大林，这有助于加强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官方接触。

哈里曼在做生意时总要碰到一些问题，如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他所积累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他从事的外交工作。驻华盛顿的几位苏联大使乌曼斯基，李维诺夫，尔后是我都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哈里曼进行谈话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善于认真地倾听别人讲话，避免引用一些千篇一律的话语。他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但事先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总而言之，哈里曼给苏联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称职的大国代表。

1946年初，根据本人要求，哈里曼从莫斯科调往伦敦担任大使。接替他担任驻苏大使的是沃尔特·史密斯。

此时，哈里曼对华盛顿政策的影响已远非罗斯福时期可比了。然而，战后美国民主党的几届总统有时也常请哈里曼协助完成一些重大的政治使命。哈里曼还担任过商业部长。后来，他担任过总统国际问题特别助理，美国副国务卿。

在“冷战”时期，哈里曼有时也发表一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讲话。然而，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即：在和平的条件下，美国和苏联应当坐到谈判桌旁，为解决争端问题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办法。哈里曼对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中所阐述的敌视苏联的路线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对此毫不讳言。他对苏美关系和国际政治问题的清醒的见解在美国总是有一定分量的。

直到最后的日子，哈里曼始终不渝地支持各国和平共处，谴责华盛顿在对苏政策上种种敌对的表现，认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表诬蔑性的言论是不可取的。他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此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表演讲，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哈里曼还把在莫斯科就签定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成功地进行谈判，以及自己参加这次谈判的经验作为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来加以引用。

在他自己撰写的题为《变动世界中的美苏关系》一书中，哈里曼写道：“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本届政府倾向于以过分怀疑的态度对待俄国人——至少是那种不正确的怀疑态度……”^①

他的这番话是针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说的，而对以后的几届政府来说，这些话就有更加充分的根据了。

正当我把自己关于哈里曼及其在政治上的作用的回忆记录在案的时候，传来了他不幸逝世的噩耗。我难以相信，他已不在人世了，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柔和的声音了。艾夫里尔·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译者

哈里曼的声音曾向他的所有听众们传达过这样一个清醒的论断，那就是：美国和苏联必须和平相处，而且只能是和平相处。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上的别墅

前面既然提到了谈判，那我想就离开题目介绍一点儿或许会使读者感兴趣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的苏联外交部别墅里通常举行各种双边和多边的会晤和谈判，草签和正式签署各种重要协议、条约以及其他国际性的文件。

每个负责组织某一会晤的国家，一般都极力为这些会晤创造良好的气氛，为参加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条件。在这方面选择合适的会址也是重要的，是的，甚至这一心理因素有时也起作用。

上面所谈的别墅以及别墅所在的地段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814年就在这个地方，为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寓言作家、俄国科学院院士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①建造了一幢古典风格的漂亮的房子。

后来这幢位于斯皮里多诺夫大街上（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的旧称）的德米特里耶夫的房子成了莫斯科的“文学俱乐部”。阿·谢·普希金、叶·奥·巴拉丁斯基^②、瓦·安·茹科夫斯基^③、康·尼·巴丘什科夫^④、彼·安·维亚

① 俄罗斯诗人、伤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哀诗、讽刺诗、民歌体歌谣、寓言和叙事歌谣等。——译者

② 俄国诗人。诗作凄楚哀惋。心理描写深刻、富于哲理。——译者

③ 俄国诗人，早期属伤感主义，后来成为俄罗斯浪漫主义创始人之一。——译者

④ 俄国诗人，俄国阿那克里翁诗体抒情诗的倡导者。——译者

泽姆斯基^①、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英雄、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②都曾在这里朗诵过自己的诗歌。对于每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来说，甚至列举一下俄罗斯诗歌的卓越代表人物就能说明许多问题。

后来这座庄园归属阿克萨科夫家所有。1893年，又被位于奥列霍沃—祖耶沃^③的尼科尔斯克纺织工场厂主莫罗佐夫^④家买去。

这个家庭的代表之一萨瓦·季莫费耶维奇·莫罗佐夫是革命前俄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萨瓦·莫罗佐夫智慧超群、兴趣广泛，他同自己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过往甚密。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⑤在斯皮里多诺夫大街莫罗佐夫的别墅里给朋友们朗诵自己还未出版的小说《红笑》^⑥。莫罗佐夫同安·巴·契诃夫、阿·马·高尔基以及弗·伊·列宁本人也熟悉的艺术剧院演员、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马·费·安德烈耶娃是好朋友。

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不止一次地向莫罗佐夫借钱，以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需，而莫罗佐夫总是有求必应。他对党的帮助还不止这些。他为需要找工作的党员提供工作。一旦需要，就帮助他们逃避警察的搜捕。其中，著名的革命家尼

① 公爵，俄国诗人、文艺评论家。——译者

② 卫国战争中任骠骑兵团长和游击队长。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交往甚密。

——译者

③ 苏联城市（1917年设市），位于莫斯科州克利亚济马河畔。——译者

④ 俄国资本家，纺织企业主。——译者

⑤ 俄罗斯作家，同情革命派。——译者

⑥ 中篇小说《红笑》（1904年创作）揭露日俄战争的残酷，反对一切战争。

——译者

古拉·鲍曼^①就得到过他的帮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把别墅建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别墅的正面是英国哥特式的风格。经过过厅就是明亮的前厅，接下去是用大理石镶嵌的白色圆柱大厅、饰有画家博加耶夫斯基^②创作的壁画的大客厅，再往后是用弗鲁别利^③的作品装饰的小客厅。前厅的另一边是正门楼梯的平台，那里装饰有弗鲁别利的玻璃画和群雕，另外还有一个餐厅，厅内有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壁炉和19世纪的巨大枝型吊灯。

不能不令人惊叹的是，建筑师们显示了无穷的想象力并在建筑装饰方面做了全面周到的，甚至细致入微的考虑；他们为每一个房间都仔细地设计和实施了各具特色的方案。

这幢别墅可以说经的多，见的广，它也能做不久前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见证人。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在这里召开了有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战争期间相互提供军备的问题。

同年10月的下半月，在这幢别墅里又举行了有苏联、美国 and 英国三国外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会上研究了由于战争形势而产生的几个问题。

在这幢别墅里还不时地举行各种最高级别的活动。1944年10月10日，斯大林为前来苏联访问的丘吉尔在这里举行了早宴。同年12月3日，也是在这里，以斯大林的名义为欢迎夏尔·戴高乐举行了早宴。

① 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化名格拉奇，1905年被敌人杀害。——译者

② 苏联画家，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家。——译者

③ 俄国画家，画风接近“现代派”。——译者

1945年5月3日，苏联政府为庆祝打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在这幢别墅里举行了外交招待会，会上充满了欢腾喜悦的气氛以及对人类和平未来的美好希望。

我有幸同其他文职的和军界人士一起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会上没人发表讲话和祝酒词，但是从每个人的谈话中都能感到这一时刻的庄严和对伟大胜利的喜悦。整个气氛都使人产生这种情绪，似乎能听到那令人陶醉的美妙乐曲声。那些伟大的全民欢庆的美好日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战后的年代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上的这幢别墅经常被用来接待外国代表团。这幢身披节日盛装的别墅今天也时刻准备着接待前来谈判的朋友和对手。

其他协议

苏联所奉行的政策及其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1963年签订关于禁止在三个领域^①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之后又签署了一系列其他旨在限制军备竞赛的国际条约和协议。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条约和协定，它们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1967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②（1968年）；禁止在海洋床底及其底土部署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条约（1971年）。

我受权代表苏联签署了禁止研究、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

① 指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译者

② 也叫防止核扩散条约。——译者

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1972年），它实际上是国际关系史上裁军方面的第一个实际的行动，还签署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利用影响自然环境的手段的公约（1977年）。

苏美下列双边协定占有重要的地位：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1972年）及其议定书（1974年），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又称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公约（1972年）。

了解美国情况的人看到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令人惊奇的荒谬现象，不止一次地感到震惊。

这同样涉及华盛顿在与裁军有关的对外事务中的行为。经过多年艰苦的谈判之后，双方准备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毫无疑问，谈判双方的参加者都认为这是一个成就，而且是苏联和美国的共同成就。

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是在吉米·卡特任总统时进行的。正是为了协商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不止一次地拜访过白宫当时的主人。

当时已商定，条约将在最高级别上签署。最后也确实是这样做了。

但是，事隔不久，就是这个卡特促使美利坚合众国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他对苏联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在阿富汗以及围绕阿富汗问题所形成的局势居然大为恼火。换句话说，由于美国政府不赞成苏联对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主解决内部事务的权力的阿富汗给予援助，美国就认为不能批准在维也纳签署的这个条约。

这是一种通向死胡同的政策。因为如果奉行这种政策，那么，就无法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不管是卡特还是他的继承人，过去和现在都清楚，这种立场的全部哲学都是虚伪的。但是，他们需要利用这一哲学来欺骗公众舆论，以掩盖华盛顿在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上背信弃义的真正原因。

至于说似乎阿富汗事件是使国际形势恶化的原因，那么，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问题在于，构成美国对苏新态度的基础，实际上向“冷战”倒退的美国政府的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在阿富汗事件之前，而不是在这以后做出的。

北约关于在15年内每年增加军事预算的决议也是如此，它是1978年5月通过的。1979年12月，美国总统提出的关于在5年内使美国的军事潜力达到最高水平的决议与它们同出一辙。这也包括北约作出的十分危险的“补充军备”决议，即在欧洲部署美国新型中程核导弹的决议。这个决定也是1979年12月出笼的。同年12月以前已经很清楚，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美国的批准实际上已告吹。由此看来，1979年底发生的阿富汗事件与此毫无关系。它只不过是华盛顿用来遮盖赤裸裸的军备竞赛政策的一块遮羞布。

人们不禁要问，卡特那番充满激情的讲话又有什么价值呢？要知道，当年为了协商该条约的最后细节，他在白宫同我会谈时曾对本书作者信誓旦旦地说：

“美国赋予这一条约极大的意义，这个条约应该签署。美国坚持这一主张。”

自然，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例子再次表明，华盛顿在国际协定上的签字是非常廉价的。

倒 退

后来，当里根上台后，局势就更加复杂化了。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针的决策圈子中，军国主义势力占了上风。

在美国当局强加给北约集团的决议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些忠于这条路线的人们的信条。华盛顿政策的宗旨是夺取军事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去确立控制权。

美国和北约武库中的武器似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但是，他们仍然发疯似地通过一个又一个耗资数十亿的军备计划。生产武器的传送带也运转得越来越快。武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增加或者在更新换代。军备竞赛中一个新的极其危险的方针正在酝酿和实施中，即将军备竞赛扩散到太空去。

为了使世界军事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他们以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利益作为借口。但是，在解释这些利益时，却竭力颠倒是非，以致于在实际上使他们的利益同其他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全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在美国和北约加紧军备竞赛和推行“实力”政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安全，还是民族安全都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这种政策同保障国际安全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在古代和现代历史中，都有不少人觊觎最强者的地位并力图操纵世界事务。但人所共知，他们落得了什么下场。

现代人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了另外一种现实的关于应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和安全的观念。这

就是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不使用武力，以及国与国之间进行和平合作。只有在这样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和平。

人类早已跨过了那条界线，继续储存和完善核武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在当今的条件下，谁打算冲到前面，取得军事优势，那是毫无希望的。指望在核战争中取胜，无论是提出什么样的作战理论，是进行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战争还是持久战争，都只能是一种幻想。

世界知名的学者、军界和民界造诣很高的专家都异口同声地对此做了权威性的说明，当然，那些丧失了或者生来就没有廉耻和良心的人又当别论。

在核时代，必须具有符合时代现实的政治思维。在那些至今诸如“武力”、“威慑”、“优势”的思想还占上风的地方，必须让“不使用武力”、“信任”、“平等”和“同等安全”的观念来取而代之以。

其实，为了就限制核武器谋求达成协议，卡特也曾表现出某种灵活性。不久以前，当他还是白宫主人时，他说的一些话值得现在一提。

我受权去见他就有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的最后几个问题进行磋商。会谈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参加会谈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阿·费·多勃雷宁。会谈结束时，我对卡特说：

“我们现在同美国谈判，暂时还未将英国和法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考虑在内。但是，必须考虑它的时刻日益临近了，因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国。”

卡特答道：

“我完全清楚，您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想过很多。但是，我承认，关于能否找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我尚无肯定的结论。”

这一表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代表们对必须把英法两国的核武器考虑在内，以便遵守平等原则这类话，连听都不想听。

如果今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拍一张反映美国及其同盟国在我们的星球上发展军备的规模的照片，那么，观察到的景象将使每一个客观看待问题的人触目惊心：密密层层导弹、战略轰炸机。海洋上的大队战舰。遍布各地的数百个军事基地，大量积聚的各类武器。

人们可能说：你们苏联在陆地、空中、水上和水下也都有武器。我们的回答是：

“是的，有，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国是被迫采取对应的措施。这样做正是为了回击，并且只限于保卫我国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利益所需的数量。我们从来都未追求过优势，主张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保持军事平衡。

华盛顿按照自己的方针，企图贬低现有的，并阻碍达成新的苏美关于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的协议。

在同现在美国当局的代表会晤时，我不止一次地代表苏联对华盛顿进行有根据的指责：

“怎么回事呢？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执政时，尽管有困难，并且是不小的困难，但是在我国两大国之间还是签署了几个极其重要的协议。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当局不愿意达成协议呢？”

华盛顿所奉行的导致世界战争危险增长的方针甚至引起了其北约盟国的不安。其中，有些国家直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西方各国各阶层居民中的不安情绪在加剧，反战运动的浪潮已经持续多年，连在美国也是如此。

这一切使大洋彼岸的人不能不加以考虑。从那里传出许多愿意同莫斯科进行对话的保证。

华盛顿的弥天大谎

不久以前，人们不是还怀着虔敬的心情想到宇宙苍穹吗？要知道，从童年起，在人们的意识中有一种信念就扎了根，认为那是最和平的地方，那儿没有威胁。

忽然，有人却企图将科学的伟大发现，将利用自然规律，变成从太空屠杀地球上的生命的工具。人类的理智应该猛醒起来，反对这种企图，反对使生灵涂炭、使地球变成一个大坟墓的不人道的计划。所有的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不管其思想和宗教信仰如何，不管他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生活，都应该大声疾呼，人类的未来应该是生存，而不是核坟墓。

因此，苏联领导人决定就太空问题进行公开的对话，同时也讨论同美国开始新阶段的谈判问题。

1985年1月7—8日，我在日内瓦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会晤时讨论了谈判的内容、宗旨和太空问题。当时这一地区的天气是少见的寒冷。城市似乎因此变得静悄悄的。大街上的行人也显得十分稀少，这大概还因为当时根本不是旅游季节。

不过，在这变得寂静了的城市里，人们的共同情绪多少

也反映出他们对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的理解。似乎，城里的每一幢房屋、环绕日内瓦的丘陵和山脉都在期待着两个大国将要说些什么。

大批新闻记者从世界各国来到了日内瓦，他们总是不安静的。这些人简直是成群地守在苏联和美国代表处周围，因为在那里正在轮流举行会谈。

是的，对这些记者们可以理解。他们“命中注定”就是要处于事件的中心，以便向读者报道最新的情况。尽管代表资产阶级新闻工具的记者们在报道时，其诚实程度摇摆不定。

美国方面勉强同意了接受有关谈判内容及其宗旨的观点，同意对战略武器、中程核武器和防止在太空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应该一揽子地加以讨论。这是个原则性的协议，已被写进联合声明中。它是在实现两国间对话方面迈出的一步，但是同两个月后苏美在日内瓦就太空武器和核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所面临的任务相比，它仅仅是一步。

苏联经常提醒各国：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消灭核武器。

苏联警告过美国政府：如果它执行其太空计划，那就意味着根本谈不上什么削减核武器了，至于销毁核武器，那更不必提了。不仅如此，这将会为进一步的、而且是无法控制的全面的军备竞赛打开闸门。

给“星球大战”计划挂上“防御”性的招牌，这明明是骗人。因此，“战略防御计划”是华盛顿撒下的弥天大谎。

如果在美国、苏联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里的大街上，问任何一个人，他是否认为，应把地球周围的太

空变成策划战争的基地，或者他是否赞成禁止这样做，那么，当然只能听到一种回答：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太空保持和平。”

在讨论太空和核武器问题时，总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世界对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有何反应？”

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举行会谈的大厅里，人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有充分的根据说，事实上，全世界都支持苏联的立场。在会晤时，美国总统本人也令人信服地说过这一点。各国人民都希望看到其未来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和平和生存的道路。

让他们把耳朵贴近地面听一听

在继续谈论苏美谈判这个题目时，我要强调一个想法：华盛顿极尽一切可能来证明，似乎增加军备和巨额的军事预算会为谈判创造最好的条件。按照这一逻辑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武器越是堆积如山，就越容易就其裁减问题达成协议。

显然，军备竞赛的大膨胀和政治上暴力手段的猖獗，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和美国军火大亨们拍手称快。

这同杜勒斯和美国最坏的反动分子的哲学如出一辙，他们害怕苏联提出的任何旨在停止军备竞赛、裁军、特别是销毁核武器和不把军备竞赛扩散到太空的建议。

经常有人对我们说，达成协议需要很多时间，前面的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是的，我们现实地看待形势，一切都取决于双方是否有政治决心，是否愿意在明智妥协的基础上

达成协议。苏联方面两者兼有。

的确，莫斯科坚持恢复关于完全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谈判并且要将其进行到底。核武器试验并不是由我们首先开始的。

1946年7月1日，一颗原子弹投在集结在太平洋比基尼珊瑚岛地区的一大群美国海军陈旧的战舰上。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核武器的第一次爆炸试验。

就这样，杜鲁门政府举行了美国核“臂力”的第一次表演，以图靠实力来对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现在的情况同那时一样。华盛顿毫不隐讳地要继续进行试验以提高这一武器的杀伤力。

对这样的人能说什么呢？让他们把耳朵贴近地面听一听吧。大地已在武器的重压下痛苦地呻吟。

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在相互关系中能够遵循一定的准则，那将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准则是：将防止核战争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宗旨；不进行核战争宣传；承担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非核国家使用这种武器；不以任何方式扩散核武器，其中包括不把核军备竞赛转移至包括太空在内的新的领域；在同等安全的基础上裁减核武器，直至其全部销毁。

不，这并不是罗列事实。这是今天人类生存本身的一部分。

1985年11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同罗·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了会晤，从那里传出来苏维埃国家主张签署最有效的协定的声音。当然，这些协定必须规定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核查。

人们已经清楚地懂得，即使大炮不响，军备竞赛也会给人类带来痛苦。它吞噬着越来越多的物质和智力财富，使人们不能去解决诸如饥饿、疾病、寻找新能源、保护周围环境、和平开发世界大洋及宇宙等全球性问题。

1986年6月，我们的兄弟国家——华约成员国在裁军方面再次作出了努力。他们向北约成员国以及所有的欧洲国家提出了裁减欧洲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包含大幅度裁减欧洲各国所有类型的陆军和战术突击航空兵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部署在欧洲的有关兵力及军备。裁减的地理区域包括整个欧洲，从大西洋至乌拉尔。

这里讲的是降低欧洲的军事对峙水平的问题。这是防止核威胁斗争中的主要方向之一。苏联和华约其他成员国所建议的裁军措施为阻止形势向危险的方向发展开创了现实可能性。如果这些建议能够实现，人们就可以有希望地展望未来。

美国是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呢？

在进入1987年时，美国政府采取了意味着彻底拒绝履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行动，即拒绝履行那个在限制进攻性武器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的条约。

威胁为什么不能消除？

人们可能感到奇怪，西方某些国家的主要人士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过问过裁军问题。我们就以联邦德国为例吧。姑且不说别人，但该国的代表、领导人却似乎首先应当考虑禁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也应该考虑，如何防止欧洲发生

新的灾难。

我本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同联邦德国前外长瓦尔特·谢尔一起讨论有关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军备的问题。但是徒劳无益。他只是认真地听着，有时甚至表示一点儿意见，看来是为了证明他至少是理解我们的立场的。但是，一到需要他就实质性问题表态时，他干脆就从这些问题上滑过去，回避讨论。

事实上，只有两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福特对裁军问题给予了注意。卡特也给予了一些关注。福特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中达成的协议是在卡特执政时付诸实施的。

那么问题何在呢？为什么发生这一切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西方大国在政治上定调的人主张军备竞赛，储存核武器，使太空军事化，他们奉行这一方针是为了用实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然而，他们应该考虑，这种手段过去已多次试过了，结果遭到了失败。

他们到底指望什么呢？或许，他们相信由于某种原因核灾难不会发生，或许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世界在只有他们所承认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条件下生存，那就随它怎么样好了。换句话说，要么让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统治一切，要么让全世界都堕入深渊。

这样，在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在同一天宇下的世界大舞台上，各种不同的势力在相互较量。但是，不管这场斗争多么艰巨，人民的切身利益将一直是从政治上衡量这些势力的尺度。现在的形势不是使人们去相信宿命论，认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相反，在推动人们去为未来进行积极的斗争，何况，和平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更为强大。

所有的人的义务

在40年的和平条件下，确切些说，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人类已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它有权为苏联提出的倡议树立用金子铸成的里程碑。

只须想一想：大炮轰鸣声和金属横飞声刚停止，在柏林帝国国会大厦前最后的枪声刚响过，苏联就将自己的建议摆到谈判桌上：永远禁止核武器，停止其生产。

在我们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屏住呼吸，倾听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新的宏伟计划。这一计划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和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必须制定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个计划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共二十七次重申了这个计划。它也得到了华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肯定。

完成这一崇高的任务，将是在裁军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多么辉煌的胜利啊。

而在那些策划核战争计划的人的对外政策的道路上应该立个什么标志呢？只能是通向坟墓的路牌。

为了根本解决问题需要不少的时间，即便从这点出发，我们的理智也要求人们现在就竭尽全力，以使停止军备竞赛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能更容易地得到解决。

……写到这里怎能不令人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知己、美国总统的顾问及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曾经说过的话呢。

这还是在战争结束以前的事。在同我这个苏联驻美国大使的一次坦率的谈话中，霍普金斯说了一番几乎是预言般的

话：

“您也许不会相信，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一个人在考虑如何处理战争留给人类的军队和武器问题。”

我指出：

“这样说来，打赢战争比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军队及武器问题还要困难。”^①

霍普金斯对这个想法做了下述评论：

“我同意，这个问题正在产生。但是胜利可能冲昏人们的头脑。”

接着，他立刻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此问题的立场做了评价。他说：

“民主党由于罗斯福留下的传统，较易使国家的军备及军队适应战后的新形势。共和党人则不然。如果他们执政，别的动机就可能占上风。”

我当时想，霍普金斯的话里反映出了通常的反共和党的观点。但是看来，他那时就已想到了反动观点更为根深蒂固的共和党在对外事务中可能推行什么样的计划。

尽管在战后时期，两党的政策均推崇军备竞赛、扩张以及追求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但是，里根的共和党政府比其他人的政府在上世界上制造的僵局和紧张局势更多、更经常。

霍普金斯的话里有不少真理。

^① 从上下文看，此处似应是“打赢战争比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军队及武器问题还要容易。”——译者

通过会见和事件看英国

“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伦敦会议 贝文和艾德礼
相互取长补短 在圣詹姆斯宫和白金汉宫 丘吉尔
的回忆 艾登的天赋及其不成功的结局 英国的三
位一体 一位面目不清的思想家——盖茨克尔
“快乐”的勋爵道格拉斯—霍姆 “两任首相”威
尔逊 英国官场面面观 伦敦和伦敦人 “自由言
论之角” 威廉·莎士比亚和列夫·托尔斯泰 有
纪念意义和亲切的地方

许多来到英国的人大概都会怀着极大的兴趣想看一看和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如果是首次来到这里，则尤其如此。

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城市？著名的托尔堡^①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威斯敏斯特教堂呢？白金汉宫又是什么样的呢？莎士比亚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呢？英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

1945年底，为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而首次来到英国首都时，我也产生了这些问题。

世界史上一场空前的战火刚刚扑灭，欧洲悲喜交集。它

^① 11世纪末伦敦之城堡，17世纪以前的王宫之一，1820年前为国家监狱，后为博物馆。——译者

既为死难者悲痛，又为胜利而欢跃。英国同参加反法西斯侵略者战斗的其他国家一样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而当时，英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搞好各国之间的关系，消除这场严酷战争带来的后果。

“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苏联领导和斯大林本人一直坚定不移地打算同西方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国继续合作。波茨坦会议期间，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变化，以克列门特·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接替了在整个战争期间管理国家的温斯顿·丘吉尔政府。这一事实没有动摇苏联的决心。

动作缓慢，身体臃肿，嘴里总是叼着雪茄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外表看起来就是这样。他惯用的手势就是稍稍举起右手，两指分成“V”字形（英语“胜利”这个词的第一个拉丁字母），这手势常常博得掌声。

工党执政对英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工党的方针有何特点，这一点连英国人自己也绝不是一下子搞清楚的。的确，开始进行了某些社会改革，但这并没有改变实质：政权的阶级性依然如故。政策的修饰，顾名思义，就是修饰，其目的是为了与原来的政策不致相差太远了。总之，结果是世世代代形成的社会基础不会有重大变化，更不会被摧毁。至于英国的选举结果在国外产生的印象，它基本上同英国人想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英国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分子执政，苏联方面总是尽一切

可能同它们搞好关系，保持正常的联系，当然还在解决战后调整问题方面进行合作。同时，苏联还希望，艾德礼政府至少在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问题上对苏联采取比较客观的立场。

殖民地领土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世界各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许多英国人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其中有些人是戴圆顶礼帽的，而还有些人一直没有忘记戴高筒礼帽。从前许多英国人戴这些礼帽，千方百计地模仿勋爵的样子。

伦敦会议

时间的流逝象一层薄雾似地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现在人们无法看清当时就殖民地问题进行的那场政治斗争中的许多东西。1945年9—10月在伦敦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外长理事会会议就是这场紧张斗争的例证。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维·米·莫洛托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詹·贝尔纳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和厄·贝文率领的英国代表团。法国外长乔·皮杜尔和国民党中国外长王世杰分别率领各自的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中还包括了苏联驻美国和英国大使。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外长理事会在伦敦会议以及随

① 为筹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调整，根据1945年波茨坦会议的决定，于1945年设立有苏美英中法外长参加的国际机构。外长会议共举行过6次会议（最后一次于1949年召开）。——译者

后的几次会议上研究了战后调整的具体问题。其中包括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

苏联坚持提出关于给予这些殖民地以独立的建议。而西方盟国却反对这一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具体地主张将其中的一块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历史上曾是利比亚的一部分）交由苏联以联合国名义进行托管。

这项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尽快保障其独立。苏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利比亚后来获得主权。

上述建议遭到了伦敦和华盛顿的强烈反对，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大臣贝文。他公开庇护殖民主义者对前意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工党领袖的这种顽固态度对于在他之前登上大臣宝座的任何一个保守党人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

由于对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在理事会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出现危机的局面。有一次，在讨论过程中贝文对莫洛托夫说了难以容忍的无礼的话，莫洛托夫当即提出要求：

“大臣先生，请您把话收回。”

当这一要求没有达到所需的效果时，苏联部长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边走边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参加会议。”

谈判桌旁开始议论纷纷，总的来说，情况对贝文不利。在短短几秒钟内，他估计了一下形势，提高嗓门说：

“好，我收回自己的话。”

但莫洛托夫没有听见，多半是没有听清楚贝文喊些什么，而是继续坚决地朝门口走去。如果门在他身后关上的话，那

么会议可能就开不下去了，就此中断了。

我不假思索地对着正在离去的莫洛托夫大声说：

“贝文已收回了自己的话。”

苏联代表团团长听到这句话时正走到门口。他回到桌旁坐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来“缓和”一下气氛，或者可以说，“活跃”气氛。会议又继续进行下去了，尽管所有与会者脸上的忧虑尚未消失，而莫洛托夫和贝文几乎是互不理睬。

是的，不管人的地位如何，有时神经会顶不住的。

后来，我得知，斯大林对苏联部长在理事会上打算中途停止参加会议的做法是赞许的，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会议的完全破裂。斯大林甚至认为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这是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的。这种事我也有过体会，那是在1946年安理会讨论毫无根据地提出的关于在伊朗北部的苏联军队问题，我当时自己也退出了那次会议。斯大林对那些造成类似情况的有过错的人，不惜使用一些尖锐的话（当然在自己人中间），尽管这种话他是轻易不使用的。

贝文和艾德礼相互取长补短

现在谈一下贝文。从某个方面来看，这是个独特的人物。他的特点首先是，在与外国活动家，特别是与外交界交往中，他并非总是愿意恪守传统的准则的。看来，贝文认为，由于出身一般（他出身于下层），他这样做是可以的。

一次会议开始之前，三大国部长及大使有一个短暂的会见，贝文同我交谈时说：

“我同你们的古谢夫大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接触，我们的事情进行得很正常。”

古谢夫离我们不远，也听到了谈话中说的某些话，但是没有插话。

然而，人所共知，贝文同他谈话的主要特点是，他们常常似乎相互在比谁沉默的时间更长。当然，这一切完全不是苏联大使的过错。古谢夫向大臣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表示希望得到答复，并耐心地等候答复。他坐在那里猜测，但往往是久久得不到回答。贝文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海阔天空地高声谈论，但就是不接触实质问题。他甚至不建议，譬如说过一两天，等他可以给予答复时再见面。古谢夫大使对我讲述这一切时，抱怨大臣的古怪的特点。他强调说：

“这一方面很有趣，另一方面不好。”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后来几次会见时，在同贝文的交往中我形成了一种看法：他完全不精通历史。他自己也说他对这样一门科学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有一次，贝文承认：

“虽然我自己不得不直接了解历史和从事外交，但我几乎没有读过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籍，而且我将来大概也不会去读它。”

我甚至有点儿欣赏这种直率态度。没说的，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谦虚，简直是自我批评。

但贝文的另一个特点我是根本不喜欢的，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当贝文同国际会晤的参加者和大使们交谈时（甚至对他自己的同事们交谈时也不例外），有时使用那些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看作为是可以接受的话。贝文用的就是介乎牛津市那些古板的绅士的矫揉造作的语言和伦敦清洁工人惯用

的骂人话之间的某种语言。我甚至暗自把他同库斯托季耶夫^①时期豪爽的俄国商人相比。而如果贝文尽量使自己的举止彬彬有礼，那么可以感到，他在同自己的这种毛病（常常信口开河地说些挖苦话）做斗争。

所以，一方面，贝文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和工党领导人。另一方面，在个人交往中，他是一个性情古怪、脾气专横的人，而且不管恰当或不恰当，他总是要表现一下。

在苏联代表团内，我们相互开玩笑地说，如果把贝文和当时的英国首相艾德礼两个人的优点集中在一起，相互取长补短，那么，就会恰到好处。

艾德礼的见解没有贝文那样直率和果断。他也是工人出身，代表了具有自己固有的风度和独特的分寸的那一派英国活动家。

对他来说，在会上就某一个问题的第一个发言是十分苦恼的事。然而，支持美国，这是他十分乐意做的事。他这颗明星在官场上闪烁的时间不长。

在圣詹姆斯宫和白金汉宫

1952年6月，我被任命为苏联驻英国大使。

这次，斯大林也把我召到克里姆林宫去谈话。他强调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并特别指出：

“在战后的国际事务中，英国也能够起不小的作用。但富有经验和工于心计的英国外交将朝哪个方向发展还不完全

^① 苏联画家，擅长肖像画，是最早表现苏维埃题材的画家之一。——译者

清楚。”

同往常一样，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而我则站着。然后，他边思索边向我走近，并说：

“我们需要能够把握其外交动向的人。”

语言简短而明确。这就是主要的指示。

我在伦敦工作期间，世界局势仍然是复杂的。英国领导集团无疑也应对这一国际局势负责。这对苏英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总体来看，不难理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离人们越来越远，它们在人们印象中逐渐淡薄了，苏英关系中一切良好的东西越来越被薄雾遮盖得看不清了。不错，在两国关系中时而也闪现出一些光芒，特别在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上，但是，也许仅此而已了。

我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递交了国书，不过，这还是在她加冕之前。过去我曾有幸见过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国王。第一次这样的会见是在圣詹姆斯宫进行的。那时，国王为欢迎参加1946年初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举行了午宴。所有客人从摆着相当笨重的金制器皿的宴会桌旁站起来后，便走进宽敞的客厅。在步入客厅的时候，我同国王正好并行，看来，这不是偶然的。突然，我听见他建议说：

“我们到客厅中间去，稍微谈一谈吧。”

英国君主主动、热情地向我表明，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在反希特勒斗争中苏英之间建立的联系。不言而喻，我完全支持这个想法，并且从我们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说：

“主要的是双方都要有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愿望。”

这次谈话引起了在场的人的注意，但谁也不感到惊讶，

因为两国在战争中曾经是同盟国。坦率地说，同国王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然，我向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介绍了这次谈话的印象。

我同国王及伊丽莎白王后的第二次会见是在欢迎参加这一届联合国大会各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我记得，他们对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外交官在内的苏联代表们十分有礼貌。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她的姐姐玛加丽塔站在离国王和王后不远处，也在接见客人。同两位公主的谈话是简短的、交际性的，但是十分友好的。

顺便说一下，在英国，对加冕人物的崇拜是普遍的现象。英国人也没有忘记孀居的王太后。乔治六世于1952年去世后，他的夫人——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母亲至今仍是广大公众关注的对象。众所周知，当其女儿执政时，丧偶的伊丽莎白王太后仍然健在。老伊丽莎白是一个有魅力、很有教养的女人。乔治六世的遗孀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在公众场所露面。她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荣誉。

当我已经成为驻英国大使的时候，她邀请我及夫人前往英国首都有名的音乐厅“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去听杰出的意大利歌唱家吉里·贝尼亚米诺的音乐会。过去，我也有机会听过这位非凡的意大利美声艺术大师的演唱。他出色的男高音使数千名观众为之倾倒。听着他歌唱，我情不自禁地想把他的嗓子比作无边无际的大海，如果这种比喻是恰当的话。人们说，他是“第二个卡鲁索”。^①这种比喻也许是恰当的。

^①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美声艺术大师。——译者

王后对吉里的歌声赞叹不绝。

她说：“绝妙的演出，正是一个伟大的歌唱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那场音乐会竟会是这位著名演员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演出，这次音乐会成了他的“天鹅之歌”。^①不久，吉里去世了。

音乐会后，王后对演出表示十分赞赏，并借机说道：

“我想表达自己对苏联人民及其在战争年代的坚韧不拔精神所抱有的良好感情。”

我回答说：“您现在所说的话同您已故的丈夫在1946年，在圣詹姆斯宫与我交谈时对我说的话有些类似。”

还在我第一次来到英国的那些日子里，伊丽莎白公主以她的庄重、严肃和彬彬有礼给所有的苏联外交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记得，她对俄罗斯文学、我们的艺术以及我国人民（对其勇敢的精神，英国人是十分敬佩的）的许多话虽然简短，但很有意思。

1952年，我递交国书时，同伊丽莎白女王进行的谈话，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除了我上面所说的，以及在同继位的公主会见时我感到特别明显的品质外，我还记得，她对苏英关系问题的论述是深思熟虑的。

仪式是在白金汉宫的接见厅举行的。我觉得，这好象是个特别长的、不成比例的狭窄大厅。我们苏联代表相互之间谈到，大厅内部装修得非常好，但如果这个大厅再宽几米，天花板再大大加高些，那么，就其规模来说，它大概不亚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至于说内部装饰的色调和布

^① “天鹅之歌”通常指最珍贵的创作成就，去世前的作品，相传天鹅一生只在临死前唱一次。——译者

局，总的来说，白金汉宫是相当阴暗的，是按一般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风格建造的。里面缺少明快的色调。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寻找在英国中世纪的城堡里常见的大壁炉。从前在这种壁炉里用铁扦烤过牛羊肉。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壁炉。

丘吉尔的回忆

在谈到盟国的克里米亚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时，我已讲过我对丘吉尔本人的印象，同丘吉尔的几次会晤在我的记忆中是深刻难忘的。1951年的英国大选结束以后，丘吉尔再度担任首相，那时我已是驻伦敦大使，每次我同他交谈时，他必定都要回忆起战时同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多次会见，回忆起“三巨头”在波茨坦会晤时的情景。他喜欢浮想连翩，沉浸在对往事的遐想之中。他仿佛在这些过去的往事中信步漫游，自然是夹着他的雪茄喽！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丘吉尔是多么自信地等待着英国大选的结果，这种对投票胜利结果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给了斯大林。但实际生活却有自己的安排。

在我们以后的谈话中，丘吉尔没有再回忆起他生活中的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他只是谈了他同苏美两大国领导人会见的情景。如果此时我不插话的话，看来，丘吉尔还会无休止地讲下去。这一切使人感到，他从这些回忆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而我的在场成了促使他回忆的一个很好因素。

1953年，当我即将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之前最后一次去拜访丘吉尔时，就是这种情景。我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因而奉召回国。那时斯大林刚逝世不久。

丘吉尔问我：

“您喜欢伦敦吗？”

我回答说：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特别是现在，当它为迎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而装饰一新的时候。打扮得格外漂亮的要数皮卡迪利大街了，因为从一切情况来看女王卫队将要经过这条大街。英国人善于筹备盛大的庆祝仪式。”

丘吉尔笑了笑，以他在这种场合下特有的狡黠的口吻说：

“是的，皮卡迪利大街和整个城市都由于这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们英国人认为，宁可为国王或女王一生中的一次庆典开支一大笔钱进行各种布置和装饰，也比美国人为选举他们的总统每4年就花一次钱更好。”

我不想隐瞒，这一典型的丘吉尔式的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得很俏皮，而且从实质内容上来说也是对的。

我说：“在美国工作时，我本人也看到过这种类似的现象。”

为了使话题转移到克里米亚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我向首相提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您回顾过去，那么您今天是如何评价当时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这些会议的意义呢？至于莫斯科，它所持的意见就是斯大林与您，首相先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分手时所阐述的立场。大概，您还记得，当时他特别强调了三大国领导人两次会晤的重大意义。在雅尔塔斯大林是对罗斯福，在波茨坦是对杜鲁门讲了类似的想法。”

丘吉尔似乎就等着这个问题似的，他说：

“我和美国总统当时对斯大林所说的评价都是一样的。”

我们俩的评价实质上 and 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吻合的。当然，在这几次会议上有些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可能进展得并不都很顺利。例如，关于波兰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是达成了协议。”

然后，丘吉尔就谈起有关罗斯福在雅尔塔时的一些情况。

“我曾担心，”他说，“在雅尔塔时总统的体力能否支撑到会谈结束，有时过一天，两天，他就感觉不好，旧病复发。当然紧张的工作也有影响。”

我对此说道：

“看来，斯大林也曾对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有些担心。他甚至还去拜访了总统，事先告诉总统，请他不要使自己太累和不要在床上欠身。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没有再过多地打扰总统。他只是祝愿总统早日康复。我曾亲眼见到了这一感人情景。”

“对，”丘吉尔说道，“关于这两次会议人们写的和说的已经很多了。看来，还会更多。”

谈话就这样在良好的气氛中结束了。丘吉尔一直把我送到唐宁街10号的门口，摄影师们早已在那里了，摄下了我同丘吉尔最后一次会见的情景。照片上，首相站着，当然，还夹着雪茄，面带着通常那种有分寸的纯丘吉尔式的微笑。

这就是我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最后一次会见。不久，他就被解除了政府首脑的职务，当时，在这个国家的领地上，太阳还没有西落。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这颗太阳就开始降落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殖民地解放进程发展起来了。

在我同首相会见后的第三天，他给我寄来一本他自己作的水彩画画集，里面有数十张不大的水彩画。

众所周知，丘吉尔偶尔作一些画。特别是，当时曾广为流传，说他退休后曾到地中海去画风景画。

丘吉尔著有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共6卷，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吉尔的国务活动履历表是从下议院开始的，他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开始当选为下院议员的，除中间有过不长的间断外，他从事国务活动几乎有65个春秋。还是在本世纪的头10年内，他就担任英国内阁的大臣职务，历任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殖民地和财政大臣等职。在自己漫长的政治家生涯中，他曾两度出任首相，其中一次是在1940—1945年间，即在战争期间。

他对我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他曾是1917—1922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策划者之一。

同时，他又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懂得没有苏联就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道理的一位领袖。然而，也就是在大炮的轰鸣声刚刚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成为历史时，丘吉尔就成为进行反苏“冷战”的发起人。无论是在任英国政府首脑时，还是在野时，他这一立场都是一样的，他对苏联的观点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

艾登的天赋及其不成功的结局

在英国工作期间，以及在此前后的时间里，我曾同英国不少国务活动家见过面，其中有：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休·盖茨克尔、哈罗德·威尔逊、爱德华·希思、詹姆斯·卡拉汉、塞尔温·

劳埃德、菲里浦·诺埃尔-贝克尔、理查德·巴特勒、迈克尔·斯图尔特、戴维·欧文、彼得·卡林顿、弗朗西斯·皮姆、杰弗里·豪。

同这些人的相识和谈话给我所留下的印象是各不相同的。当然，关于所有这些活动家我无法在一本书中全部讲述。但我想特别提及安东尼·艾登。他曾于1935—1938、1940—1945、1951—1955年三度出任外交大臣之职，而在1955—1957年他是英国政府首脑。

我想写艾登并非由于他原则上采取了有别于当时保守党其他活动家观点的立场。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的另一方面：他具有一种天赋——善于寻求妥协，与对手达成某种协议。

参加某些会谈的人有时会感到，好象在通向使局势缓和和使各方立场接近的道路上横着一堵墙，道路被堵死了。突然第二天，有时是几小时后艾登带着可以随时调节的微笑出现在会场上，并开始阐述自己的往往带有某些新的内容的观点，以致使你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加以拒绝。他的这一特点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也都知道，他们都非常尊重艾登，甚至当他所阐述的观点中的新成分丝毫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建立起一座协议大厦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一方面，他是一位有时能创造危机局势的活动家，如三方联合入侵埃及（1956年）；另一方面，艾登的思想和建议犹如抛出来的救生圈不止一次地缓和了会谈的困难局面。他遵循英国外交的传统模式，并在英国的历史上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所以，要写英国的历史，就不能不对此人做出应有的评价。

我更多的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见到艾登，首先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几次盟国会议上。但我在伦敦也同他见过面，这是在1951年大选中保守党战胜了工党以后。象往常一样，他态度和葛可亲，并表示愿意讨论任何问题。

然而，艾登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旧大陆当时的形势下各战胜国大国之间的关系。这次他对欧洲事务，特别是与德国有关的事务也忧心忡忡。

在我们会见之前，世界还没有忘记，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年轻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拂袖而去，挂官辞职了。他的这一举动当时被视为一种故作姿态的做法，尔后人们认为这一行动是对张伯伦勾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策的一种挑战。众所周知，当时张伯伦是伙同与他一样的“绥靖分子”——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干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艾登很乐意回忆他的这一行动，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谈到欧洲事务时可以感觉到，他所代表的国家是一个已被共同义务把它与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虽然，他在这一次仍表示希望，不要使苏英关系出现恶化，但我的感觉仍然是，他在说这些话时缺乏信心和坚定信念。

在此之前，杜鲁门和杜勒斯已经做了手脚，所以盟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英国统治集团根本就不积极行动来避免西方大国同苏联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是恰恰相反。这一切在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那次谈话时的另一个情节，我仍记得很清楚。艾登病得很厉害，当然，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他患了黄疸病，感觉很不好。有时，他感觉好点儿，但有时情况又相当糟糕。平时精力充沛、动作敏捷、喜欢开玩笑的他，

这次则显得无精打采，不爱动，虽然，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力及清晰的思维。艾登仍是我从前在柏林、日内瓦和旧金山见到的那样，是个有意思的交谈者。

艾登的政治生涯由于英法以三方联合侵略埃及失败而告终。1957年1月，他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他是背着不体面的包袱离开政治舞台的。

英国的三位一体

哈罗德·麦克米伦接替了艾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就在保守党内起着显著的作用，偶尔在保守党组阁的政府中担任一些大臣的职务。而有一天，他自己成了内阁首脑。

自从丘吉尔放弃积极的政治活动后，麦克米伦立即成了艾登在争夺英国政府首脑的斗争中的主要对手。然而，首相的宝座在1955年4月仍被艾登得到了。

同意在这届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后，麦克米伦并没有放弃对首相职位的追求，并极力加强自己在政府中和党内的地位。在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上，他并不总是考虑艾登的意见，虽然在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任务的问题他们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而艾登则极力设法使他于1955年12月就改任财政大臣，指望由于他在财政问题上缺乏经验，尤其是在英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出任这样的职务，会动摇麦克米伦的政治威信。

然而，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麦克米伦却成了政府首脑。他在对外政策上的观点的特点就是积极主张加强英国与美国在北约的军事政治集团范围内的联系。他表明自己是联邦德

国重新军事化和西欧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拥护者。

同时，麦克米伦赞成同苏联举行谈判，以谋求解决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1959年2月—3月，他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我也参加了。在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公报中强调，两国在观点上的分歧“应通过谈判加以消除”，而不应诉诸武力来解决。同时还表达了扩大两国贸易的愿望。然而要将这些内容付诸实施，麦克米伦还缺乏足够的条件。其实只要他有这一愿望，他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当时的英国领导层中人们常说，在麦克米伦身上，经常可以感觉到一种傲慢和虚荣心。我本人也发现，这两种性格特点在他身上都有，但未必比其他活动家——保守党的中坚分子的更严重。

1963年10月麦克米伦挂官辞职，回到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重新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首相的职务和出版公司的工作，这真是有趣的现象。麦克米伦于1986年12月去世。

我同亚历山大（简称为阿列克）·道格拉斯—霍姆也见过面，他是继麦克米伦之后领导保守党政府的。但是，他担任首相的时间不长。1964年保守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工党执政。后来，在1970年，当保守党重新组阁时，道格拉斯—霍姆被委任为外交大臣。这一届内阁是由爱德华·希思领导的。

无论是同道格拉斯—霍姆，还是同爱德华·希思我都见过多次，其中包括我在英国访问期间。在谈话中，这些英国领导人均承认发展与苏联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可惜的是，他们走的是他们前任们走的那条老路：他们的言行不一。

保守党政府在实践中执行了一条严格限制与苏联发展关系的政治方针。它千方百计阻挠英国走上一条刚刚开辟的缓和进程的道路。这届政府还于1971年秋对苏联采取了粗暴的挑衅行为，指责苏联驻英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从事“不能容许的活动”，并要求他们离开英国。这一指责纯属捏造。我们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就这一行为向英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当然也拒绝了英方伪造的文件。

苏英关系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3年才具备了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访问苏联的条件。访问于12月进行。

在苏联首都举行的会谈中，道格拉斯—霍姆保证说，英国方面此次愿意改善英苏关系，切实希望扩大两国之间在各个级别的政治接触和协商。双方强调了苏联和英国发展经济、科技和工业合作的重要性。不久，于1974年5月我们就签定了为期10年的相应的协议。这已经是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然而，苏英关系中的某些切实进展，只是在工党于1974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以后才开始明显地体现出来。

一位面目不清的思想家——盖茨克尔

我与威尔逊的前任、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之间的联系还是在1952—1953年我任驻英大使期间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不只是在执政党内。

与苏联使馆的客人盖茨克尔的那次谈话我仍记忆犹新。根据他的愿望，谈话是一对一单独进行的。在一般政治问题上，他谈论的东西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对美国适可而止的

批评，同样有适当限度地强调改善英国和苏联关系的必要性。

盖茨克尔是这样说的：

“我主张东西方之间就国际生活的基本问题取得相互谅解。我认为，这种相互谅解应当是基于承认在欧洲，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既有苏联的合法利益，也有西方的合法利益。”

盖茨克尔接着说道：

“此外，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结束和盟国取得的胜利，对各国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这大概首先就是，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可能有共同的敌人，将来也许仍不能排除这一点。”

然而，在谈论这一题目时，他竭力不想过分深谈有关东西方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思想。我感觉到他在表达这一思想时有些拘谨。他把话题从关于可能有共同敌人的想法上引开了，似乎害怕这种想法。

工党领导以及盖茨克尔本人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同时相当顽固地推行支持北约集团以及与华盛顿结盟的路线。出于礼貌，他也不反对批评华盛顿，但当谈到现实的政策时，他那热情就冷却下来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英国的对外政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依附于美国方针的境地，对此，工党是有着不小的责任的。而当北约成员国中的西欧国家在美国的导弹核武器面前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后，这种依附性就更加严重了。工党执政时，力求与华盛顿保持团结一致并在处理对外事务中表现为捉摸不定、变幻莫测，历史对此都给予了报应。可说是应得的报应。

在那次谈话过程中，盖茨克尔作为党的领袖强调指出：

“工党对发展苏联与英国关系很感兴趣。”

为了使他的发言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他甚至还站了起来。我和他开玩笑说：

“我也准备站起来，来帮助您加强您所说的话的意义。”

他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向他伸出了手。我们俩人立即为各自的不由自主的动作而哈哈大笑。但我们立刻又都明白，虽然这一切看起来是在开玩笑，但这一玩笑毕竟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老调。

盖茨克尔补充道：

“归根到底，工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不是吗？”

“您当然更清楚。”我说。

这时，我们俩人又笑起来。

就他说的最后一点看法，我向他提了个问题：

“盖茨克尔先生，作为工党领袖，您能否就工党将把英国引向何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因为迄今为止，工党尚未试图为改革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而做些什么。不错，工党尝试过，比如说，将一些交通工具国有化。然而，却没有人认真地把国有化的法令看作是动摇英国经济的私有制和垄断制结构以及英国的社会结构的步骤。”

盖茨克尔也直言不讳地说：

“工党当然不会遵循马克思学说，认为它对英国并不完全适用。”

我认真地听着。他接着说道：

“工党赞成社会的改造。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那种彻底改造。”

从盖茨克尔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了工党领导人，特别是其

右翼反对与英国共产党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我则指出：

“如果马克思的学说对工党不合适，那么英国工党到底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呢？因为一个严肃的政党是不可能没有它的根本原则的。贵党的原则是什么呢？贵党的实践活动总应该依据某种理论吧？”

盖茨克尔回答说：

“工党的指导思想是费边主义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悉尼·维伯和维伯夫人^①，他们就是英国工党最尊崇的人物，我本人亦是如此。”

在这里，盖茨克尔避免使用任何可以解释为在工党内部存在着不同派别的说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属于党的右翼，其理论信仰就是某种“民主社会主义”，而工党领袖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

盖茨克尔费劲地选择着词汇，来解释作为工党政治行动纲领基础的思想体系。他极力想证明，工党政策的思想基础同保守党的是大相径庭的。然而，他根本不能解释清楚这区别到底在哪里？

盖茨克尔不接受“阶级意识”的概念，但当他开始深入议论的时候，结果往往可以看到，除了在议会的辩论中和准备议会选举时玩弄的一些个别的宣传手法以外，工党几乎没有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东西。换句话说，工党政治活动的思想基

^① 悉尼·维伯夫妇，1892年结婚。英国经济学家，工人运动史学家，工联主义和所谓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悉尼·维伯是“费边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参加工党政府（1924，1929—1931）。——译者

础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思想，其中包含着一定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折中主义。这也就是维伯夫妇、蒲鲁东和盖得等人受欢迎的原因了。盖茨克尔说起这些人来时是那么坚信不疑。

虽然对我来说盖茨克尔的言论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突出地表明了工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的实质。

是的，英国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就是这样建立起一整套教育体系，使它能够让社会科学始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包括各个派别的历史学。学校的教学大纲，其中包括大学中的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大纲，大学生的教科书都要经过检查，以便使教育中心不致受到“叛逆思想”的影响，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如果有哪位教授有时愿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说些好话，那么这多半会被人说成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献媚讨好。而如果谁要是想严肃认真地来评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他决不会有好下场。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有一次，在同盖茨克尔的另一次谈话中，我问他：

“您是怎么评价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

结果发现，尽管盖茨克尔并未读过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但他知道这位经济学家。而李嘉图他好象只是听说过。

需要补充的是，英国的国务活动家，无论是工党党员，还是保守党党员、大臣、议员、社会活动家、外交官和宗教界人士都在人文科学方面受过一点儿支离破碎的教育。从实质内容上来说，这都是些折中主义、实用主义，或是地地道道的贝克莱主义。贝克莱本人显然也会为他们如此精通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而给他们打高分的。

不言而喻，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有些人是有学问的，他们在理论方面比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人要高出一头。其中大部分人（包括共产党员）并不是在地道的学校里，而是靠自己不懈的努力而获得这些知识的。

“快乐”的勋爵道格拉斯—霍姆

很难说，英国的历史将会如何评价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在我写他的时候，此人仍然健在。

在40、50、60年代期间，他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特别是在执行对外政策方面，起过显著的作用。他曾长期在保守党政府中任外交大臣之职，也担任过首相。

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他赋予整个英国的对外政策以某种特殊的鲜明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他在哪里的发言，都能表明，它的政党想干什么。他总喜欢略微赶前些。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政府有些新的话正要准备发表，而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已经突然将其说出来了。根据他的讲话，特别是在有大国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几乎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英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动向。

但道格拉斯—霍姆做事也不是随意地不假思索的。不是，他把自己的思想同其他思想精心编织联系在一起，以致只有细心的观察家才能搞清楚，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然而，他那交织着论据和辩解的一整套思想是从来也不会同美国的政策相矛盾的。所以道格拉斯—霍姆总是能得到华盛顿的尊重，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

我个人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他处理事务时外表的风度和

在维护自己立场时随机应变地选择论据，都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在对外交往中所采取的手法，包括与苏联代表接触的方式，都百分之百地体现了保守党的政策，保守党总是避免就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局势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在苏联和英国之间能架起桥梁。

有一次，在我正式访问英国期间，阿列克·道格拉斯—霍姆邀我共进早餐。这是在1970年10月27日。

“我们俩人将进行一次单独会见。”他提醒道。

他事先解释说：

“我们到‘高级俱乐部^①’去谈谈吧，到那里去的只有上层人士。他们连说话都是悄悄地。”

对这次邀请，我开玩笑地说：

“瞧，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悄悄地说个够的地方了，也许还能达成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协议！甚至连咱们俩人也没梦想到的协议！”

我的同行笑了笑，说道：

“尚难预料。”

后来，根据我的建议，我们还是商定，我们俩人各自还带一名工作人员。我们就这么做了。同我一起参加此次会见的是我国驻伦敦大使米·尼·斯米尔诺夫斯基，与阿列克勋爵一起的是大使邓肯·威尔逊。

在约定的时间，道格拉斯—霍姆大臣已经在这家著名的俱乐部里等我们了。我们走进了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厅。大厅内设有大约30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坐的人数显然不可能超

① “高级俱乐部”（来自英语）意为“上等人俱乐部”。它的正式名称是“卡尔顿俱乐部”。这是英国保守党的俱乐部。——作者

过4人。桌子相互间隔较远。是的，看来大臣是对的：当邻桌的人在谈话时，我们几乎什么也听不到。

但我们注意到，大厅内四周的墙都是用一层特殊的材料装饰的。这是“公司的秘密”。看来，这种材料能吸音。甚至如果客人们想大声喊叫，象在英国议会中那样，那他们也是徒劳的，因为这种喊声是谁也听不见的。

当然，在饭桌上我们就有关欧洲安全、裁军和两大国家军事集团间关系的主要问题阐述了双方各自的立场。我们边听边注意分析道格拉斯—霍姆就所有这些问题所说的话中的细微差别。英国对公开走上重新军事化道路的联邦德国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特别引人注目。

无论是关于西德问题，还是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或是其他问题，我们都未能捕捉到任何从前没有向我们阐述过的新东西。西方对民主德国的不友好的态度，不承认其是主权国家，对苏联就裁军问题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我的对话者把这一切又都重复了一遍。

道格拉斯—霍姆关于英苏之间的贸易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论述看来有点儿不同。道格拉斯—霍姆没有忘记借机谴责工党。他说：

“保守党政府不仅不阻止双边关系在贸易、文化交往方面的发展，而恰恰相反，准备比那些好吹牛的工党人士做得更好。就让我们两国有关部门的代表哪怕是现在就会见并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我准备从英国这方面给予一切必要的指示。”

我们当时有这样一种印象，道格拉斯—霍姆想更多地关注双边关系问题。在那一时期，英国在这方面的确做了一些事，虽然无论是在保守党执政时期，还是在工党执政时期，

以及在今天，双边交往中的不稳定性只能同不列颠群岛那变化无常的天气进行比较。

“两任首相”威尔逊

谈到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继承者威尔逊时，我想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做了重要的贡献。还是在战后工党的第一届政府中，威尔逊就任贸易大臣。的确，他在1951年与工党左翼领袖比万一起退出艾德礼的内阁，以示抗议政府削减社会需要的开支。

1964—1970年，威尔逊领导着经过13年的间断而又重新掌权的工党政府。这届政府在内政方面的活动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进行一定的改革，向工会讨好和号召与最大的垄断组织进行广泛合作。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英国积极参加北约，并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越南、近东、欧洲安全、裁军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关于威尔逊政府对苏英关系的态度，它的特点就是前后不一致。起初，在经济和文化联系方面，以及在政治接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在这方面的进展受到了阻碍。尔后，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阴谋于1968年遭到失败，西方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英国方面参加了这股浪潮并实际上冻结了同苏联的一切联系。

对工党政策的日益不满，导致了它在1970年议会选举中的失败。在尔后的4年时间里，工党不得不甘心于在野党的地位。

威尔逊是在1974年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的。第二年2月，他访问了苏联。当时举行的苏英最高级会谈对于搞好互利合作和发展苏联与英国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谈结束时双方签订了苏英关于磋商的议定书，其中规定加强两国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的政治磋商。此外，还签署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关于科技合作的两个长期计划。

在此次最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苏英声明中，双方确认，愿意促进世界各地局势的缓和。

1976年3月，我正式访问伦敦，同威尔逊及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拉汉进行了会晤。双方满意地指出了在实现莫斯科协议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我代表苏联强调，我国一贯主张把同英国的关系推向前进。

我同威尔逊以前就见过面，那还是在1965年3月我访问英国的时候。那时正值他任首相的初期，而1976年的会见则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了。在此之前，他已决定不久将辞去首相和工党领袖的职务，这事实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政权移交给了卡拉汉。

从威尔逊在伦敦与我最后一次会晤时的举止来看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即将离开积极的政治活动一事是不无遗憾的。对于威尔逊本人来说，这次会晤的气氛由于上述原因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调，但他仍然竭力使我们的会见在一种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英国以及国外，威尔逊作为一名善于应付各种政治风云、经验丰富、能够利用业已形成的局势的精明的政治家而很有声望，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新的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的政治信念倾向右翼。他任首相伊始，就拥护英国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卡拉汉认为，英国应“始终坚定站在”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这块土壤上”，发挥“大桥建设者”的作用，即作为英联邦国家与美国，以及美国同“共同市场”国家的联系环节。

至少在卡拉汉政府执政的初期，苏英关系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双边贸易显著增长。科技和文化合作积极开展。

1977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访问了苏联。列·伊·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她。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过程中，我们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生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苏英防止偶然爆发核战争协定的签订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件。

但是，后来卡拉汉政府对不列颠群岛上的一些人士施加的压力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让步，这些人鼓吹要注意“苏联威胁”的神话，竭力破坏英苏两国合作的正常进程，再度恢复“冷战”的气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似乎还在秋千上摇晃不定的苏英关系。

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卡拉汉仍在工党领导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谁想了解不久以前英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那还得倾听他的意见。或许其中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英国官场面面观

英国及其首都今天的政治面貌如何？换句话说，谁不想知道这个国家今天最关心的是什么？苏联人民对此也很感兴趣。保守党政府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无保留地支持美国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系列西欧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新式导弹核武

器的计划，走上了一条增加军费开支的道路，正式和公开地宣布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华盛顿则企图给这一计划挂上一块时髦的招牌“战略防御倡议”。

昔日的不列颠狮子已衰老了。其领土从前属于这庞大的殖民帝国的那些国家对伦敦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执拗（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后来他们在时间与先进思想的冲击下变成了英联邦，现在经过了新的变化简单地称为联邦。然而事实说明，就是这种组织也远非坚如磐石；对此伦敦和全世界都非常清楚。其成员国在联合国越来越经常地投票反对英国，表示抗议英国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政策，拒绝参加伦敦组织的某些行动。英国往往经常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托利党^①执行的是一条限制民主自由，削减对人民的社会需要拨款的强硬路线，这也是今日伦敦政治面貌的明显标志。英国人在阿尔斯特^②的恐怖行动仍在继续，有时发展成为对北爱尔兰人采取赤裸裸的军事行动。失业大军剧增，一切旨在减少或消除这一现象的努力均告失败。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然赞成保留前几年在苏英关系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对下列事实也给予了原则性的评价，即托利党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追随华盛顿的军国主义路线，让美国在英国领土上部署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巡航导弹，参加了美国的军事太空计划——战略防御计划。

我们公正地指出了托利党的行动对欧洲和国际和平利益

①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译者

② 爱尔兰共和国北部省分。阿尔斯特历史地区的一部分，面积8000平方公里，人口20.7万（1971）。——译者

的危险性。这一点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4年12月访问英国时，以及后来于1985年3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谈中，都亲自对玛·撒切尔夫人阐述过。

今天的英国是昨天英国的产物。今天反映在官方政策中的东西也就是昨天奠定这个政策的基础。至于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政府，那么，要想找到它与前几任保守党政府所执行的方针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并不容易。有时在伦敦发生的政府成员的变动并未破坏保守党政府无论是在内部事务，还是在对外事务中所执行的主要路线的继承性。

这种政治上的人事调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的变迁。

卡林顿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撒切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方针的积极执行者。他确实曾试图使该政府在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时所采用的方法变得稍微温和些，多少不那么死板和生硬。保守党领导人认为这种“温和性”是不合适的。大家一致认为，至少正是这种温和性，导致了随后的卡林顿于1982年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

卡林顿勋爵的政治生涯并未结束，他接着就去担任了北约秘书长的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的职责范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卡林顿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至少在西欧舆论面前要将北大西洋集团活动的真正方向掩饰起来。

伦敦和伦敦人

在英国任大使期间，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这个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我已经介绍过同这个国家一些国务活动家和政

治活动家的会晤情况。我想简略地谈谈我对英国议会以及对英国首都的印象，并稍稍谈谈对英国人民的印象。

我要声明一下，我并没有为自己规定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或者新闻记者所能提出的那种目标。我想首先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谈谈我几次访问英国和作为大使在那里工作期间所得到的印象。

英国议会不止为一个君主加过冕。也有这种情况，当国家元首的活动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时，也是议会推翻了他们。奥利弗·克伦威尔^①在1649年把查理一世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了上议院，使经过他改良的下议院成了国家主要的权力机关。

当代的英国议会是由两院（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关于它的权限，关于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至今仍众说纷纭。而它恰恰正是这样，有些事它能做，有些事又不能做。这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

走进议会，你马上会碰上盛装的公差，他们的服饰差不多是难以形容的。但他们的仪表却令人难忘。他们的手势虽然是彬彬有礼的，但却如此奇特，足以使从未跨进过这一“英国民主殿堂”门槛的胆小的人吓一跳。

议会的决议，可以比作一块复杂的、千万条线织成的料子。那些在国内实际上行使着权力并且连对这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员组成都有决定权的人正是通过这千万条线从外部对立法者施加影响。无论怎样说，这些人一定能够迫使议会接受他们的决定。各种不同的建议可以讨论几天、乃至几

^①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领导人。1640年被选入长期国会，他依靠军队的力量把长老宗赶出国会，推动处决国王和宣告成立共和国。——译者

个星期，可以被否决、被修订，也可以变得面目全非。但是，这些建议最终会成为现成的决议，而且这些决议经过润色加工，显得四平八稳、文句优雅并丝毫不会妨碍统治阶级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决定举行特别大选。这有时看上去象某种离奇的东西。但是，这类事件实质上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可以说，这些事件的遗传基因已经包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了。不管是什么大选，结果总是资产阶级执政。而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最重要的。

两个主要的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相互交替地执政。而且每一个政党都知道，当它在大选中获得所必需的多数时，那么过一段时间它就应当准备好处于少数派地位。仅这一点，就把两党拴在一条绳子上了。这条绳子既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对任何一个愿意看见的人来说，是可见的。

如果注意一下议会、武装力量和警察机关，那么，每一个机构，包括立法机关，都象是各自为政似的。英国的实例鲜明地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历史是这样安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科学经济理论时首先依靠的是取自于英国的生活、英国“古典”资本主义的实际材料。

现在，谁要是不赞成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柱、尤其是主宰英国经济的人的观点、哲学，那么，这一派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不可能获选而进入英国议会。此外，英国资本已与美国资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多国垄断集团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凶恶势力。那么，英国政权制度系统，连同这一政权所进行的幕前幕后活动的实质就更加清楚了。

英国议会是否就对外政策问题拿出点儿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见解呢？是的，有时也有这样的事，但极为罕见，而且都是涉及一些次要的问题。但旨在加剧军备竞赛、并为此加紧税收压榨、加强北约集团政策中的军国主义倾向的决议却层出不穷。

在议会中就各种问题，包括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的讨论和辩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在辩论过程中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某些人表示反对华盛顿的军国主义方针，特别是反对在西欧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些辩论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实质和各个政党对此的态度。

在同英国的关系中，苏联坚定不移地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列宁主义原则。意识形态的分歧、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身不应成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障碍。

在履行大使这一官方职务时，我有机会在伦敦及其郊区、在英国的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虽然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活跃的旅行家。我从未当过旅游者。

伦敦……假如有人问我，对这个大都会和它的居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政治和国家机关暂且不谈），那么，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大概，最感惊奇的是，在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里，你根本听不到在美国的大城市里随时会感到的各种车辆的嘈杂声和怪叫声。

伦敦占地面积很大，市政建设铺得很开，看来，这是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大城市生活中的每一个标志物，特别是在交通方面，被巧妙地装配在使它运转的整个机器上。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机器的各个部件都运转良好，人们习惯于专心致志地执行警察或传

统所规定的准则。

我举一个很有伦敦特点的例子。事情发生在一个阴雨天。甚至连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也要小心谨慎，别让雨淋出感冒来。他在公共汽车站排着队等车。汽车来了。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谁都没有抢先尽快钻进车里。英国人很珍惜彼此的协作互助精神。人们默默地向前走，好象是一种不会说话的物质被静静地吸进开来的大汽车里。谁和谁都不争吵，根本就没有人说话。的确，这里的一切并不都与我们关于礼貌的概念相吻合。似乎应该让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妇女优先上车，但没有这个习惯，没有人这样做。

伦敦人（在英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一般在晚上9点钟左右就开始与外界隔绝。严严实实地关上百叶窗。窗户上看不见灯光。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里也可以见到类似的现象。但英国人在这方面打破了所有纪录。而在美国则完全相反：在美国的大城市里，晚上九十点钟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沸腾。这时才喧闹初起，一切都在动、在跳、在蹦、在叫、在闹。

到了英国首都而不去看看白金汉宫的仪仗队换岗，这对英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几百人，有时是几千人汇集在白金汉宫的铁栅栏外观看魁梧的近卫军士兵，他们的制服据说是许多服装师的劳动成果。应该说，这身制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身衣服只是用来摆排场的。英国人说，近卫军头上戴的高得出奇的帽子是用俄国熊（是的，说的是俄国熊）的皮做的。从前可能是这样的。但就今天而言，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了。不过，在英国国内，恐怕只

有在马戏院里才能见到熊。

白金汉宫前的仪式是首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把它看作是伦敦最迷人的一景。

“自由言论之角”

我不能不介绍一下伦敦优美的公园。这些公园里可以散步，休息休息，在古树的树荫下读读书。在春夏季节，这些古树枝叶匀称、繁茂、清新宜人，好象是为了取悦于英国人而专门长出来的。

在伦敦，以及在整个英国的公园里都有美丽的、精心照料的草坪。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耐心，没有孜孜不倦的操劳，就不会有这样美好的草坪。这是多年劳动的结晶。当被问到培植漂亮的草坪有何诀窍时，英国人总是略带几分善意的狡黠回答说：

“这种事难就难在头40年。”

总之，看着英国公园里草坪上的绿草时，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其中的许多草坪肯定会“记得”拜伦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时代。

到过英国的人谁能不知道海德公园？！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怪物。这里不是政治生活或工商生活的中心，不是的。但是，许多伦敦人只要想少时摆脱一下城市的嘈杂，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或者只不过想独自清静一会，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到这个公园里来。这里绿草如茵，开阔的草地上高耸着古老的榆树和法国梧桐，塞彭廷湖面闪烁发光，天鹅怡然自得，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而紧挨着这个大公园的就是肯辛顿公园，这里风景如画。那里有几幢低矮的建筑物，砖石因年代久远都发黑了，这是旧王宫（维多利亚女王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稍远一些就是使馆街，苏联大使馆也在这条街上。

几代伦敦人在庞大的城市中心保留下这么150公顷大自然的幽静田园，这是值得称赞的。海德公园顶住了地产商、城市建筑师和各级政权的冲击，真是傲立在首都心脏。而且，这个公园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

这个公园好象是一幅反映英国生活的立体照片。在这里可以看到娇生惯养的贵族，特别是一些贵妇人，她们骑着纯种马，享受着骑马的乐趣；也能看到不属于不列颠上流社会的伦敦人。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这里散步，而且，有些孩子才刚刚学会走路，靠成人用一种象是缰绳的东西扶着、引着挪步。

这个公园里有一个著名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民主角”。这里有许多自制的高台和讲台，有时用木箱代替讲台。只要讲台上没有人，任何一个“渴望民主”的讲演者都可以登上去，做一番连德摩斯梯尼^①都会羡慕的讲演。这个“自由言论之角”虽然已令许多人厌烦之极，但它对那些尚未获得公认的讲演家来说仍然有诱惑力，并作为英国首都生活的一个稳固的特征而保留下来。没有它，伦敦就不是伦敦了。

这一“公园民主”在国外也是很有名的。不妨谈谈对这一实践中的英国“制度”的某些个人印象。我偶尔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英国人抱怨说，讲台周围就缺少一些供人听累了讲

① 雅典雄辩家。——译者

演之后可以甜甜地小睡一会的安乐椅。我听后觉得，我是不会同他为此争辩的。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从这些讲台上很少能听到严肃的讲演。发表演讲的多半是那些被某种观念弄得神魂颠倒、神经不怎么健全的人。他们经常挥舞手臂，却很少能谈出点儿道道来。有好几次我们走近这些讲演者，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但一次也没听到有点儿道理的讲话，甚至连正常人讲的话也没有听到。这可能是偶然的，是我们不走运。对此，我们不必去争论。但是，如果认为这类“角落里的讲演”是民主的体现，那是荒谬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著名的苏联外交家阿·阿·罗申一起郊游之后返回伦敦，路过海德公园时，看见这样一个场面。一个讲台上站着一位讲演者，他比划着，双手朝天，激动地论证着什么。听众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50米开外的一张长椅上，侧身对着讲演者。他的一只耳朵也许能听到点儿什么，不过，这也是大可怀疑的。

玩这个“民主”游戏的不是儿童，而是成年人。那些赞扬这一切的人知道，锅里的蒸汽必须……放一放。这样一来，英国议员们就可以说，伦敦有一个“自由言论之角”，“民主主义者”可以在那里发表意见。是的，可能有某个外国人会对此赞叹不已。

我认为，伦敦和这个国家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办得很好，特别是如果谈到它们的室内装饰的话。那里一切都很严肃、朴素，没有招摇和奇异的东西。英国人一般不欣赏各种现代派的“装饰品”。

我们很想认真地了解一下英国首都的居民，在这方面已

经出版了许多书和学术著作，旨在给真正的英国人画一幅肖像画。我和妻子开玩笑说：

“我们也该找一些最典型的英国人，从外貌到习惯、以及对某些东西的看法，都做一番描述。”

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要办这件事，不仅一年不够用，10年也不够用。为什么？因为在同担任官方职务的人会谈、会晤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行为中有许多美国人、法国人以及我们自己所具有的特点。至于普通人，那么，你总不会专门把他们请到家中来研究吧？而象我们这种人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去私人住家串门。因此，我并不想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去深谈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习俗。

但是，根据在英国逗留期间所积累的经验，毕竟还是能够得出关于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的概念，也能进一步弄懂已经成了名言的一个常用说法：“我的家就是我的堡垒。”有才华的苏联记者和作家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在《橡树的根》一书中，以丰富的内容，以英国和英国人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事例充实了这一古老的、意味深长的俗语。我个人很高兴地读完了这本书，并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

20世纪是科技进步的世纪。英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但是，这里日常生活的节奏可能比其他国家要慢些。人们的习惯和行为准则同样改变得很慢。好象每一个男女，每一幢房子和每一套住宅，城市里的每一个公园、每一个机构（官方的或者私人的）都在一起抵制那些触及业已形成的旧框框、甚至是只触及外表的新生事物。比如，头戴圆顶礼帽（英国的一种传统帽子）的官吏或银行职员今天仍不罕见。

每次到伦敦，我都用目光去搜寻这些圆礼帽。我总觉得好象看见了《匹克威克俱乐部》和早在电影刚问世时拍摄的英国早期电影中的人物。

是的，“橡树的根”仍然深深地扎在英国和英国人的生活中，要撼动它并不那么容易，更不用说要拔掉了。这棵橡树牢固地长在土里了。这个相对来说面积并不大的国家好象紧缩成了一团，以便增强一种抗拒能力，不让世代形成的特征被抹煞掉。

威廉·莎士比亚和列夫·托尔斯泰

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而没有看到演出他的作品，这是不能原谅的事。哈姆雷特、奥赛罗、苔丝狄蒙娜、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人物和别的其他人物既再现了伟大诗人遥远年代的生活，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古老的而又象这个世界一样永恒的主题——善与恶、忠与奸、爱情与阴谋、友情与仇恨，从而使我们的当代人以及各个时代的人激动不已。我尽可能在伦敦多看看用原著丰富的语言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在美国我也见到过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当时在纽约曼哈顿中心演出了《亨利五世》。这出戏由一个来美访问的英国剧团演出，并由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的伦敦演员费雯丽和劳伦斯·奥立弗主演。这两位卓越的演员成功地使你忘却了距离，忘却了你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而根本不是在中世纪早期的英吉利王国。你坐在剧场内，丝毫也没去想人类史上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刚刚结束。好象你是在那里，在舞台上，在百年战争的冲突中：英国军队占领

了法国的整个北方和它的首都巴黎。光明与黑暗、美德与残忍正在进行着一场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斗争。

人道主义者莎士比亚以和平的颂歌来结束全剧。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在剧终时宣布：

“战争从此不再扬着流血的剑戟，
迈步在英格兰和美好的法兰西之间。”

演出结束了。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到后台，热诚地感谢费雯丽和劳伦斯·奥立弗，感谢他们邀请我们来看演出。对此我补充说：

“你们演得好极了，我们看后感到非常高兴。也谢谢你们的演出。”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英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在伦敦的西北部，离伯明翰很近，在它的南边。埃文是一条小河。古老的房子（还用说吗，这个小城第一次见诸史书是691年），修剪整齐的草坪，铺上柏油的小径，鲜花盛开。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是一个旅游中心。这里是莎士比亚的故乡。他的故居博物馆受到精心保护。莎士比亚剧院总是挤得水泄不通的。

一句话，这是一块民族圣地。经过了几个世纪，人们踩出了一条通往这里的路。这条路至今仍未荒芜。

莎士比亚也被安葬在那里，安葬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他被安葬在河岸上的一个教堂里，紧靠北墙的神坛下。在这块神坛墓地北墙上，离地面约1.5米处有一块墓碑。墓碑的主体是这位伟大剧作家的雕像。雕像用浅蓝色石灰石塑成，有半个人那么高。莎士比亚的右手拿着一支笔，左手放在一张纸上，而双手和纸放在一个小枕头上。诗人看上去很年轻。他

很漂亮：额头没有皱纹，鬓发潇洒地卷着。看来，按雕塑家的构思，莎士比亚正在朗诵一首诗，马上就要往纸上写了。下边用英文写着：

“耶稣诞生后的1616年4月23日逝世，享年53岁。”

前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有的只是为了在他的灵前站一会儿、思考一下，可以说是各有所思。

我也在他的灵前站了一会儿。墓志铭给我留下了印象。据说它的作者就是莎士比亚本人。

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请住手，
 勿挖掘这块石碑底下的尸骨。
 谁在这里动土他将受诅咒，
 谁尊重我的遗体就会受祝福。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同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国人民的民族圣地亚斯纳亚·波良纳。

他的墓地坐落在宽阔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公园里。只是没有任何墓志铭。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土堆，符合古老的俄罗斯习惯。很朴素但在这种朴素中也蕴蓄着一种强烈的激情。激情在无言之中。每一个到此致哀的人都怀念着在这块土地上安息的人，一位语言、思想和精神的泰斗。

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站在墓前都肃然起敬。同在英国那个小城市站在莎士比亚的墓碑前的情况完全一样。

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这座墓前也肃立过。然后，我们在公园里、在故居博物馆内走了走，到了他曾从事创作活动的地方，参观了那张著名的书桌，这张桌面

的四周装有一圈低低的栅栏，为的是不让穿堂风把纸张吹落到地上。在这间屋子里，作家写出了他大量巨著的不少篇章。

伟大作家的秘书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布尔加科夫领着我们参观了各种东西并从容地做了讲解。列夫·托尔斯泰去世后，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曾住过多年。

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象职业导游一样领着我们参观了博物馆的各个房间，逐件看了展品，对作家在这里的情况做了介绍。

我很感兴趣地观察了一下布尔加科夫本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博学的人。关于他本人的情况，他当时几乎什么也没谈。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托尔斯泰的秘书自己也度过了丰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不寻常的一生，为了俄国和苏联文化的传播在国内外做了崇高的工作。

他写了几本关于列·尼·托尔斯泰和作家的遗产的书。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时，他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他被关进监狱，而后被关进设在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希特勒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瓦·费·布尔加科夫用在城里干活的犯人不断给他带进去的不大的广告纸的反面写下了《托尔斯泰的朋友们》一书。在书的扉页上，他工工整整地写下“如果我死了，请寄给我的妻子安娜·布尔加科娃”，并附上了地址。

但是，在集中营里他没有死，熬过了法西斯地狱的种种折磨。战后，回到苏联之后，他实际上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度过了整个后半生。他先后担任了列·尼·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的研究员和保管员。作为保管员，他领我们参观了亚斯

纳亚·波良纳的名胜。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布尔加科夫是1967年去世的，并葬在这块地方，离列夫·托尔斯泰本人的墓地不远。

托尔斯泰关于莎士比亚的批评性言论是众所周知的。布尔加科夫也谈到了此事。伟大作家认为，在描述社会的某个阶层时，必须让属于这个阶层的人物有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托尔斯泰指出，但是在这位英国剧作家的作品中，所有人物都是聪明的人，而这在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莎士比亚笔下有时缺少“活生生的人物的语言”。

在某种意义上讲，托尔斯泰是对的。在莎士比亚笔下，甚至一些傻瓜也会轻易地说出后来成为格言的语句。

但是，为什么一个傻瓜就不能说出一句有智慧的话来呢？当时，在我读到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性意见、听到布尔加科夫提及此事时，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老葛罗米柯村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疯子，马上就要到我们村来了，现在他正在邻村的街上走着呢。我们这些小孩急不可待地等着他究竟什么时候来，看看他的举止如何。不仅是我们，大人们也很有兴趣，想看看他。这样的人并不是经常能见到的。过了两三个小时，他来了。他在街上走着，大声喊着一些我们青年人，甚至大人们都从未听到过的格言和诗句。他的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嗨，人们！在阴间用不着操心，谷物会自己脱粒，亚当耕种，夏娃扬场。”

我至今也忘不了疯子说的这些话。在这些话中，可以感到有一种诗歌的鲜明节奏和格言的言简意赅。

为什么莎士比亚，这个细心观察生活的人就不能发现和

听到生活中某种类似的东西呢？

其实，我认为，托尔斯泰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表现了一个天才的语言大师对另一个同样的天才语言大师真诚的敬重。因为他并不怀疑莎士比亚的巨大才华和他在文学中所占的位置。

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关于托尔斯泰生平最后岁月的故事片。这部影片是苏联优秀导演谢·阿·格拉西莫夫创作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影片的结尾。

……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托尔斯泰送葬，队伍拉得很长。下葬时所有人突然都跪下了——悼念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巨人……

这无声的一幕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是啊，对莎士比亚，对托尔斯泰，都应给予应有的评价。

有纪念意义和亲切的地方

谈到英国首都，不能不谈这样一个对每个苏联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都十分亲切的题目，即伦敦有不少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这里有马克思故居，1902年至1903年期间，《火星报》曾在这里印刷，现在这里有一间列宁纪念室。这里还有海格特墓地，列宁曾多次到这里来，在伟人卡·马克思的墓前默哀。这里有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列宁经常到这里来。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著作之一）时，他于1908年专程来到伦敦，在这座图书馆里从事写作。这里有海德公园，列宁常在这里散步，

或许向那些古怪的演说家瞥上一两眼。列宁去过的房子、街道、广场还多着呢！

从1902年4月至1903年5月，列宁在伦敦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后来，为参加分别于1903年、1905年、1907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第三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又不止一次来过伦敦。

列宁在伦敦期间，以及他在其他地方侨居近15年的时间内，他的活动服从于一个任务——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斗争。

在列宁看来，英国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堡垒，在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苦大众的贫困现象，而这种现象由于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书的描述已深为人知。伦敦引人注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深刻差异，民族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斗争的丰富历史。

还在不太遥远的19世纪中叶，宪章派的空想家们精心编纂了他们的宪章，并顽固地加以推行。当时英国的工人建立了工会。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上，英国工人运动显得十分涣散。

伦敦闻名于世还在于，它向很多政治侨民提供过避难权。

上世纪50年代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创办的第一家俄国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钟声》报就是在这个城市诞生的。正是它敲响了警钟，钟声传进了施吕瑟尔堡和彼得罗巴甫罗夫卡的囚室。《钟声》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刊物的先驱。它广泛阐述了有关进步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保护无权者和被压迫者而大声疾呼，号召人们为反对沙皇的专制制

度而斗争。

从1849年起，卡·马克思住在伦敦，在这里，他领导过国际工人运动。也是在这里，他撰写了一部天才的著作《资本论》。1870年弗·恩格斯来到伦敦，并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1895年）。

第一国际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1872年以前，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一直设在这里。1871年流血的“五月份的一周”^①以后，幸存的巴黎公社社员在这个城市找到了栖身之地。

是的，1902年4月的一个阴雨天，当列宁第一次来到英国首都时，他看到了伦敦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们总是渴望更深入地了解列宁的天才、列宁的思想，更全面、更清楚地了解列宁生活道路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包括伦敦这一时期。列宁生平的每一篇章，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和亲切的。正因为如此，列宁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引起了人们这样的兴趣。我曾到过这些亲切的地方，在那里脱帽肃立致意。

^① 1871年3月28日，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1871年5月21日，凡尔赛反革命分子在普鲁士军队帮助下攻入巴黎，经过激烈巷战，28日公社失败。——译者

——第八章——

在“冷战”战线上

是谁策划了它？艾森豪威尔的“腾飞”在四国会议上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 干涉的理论及其调整 艾森豪威尔过迟的醒悟 杜勒斯是何许人也？在他仕途生涯阶梯上的最后一级 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 美国对古巴的威胁 在白宫同肯尼迪的谈话 妥协的寻求与成功 “不落俗套的”记者 传奇式的人物 可耻的战争 胡志明的宿愿 得到实现 腊斯克不喜欢“出风头”

1953年4月，我从伦敦回到了莫斯科。我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一新职一直到1957年2月。

回国使我很高兴。可以说，我实际感受到了人们所说的“在家里连四面墙也会助一臂之力”这句名言是多么正确。这种激动的心情我过去就体验过了，那是在1948年8月，当时我在美国呆了8年多之后回到了祖国。

是谁策划了它？

岁月在流逝。“冷战”成为了现实。美国奉行“推回共

产主义”的方针和“战争边缘”政策，公开宣布推行“实力外交”，从而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希特勒“第三帝国”被粉碎之后，建设新欧洲的各项实际任务（波茨坦会议决议确定了总的方向）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中却有一批人，鬼迷心窍地要建立有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参加的、首先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排它性的军事集团。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应当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力量。

还在1949年4月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联盟（北约）成立以前，该联盟的策划者们就开始积极进行活动，在社会舆论面前为这一与和平利益背道而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盟国义务的步骤进行辩护。战后，早在这个集团正式成立以前，他们就网罗一些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有名望的记者大肆鼓噪。这些人以不同的腔调，卖劲地唱着同一个曲子，似乎西欧国家面临着“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将要组成的这个军事集团是“纯防御性”的。

在新闻媒介中，美国资产阶级新闻业的鼻祖华尔特·李普曼表现得特别积极。他在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报刊上呼吁建立西方国家的军事集团。贯穿李普曼著作的主要思想是，这个集团对于西欧及其大洋彼岸的盟友来说，就象空气一样重要。在他的每一篇文章里，都含有不少对苏联不友好的攻击，尽管每次攻击的程度有所不同。

这位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被认为是美国职业文人界的元老，有时他也能客观地看问题。因此，我们经常邀请他参加苏联使馆举行的各种礼宾活动。我想起了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他问我：

“大使先生，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难道您仍然相信世界有可能和睦吗？”

我回答说：

“是的，我愿意相信有这种可能。”

李普曼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毫不隐瞒，华盛顿所极力主张建立的这个未来军事集团的矛头应该是针对苏联的。这些人在战争期间还曾说过，红军英勇抗击敌人并连连得胜符合西方世界国家的利益，但现在却如此迅速地开始忘记自己原来说过的话。

在杜鲁门总统政府里，迪安·艾奇逊是积极主张建立这个军事集团的智囊人物。当年他先任美国副国务卿，而后又升为国务卿（1949年—1953年）。为了使“冷战”鼓吹者们的计划获得某种理论基础，他花了不少力气。不论是“杜鲁门主义”，还是“马歇尔计划”，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他的笔迹。

为了不惜任何代价把建立北约集团的事情进行到底，艾奇逊有条不紊和坚持不懈地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对他来说，找到参加者并不困难，只要促使政府慷慨解囊就行。办法就是：谁能通过竞争方式提出一个在反动派看来最有远见的关于建立这个侵略性组织的计划，就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给他。在美国，通常根据协议吸收一些学术机关参与研究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以供华盛顿官方参考。

在战争年代里，尽管艾奇逊当时是美国副国务卿，并且主管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但他在政治中并未起多大作用。至少，当时他还不算是一个大政治人物。

当美国对外政策从与苏联合作转而公开敌视苏联和人民

民主国家并为此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他的势力开始迅速上升。正是在这些年代，艾奇逊登上了国务卿的宝座。北大西洋联盟的建立，对他来说，犹如政治升迁的顶峰。

但是时间表明，艾奇逊的政治生涯丝毫没有使他的名字留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当你现在碰到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官，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人了，问他们是否知道艾奇逊其人其事时，能给予肯定回答的人并不多。当然，有时或许有某个人会感叹地说道：

“噢，就是那个曾插手建立北约组织的艾奇逊呀！”

只有一些外交官还能讲一点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们由于职业关系应该了解（哪怕是一般性地了解）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来龙去脉。

艾奇逊和我们见面时，表面上总是保持彬彬有礼的样子。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你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在美国土地上长大的英国贵族。顺便说一下，他出生在美国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区——新英格兰。

起初，艾奇逊往往对苏联还恭维一番，但这些恭维话涉及的都是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例如，有一次，1943年11月在大西洋城召开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会议期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时，在莫斯科为此专门任命的代表团到达之前，我受委托在会议上担任苏联的代表，而艾奇逊是美国驻联总委员会的代表。

朝鲜战争是美国国际政策日益增长的侵略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苏联一贯努力维护国际安全、保障可靠的和平，从一开始就主张停止这场战争，坚决谴责美国对朝鲜人民的侵略。1950年7月4日，我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发表了一个关

于美国武装入侵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美国政府采取了反对和平的敌对行动，它必须对其进行武装侵略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苏联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光荣地经受住了战争严峻考验的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正义事业支援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对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开始和后来这次停战（1953年）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华盛顿和它所支持的汉城傀儡政权的过错，朝鲜半岛的局势至今尚未正常化，自然，这就使得远东的局势也不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从南朝鲜撤走美国军队、为和平统一国家创造条件、排除外来干涉的建议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基础。苏联对这一立场表示赞同和支持。

还应当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苏联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的签订（1954年）。该协定结束了法国所发动的反对这一地区人民的流血战争。

1956年底，外部势力依靠匈牙利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在该国策划了一次叛乱，企图恢复那里战前的制度，使它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叛乱遭到了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向全世界表明，它们有能力保卫自己。

这些举动，和其他类似的举动一样，受到了应有的回击。苏联以自己的政策为组织这样的回击作出了积极贡献。

艾森豪威尔的“腾飞”

与丘吉尔一起同为“冷战”政策创始人的杜鲁门下台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接替他出任总统。

关于这位美国活动家能说点什么呢？

一些本来很不显眼的人物出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位置上，这种情况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常与社会动荡、战争有关）的时代里比比皆是。艾森豪威尔的“腾飞”便是其中一例。没几年的功夫，它由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几乎默默无闻的参谋当上了西欧盟国远征军的最高司令（1943年），尔后又成了美国的总统（1953年—1961年）。

问题不仅在于，甚至并不在于艾森豪威尔的个人素质。从他个人素质看，他并不怎么特别出众。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遇。美国一参战，罗斯福政府必须马上解决美国军队最高领导干部的问题。

这就使艾森豪威尔得以迅速高升。当需要一个十分了解参谋部工作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美国将军担任西方盟军总司令的时候，他被选中了。当时在美国首都相当长时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艾森豪威尔出生在美国定居的德国移民家庭，由他担任此职，在当时具体条件下可能会利大于弊，因为他了解德国人的性格、习惯和特点，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场外，这一点可能都是有益的。

艾森豪威尔任职后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了拜会。我们认为，这次拜会是对我们做出的善意表示。将军这次来访，无疑是罗斯福出的主意。

关于艾森豪威尔这位军事首长和国务活动家已有论述和著作，没必要再去重复。我只想谈一下我所记得的几件事，其中有些涉及他的政治生平，而有些则是我个人同他会见的情况。

战胜法西斯德国这一事实，在艾森豪威尔的思想中无疑留下了痕迹。对苏联指挥部所筹划和实施的辉煌军事战役，他并不掩饰其钦佩的心情。艾森豪威尔讲了很多关于斯大林的好话。他热情地回忆起1945年访问莫斯科时与斯大林的会见。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荣获了苏联的勋章——胜利勋章和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对此，他给以高度的评价。

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说过，美国和苏联必须而且可能和平共处。比如，1946年在底特律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两国之间应该取得谅解，两国领导人之间应该发展个人接触。

1947年8月，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甚至讲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要“和平共处”。诚然，当年以及后来他开始对美国过去的盟国——苏联使用了诸如“侵略性专政”的说法，尽管他还继续承认说，苏联“不希望战争”，比如1948年2月他在华盛顿就这样说过。

是矛盾？是混乱？的确，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所有这些都贯穿着一个基调，那就是对苏联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艾森豪威尔在公开会议上和内部会见时发表的声明中，在那些随后以不同方式公诸于众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橄榄枝逐渐枯萎了，越来越清楚地听到了金属的声音。在越来越起劲地宣扬美国应领导世界这一思想的大合唱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

艾森豪威尔出任北约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年—1952年）期间，发表了不少敌视苏联的言论。他在这个岗位上积极促

进这个公然反苏的集团开展军国主义活动。

1952年，艾森豪威尔参加了总统竞选，并获得了胜利。如果可以把这次政治上的腾飞同运动员的跳跃做类比的话，那么，这一腾飞无疑是创记录的。很多人认为这次腾飞是辉煌的。1956年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样，他实现了政治上的第二次腾飞。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都是靠一些同生产武器有关的大公司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当选的。对于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等财团和其他一些亿万富翁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治方针实质上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方针。所以，他们全力促进这一方针的实现。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巨资。

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执政8年，其特点是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反动势力日趋加强，国内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军工生产不断加速。军备竞赛和“冷战”的口号渗透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

在四国会议上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初期，朝鲜战争结束了。后来，各方签订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看来，东西方关系的紧张程度似乎趋于下降。然而，华盛顿根本就没打算这样做。

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了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参加了这次会议。看来，似乎出现了至少可以找到基本方向的不错机会。按照这个基本方向四大国有可能在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成

果、履行有关的盟国协定方面取得进展。

这就客观地向与会者提出了如下任务：从巩固和平与制止战争的角度出发，达成有关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协议。可是，在这个会议上，就解决这个任务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在会议过程中，出现了反映昔日盟国之间严重分歧的尖锐对话。至于苏联方面，它认为四大国领导人会晤不是为了暴露这些本来就很清楚的分歧，好象为它们登记造册似的。如果为了这个目的，用不着前去日内瓦。苏联主张，在会议上应该讨论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保障欧洲安全、停止“冷战”和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等问题。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德·艾森豪威尔、安·艾登和埃·富尔。他们热烈地论证说，北约军事集团是和平的因素，在欧洲更是如此。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为那个实际上是让西德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进行辩解，支持复活联邦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美化这一政策并把它说成是爱好和平的政策。与此同时，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提出了很多毫无根据的、无中生有的指责，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坚定地奉行和平以及同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主张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

为了从这三大国领导人手中打掉所谓西方爱好和平、苏联的政策似乎与巩固和平的任务相违背等虚伪说法，苏联代表团（成员是尼·谢·赫鲁晓夫、尼·阿·布尔加宁、维·米·莫洛托夫、格·康·朱可夫和我）宣布，苏联准备加入北大西洋联盟。为此我们提出了“滴水不漏的”理由：如果北约集团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话，它就

不能不同意苏联加入这个组织。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宣读这一声明时，西方与会者的反应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他们竟如此惊慌失色，就象我们当时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以致在他们眼前，会议大厅壁画上的稀奇古怪的人物似乎都跳起舞来了。

在几分钟时间内，对于上述问题没有一个西方代表团能答上一句话。艾森豪威尔伸着脖子，他的脖子显得更长了。他把身子侧向杜勒斯一边，为了同他私下商量一下刚才所发生的事情。总统特有的笑容常能帮他迷惑选民，赢得他们的选票，可是现在这种笑容却从他脸上消失了。且不说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谈的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我们始终没有收到对日内瓦建议的任何正式答复。这一建议干脆被束之高阁了。

会后，当所有的人都开始离开会议大厅时，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的团长和团员们却故意走得慢腾腾的，神态异乎寻常，显出某种忧虑。杜勒斯在走廊里赶上了我，他问道：

“难道苏联真是严肃地提出上述建议的吗？”

我回答他说：

“不严肃的建议苏联领导不会提，更何况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

杜勒斯还想说点儿什么。但快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他说：

“我们应该告诉您，葛罗米柯先生，我们将认真考虑苏联的建议，因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这时，他还是露出了一丝笑容。当然，他的笑容马上就

消失了。结果，艾森豪威尔说的这番话好象成了对杜勒斯刚刚向我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我们的谈话到此便结束了。

后来，在四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举行会晤时，从各种迹象看，西方大国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愿望。他们干脆设法避开这个问题。有时偶尔提到这一建议，他们的脸上便出现占卜官^①那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

在随后几年里，当进行激烈辩论时，参加辩论的各方对北约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发表看法时，苏联方面不时地提请西方伙伴们重视苏联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议。我不止一次地亲自提醒美国的国务活动家要注意上述建议。这当然已经不是原来那些人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连个概念也没有。

原因很简单：苏联的建议是北约国家在政治上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就开始想方设法地隐瞒这一建议。在这方面，秘密检查机构干得很有成效。

朱可夫受我们代表团的委托，在日内瓦拜会了艾森豪威尔。当他汇报这次拜会的情况时，我们得知，艾森豪威尔在同朱可夫谈话时似乎心思很重，说的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官话。他好象判若两人。用朱可夫的话说，他由一个喜欢交谈、面带笑容的人变成了一个毫无表情的木头人了。我发现，所有这一切使朱可夫感到莫名其妙。

美国总统及其得力助手——国务卿杜勒斯后来在日内瓦采取了一贯的强硬立场，绝不是为了使西方大国同苏联达成协议，不管在德国问题上，还是在消除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

^① 古罗马根据鸟类飞翔与鸣叫解释神的意志的预言家。——原编者

地问题上都是如此。这更加证实了朱可夫同艾森豪威尔谈话中得出的印象。

这里我要指出，当我们代表团回国时，朱可夫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想法：苏联应该把“火药”保持“干燥”。当然，参加会议的其他苏联人也有这种想法。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在我国，有谁不知道从士兵到元帅和苏联国防部长的这位统帅的名字呢？

即使在国外那些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中间，也很少有人没有听说过他。不论是苏联的朋友还是苏联的敌人，他们都描述过朱可夫。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始终承认他有杰出的军事天才，那些认识朱可夫元帅本人的人尤其如此。

在各个不同时期，艾森豪威尔也对朱可夫说过不少热情洋溢的话。1959年，他对我说：

“我钦佩朱可夫的统帅才能和他的人品。”

这次谈话是在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外长拜会美国总统时进行的，外长们从日内瓦到华盛顿参加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葬礼。

同年稍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同我谈话时也这样高度地评价了朱可夫。美国总统回忆说：

“我在西欧任盟军最高统帅时，我们大家，我、我的下属、指挥盟军部队的将军们，简直是屏着呼吸注视着苏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向柏林胜利进军。我们知道朱可夫不爱开玩笑，既然他提出了要在德国心脏摧毁法西斯主要堡垒的目标，

那就一定能做到。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到，尽管希特勒的部队疯狂地进行抵抗，但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进攻的红军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总统这番话说得很公道。

我曾多次与朱可夫元帅会面，特别是任命我为外交部长之后。当时他是国防部长。有两次会见很难忘怀。一次是在1957年4月，当时我们一起前往布加勒斯特签订关于临时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苏军法律地位的苏罗协定。另一次是在1957年5月底，当时我们一起去匈牙利执行类似的使命。

我们在飞机上并排坐在一起，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在那次去罗马尼亚的途中，我们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谈话。朱可夫谈起了过去的那场战争。

“为了夺取胜利，要有多种因素，”他着重指出，“除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军官兵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战争期间，苏联武装力量越来越显示出了这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作战是为了反对侵略，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把其他国家人民从法西斯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我们竭尽全力，使全体军人，从士兵到将军，对我们的胜利充满信心。”

我记得这位元帅说过一些坚决有力的话，意思是说加强部队纪律的严厉措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更是如此。不能松懈，不能高枕无忧。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朱可夫之所以说出这番话，看来是因为：众所周知，他本人同采取这些旨在保持苏联军人高度纪律性的非常严厉的措施有关。

朱可夫以毫不掩饰的激动心情谈了新式火箭武器的试验成功，而苏联军队当时已经得到了这种装备。那时还没有洲

际弹道导弹，但一些大国的军队已经有了威力巨大的火箭武器。他列举了已经过试验的我国火箭射程的数据。

在谈话过程中，我提请朱可夫注意这样一件事：

“自从出现核武器以来，美国顽固地反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停止生产和彻底禁止这类武器的建议。美国竭力想保持自己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认为苏联在很长时间以内不会有这种武器。”

当时，朱可夫针对华盛顿那些指望对苏联获得稳定的军事优势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说了一些相当尖刻的话。

我们抵达布加勒斯特。在各种正式会晤结束之后，我们在晚上似乎又把飞机里开始的谈话继续了下去。元帅的情绪一直很好。我注意到，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圈子里的人在场，他便显得不怎么拘束。所有的人，特别是老一辈人，都知道朱可夫这位统帅。

那天晚上，朱可夫回忆起一些往事，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你非常清楚，人民尊敬你，实在是爱戴你。如果英雄之中还有什么等次的话，那么人们大概会主张授予你英雄中的英雄这样的头衔。甚至学生们也兴高采烈地说，你是战争胜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在我国的成年人中，难道有人不知道朱可夫是何许人吗？”

元帅回答道：

“对我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环境下所做的工作作出评价，那自然是人民和党的事情。”

他说话时态度平静，朴实无华。

“我认为，”他好象是边谈边议地说，“自己做了点儿

需要做的事。是不是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呢，这无需由我来做结论。人们器重我的工作，这或许并不合乎所有人的心意。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也没个准儿。但在困难的时刻，在谈论到我的时候，他说的话总是恰如其份的。”

我很喜欢这位著名军人说出的这些清醒的思考。要知道，在战争年代里，仅仅朱可夫的名字就能使他所在的那个集团军或方面军的力量倍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我想给你提一个不那么好回答的问题，大概新闻界人士，以及你的朋友、同志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过这个问题：你是否常对自身安全感到担心，特别是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朱可夫可能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朱可夫肯定地说：

“是的，这种问题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过，其中包括我的家属。当然，他们谈这个问题已是战后的了。”

随后，他仍象刚才那样平静地谈了自己的亲身体会：

“首先应该指出，没有人不怕子弹，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但要知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一心扑在战斗上，所以个人的安危通常是顾不上考虑的。”

在他的言谈中，我既看不出什么装腔作势，也看不出什么添枝加叶，夸大其词。而且我确信，他谈得坦率、直爽、真诚。

“而我，”他接着说，“完全不想突出自己。我的副官常常因为提醒这些事而挨我的剋。”

说到这里，他举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牺牲的例子。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是在东普鲁士离梅利赞镇不远的地方被流弹的弹片击中身亡的。炮弹在这位大将乘坐的汽车后面爆炸。这件事发生在被围困的柯尼斯堡附近。在战争最后一年的那个冬日里，柯尼斯堡附近战场的形势似乎并不紧张。

“是偶然的吗？”朱可夫问道，“是的，是偶然的。但是，躲也躲不了。”

元帅所谈的和我早先对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在访问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谈话，使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他。

他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应该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军将领之首。他是那种直接率领军队同狡猾而凶残的敌人进行战斗的将领。时势把他摆在首要的位置上。

因此，我不打算评价他的统帅天才，只想谈谈他有关打仗并使之取胜的政治思维。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朱可夫没有说过可以被认为是批评斯大林的话。尽管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而且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已经做了人所共知的评价，但朱可夫却说：

“我承认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的巨大功绩。”

谈起就某些军事行动作出的重要决定以及斯大林在通过这些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时，他话语不多，但作出了明确、肯定的评价。

我注意到，朱可夫更愿意谈论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那一时期的一些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元帅鲜明的统帅才能，率领百万雄师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本领，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还注意到，他根本不提赫鲁晓夫在任何战役及其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赫鲁晓夫自己则经常喜欢回忆他去前线视察，同一些军人接触的情景。

在我国近期的著作中，开始出现一些说法，似乎朱可夫承认，苏联武装力量之所以未能准备好迎头痛击法西斯侵略军，苏军领导人也有过错。在朱可夫同我交谈时所发表的议论中，我没有听到过这种想法。但我记得，他明确地，象军人一样地表示了自己对苏联武装力量战前建设以及加强我国国防力量的态度：

“在战前，关于进一步加强战备的决定作出得太晚了，这是主要问题之所在。”

换句话说，他认为，在这方面首先应归咎于政治领导人，高层作出的决定可能在军事方面起了消极的作用。

这位著名的军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谈起了斯大林在战争前夕镇压高级将领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害。

“当然，我认为他们全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朱可夫肯定地说，“失去图哈切夫斯基的后果对于军队和国家来说都是特别明显的。”

然而，在原政治局委员们在场的情况下，朱可夫不发表类似的意见。

有时候，与朱可夫相识的人，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在指出他对国家有功的同时，一有机会总是强调说，这位军事首脑是如何生硬与粗鲁，并且还描绘一番他同他们谈话时的举止。他们把一切说成似乎他的特点就是不能克制自己。可以设想，在前线，尤其是在战斗中，他是很厉害的，但正如俗话说，一着急，说话就不考虑分寸了。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甚至在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种场面——他总是能够克制自己。不仅如此，他总是彬彬有礼，堪称典范，即使他在内心感到十分激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从没听说他发过火，说过什么粗话。

我知道他是一位讲原则的人。有人说他想千方百计地抬高自己在战争中、在指挥军队中的作用，我敢断言，那是冤枉了他。众所周知，正是这种诽谤使他的官职发生了变化。

对于象朱可夫这样的人，就算他真的曾经过分强调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难道能够为此而加以谴责吗？他对祖国立下的功勋是巨大的、众所周知的。战争的历史本身已经把他的作用象宝石一样镶在我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光辉胜利的桂冠上，它闪闪发光，激发着苏联人民的自豪感。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我国的光荣史册上，曾经有这么一位四度荣膺苏联英雄称号、两次获得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既是传奇式的统帅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是卡卢加郊区一位农民的儿子——格奥尔基·朱可夫。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

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还同另外几位苏联军事家有过交往。对于他们，我也不能不说些赞美之词。他们虽已去世，但在我国、我军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年代，都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业绩。

向读者介绍一下罗基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这样的苏军统帅，当然是完全应该的。他作为一名士兵

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日夜夜，后来参加了同白匪的战斗。1937年到1938年间，他志愿去西班牙作战，在同法西斯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作战经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马利诺夫斯基表现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将领。他率领军队在战场上胜利地抗击了希特勒德国的侵略。他作为参加击溃日本关东军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作用是很显著的。

在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大约半年之后，马利诺夫斯基接替朱可夫任国防部长。从那时起，我们经常有机会见面。

马利诺夫斯基首先是一名军人，他自己也常常强调这一点。不过，党和政府委托给他的这个重要职务当然也使他成为一名国务活动家提供了条件。我还要说，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同马利诺夫斯基谈话时，他有时是这样开始的：

“我是个军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元帅喜欢争论。如果他认为交谈的对方讲得没有说服力，他会提出不同意见。话又说回来，这难道不正是每一个深信自己正确的人所具备的品质吗？

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和同志们谈话时，马利诺夫斯基都不惜痛斥那些对苏联执行穷兵黩武政策的人。要知道，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我国及遭受法西斯侵略之害的许多国家刚刚开始医治战争创伤，而且“创伤”一词还远远不能充分概括那在德国帝国主义支撑下掌权的希特勒罪恶集团给苏维埃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

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谈什么事，都会感到心情愉快

和很有意思。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不少。只要有可能会，我们就利用工作间隙，抽些时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那里彼此进行交谈。

马利诺夫斯基喜欢打猎。又有谁在打猎时不去神思遐想一番呢？而在紧张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首都，所有的时间都事先安排得满满的——这里一个小会，那里一个大会，又是社会活动，又是电话铃声，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事，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可能就顾不上去神思遐想了。

打打野猪、驼鹿，特别是松鸡，我们俩人又变得精力充沛，而有时只不过是散散心，或者玩得累累的，感到很痛快。遗憾的是，去打松鸡的机会不是很多。对我们这些狩猎爱好者来说，打松鸡是最好的一种狩猎活动。

松鸡是苏联境内的一种古代残留下来的鸟类。这种鸟的“发情”期在每年的初春，大约持续10—12天，这时它们显得特别活跃。松鸡知道，它应落在哪棵树上唱“情”歌。那歌声往往会使猎手的心脏跳得非常快，假如有哪位医生能在手持猎枪的猎人走近那棵迷人树的一刹那去听听这颗心脏是怎样跳动的話，他一定会吓一大跳。

不过，有时不得不在森林里走上许多路，起码要有一次、甚至两三次滑倒在还没有来得及融化的冰面上，跌落在水洼中，才能有幸找到一只松鸡。

有一次，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打着松鸡，我现在想起了他当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

“我试图靠近松鸡来向它开枪。可松鸡也真绝，选那么一棵树来唱‘小夜曲’，想悄悄地靠近它而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松鸡扑棱一声飞上了天。简直就象在战场上那样，叫

它给溜掉了。好象松鸡的总参谋部制定了一套非常有效的作战部署似的。”^①

同马利诺夫斯基——我国军界的这位著名的卓越人物的会见和谈话，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当罗基翁·雅科夫列维奇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对这一巨大损失我深感悲痛。

对于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这位党务、国务和军事活动家，我一向是十分敬佩的。应当说，我们二人所分别领导的国防部和外交部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是相互配合的。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每一个苏联人都很清楚，只有基于稳固的物质基础——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可靠的国防实力、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和保卫苏联人民和平劳动的武装力量，对外政策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战时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的武装力量和防卫措施也不能不受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要看对外政策的效果如何，是否符合人民及其安全的利益。

格列奇科同我的工作接触是经常的。我们不仅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有接触（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们二人于1973年进入政治局），而且过不了两三天，我们就要对那些国防利益和对外政策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经过详细讨论，草拟出建议，然后通常由我们俩人联名向政治局提出。

总之，我同格列奇科元帅保持着密切的友好联系。在我

^① 很少有人知道，1981年曾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松鸡的保护和繁殖，以及人工繁殖这种珍稀鸟类的方法问题。——作者

们根据历届党代会的决议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和加强国防能力的工作中，列·伊·勃列日涅夫曾给以支持。

我是在1955年真正认识格列奇科的。当时，他是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责任重大的职务，把它交给格列奇科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天才军事将领是理所当然的。

经过同格列奇科初步接触和交谈，我就已经确信，他不仅是军事问题的行家里手，而且对那些超出纯军事范围的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能够很透彻地阐述对美国、整个北约集团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其他国家政策的看法。

格列奇科的一大优点是，他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从不要别人把他的看法当作是无可争议的真理。一旦他感到自己的看法缺乏说服力或者不够准确，他就会承认对方的意见是对的，并同意对方的见解。

格列奇科不能算是一个善于辞令的演说家。他自己也不认为他善于搞鼓动，善于写些豪言壮语之类的东西。

但是，在交谈中，特别是小范围的交谈中，格列奇科就完全变了样。他发表的意见总是很中肯。他善于分析事实，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有时，在我们俩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着很大的兴趣同格列奇科单独交换意见。

格列奇科既是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又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我想，我们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军事历史，对他这样一位军事将领、爱国者、共产党员，永远会作出应有的评价。

干涉的理论及其调整

四大国领导人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华盛顿就开始强化其“实力”政策、“战争边缘”政策的方针。这一政策最热衷的吹鼓手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美国对外政策的领导权越来越被他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健康恶化后。

这一切在1957年正式宣布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主义”中得到了反映。按照这一理论，美国有权动用武力强迫中近东接受美国的统治。这个理论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粗暴干涉这些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内部事务。自然，这一理论同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是大相径庭的。

苏联不止一次地指出“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主义”对和平的危害性。这一理论曾以公开和隐蔽的形式广泛地加以实践。例如，帝国主义当时就已策划了反对叙利亚独立的阴谋；1958年美国对黎巴嫩采取了侵略行动。仅仅这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后来，这一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美国的近东政策上。时至今日，这一点仍然可以感觉得出来。

正如所料，华盛顿那种浸透着扩张主义的政策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常常严重受挫。于是艾森豪威尔在继续声称西方必须奉行“实力”政策以维护和平的同时，也不得不作出某种调整，与苏联建立政治接触。他还邀请了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正式访问美国。

这次访问是于1959年9月进行的。在苏美会谈中，双方就有关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和平解决中欧问题，包括西柏林周围局势的问题。苏联方面强调，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签订对德和约和使西柏林及其周围局势正常化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从美国的立场出发，则不可能采取这种解决办法。不过，双方还是达成了以下协议：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继续进行，四大国政府首脑将于1960年5月再次举行会晤。

在整个访问期间，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代表团表现得很殷勤，他努力为谈判创造一种友善的气氛，总的来说，极力表现出希望苏美之间能有一种建设性关系的樣子。

艾森豪威尔此举还表现在邀请苏联政府首脑及其随行人员到他的乡间别墅——戴维营去，双方在那里继续进行了会谈。这个别墅坐落在卡托克廷山区东坡（海拔约1100米）的一片树林里，离华盛顿大约75公里。别墅由几个漆成绿色的木制小宅院组成，四周由高高的金属栅栏围绕，栅栏上拉着铁丝网。这难道不象是个堡垒吗？

主宅院是一个简朴的木制平房，中间是个面积不大的中央厅，两侧有几间卧室。厅内有一个大壁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这个别墅第一次用作总统的乡间别墅，被罗斯福取名为“香格里拉”。这是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所描写的一个虚构的不老国的国名，这本书当时很畅销。

罗斯福常常（尤其是在夏天）到这座乡间别墅去清静清静，以便避开城里的喧闹和华盛顿的湿闷。他的继任者杜鲁

门则相反，很少到那里去。

艾森豪威尔重新开始使用这座别墅，并以他孙子的名字命名。于是，别墅被改名为“坎普—戴维”（俄语为“戴维营”之意）。此后，这个名字就叫开了。一般来说，美国人喜欢起地名，哪怕只有两三栋房子，甚至只有一栋房子的地方，他们也要起个名字。但名字起了以后又改，显得很随便。有时见到一个小房子，如果按我们的习惯，就会简单地叫做“房子”。而美国人可以把一个很小的房子叫做“金岩石”，原因很简单，房子的附近有一块不过2米高的褐色石头。

有些美国总统常在“戴维营”接待外宾，其中包括最高级外宾。对这座别墅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以适合于接待外宾之用，我不止一次到过这个地方，可以证实这一点。

赫鲁晓夫访问华盛顿时，有几件事很有意思。有一次，在预定的最高级会谈开始之前（赫鲁晓夫还没有到），我和杜勒斯正在交谈，艾森豪威尔走过来同我们一起聊。总统抱怨说：

“我的身体开始出毛病了。”

他看上去的确有些疲倦。然后，他又补充说：

“心脏不好，开始有点儿不管用了，现在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和杜勒斯很同情他，没有说什么。他继续说：

“要是我稍微多懂一点儿医学常识就好了，不久前发生的心肌梗塞就可以避免。原来，应该在睡前喝上一小杯白兰地。”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他急忙把权威端了出来，以表明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

“这不是我的意见，是给我治病的医生的意见。他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怀特教授。”

有一次，科学院院士叶·伊·恰佐夫告诉我，他很了解怀特，这是一位大专家，总统在这位医生的帮助下同恶疾进行了一番斗争。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没能治好，病魔很快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苏联政府首脑在我们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邀请艾森豪威尔和他政府中的一些部长参加。

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是总统夫人玛米（这是美国人对她带有某种亲昵和温柔的称呼）。她友好地发表了对苏联人的看法：

“你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在战争年代，你们非常困难，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为了取得胜利，你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然而，连她也赶起政治时髦来了，这在美国，不仅在那个年代，就是现今也都时兴这么做。她说：

“但是看来，苏联有意把本国的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我们的报刊常常发表这种看法。很多美国人就是这么看的。这是真的吗？”

看来，美国炮制出来的这种荒唐谣言都已经传到“最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们的耳朵里去了。

自然，对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只好以适当方式说明事实真相，讲明我们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我还说：

“苏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的。请不要相信对我国散布的种种谎言。”

玛米以独特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她用讨人喜欢的直爽口气说：

“不知为什么，您所讲的这些，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报道过。即使在圣经里我也没看到过这种说法。圣经是我手头必备的书。”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保持严肃态度的同时，在这个问题上附和了她的意见：

“的确，在圣经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总的说来，在这次会晤中，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政府的其他代表提到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气氛与以前的谈判气氛是一样的。美方客人谈到，在战争年代里，苏美这两个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进行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将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和平事业。我们注意到，他们这次谈得稍稍大胆一些。

至于访问本身的成果，虽在两国关系中没有出现实际进展，但访问总的气氛是务实的。双方共同制订的总结性文件的精神也反映出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过迟的醒悟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一件导致苏美关系复杂化的事件。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形势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事件在身为国务活动家的艾森豪威尔的生平中也留下了一笔，但远非光彩的一笔。这指的是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该机被苏联火箭部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

事实俱在，这是一起预谋的、计划周密的挑衅行动。这架飞机的驾驶员鲍尔斯对此也供认不讳。但是，华盛顿却企图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态度很嚣张。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就是不肯对这一挑衅行动承担责任，虽然已经弄清楚，总统对此也应负全部责任。

苏联理所当然地要求美国政府就它犯下的罪行向苏联道歉。苏联正是这样把问题提到了5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预备性会晤上。四国首脑是根据早先达成的协议去到那里举行最高级会议的。

从这次会晤进行时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紧张的程度。

代表团的团长们聚集在会议厅里。第一个走进会场的是赫鲁晓夫，和他一同进来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我。我们立即向自己的座位走去，然后站在桌旁，等着其他人。

过了两三分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长们进来了。他本来想离座向苏联政府首脑这边走过来，但一见到赫鲁晓夫那冷淡的，甚至可以说是冰冷的目光，他立刻明白了，就站住不动了。他们二人没有互致问候，甚至也没有握手致意。

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保持着必要的礼节，同与会者一一握手。

总的来说，这一独特的前奏曲是个不祥之兆。根本用不着特洛伊的卡桑德拉^①的那种本领，就能预见到会晤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其实，在正常的条件下，这种会晤本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四大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紧张局势走向

①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普里阿姆国王的女儿，善于预言。

缓和。

戴高乐讲了几句之后，赫鲁晓夫接着发了言，他说：

“只有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就鲍尔斯的挑衅行为向苏联道歉之后，会议才能开始举行。”

“我不打算做这样的道歉，因为我没有任何过错。”

艾森豪威尔说这番话时声音小得勉强可以听得见，好象不是讲给别人听，而是讲给他自己听的。

所有与会者都懂得，如果继续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那将意味着开始一场看谁泡得过谁的竞赛。于是，大家连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会议厅。

这件事在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事情的经过确是这样的。

美国方面后来也没有向苏联道歉，尽管苏联有充分理由要求它这样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会晤破裂了。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艾森豪威尔把会晤搞破裂的。

法国总统还试图挽救局面，但没有取得结果。戴高乐随后同赫鲁晓夫会见时暗示，艾森豪威尔原则上是不对的，但似乎应该宽恕他，就象宽恕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

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的外交路线是非常矛盾的，是极其摇摆不定的。在这个路线中，很难准确地区分，哪些东西反映出支持他上台的集团，首先是军工集团对他所施加的影响，哪些东西是他个人的看法。不过，艾森豪威尔的这些看法，他在国际事务中前后不一的所作所为，是由某种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他本人不断得以成长，他的观点也逐步得以形成；在这种环境中，他既有过戎马生涯，又有过从政的阅历。

不过，与此同时，对他在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所做的一个表示，应当给以应有的评价。在谈到“庞大的军事组织和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结成联盟”时，他提出：

“我们应当注意防止军事工业集团产生过分的影响。”

这一结论值得每一个美国人铭记在心。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比较现实地看待事物，指出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

看来，在衡量他作为一个军人和政治家一生的功过时，这一积极面也应加以肯定。

杜勒斯是何许人也？

在美国，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常说：

“假如没有杜勒斯，那就应该造出一个杜勒斯来。”

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说法。这句话是有它的涵义的。

忠实可靠的奴仆，他顽固而又有点儿独特的本事，拼命捍卫军工集团的利益——这就是杜勒斯其人。他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中任过美国国务卿，毫无疑问，在长时期内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杜勒斯于1888年出生在华盛顿一个神学教员的家庭里。他受过法律教育。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杜勒斯于1892—1898年曾任过美国国务卿。

早在1907年，约·福·杜勒斯就以秘书身份参加美国代表团，出席了海牙和平会议，而在1919年则成了参加凡尔赛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顾问。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完成过各种不同的外交使命。他在凡尔赛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不算大，但是，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初出茅庐的顾问，是有名的“戴维斯计划”的鼓吹者。这个计划加速了德国重工业的复兴。15年以后，希特勒利用了这一重工业来准备对别国进行法西斯侵略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杜勒斯同大财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是许多工业公司和银行的董事，其中包括纽约花旗银行和其他一些垄断资本集团。他领导过庞大的苏利文—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按美国报界的说法，这个事务所向包括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部门，以及相当数量的保险业和银行业一共60个公司提供服务。这个事务所是亲法西斯组织“美国优先”的一个成员，该组织是由美国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查尔斯·林德伯格建立的。杜勒斯本人和他的妻子曾向这个组织做过大笔捐款。

1941年，杜勒斯被选为美全国基督教会理事会主管国际事务的委员会的主席，他属于这个组织最反动的一翼。1944年，他成为纽约市律师联合会的副主席兼该组织下属的国际法委员会主席。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杜勒斯究竟算政治家还是律师？在他身上，政治家和律师兼而有之，而且二者又互为补充。此外，根据我个人长期对此人的观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约从凡尔赛会议开始，杜勒斯就开始由律师转变为政治家了。尽管他当时还大器未成，但他那特有的虚荣心、同僚和朋友们的恭维，使得他越来越自命不凡。

美国外交机构这个未来的首脑，不断地积累着经验，逐渐练就一副独具特色的杜勒斯外交手腕，正在顽强地、一步步地往上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名字已经常常见于报端，

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当上了纽约州州长杜威的总顾问。杜威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1944年的美国大选中，同罗斯福决一雌雄。的确，当时很多人还有疑问：

“这位杜勒斯是何许人也？他好象是同教会打交道的，但讲起话来却毫无教会味道。”

态度生硬、不顾情面——这是他讲话、声明和文章的风格。杜勒斯既笃信教义，又崇尚武力，而且二者兼顾得不错。他顽强地沿自己选定的道路走下去。杜勒斯自己已是个百万富翁，他始终热衷于维护大财团所追求的目标和越来越充满扩张主义味道的美国外交政策计划。

在长达约15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对杜勒斯的活动进行观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表现是一贯的。杜勒斯从不故意讨好白宫的主人，不管是谁在台上。无论是罗斯福的政府，还是杜鲁门的政府都不认为此人是个单纯跑跑腿的小伙计。当他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讲话时，他总是在圣经的幌子下坚持右翼的反动立场，而且态度很顽固。

正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样，我和杜勒斯是1945年在旧金山会议上相识的，虽然在这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其人其事了。考虑到他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其他一些苏联代表也同他进行了接触。

杜勒斯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会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这段时间里，他脸上总是带着矜持的微笑。他不感情用事。当他出现时，在我们苏联代表团里常常开玩笑说：

“今天，杜勒斯大概要画十字，求神保佑大家了。”

杜勒斯认真地听取各位团长的讲话和意见，而他本人作为一名顾问，则不发表什么意见。他从事的似乎是一种“内

部”工作。不过，这对他有好处。在各种会议上，每个代表团除了讨论和解决问题之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美国代表团里，常常有各种集团的代表。因此，在总的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某些部门的大财团（它们不仅依赖本国市场，而且也依赖外国市场）的特殊利益也常对政策产生影响。总而言之，杜勒斯在旧金山就象一块海绵一样，在粉碎法西斯德国之后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大规模会议上汲取着经验。

当时，我们苏联代表团还不知道杜勒斯对苏联持特别强硬的立场。因为那时全世界正在为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而欢呼，这种情绪自然对会议总的气氛产生了影响。

但是，杜勒斯当时正在准备改变美国的政策。罗斯福去世以后，这些变化很快就出现了。旧金山会议闭幕后不久，他就越来越经常地发表敌视苏联的言论。

杜勒斯不具备人们常说的那种天赋的演说才能。他讲得很慢，不慌不忙，声音不大。然而当他很快得势，成了一个官方的政治人物时，他的话还是给人产生印象的。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主宰美国的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在讲话。

在他仕途生涯阶梯上的最后一级

杜勒斯参加了1945年在伦敦、1946年在纽约和194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他对美国政府立场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48年，杜勒斯重新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对外政策总顾问。当时报界指出，杜威一旦当选总统，杜勒斯就

可能成为国务卿。在50年代初期，杜勒斯先后担任过各种职务，不过，他基本上一直是在当顾问。那时，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没能再爬上去一步。他曾积极地参加了1952年的大选，是共和党对外政策纲领的起草人，全力支持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

1953年1月，杜勒斯踌躇满志地登上了自己仕途阶梯的最后一级，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总统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己人作为依靠。

从那时起，杜勒斯就一直站在共和党和与军火生产有联系的大财团中最好战的极端分子一边。他上台任美国国务卿，这就使美国整个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带上了他的印记。这首先表现在苏美关系上。人们认为，杜勒斯和“冷战”是不可分的。

“在战争边缘上搞平衡”——这种主张是杜勒斯发明的。他反复论证，这种平衡就是美国舍之就寸步难行的东西，而基于这种平衡的政策才能显示出高超的外交艺术。他就是死抱着这种主张一直走到头，直到他不再担任国务卿的职务，实际上也就是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不错，在杜勒斯因病去职前几周，他承认：

“要在战争边缘上搞平衡，还是得小心谨慎才好。”

当时很多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

“杜勒斯这是怎么啦？”

不过，这种不彻底的醒悟并没有使他的政治面目发生多少变化。

即使在今天，一提起杜勒斯的名字，人们就自然会联想起美国政策的好战方针和敌视苏联的行径。在这方面，没有

多少美国政治家能够超过他的。

如果把他单纯作为一个人来看，能谈些什么印象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如果撇开他所鼓吹的政策，对此人就很难得出个什么概念。

有时同杜勒斯会见，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在他还未“来劲儿”的时候，他总是显得有些窘迫。可能，这里面有某种装模作样的成分。他环顾一下四周，下意识地耸耸肩，然后才逐渐把话匣子打开，但还是似乎边谈边找合适的话题。

据我亲身经历，杜勒斯和别人面对面单独谈话时，他老是坐立不定，好象有条虫子在他身上爬似的。如果是站着谈话，那他的两条腿就老是在动。谈话时，他很少直视对方，目光常常射向一旁。如果不是谈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那他的谈吐就能比较从容一些。如果我们举行招待会、宴会，他有时也喜欢带着夫人来参加。

杜勒斯是个有学问的人吗？按照西方国家标准来衡量，毫无疑问，是的。在西方，文科的教育制度是严格为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服务的。毕业于这种学府的西方人士有时自己也感到所学的知识太局限。

杜勒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虽然有时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发表一些陈腐的批评意见。我曾多次访问过华盛顿。有一次，杜勒斯邀请我和我国驻美国大使米·阿·梅尼希科夫到他家里做客。

在一座不大的别墅里，主人在一间客厅兼书房的屋子里接待我们。他很得意地让我们看他读过的各种书籍，其中包括一些古书。他的藏书不少。

杜勒斯把我们带到一个书柜前，看得出，他是想炫耀一下，他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书柜上摆有美国出版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

他取出一本书说：

“喏，这是列宁的，那是斯大林的。这是选集。目前我正在研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正在琢磨这里面关于专政是怎么说的。我想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一般地指的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杜勒斯翻开几页给我们看，他在上面写满了批注。有的地方在整行整行的下面划着道道，有的地方则打着惊叹号。这一切说明，读这本书的人读得很认真。

我看了看夹着书签的那几页书，每页边上都写满了批语。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写批语的人对他所读过的这几页内容全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我和大使对主人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并祝愿他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方面取得成就。杜勒斯大声笑了起来，我们也同样大笑了起来。这表明，双方都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不过，从此以后，杜勒斯再也没有炫耀过他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哪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理。他在各个方面，不论是在国务活动中，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中，还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终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1959年夏天……苏、美、英、法四国外长齐集日内瓦，参加讨论德国问题的例会。

突然宣布休会，因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了。仅仅在几个月前，因健康原因他被政府由美国国务卿改任为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现在，他去世了，部长们根据各自首都

的指示，应飞往美国参加葬礼。

大家都明白，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大家一同从日内瓦起飞。上飞机时，我一进去就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比我坐得稍前一点。他有生理缺陷，拄着拐杖走路，我们总是让他走在前面。

航程过了一半，在飞越大西洋时，美国国防部长尼尔·麦克耳罗伊走到了我面前。

“葛罗米柯先生，可以和您坐在一起吗？”这位部长问道，“我有点儿事想谈一谈。”

“请吧，请您讲吧。”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位国防部长不会是来谈一般性问题的。再说，他未必是按自己的主意来硬要同苏联外长谈话的，况且，在这架飞机上还坐着美国的国务卿。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部长开始谈论起他所说的“黄祸”（即指中国）。他起劲地借题发挥，试图说服我相信他的论据和见解是正确的。

“‘黄祸’，”麦克耳罗伊肯定地说，“现在已经很危险了，就这么置若罔闻是不行的。此外，不仅应该正视这一祸害的存在，而且还应该同它进行斗争。”

“他究竟想干吗？”我心里想，但嘴上什么都没说，只是听他讲。他又继续说道：

“我们不妨联合起来反对中国。”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想看看对他这番话有什么反应。

苏中关系在那些年代是复杂的。实际上，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已接近到了零点。中国正在开展所谓的“文化革命”：

红卫兵横行霸道，苏联大使馆处于真正的围困之中。

听麦克耳罗伊讲完后，我说：

“我们和你们，换句话说，苏联和美国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解决欧洲存在的尖锐问题的办法，并改善苏美关系。”

“但是，”麦克耳罗伊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对此，你们和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

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实际上到此就结束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谈这个问题的是国防部长，而不是国务卿。看来这是预先安排好的。

在莫斯科我向赫鲁晓夫报告了同麦克耳罗伊初步谈话的情况。他说，对美国国防部长的回答是正确的。看来，这个问题不必再谈了。

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

根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总体情况的客观分析，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26日）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发展的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新的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1957年2月，我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

苏联继续采取有效的步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正是这些阴谋导致了尖锐的危机局势的发生，使世界各个地区出现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对古巴的武装入侵就是例证。这个行动，虽然是以入侵者的可耻失败而告终，却导致了国际局势的严重尖锐化，结果使苏美双方原已商定的最高级会晤的日期推迟下来。

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会晤，其目的是安排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同1960年11月在大选中获胜而取代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的约翰·肯尼迪进行首次接触。预定讨论有关苏美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着重讨论了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及西柏林问题。苏联方面主张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向肯尼迪说明，苏联打算签订对德和约。会谈是坦率的。虽然谈话的时间比原来计划的要长，但并未能取得相互谅解。华盛顿没有这种愿望。

后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在中欧，特别是围绕着西柏林，制造了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需要给这些行动以坚决回击，以保障民主德国的合法利益，不让波恩及其庇护者在西柏林问题的阴谋得逞。考虑到这一切，民主德国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于1961年8月13日采取了已酝酿成熟的、有充分根据的措施，对民主德国同西柏林的边界加强了守卫和控制。

在维也纳会晤中，讨论裁军问题时，双方的立场也有尖锐的分歧。简而言之，在这次会晤中美国总统显然企图向苏联方面施加压力。不错，美国总统总算第一次承认“美苏力量均衡”，对此，我们告诉他：

“既然承认了这种均衡，就应该在政策上作出相应的结论。”

美国对古巴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针使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古巴成了紧张局势的中心。这里简单谈一下所谓的加勒比海危机。许多人就是这样称呼1962年底苏美关系中出现的尖锐化的局势。

应该指出，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吃了败仗后，华盛顿根本就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既定方针，准备向古巴发动新的侵略，其借口是古巴似乎正在变成“共产主义向美洲渗透的基地”。同时还掀起了一场宣传浪潮，说什么在这个地区存在着“苏联威胁”。

1962年9月4日，美国总统发表声明，妄图怀疑人民古巴采取的防御措施的合法性，并且对古巴政府在加强本国防御能力方面，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这个声明包含了古巴一旦不执行美国要求时对它的公然威胁。

9月11日，苏联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失去理智，要清醒地估计到，如果它要发动战争，其行动可能引起什么后果”。苏联声明提出了实现加勒比海地区局势正常化的现实途径。

但是，帝国主义仍继续准备干涉古巴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古巴两国政府完全根据国际法准则达成了进一步加强古巴国防力量的协议。为此目的，开始在岛上部署相应的装备，其中也包括火箭。

这一步骤纯属防御性质，也不会改变苏美之间的总的力量均衡。并且，古巴方面还强调，如果美国切实保证不对古

巴进行武装进攻，也不协助其他国家入侵古巴，古巴也就没有必要采取加强自身国防力量的措施。

在白宫同肯尼迪的谈话

面对国际危机日益增长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一危机是由美国首都策划的），苏联在外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促使局势缓和下来，并保卫古巴的合法利益。

1962年10月18日，我受苏联领导的委托，在白宫同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会谈。同一天，我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进行了会谈。顺便说一下，对于这些谈话以及围绕着古巴而展开的各种事件，西方散布了不少谎言，歪曲了事实真相。

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我同肯尼迪的谈话被美国报界大加评论。所有这些评论的基本用意就是掩盖谈话的实质，又捡起一个借口，为美国政府1962年秋对古巴和苏联所采取的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为进行辩解。

但是，正如所知，在加勒比海地区局势尖锐化时，曾多次出现过解决危机局势的机会，而肯尼迪政府长时间（主要是在华盛顿策划加勒比海危机的初期，即“秘密”阶段）拒绝利用这种机会，也根本不想采取严肃的外交步骤，来解决与古巴有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同肯尼迪交谈时，主要不是谈古巴问题，而是谈其他的重要国际问题，首先是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和在此基础上促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问题。

在谈话中，我还是主动提出了古巴问题并且向美国总统阐述了苏联的立场。

“我想请您注意，”我说，“美国政府对古巴的政策会导致事态的危险发展。”

总统认真地听取了我的讲话。

“很长时间以来，”我接着说，“美国方面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对古巴的活动，企图对古巴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进行封锁。在美国，有人呼吁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侵略。这样做会给全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苏联相信，这是任何一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

肯尼迪则说：

“您知道，古巴的现行政权不合乎美国的愿望，如果那里存在着另外一个政府就好了。”

这话说得很尖锐，也很有挑衅性。

于是我提了个问题：

“那么请问，美国领导人有什么理由认为，古巴人不应按照自己的愿望，而应按照华盛顿的愿望来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古巴是属于古巴人民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别的大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我们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那里听到的种种说法，比如说，古巴似乎已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都是没有根据的。只要比较一下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庞然大物，另一个则小得可怜）的幅员和资源，就可以看出，对古巴的一切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

然后，我强调说：

“古巴领导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不止一次地向世界声明，古巴不打算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任何人，古巴坚持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力求通过谈判同美国政府解决一切争端。众所周知，古巴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一贯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那些呼吁对古巴进行侵略的人还是认为，对他们来说，光有古巴政府的声明是不够的。要是这样，就可以为任何侵略行为进行辩解。”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思想，我指出：

“一些国际问题之所以能得到解决，大都是各国之间谈判的结果，是各国政府对各种问题阐述立场而发表声明的结果。”

这样，就向美国总统表明，如果美国对古巴或苏联有什么要求，那么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威胁和讹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合适的。

当时，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向肯尼迪声明：

“美国对古巴采取敌视行动，同时也敌视那些对同古巴保持良好关系、尊重其独立并在古巴困难的时刻给它援助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会袖手旁观。20世纪60年代不是19世纪中叶，不是把世界瓜分为殖民地的时代，也不是被侵略国家在遭到进攻几周后才能呼救的时代。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强国，不论是由于古巴问题还是由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局势而出现爆发一场大战的威胁时，它不会只是一个旁观者。”

肯尼迪企图表白说：

“我的政府没有进攻古巴的计划，苏联可以认为，对古巴不存在任何威胁。”

而且，肯尼迪甚至做了重要承认：

“在吉隆滩地区的行动是个错误。我正在抑制那些主张入侵的势力，力求防止导致战争的任何行动，只要另一方不挑起这种行动。”

“我不否认，”他说，“古巴问题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不知道，这一切怎么才能收场。”

与此同时，肯尼迪把事情解释成这个样子，似乎局势的尖锐化是由苏联向古巴提供武器引起的。然后，总统宣读了关于古巴问题的正式声明，为美国决定封锁古巴进行辩解。

他说：“这里说的只是禁止向古巴运送货物的船只在返航时驶入美国港口装货。”

我不得不再次以苏联领导的名义说：

“苏联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不要采取任何同和平与缓和的利益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相容的步骤。”

与西方所流行的某些说法相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肯尼迪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在古巴有苏联火箭武器的问题。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回答，在古巴有没有这种武器。

同时，我向总统解释说：

“苏联对古巴的援助只是为了加强它的防御能力，发展这个国家的和平经济，苏联专家教古巴人使用防御武器，这绝不能被看作是对什么人的威胁。古巴向苏联求援，是为了消除它面临的危险，因此，苏联同意给古巴援助。”

最后我说：

“总统先生，我希望美国现在能清楚了解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和我们就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所做的评价。”

会见结束时，我还完成了莫斯科的另一个委托：

“苏联领导建议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晤，以解决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并讨论苏美之间有分歧的问题。现在，我向您转达这一建议。”

在这次谈话中，肯尼迪虽然对此建议当面作出了肯定的

反应；但就在同一天稍晚些时候，我却得到通知说，美国方面认为，如果上述会晤在1962年11月举行，恐怕来不及做好准备工作，那样的会晤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这样，华盛顿虽未否认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可能性，但却把这次会晤无限期地推迟了。

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美国总统隐瞒了美国政府对古巴的真实意图，并强调美国政府不打算进攻古巴，实际上是想蒙骗苏联。与此同时，总统身边的一帮人——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泰勒将军以及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却极为秘密地在讨论着美国武装力量入侵古巴的各种方案。

在同总统会晤的同一天，我还会见了腊斯克。谈话时，国务卿肯定地说：

“美国不打算武装入侵古巴，虽然古巴已变成了进攻美国的军事基地。古巴的国内政权不符合西半球的安全利益。”

听着他说的这番话，我和阿·费·多勃雷宁大使都竭力想猜透：他自己是否相信自己说的东西。

腊斯克对古巴出现了苏联武器一事表示特别不满。但是，他和肯尼迪一样，未直接问及在古巴是否有我国的导弹。

对腊斯克提出的所有“担心”，我的答复是：

“古巴从1961年反革命分子入侵该岛的事实中，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结论。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由美国人在美国的领土上训练出来，并靠美国出钱武装起来的。如果华盛顿对古巴有什么要求，比如说，物质上的要求，美国可以同古巴人谈判解决。”

腊斯克对此未作出回答。

然后，就美国在国外、位于苏联边界附近的军事基地问题进行了一段相当重要的谈话，我对国务卿说：

“您显然不会否认在土耳其和日本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许多军事顾问，更不用说英国、意大利和西欧以及亚非其他一些国家了。这就是说，美国可以在这些国家拥有军事基地，同这些国家签订军事条约，而苏联却无权帮助古巴发展其经济，巩固其国防，是的，说的正是国防。”

对此，腊斯克也没有作出回答。

他说：“苏联夸大了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的作用。”但他回避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腊斯克有意不谈位于苏联周围的美国基地问题。

同肯尼迪和腊斯克的讲话结果表明，美国政府无意客观地从根本上把局势弄清楚，更不用说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了。美国政府宁愿搞“危机外交”。

应该说，同肯尼迪谈古巴问题时，出现了许多急剧变化和反常现象。这位总统神经紧张，尽管他竭力加以掩饰。他说话前后矛盾。一面对古巴进行威胁，一面又作出保证，说什么华盛顿对古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他说了些带有讹诈味道的话，但也懂得侵略古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美国领导集团的心情矛盾和神经紧张。后来，白宫首脑的理智占了上风。这表明，从表面看，他心理上虽有点儿失去平衡，但这个人毕竟还是智慧过人，性格坚毅。

48年来，我曾同9位美国总统，即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约翰·菲兹吉拉德·肯尼迪、林顿·约翰逊、理查德·米尔豪斯·

尼克松、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小詹姆斯·厄尔·卡特、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谈过话，这次同肯尼迪的谈话大概是最难谈的一次了。

妥协的寻求与成功

几天以后，美国总统于10月22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他还给苏联政府首脑发了一封私人信件。美国走上了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道路，蓄意制造了一场危险的危机。

1962年10月23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是“史无前例的侵略行动”，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华盛顿要“把世界推向战争灾难的深渊”。声明还指出：“各国人民应当看清，美国这种冒险行动是向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迈出的一步。”

声明还强调指出，如果侵略者发动战争，苏联将给予应有的回答。

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外交文件来往频繁。苏联方面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古巴政府也为此作出了努力。

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仅仅限于施加政治压力这一种策略。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当时的司法部长）后来回忆说，美国总统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开始加以实施，但是，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事态的发展了。后来事态重新得到了控制，苏联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肯尼迪在这个阶段最终还是顶住了坚持要

“试一试实力”的“鹰派”的压力。

10月27日，苏联方面在致美国的正式函件中提出了妥协性建议，这些建议也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苏联同意从古巴撤出美国称之为“进攻性”的导弹，但必要的条件是：美国政府必须同意尊重古巴的边界不可侵犯，并保证不侵略古巴。

美国总统在回信中保证不入侵古巴，并许诺撤销对古巴的海上封锁。

在苏美的接触中，美国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在处理同危险局势有关的问题时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内部的尖锐斗争。政界中的极端分子对已达成的妥协表示不满，千方百计地想加以破坏，至少也要造成一种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局面。

比方说，那些反对消除危机的人坚持说，美国不应同意苏联提出的关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要求。1962年10月27日白宫发表的声明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该声明企图证明，西半球的安全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并非相互联系的，只有解决了加勒比海危机之后才能着手解决其他问题。

这样，美国政府就公开表示不想讨论撤销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问题。但与此同时，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公开指出的那样，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秘密的讨论，而且总统原则上决定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最后，这件事确实这样办了。

在这场外交斗争中，苏联领导采取了既讲原则，但又灵活的立场。加勒比海危机的主要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1月20日，肯尼迪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撤销对古巴的海上封锁。

1963年1月7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瓦·瓦·库兹涅佐夫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尽管两国政府“未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双方认为，由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就解决危机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联合国安理会就无需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信中还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希望，就这一危机所采取的防止战争威胁的行动将导致两国之间其他分歧的解决，并使可能成为保持战争威胁原因的紧张局势得到全面的缓和。”

最后，理智和责任感占了上风，虽然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缓慢变化的结果。

“不落俗套的”记者

我第一次见到约翰·肯尼迪还是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当时，这位颇有名气的记者请我发表谈话。我同意了。会见是在苏联代表团下榻的“圣弗朗西斯”饭店进行的。我至今还记得，他提出的问题很多，但主要涉及当时正在拟定中的新组织宪章的一些条款。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谈话内容曾见于美国报端。肯尼迪在提问时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他的这些见解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观点是一致的。

谈话时，我注意到，肯尼迪十分熟悉对外政策问题。他在谈到罗斯福对有关问题的见解时，可以感到，他很懂内情。只有同白宫有联系或接近总统的人，才有可能这样谈问题。

谈话时，我甚至半开玩笑地说：

“您是不是参加了罗斯福总统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联合国的建议的起草工作？”

肯尼迪回答说：

“我当然没有参加，但我同总统周围的人保持着良优的联系，况且我父亲还是罗斯福的朋友。”

这就使许多问题得到了澄清。

这位未来的总统有他独特的谈话、发表看法的方式。在联合国宪章问题上，他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发表过同我们的原则立场有分歧的意见。即使是在苏美两国立场相对立的情况下，肯尼迪也只是听我说，没有同我争论。有时，他甚至对我们提出的理由表示理解。

当然，我很清楚，这位谈话伙伴所代表的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家族。不过他以及他整个家族，包括他那位后来也被人枪杀的弟弟罗伯特在内，都主张维护我们两大国之间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关系。他认为，在雅尔塔就“否决权”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肯尼迪担任记者时的言行举止并不使人厌烦。他提问时似乎是在自己在发表议论，而后稍做停顿，好象在用眼睛问我：您对这个问题有些什么看法？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其实，即使到后来，肯尼迪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保持了这种风格。

在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我们第一次在白宫见面时，他提起了我们在旧金山的那次谈话。我说：

“您知道吗，总统先生，我当时有一种看法，您是一位不落俗套的记者。”

肯尼迪善意地大笑起来。

在白宫的会见中，肯尼迪向我介绍了他的一家人——妻子杰奎琳和两个孩子。这是在白宫前精心修整的草坪上进行的。之后，我们到室内进行交谈，参加谈话的还有阿·费·多勃雷宁和格·马·科尔尼延科。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直接向人民发出呼吁，寻求他们的支持来抑制美国的军火工业集团。这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社会舆论都把总统的演说看成是一个大胆的步骤，是向军火工业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独特的挑战。正是这个怪物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曾迫使美国最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对国际局势和苏美关系作出某种新的评价，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旧框框。

上述演讲说明，肯尼迪要比军火商头目和五角大楼看得远些。这次演讲大概可以称做他的总统生涯中的光辉一页。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响起了凶手的枪声，身受致命之伤的肯尼迪把头无力地垂到了杰奎琳的肩膀上。但这并不能毁掉那光辉的一页。

传奇式的人物

加勒比海危机的解决加强了古巴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可是，直到今天，对古巴的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不喜欢古巴人民走他们所选择的自由之路。古巴独立的对外政策方针也不合美国的口味。

古巴共和国成立已有1/4多世纪了，而掌握该国政治方向盘的一直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属于以无限忠于本国人

民的利益、无限忠于进步与和平事业而闻名于世的那类活动家。

很少有人能在活着的时候就成为传奇式人物。历史是一个公正的法官，它给每个活动家都安排一个应有的位置。其中有些人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另一些人则注定要被人遗忘。

在莫斯科和哈瓦那（不止一次）举行的苏古会谈中，我曾同卡斯特罗多次会晤过。这些会晤使我确信，这是一位智慧非凡、心胸开阔并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巨人。

早在上大学时，卡斯特罗就读了《共产党宣言》。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懂得了，这本书也为我的祖国指明了一条通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

这位光荣的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生涯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这个共产党员感到激动。1953年，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一批爱国者遭到了审判。起义者虽然没能够夺取兵营，但他们却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开创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

在法庭上，有人问菲德尔：

“被没收的这本列宁著作是你们这些被告人中哪一个人的？”

年轻的卡斯特罗勇敢地答道：

“那是我的书。谁要是不读这些书，那他就是个无知的人。”

后来，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说道：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

及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所做的真正天才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将永远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古巴人民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原理运用在建设新生活、新社会的实践之中。

了解菲德尔青少年时期的人都肯定地说，从早年起他就表现突出，具有作为集体中的一名领袖的鲜明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在上中小学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以及后来的革命活动、党务和国务活动中都表现了出来。这首先是因为他有超群的智力、活跃的性格和令人羡慕的身体素质。

卡斯特罗一向酷爱体育运动，特别是棒球和水下狩猎。他曾对我说：

“五颜六色、变幻莫测的水下王国，总是令我神往，好象会给我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最好的休息。”

从革命胜利初期起，卡斯特罗就坚决贯彻发展全民体育运动的思想。这项工作有任何失误，都会使他难过。到目前为止，凡是在古巴举行棒球、拳击和排球等大型国际比赛，卡斯特罗几乎每场必看。有时，他还邀请当时来访的外国贵宾出席观看比赛。

革命古巴的公民、拉丁美洲的光荣儿子切·格瓦拉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国际上杰出活动家的战友。假如有一座世界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在为争取自由、为社会正义斗争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活动家，那么，切·格瓦拉的骨灰就完全应当安放在那里。尽管现实中没有这种公墓，但却有人们以自己的怀念建造起来的另外一种公墓，而在这座公墓里已经用金色的大字写上了这个人的名字。

有一次，切·格瓦拉告诉我，1959年他是怎样当上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主管古巴经济的责任怎么会落到他的身上的。

“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和人民夺取了政权以后，”切·格瓦拉说，“革命领袖菲德尔在一次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他们必须分工的问题。在谈到应当由谁来主管经济时，菲德尔问：‘朋友们，请告诉我，你们哪一位是经济工作者？’”

这时，切·格瓦拉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说：

“我以为菲德尔在问，在座的哪一位是共产党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于是，菲德尔说：‘那你就主管经济吧。’”

我笑起来，这件事确实有点儿滑稽。而格瓦拉接着说：

“后来，搞清了是个误会，但为时已晚，因为分工已经定了。就这样，‘经济工作者’切·格瓦拉，”他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胸部，“主管起古巴的国民经济来了。”

以后，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全国工业部长，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他曾在这个岗位上积极地工作。

切·格瓦拉曾多次来莫斯科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谈判。从我有机会参加的几次会谈来看，代表古巴的这位活动家对古巴的需要了如指掌，总的说来，他是一位内行的谈判对手。他既会坚决维护他认为正确的那些观点，又能掌握必要的分寸，参加谈判的苏联同志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切·格瓦拉参加过象联合国大会这样的重要会议。1964年12月11日，他作为古巴代表团团长在那里做了发言，阐述了古巴对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的立场。当揭露帝国主义的愤

怒言辞从讲坛上传向大厅时，美国代表及其军事集团的伙伴感到很不舒服。切·格瓦拉捍卫了古巴人民自主发展的权利，坚决谴责了美国干涉古巴内政的政策，以及华盛顿至今实际上还在推行的封锁古巴的政策。格瓦拉的演说赢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当天，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

古巴的反革命分子十分仇恨切·格瓦拉，他们在美国当局的纵容下，在格瓦拉发言时用“火箭炮”向联合国大厦开炮。幸而罪犯的炮法不准，弹头落到了河里。警卫人员在联合国大厦附近还逮捕了一个叫佩雷斯的女人。据查，这个古巴的反革命分子身上带着一把刀子，用她的话说，这是准备用来捅死切·格瓦拉的。这有哪点儿不象夏洛克·科尔黛呢^①？

切·格瓦拉离开纽约之前，苏联代表团为他举行了宴会，我们还邀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出席。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3个代表团的领导人。我记得，那一天，朋友们聚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大家都向我们的这位古巴朋友表示祝贺，祝贺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取得了成功。

吃完饭，我同切·格瓦拉单独进行了交谈。他说：

“我将从纽约直接前往远方的国家，去帮助人们为争取过上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生活、为自由而斗争。”

听了这番话，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注视着切·格瓦拉，暗自思量：这是一个为斗争而生，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受吉伦特派影响的一位女贵族。她潜入雅各宾派领袖让·保罗·马拉的住宅，用匕首杀死了他。——原编者

为建立功勋而生的人。否则他的生命就失去意义。他是用钢铁铸成的。

切·格瓦拉认为，哪里有不公正现象，哪里在践踏人的尊严，哪里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哪里存在着种族压迫和千百万人处于无权地位，哪里就要进行解放斗争，这也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1871年站在巴黎公社社员一边进行战斗或者参加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那些俄罗斯孤胆英雄就是这样做的。伟大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站在俄国无产者一边进行战斗，反击白匪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攻的那些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许许多多其他外国人就是这样做的。在西班牙同佛朗哥分子进行搏斗的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也是这样做的。

我曾努力捕捉我的客人的情绪。他举止从容，言语不多，但条理清楚，象是用锤子敲打出来的。我觉得，他具有某种男性的腼腆，而这又赋予这个人一种特殊的魅力。尽管如此，他的脸上也还流露出一点儿忧郁。当然，我难以启齿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1967年，切·格瓦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条消息象闪电一样传遍了世界。玻利维亚人民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中野蛮地杀害了他。

可耻的战争

1965年初，华盛顿开始武装干涉越南。这样，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推行的政策的实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那时，林顿·约翰逊已当上了美国的总统。他是在肯尼

迪在达拉斯被恐怖分子杀害以后这一非常情况下上任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美国的法律，当时身为副总统的约翰逊应出任总统。就在从达拉斯飞往华盛顿途中的飞机上，举行了就职宣誓仪式。

肯尼迪通过大选入主白宫时，约翰逊也就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应当指出，美国的社会心理有这样一个特点：美国选民是同时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因此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争夺总统宝座的人。这时他们一般并不过问，未来的副总统是否能做到不仅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一旦出现某种情况，也能胜任总统的工作。

只有当副总统由于命运的安排当上国家元首（约翰逊就是个例子）时，美国人才开始注意他，好象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而在美国，社会舆论经常受到来自上层统治集团所把持的巨大的宣传机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想弄清这一问题是件极为复杂的事。

1964年在例行的大选中，约翰逊保住了总统的交椅。部分原因是，已故总统威望卓著，而约翰逊许诺继续忠实于他的政策。

众所周知，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后来导致了什么结果：国内社会冲突和种族冲突不断激化，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失误，其中最为明显的失误是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使得几万美国人丧生，巨额物资付诸东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一落千丈。因此，在1968年大选前夕，约翰逊被迫发表声明表示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时掉下了眼泪，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些眼泪掉迟了，实在是太迟了。

现在，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美国当时千方百计地蓄意要挑起侵略越南的战争。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借口，于是，美国方面便于1964年8月在东京湾采取了挑衅行动，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事件。大量谣言散布了出来，歪曲事实真相，企图把责任推到越南北方头上。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友好国家坚决声明：东京湾事件是一次粗暴的挑衅行为，应该将华盛顿钉在耻辱柱上。

只是在美国对越南的冒险行径遭到惨败之后，人们才真正弄清楚，策划这一罪恶挑衅的约翰逊政府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全世界都不禁大吃一惊：约翰逊政府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来。

约翰逊后来大概经常收到有关美国青年在越南丧生人数的报告。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些报告并未使他产生应有的印象，而是被搁在总统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成了一堆废纸。

我和苏联其他代表同美国政府代表曾多次举行会晤讨论越南问题。在我们面前有一堵墙，一堵无法穿透、严密厚实的墙。在阿·尼·柯西金和林顿·约翰逊的会谈中，也能感到这堵墙的存在。

在60年代末期，所有人（包括白宫人士在内）都明白了，美国侵略者的50多万大军已被陷在南越的丛林之中，一筹莫展。无论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狂轰滥炸，还是美国空军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空袭都没能使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如愿以偿。

在这场连美国人自己也称做为“肮脏的战争中”，侵略者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战争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国库亏空，纳税者几乎囊空如洗。

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使约翰逊连任总统的梦想化为泡影。

民主党也同他一样威信扫地，在1968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遭到败北。结果，共和党人尼克松当上了总统，入主白宫。

约翰逊政府曾试图请求苏联“协助”美国找到一条摆脱越南僵局的出路。但毫无结果，因为华盛顿显然是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既要撤离越南，同时又要留在那里。这种立场是毫无前途的。

美国远征军在越南一共死了6万人，有30多万人受伤。在这场越南战争中，华盛顿共耗费了1000多亿美元的巨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1966年）明确、坚定地声明，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将给予越南以必要的援助。那些对这一国家发动了侵略的人应该认真对待这一声明。

华盛顿这场冒险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国被迫停战并签订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

越南人民于1975年战胜了侵略者，从而产生了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同一时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柬埔寨人民经受了艰苦的战争考验，后来又经受了波尔布特政权的恐怖血腥统治，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三国人民取得的胜利给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以毁灭性的打击。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光荣地履行了援助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崇高使命。

胡志明的宿愿得到实现

我想谈谈同越南领导人，首先是同卓越的国际主义革命

家胡志明会晤的印象。1945年9月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南宣告成立东南亚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当天，胡志明成了越南的第一任总统。

胡志明曾多次到过苏联。早在20年代初，他就作为搞地下工作的一名斗士来到我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学习过。那时，他学会了俄语。

胡志明的生平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没有必要再重谈了。我只想提一件胡志明告诉我的事情。1920年他在巴黎研究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胡志明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懂得了：

“列宁的著作为越南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产生了一个心愿：亲眼见见这位如此熟知殖民地人民愿望的伟人。1924年，他在法国和德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带有传奇色彩的彼得格勒，然后又到了莫斯科。但他没能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与世长辞了。胡志明作为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的人员前往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同列宁的遗体告别。

胡志明经过了铁窗的磨难和阶级斗争的洗礼，始终保持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在河内，在他晚年生活和工作过的一座小屋里，在他的办公桌上，象他生前那样，至今还放着一叠俄语书，其中有列宁的著作。而在他那俭朴的卧室桌上还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画家彼·瓦·瓦西里耶夫画的那张大家都很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肖像。

胡志明沿着列宁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创建了越南共产党。

该党领导越南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今天，这个党正满怀信心地领导着越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我第一次同胡志明见面是在1955年7月，他那时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正在苏联进行访问。当时，越南人民已经战胜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胡志明那次前来莫斯科是为了讨论越南面临的迫切问题和苏越合作问题。

越南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以后，3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兴盛时期。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两国合作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胡志明在1955年7月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作出的。

胡志明强调指出：

“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贵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越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越南这一困难时期，苏联帮助了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物资，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他教导自己的战友、全党和全国人民，苏联和兄弟国家提供的援助不管有多么大，那也只不过是一种需要很好加以利用的辅助资本。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利用本国的资源，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

1957年夏天，胡志明主席前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访问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同他的那次会晤同样使我很难忘怀。在那次会晤过程中，我们对苏越两国两年来的合作进行了总结。

“越南方面对这次会晤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胡志明在会谈（我也参加了）时热情地对克·叶·伏罗希洛夫说。

胡志明的宿愿是看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自由和统一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宿愿，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胡志明没能活到全体越南人民共聚一堂那光辉的一天。1969年9月3日，他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那些忠实学生和继承者，他所培育的党、军队和人民完成了他所开创的解放祖国的事业。因此，解放越南南方的最后一次战役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西贡市也改名为胡志明市，这都不是偶然的。

所有见过胡志明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都会发现，他既有革命者的热情、国务活动家的智慧，又有普通人的那种真诚可亲，平易近人。

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在最复杂的情况下，胡志明都能保持乐观精神和民族的幽默感，善于使同他谈话的人精神振奋，并很得体地开开玩笑。在友好的交谈中，他有些使人想起神话中的智者，他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们怀着无限的深情。就是在垂暮之年，他也依然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动作敏捷。

胡志明有一个特点，他在各方面，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都总是那样谦虚、朴实。他依着简朴，喜欢穿传统的越南服装。

胡志明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也会见过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里，黎笋曾多次前来莫斯科商讨有关苏越合作的重大问题。越南赢得了统一并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但这一传统直到今天仍一直保持了下来。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他说：

“越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战斗团结和全面合作万岁！”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和来宾们对这句话曾报以热烈的掌声。每当想起这一情景我不能不感到激动。

在大会期间，米·谢·戈尔巴乔夫同黎笋进行了亲切的、激动人心的会晤。

1986年7月黎笋逝世了。我同米·谢·戈尔巴乔夫及其他领导人前往越南大使馆，沉痛哀悼这位越南人民杰出的儿子。以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河内参加了他的葬礼。

现在，阮文灵同志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位闻名全国、功勋卓著的越南共产党活动家。他1936年入党，曾从事过地下工作，受过殖民者监狱的铁窗之苦，8月革命胜利后到南越工作。在越南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进入越共中央政治局，并从1985年6月开始出任越共中央书记。1986年12月，在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阮文灵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范文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著名活动家。在他担任越南外交部长和后来领导越南政府工作期间，我常同他举行会晤。现在我想着重谈谈他率领越南代表团参加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时的情况。

日内瓦会议是新越南的代表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我们苏联代表注意到，越南代表团处理问题时手法很高明，而且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

越南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他们同全体越南人民一道为努力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加强越南的国际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越南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发言，

越南朋友为建立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柬埔寨人民光荣的儿子，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韩桑林，我想说几句热情的话。他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在波尔布特实行恐怖活动的最艰苦年代，他在地下领导人民为光明的未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我是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的日子里在莫斯科同他会晤的。我们就当代的重大问题、东南亚的局势、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谈话。会见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幽静的房间里进行的。我们从容不迫地谈着，只有一名翻译在场，翻译着他那铿锵有力的话。

韩桑林对这次会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事先把所有要讲的话都扼要地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并一直把这个本子放在自己面前。

他谈到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问题，谈到了柬埔寨今天所遇到的困难，也谈到了柬埔寨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朋友们，首先是苏联和越南的帮助下，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而我当时想：“又有一个兄弟国家的人民走上了自由的道路，指引他们前进的是以这位坚强的、有智慧的人——韩桑林为首的人民革命党。”

腊斯克不喜欢“出风头”

在我同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会晤和会谈时，曾多次讨论了与印度支那局势和解决加勒比海危机有关的问题，以

及国际生活中的其他迫切问题。关于迪安·腊斯克本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关于腊斯克其人，人们说的不多，写的也不多，虽然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分别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一直同他们一道主管过美国的对外政策。这里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他不喜欢“出风头”，对于出风头，可以说他简直是受不了。他更喜欢悄悄地干，喜欢讨论些实际问题并使之得到解决。其实，腊斯克的这一品质丝毫没有影响他同国会和报界搞好关系，也不影响他及时避开反对派和新闻媒介对他的批评。

腊斯克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以精力充沛和精明能干著称。同时，他对本国政府的所思所为了若指掌。腊斯克进行过一些“艰难的”谈判，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谈判中，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特点，那就是有一股韧劲儿。如果他对某一问题已另有预案，那么，他也只有等到谈判对手已经快要要从桌旁站起来准备结束会谈时才打出来。他有非凡的忍耐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这里值得着重提一下我同腊斯克会晤中的某些问题。我们正是同他开始就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的，并于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进行这三种核试验的条约。腊斯克参加了这一庄严的签字仪式。

在美国他被认为是著名的亚非拉问题专家，他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这一点显然对他有所帮助。至于亚洲，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国家的局势，而且不仅是越南的局势，还包括老挝的局势。华盛顿将老挝视为其在东南

亚的重要根据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当美国在越南开始公然铤而走险、对社会主义的越南进行公开侵略的时候，腊斯克仍然企图证明，美国根本不打算以武力干涉印支国家的内政，更不用说对这几个国家进行武装入侵了。当我方列举了与他的说法完全相反的事实时，他干脆一声不吭。腊斯克究竟是有意歪曲事实真相，还是轻信了美国军界谎报的军情，这一点至今仍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美国军界对美国人民，甚至对国会山的立法者们隐瞒了他们在东京湾策划的挑衅事件的真相。

美国的某些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试图说明，侵略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进攻另一个国家，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按照他们的逻辑，对另一个阶级展开斗争的那个阶级也是侵略者。换句话说，侵略者就是工人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成了被侵略者。这是一种庸俗化的、与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的反科学的理论。腊斯克是这一理论有名的拥护者之一，所以令人遗憾的是，他与那些篡改事实真相以迎合大垄断资本集团需要的人一唱一和了，而对那些大垄断资本集团来说赚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 第九章 —

欧洲是一座古老 而又永远崭新的大厦

对历史的回顾 一位有特殊经历的使者 夏尔·戴高乐 “法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蓬皮杜在扎斯拉夫尔和皮聪达 三个词 总统驾驶直升机 法国社会党人的领袖 罗朗·迪马生平中的几件事 罗浮宫的珍品 毕加索的见解 凡尔赛和格雷内尔大街上的房子 在马勒梅松城堡里 法国没有忘记安娜·雅罗斯拉夫娜 彼得一世在巴黎 外省的“巴士底狱”和贡比涅 与法国人形影不离的一个词 马克思的波恩和阿登纳的波恩 1961年8月13日凌晨…… 勃兰特写下了载入史册的一页 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 最好不要忘记教训 施密特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们的大陆经常被称为“欧洲老太婆”。但要看怎样来看这位“老太婆”了！它也许还称不上是个“老太婆”。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苏美尔、埃及、巴比伦相比，它还不算是个“老太婆”。可谁又知道埋在地下的历史书籍，也就是考古学，今后还会给人们提供些什么呢？欧洲既古老，又永远

年轻。

各个时代最优秀人物的进步思想不正是从欧洲大陆传向全世界的吗？震撼了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正是在这里问世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学说诞生于欧洲。标志着人类发展新纪元开始的伟大社会变革也是发生在欧洲。

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欧洲真是饱经沧桑。它的历史是取之不尽的科学宝库。任何一段时间都充满了各种大小事件和史实，实在是惊心动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再一次怀着极大的兴趣回顾了近半个世纪历史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在战后时期，包括“冷战”的乌云笼罩着欧洲上空的年代，苏联领导不止一次地考虑过，怎样才能防止在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危险，怎样才能创造出可靠的条件使这一大陆上的国家能进行和平合作。怎样才能使拥有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也能得到摆脱军事冲突的可靠保证？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能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持久和平必须以承认并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形成的政治领土现实为基础。苏联一贯是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为出发点的。

众所周知，现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边界与战前不同。战后的边界，包括奥得—尼斯边界，是反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结果。

这些边界是公正的。根据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法文件——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以及有关国家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这些边界是合法的，必须得到各国的尊重。

战后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是保障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对

这一问题的立场是衡量各国在欧洲事务中奉行何种政策以及它们拥护和平的声明到底有多大诚意的最重要标志。

苏联及其在华沙条约组织中的盟国所持的观点是明确的：欧洲国家的边界，无论在大陆的东西南北，都是不可侵犯的。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否加入集团）一起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保障欧洲安全和发展和平合作的问题。而现在国与国的关系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从对峙和“冷战”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保障欧洲安全和发展和平合作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举行欧安会的建议，这个建议正是在新的条件下体现了联合各国的力量来发展欧洲和平合作的思想。召开这一会议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为实现这一倡议而进行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3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的代表在赫尔辛基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并于1975年8月1日签署了最后文件，这个文件确认了就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达成的集体协议。

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确认欧洲业已形成的边界不可侵犯，在最后文件中肯定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目前，由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推行的方针政策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形势明显地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仍然有效，仍具有生命力。

赫尔辛基会议与会国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举行的续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在国际事务中力求进行对话、

力求在谈判桌旁解决问题这一路线的巨大胜利。

我们一直认为，在处理有关欧洲大陆安全的问题时，应该倍加谨慎。在这里，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相互对峙。因此，旨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及保持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

苏联及其盟国在欧洲事务中所奉行的政策在其一系列建议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关于不扩大华沙条约组织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范围以及同时解散这两个联盟，而作为第一步先解散其军事组织的建议。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了关于签订华约和北约国家间以及欧安会参加国之间互不使用武力和保持和平关系的条约这一建议。如果承担了不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不诉诸任何武力的义务，这就会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和不信任感。这一倡议是提交给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关于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讨论的，在欧洲及世界的政治中，它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不论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还是在会议之外，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承认维护和巩固从签订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开始的全欧进程是非常重要的。

对历史的回顾

在苏联对欧洲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全局中，苏联同法国的关系始终都占有显著的地位。我们两国的关系史充满了各种

各样的、意义不同的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国和俄国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感到并认识到两个大国在国际利益方面有着相似、有时甚至是相同之处；而另一方面则互存戒心，甚至是互怀敌意。

当然，18世纪末俄国对雅各宾派、罗伯斯比尔时期的法国的政策也是两个大国关系史上的一部分。当时，俄国并没有出兵讨伐法国大革命。然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国专制制度不仅诅咒法国的革命者，不仅在国内迫害追求自由思想的人士，而且还积极参加了反对“这一法国时髦”的斗争。女皇曾恶狠狠地说，这种时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瘟疫”。

在沙俄驻巴黎大使西莫林的参与下，反革命势力策划了一场阴谋，企图协助国王出逃。大使甚至把写着俄军上校遗孀科尔夫男爵夫人及其随从名字的俄国护照交给了国王的家人，路易十六和他全家带着这些护照企图逃往国外，但在瓦雷纳城被逮住了。

除了那些“宣誓放弃在法国流行的革命原则”^①的人之外，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法国人统统驱逐出俄国，作为对处死路易十六的报复。

从巴黎寄来的书报、杂志还在边防海关就被没收和烧毁。许多学校甚至禁止学法语。

尽管专制政权千方百计地隐瞒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但这些消息还是传到了群众的耳朵里。当时的革命思想不仅得到了俄国的平民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贵族的同情。

^① 第17101号命令，《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圣彼得堡，1830年版，第23卷，第402—404页。——作者

1812年，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拿破仑“大军”入侵的结果是可悲的。在俄国辽阔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后，拿破仑这只老鹰一蹶不振，精疲力竭，无力再展翅飞翔了，不久，在滑铁卢战场上被彻底打垮，终于一败涂地。命运无情地惩罚了这个法国皇帝，可说是罪有应得。

拿破仑入侵后40年，又爆发了被称之为克里木战争的军事冲突。法军士兵这次与英国人、土耳其人一起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侵入俄国领土，此后大约又过了60年，法国也是同其他强国一起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又进行了一次武装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准确地讲是它的统治集团，对苏维埃国家采取了敌对立场，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在二三十年代，法国是由奉行反苏政策国家组成的大合唱的领唱，可以说是这个大合唱的指挥。

但是，我们两国也曾不止一次地并肩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应该对苏法关系问题进行反思，不仅要考虑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还要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生活本身首先要求人们正视这两个大国之间发生的冲突所引起的后果。

拿破仑的帝国灭亡了，他未能正确估计到俄国这个东方大国的潜在力量及其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鲜明例子再次说明，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并不是一回事。

不论是利用塔列兰狐狸般的狡诈在政治上搞的背信弃义，还是同俄国皇帝在河上举行的戏剧性会见，当然都没能

帮上拿破仑的忙。这个头戴三角帽的征服者根本无意同俄方达成协议，但却制造寻求达成协议的假象。这个狡猾的但基于幻想的把戏失败了，涅曼河就是见证者。

30年代的法国统治阶级的政策是这类战略失误的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他们使法国成为被希特勒首先侵占的国家之一，法国人民对此深感震惊。

苏联人民也大为震惊。无论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当战火马上就要波及到苏联这种形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还是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之后，苏联人民都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这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苏联和法国得出教训，两国必须进行合作，以防止新的世界悲剧重演。

当我们准备同法国国务活动家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时，脑海中就会有意无意地出现这些思想。当然，苏联代表，包括我在内，同法方代表进行讨论时，一向认为，历史终归是历史，主要是应当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寻求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对法关系中，苏联始终遵循这一点。苏联人民非常尊重法国人民。我也总是本着这种精神办事的。我把同我进行谈判的法国国务活动家看作是令人尊敬的伙伴，是一个伟大强国的代表，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丰富历史的国家的代表。

一位有特殊经历的使者

我忘不了1945年我在华盛顿任苏联大使期间同一位法国代表的一次会见。抵达美国的莱昂·布吕姆拜会了我。

他是法国30年代的著名人物。1936年至1938年是他的政治活动的极盛时期，当时，他曾先后两次领导人民阵线政府。法国那时的政治生活汹涌澎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以及传到法国的新的战争临近的沉重气息使法国组成了这样一个政府，如果不算巴黎公社时期，它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特殊的、独特的一页。这届政府被称为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是在法国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早些时候成立的统一工人阵线的基础上，于1936年1月成立的。

但是，人民阵线政府执政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左右。政府首脑、社会党著名活动家布吕姆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完全是一个右翼社会党人，他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缺乏连贯性，他对法西斯德国表现得软弱胆怯，这无疑有助于希特勒在1940年打败法国。法西斯分子把这位人民阵线政府前首脑抓了起来，并送往德国。

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里昂·布吕姆。

“我读过许多介绍您的文章，”我说，“特别是介绍您领导人民阵线政府工作时的文章。”

看来，我讲得过于直率了。提起人民阵线的情况显然并没有使他受到鼓舞。看得出，他并不希望回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他对自己在战前的活动只字未提，而马上把话锋一转说道：

“首先，我想通过苏联大使向列宁的伟大国家表示敬意，它经受住了希特勒德国的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我回答说：

“您是位法国人和反法西斯战士，感谢您这番友好的

话。”

然后，这位客人问道：

“您是否能够想象，欧洲现在所面临的任务有多么雄伟艰巨，我们两国所面临的任务有多么雄伟艰巨？”

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回答这些问题，讲到了这些任务是如何雄伟艰巨。但是，对于美国的作用，他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替它讲什么好话。

但是，他却以不同的口吻，不止一次地说道：

“我们应该建立友好的法苏关系，对欧洲来说，这是主要的。”

我也说：

“苏联一贯努力同法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有时苏联的好心没有得到法国的好报。您是记得那些情况的。”

布吕姆并没有对此表示什么异议，他可能认为这同法国社会党无关。

我继续说道：“您当然记得很清楚，为了改善同法国的关系，为了制止有可能发生的浩劫，苏联在政治和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多么巨大的斗争。我们曾呼吁欧洲及全世界正视现实，而当时，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德国是如何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的。非常遗憾的是，人们没有倾听我们的呼声。要知道，无论从莫斯科还是从国际联盟的讲台上，我们都向法国人发出过呼吁，但是，对于这些呼吁，当时巴黎却无动于衷。”

布吕姆对这番话没有作出回答。种种迹象表明，他根本不喜欢提到战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时期。

告别时，我们以友好的口气表示，希望今后还会有机会多次见面。

布吕姆走了以后，我试图弄清他向我谈的主要东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看来，主要的东西正是他没有直说，而只是间接作出暗示的东西。他竭力表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还没有退出舞台，他仍然在考虑如何搞好苏联同法国的关系，并希望苏联人知道这一点。

一年多以后，布吕姆于1946年底又重新当上了法国政府首脑。他当政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如果说这一政府有点什么作为的话，恐怕就是发动了残酷的印度支那战争，以图维持这一地区的殖民地地位。虽然历史的时针已经表明，印度支那人民在其自身发展中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印度支那人民走上了独立自由的道路。

在布吕姆的政治外衣上，除了战前的那一个洗不掉的污点外，战后又增添了另一个污点，这次同样也涉及法国的对外政策。好象有某种厄运之网把他缠住了，使他始终无法摆脱。

这位法国人士从来不了解，而且也不能理解法国及其人民的真正心声，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还有一件与布吕姆有关的怪事，我不能不说一说，尽管他当时已经死了。

我从美国出差回到莫斯科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之后不久，在一次外交活动中我突然遇见了……布吕姆。他走到我跟前说了点什么。我非常惊讶，忍不住问道：

“对不起，您是哪一位？”

我心里想：“难道关于布吕姆去世的消息是假的？现在站在我面前的难道就是他吗？”

看来这个人发觉了我很惊奇，就平静地说道：

“葛罗米柯先生，您不是第一个把我当成里昂·布吕姆的人，这样弄错人的事我遇到过不止一次……”

“是的，我承认，”我只好坦白地说，“其实我正打算、请注意，我只是刚刚打算把您当成布吕姆。我甚至想晃晃脑袋醒醒神：这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他说，“我不是布吕姆，尽管非常非常象他。我姓比绍夫。您可以看出，我们的姓只是第一个字母相同，我是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

当然，并没有因为他们长得相象而发生什么事件。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比绍夫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懂得奥地利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意义，也为这种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以后，我一看到他，就想起1945年的华盛顿以及坐在苏联使馆红厅的里昂·布吕姆，当时，因为突然提起了他那倒霉的人民阵线政府，他感到窘惑不安。

夏尔·戴高乐

在某些国家，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战场上血流成河的一场浩劫发生之后，一些政治家突然醒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些制订对苏政策的人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与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赢得了不朽荣誉的苏联建立并进而保持良好的关系。

夏尔·戴高乐这位卓越的法国人所采取的正是这种立场。战争期间，他侨居国外，公开领导过法国的抵抗力量。

戴高乐的法国同苏联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不错，法国政府后来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笔勾销了这一条约。在法国领导层中，与西方其他国家的阶级团结占了上风，特别是法国加入北大西洋集团以后。

1944年12月，戴高乐访问苏联期间（当时签订了苏法条约），他会见了斯大林。后来，他还同苏联其他领导人举行过多次会谈，其中包括1966年访问莫斯科时以及在巴黎同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会谈。

戴高乐不仅是当时法国卓越的活动家之一，而且还是整个西方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开创和发展缓和进程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根据两国关系历史形成的传统及欧洲和全世界当时的形势，戴高乐认识到，法国和苏联在客观上需要相互接近。

戴高乐说：“对法国来说，俄国是个可以与之对话的国家，同它的谅解与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曾参与建立苏联和法国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要知道，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倡导国。

1965年，我以外交部长身份访问巴黎时，曾把苏法关系比喻为“缓和的微风”。

后来，这阵“微风”越刮越大，变成了吹遍欧洲大陆的富有成果的大风。

当时，以及在以后几年，在整个苏法合作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关系。最高级会晤和接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会晤和接触中，研究解决了双边关系的迫切问题，讨论了欧洲及世界政治中的症结问题。

1970年的苏法议定书、1971年的“苏联和法国合作原则”

等双边文件构成了两国关系坚实的基础。这些文件的意义在于，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符合苏法合作的利益。

我曾多次访问过法国，实际上参加了近20年来所有的苏法最高级会谈，在莫斯科接待过法国多任外交部长。

现在回忆起同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弗朗索瓦·密特朗、乔治·皮杜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米歇尔·德勃雷、皮埃尔·莫鲁瓦、埃德加·富尔、莫里斯·舒曼、米歇尔·若贝尔、让·索瓦尼亚格、路易·德居兰戈、让·弗朗索瓦—蓬塞、克洛德·谢松、罗朗·迪马以及法国其他国务活动家及政治家的会见和会谈，我感到很满意。

我不止一次地同莫里斯·多列士、瓦里德克·罗歇交谈过，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在巴黎时，还同乔治·马歇、雅克·杜克洛及法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交谈过。在不同的时期，同法国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以及社会和工商各界人士的会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些接触无论从官方交往上看，还是单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看，都同样是很重要的。

我同戴高乐曾会见过几次。同他见面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联想：如同法国人有时所说的那样，法国有两个高大的形象，一个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戴高乐。在将近20年期间，戴高乐作为一名国务活动家，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在社会问题上，戴高乐并不持进步的观点。在对外政策方面，从战后初期起，他就投身于使法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股潮流。尽管如此，他在这一集团中仍然

保持了他特有的本色。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以其特有的风格一再表明自己的这种独特性。正因为如此，还在战争年代，戴高尔同罗斯福就有点儿疏远，后来同罗斯福的继任者们也是如此。

在会谈和会晤中，我曾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过戴高乐。我曾多次以部长身份访问过巴黎，戴高乐总是在爱丽舍宫接见我。交谈通常是坦率、友善的。

戴高乐善于在谈话中回避尖锐的问题。他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本领，那就是当他认为所谈的问题微妙时，他会不作出实质性反应。而且，他往往是这样谈的：看上去他似乎倾向于同意对方的意见，但实际上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常常可以感到，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通常会说“一切都有可能”，这样就应付过去了。

记得有一次，当我问到法国和苏联能否签订有利于欧洲和平的政治性条约时，他说：

“在苏法关系中，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是别人，就可能会议论一番，说签订条约的条件是成熟了或是还没有成熟。而戴高乐呢，我可以这样说，他以法国式的巧妙回避作出明确的答复，既未肯定，也未否定。

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在正式宴会上讲话时，他几乎从不用讲稿，但讲得很顺当。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据他身边的人讲，他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把事先写好的讲话稿背下来。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因此，他的即席讲话总是很成功的。

法国伟人荟萃，戴高乐完全有资格在其中占有显著的一席。但是，他却被安葬在远离法国首都，香槟省的科龙贝村

一个很简朴的墓地里。从那里，从阿尔卑斯山脚下到巴黎有250公里之远。

是的，这就是那个科龙贝—列·代茨—埃戈里茨。这位将军如果有空离开巴黎一段时间的话，他每次都喜欢到这里来。而且，他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年……

这个地方处于香槟省、洛林、勃艮第三省交界处，在这片原野和山丘上，曾经发生过不少战斗，牺牲了许多法国人。历史上，罗马人曾到过这里，当代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在此处抵御住了阿提拉^①。国王火枪兵及无套裤党人^②也曾到过此地。

科龙贝—列·代茨—埃戈里茨，译成俄语就是“两个教堂的科龙贝”的意思。其中的一座教堂是14世纪建造的圣巴基斯特修道院，100年之后又建成了第二座教堂。这第二座教堂在18世纪曾改建过，至今还在。每逢礼拜日，这位将军就到这里做弥撒。可是，那个修道院已经被毁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在这里，戴高乐曾同家人住在一幢两层的小楼里，旁边建造了一座顶尖不高的六角塔楼。这难道不象法国的古城堡吗？

他把自己的住处称为“布阿谢里”（大意为：“带有木板墙面的房子”），他的书房设在塔楼内。在那里，他常常长时间陷于沉思，撰写回忆录。他那叱咤风云的一生和尔后

① 公元434年起为匈奴人领袖。曾对东罗马帝国、高卢、北意大利进行过毁灭性的征伐。在阿提拉当政期间，匈奴部族达到了极盛时期。——译者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贵族对不穿短套裤而穿粗布长裤因而与贵族有别的平民代表的讥称。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者以此自称。——译者

的乡间隐居生活都是值得诗人笔兴大发一番的。

丘吉尔为了写回忆录，搞了一个由文学、科学工作者组成的庞大班子，他一卷卷地写“回忆录”，速度很快。而戴高乐则与他不同，他写得非常认真，并亲自抄清手稿。外交部的工作人员雷涅·蒂博多帮他收集文献资料。

代表戴高乐将军同出版社进行谈判的是他的忠实助手、与他多年合作的语言学专家乔治·蓬皮杜。蓬皮杜于1969年接替戴高乐当上了法国总统。

戴高乐力求使自己的回忆录不仅成为一部政治性作品，而且也成为一部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他果然获得了成功。有人问他：

“您并非作家，怎能写得这样成功呢？”

他回答说：“这简直是苦差事，要写下一页纸就得搜索枯肠，写出三页草稿才行。我的女儿伊丽莎白用打字机打出之后，我再修改三遍。实际上，我没完没了地进行修改。请相信我，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

作者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修改文稿，甚至当他收到排版清样以后，在长条样上也没有停止这一工作。他非常注意作品的文学形式及风格，力求使自己的著作中能够感觉到一种和谐的完美性。他摹仿古典作家的方法，用一个单词作为标题。他的回忆录共三卷，每卷的标题分别为：《召唤》、《统一》、《拯救》。我收到了寄给我的戴高乐回忆录，在我家的藏书又增加了一部新作品。

他喜爱自己的科龙贝。因此，他临终前嘱咐把他埋葬在这个清静的乡间墓地。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这是将军的全名）将永远留在了解他的人们的记忆之中。

“法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现在回忆起同法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顾夫·德姆维尔的会见和会谈，我感到非常满意。在戴高乐时期，他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达10年之久（1958—1968年），后来，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还当过总理（1968—1969年）。1966年，他曾陪同戴高乐总统正式访问苏联，而在此前一年，他以外长身份正式访问过我国。作为戴高乐身边的人，他无疑同戴高乐的观点一样，赞同发展苏法关系。

戴高乐的老战友安德烈·马尔罗也值得专门一提。战后，此人成了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他是戴高乐第一届政府（1944—1946年）的成员之一，负责戴高乐党的宣传工作，而在1959—1969年，曾任文化部长。

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天份能够同政治（指直接意义上的）结合在一起，这并不是很常见的。政府中重要的政治职位与文学家、画家、作曲家、演员等人的天份兼而有之，这种现象历来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各国大概也都是这样。

有人会问，1世纪中叶的罗马皇帝尼禄^①以喜欢诗歌、音乐著称，你又怎样解释呢？是的，他是以此著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大坏蛋而臭名昭著。据说，甚至目睹人血横流时，他还奏乐取乐，尽管这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并非真有其事。古代史料认为，尼禄如果不是个疯子，起码也是个不正常的人。他的下场是罪有应得的：这个自诩

^① 罗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皇帝（公元54年起）。据文献资料记载，此人为人残暴、好色、妄自尊大。——译者

为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的帝王，实际上是一个荒淫无耻、凶残暴虐的刽子手，他被自己的仆人、心腹、卫士所杀。临死前，他惊呼：

“一个多么伟大的演员正在死去！”

但是，例外总是有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但同时又是一位国务活动家。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

马尔罗也是这样的例外者之一，看来，谁也不会有异议。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帮助共和的西班牙作战的外国志愿军飞行大队队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过一个旅的抵抗运动的参加者。

马尔罗深信，担任文化部长之后，比起单纯从事文学创作，能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更多的事情。对于他任部长期间的情况，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介绍，而人们谈论的就更多了。

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在我正式访问法国期间同马尔罗会见时的一次谈话。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谦虚。是的，是谦虚。马尔罗是法国公认的作家，是法国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但他绝不想突出自己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时期的作用。

他谈到了别的人，谈到了政治和世界局势，并就文化问题及苏法文化交流发表了看法。只要我向他提出个什么问题，他总是非常乐于回答。他的话流畅自如，同时又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他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不涉及到所谓的德国问题。马尔罗似乎事先预料到这一点。

他说：“苏联、法国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出现新的希特勒。希特勒本人的血腥狂热已经结束。这对欧洲和全世界都已经够了。”

然后，他谈到了我国，强调指出：

“为了取得胜利，人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贵国人民，苏联人民更是如此。”

他说话声音很轻，速度较快。当时我感到，这声音不象是站在讲台上的演说家说的，而更象习惯于在壁炉旁进行推心置腹交谈的人说的。

我问他：

“您是否相信，那些制定北大西洋集团政策的人不会允许在还有不少纳粹分子的西德复活军国主义？”

马尔罗说：

“法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的。”

相信读者会同意：这句话说得很鲜明，听起来有点象格言。

随后，他又补充说：

“戴高乐将军是可以信赖的。”

这时，我说：

“要知道，并不是戴高乐一个人决定北大西洋联盟的政策，不是吗？”

马尔罗表示同意，他说：

“当然，并不是他一个人。”

但是，他再次强调指出：

“戴高乐对德国人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任何人也无法使他动摇。”

我向马尔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您既当部长，又从事创作，您是怎样使二者兼而得之的呢？”

他笑了笑说：

“我料到您会提出这个问题。好吧，我可以这样回答您：几乎没有功夫从事创作，因为时间都被社会活动占去了。社会活动是应该重视的，甚至应当十分重视。”

马尔罗坦率地说：

“我同苏联文化界人士经常保持接触，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例如，我高度评价苏联政论家伊里亚·爱伦堡的社会活动。”

他是这样称呼爱伦堡的。我们站在宽敞的大厅里，手中端着一杯咖啡，这是外交招待会的通常作法。有人告诉我们，在巴黎得喝“法式咖啡”。其实，煮这种咖啡没有什么秘密，只不过是往一个杯子里放上双份咖啡，这样就显得浓了。不过，我觉得，这同全世界流行的一般的“爱斯普列索”——一种不加牛奶的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种叫“卡普奇诺”，是在咖啡里放上打成泡沫状的热奶油。这种做法是意大利修道士想出来的，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名称，翻译过来就是“修道士咖啡”。但不知何故，这种咖啡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小吃部里却深受欢迎。

马尔罗说：

“我相信，一个文化工作者，不管他从事何种创作活动，只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献给和平事业，就能很好报效祖国。”

他这样说时，似乎在世界上，至少在欧洲，只有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但是，欧洲以及全世界所看到的却是，军备竞赛在日益加剧，核武器在不断增加，复仇主义计划正在不断策划出来。

看来，这位语言大师（他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无愧于人民的篇章）没有对所有事情都了解得很透彻，但他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析是清醒的，这是值得称赞的。在法国的优秀儿女中有一位苏联人民也非常熟悉的名叫安德烈·马尔罗的天才作家，法国有理由为此而感到自豪。

蓬皮杜在扎斯拉夫尔和皮聪达

夏尔·戴高乐逝世后，总的说来，发展苏联与法国间良好关系的路线延续了下来。1969年，乔治·蓬皮杜在戴高乐决定退出国务活动而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从而接过了政治接力棒。

当然，每一个法国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同外部世界一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两个人物加以比较：戴高乐的个性威严、鲜明，而蓬皮杜则比较谦恭质朴。作为戴高乐执政时的一位法国总理，蓬皮杜在法国人眼前出头露面的程度恰好是爱丽舍宫所希望的那样，而高居爱丽舍宫总统位置的是一位老战士，其名字曾是抵抗运动的象征。在战争年代，每一个爱国的法国人确实都认真地聆听戴高乐所说的话。蓬皮杜当时是一位不怎么知名的人物。而在国外他就更鲜为人知了。

但是，历史并不总是按常规发展的。历史有时也会发生突变。而且，不仅有可能将强有力的人物排挤到一边，使其

声誉黯然失色，而且有可能将那些以前并不很出名的人推上国内生活的表层，甚至推上国际舞台。

蓬皮杜便是这样。他的名字和活动远不是一下子便为千百万人所熟知。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即使蓬皮杜已当上了总统并在议会里得到相当可靠多数支持时，他还得考虑要使自己的仪表在法国公众面前得到好评。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1973年1月，蓬皮杜来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人们在明斯克附近的扎斯拉夫尔迎接他。当时天气很冷，寒风刺骨。总统身穿一件薄大衣，没有戴帽子就下了飞机。他的随行人员的衣着也都是“巴黎式”的。

简短地寒暄之后，我和列·伊·勃列日涅夫看到蓬皮杜明显地冷得有些打颤，就建议他再穿得暖和一些。当时，考虑到天气情况，我们已为他准备了一顶皮帽。

“请戴上吧，这样头部会暖和些。”我说。

总统坚决地拒绝了。他狡黠地使了个眼色，向那些摄影师和电影摄影师点了点头，然后说：

“帽子在我们那里并不同时髦。法国电视观众对我该会有些什么想法呢？”

不过，后来在宾馆里，在远离那些纠缠不休的记者的情况下，他戴上了有护耳的皮帽，在白雪皑皑的花园中散步时，那种穿戴的模样完全是“俄国式”的。

我不准备评价蓬皮杜在对内政策方面的观点和活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认为回忆一下他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做的某些事情，为这位国务活动家的肖像勾画几笔是适宜的。

蓬皮杜是戴高乐执政时期国家所积累的政治资本的继承人。同戴高乐一起工作，对这位将军的路线的支持，以及作

为总理对管理国家所做的贡献——这一切保证了蓬皮杜在法国社会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以前的这些活动，为其成为国家元首作好了准备。

苏联领导如同在戴高乐执政时期一样，竭尽全力，使在粉碎法西斯德国之后同法国形成的良好关系不仅得以保持，而且进一步得到发展。

两国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接触，成为这一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标志。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在70年代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些会晤中，两种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始终占居着主导地位：第一，苏联和法国应尽一切努力来防止在欧洲和全世界爆发新的战争；第二，必须使两国的实际关系符合缓和与国际安全的利益。

在苏联和法国活动家们的各种谈话中，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应该怎样防止来自德国的侵略，也就是说，应该怎样执行波茨坦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决议？”

苏联方面总是强调指出，两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应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法国方面原则上也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该执行符合和平利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都提请法方人士注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根本不能保证该国会执行这种政策。但是，法方人士对此所做的解释，打个比喻说，完全符合洛可可式^①艺术风格的古典要求，基本构思往往被各种华丽的装饰所掩盖。

^① 18世纪上半期欧洲艺术的一种风格，其特征是脱离生活，向往幻想世界，崇尚矫饰、神话题材等。雕塑和绘画优美精雅，富有装饰性，但不深刻。——译者

不错，后来又做了些比较正确的补充说明。

但是，就这个题目进行会见和交谈之后，我们总有某种不快之感，于是，我们常常自问：

“难道法国人已经忘记，至少是开始忘却这样一个真理，即：苏联和法国这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切地关心维护世界和平？为什么我们的交谈对方把某些纯属策略性的考虑摆在制止新战争爆发的基本要求之上？”

在同法国人士交谈中，我们说：

“西德的德国人自己不可能不关心维护欧洲的和平。”

苏联及苏联的领导一向认为，两个德国都应严格执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我们过去一向强调这一思想，今天也是这样。

在我与蓬皮杜的多次会见中，包括我在巴黎访问时，蓬皮杜都正确地指出：

“必须发展苏联和法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双方对于这个话题都是很感兴趣的。我代表我国向他指出：

“为了顺利发展苏法经济联系，由法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动将会是一件有益的事。”

总的来说，蓬皮杜表示理解这种愿望。但事实证明，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后来，当吉斯卡尔·德斯坦坐上总统宝座时，我们同样表达了这种愿望，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愿望。

1974年3月，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在皮聪达（高加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我也参加了这次会晤。这次会晤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但又是令人忧伤的印象。蓬皮杜那时已是重病在身。在索契附近的阿德列尔机场，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和我亲切地会面了。蓬皮杜微笑着，他的言谈举止极其和蔼可亲，一句话，是位真正的法国人。但他那简直是蜡黄色的脸却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但是，无法掩盖的是，无情的病魔正在夺走总统的生命，剩下只有最后几周，也许是几天的时间了。

我们乘直升机由阿德列尔飞抵皮聪达。可以感觉到总统累了。为了进行通常的随便交谈和保持最低限度的面部表情，他都要花力气。有时，他也想聚精会神，但显得不太自然，即使在这一瞬间，也令人感到，尽管他专心一致地看着，但目光却不是射向外部世界。他谛视的多半是自己的内部世界。谈判期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日程安排得非常宽松，总统的所有愿望都考虑到了。

但是，蓬皮杜的理智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所表达的思想清晰明了。各种谈判和会晤，如同往常一样，都是在求实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按照原来迎接蓬皮杜及其随行人员的那种规格，我们在勃列日涅夫的率领下，将总统从皮聪达送到了阿德列尔。看到总统上下汽车的样子，令人心情沉重。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未能掩饰住当时正在折磨着他的病痛。而且，面部表情显得极度痛苦。

他以这种形象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而3周之后，他去世了。

在法国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中，蓬皮杜理所当然地占有一

席之地。在法国首都建立蓬皮杜文化中心，以纪念这位已故的法国著名活动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完全正确的。

三 个 词

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是任法国内阁部长、然后任法国总统期间，我同他的会见给我留下了鲜明的、也许比别人更为鲜明的印象。但我只谈谈他主要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方面的言论给我留下的印象。顺便介绍一下吉斯卡尔·德斯坦这个人的某些特点，也许是适宜的。

当然，任何回忆录所反映的都是作者的个人意见和主观见解。这完全不是因为作者本人希望这样。而仅仅是因为作者多次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的某些特点和品质在作者的思想感情上留下了印记，而作者正是从这些记忆中汲取素材，并介绍给其他人。

我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初步印象是在他任戴高乐政府，尔后任蓬皮杜政府的部长时形成的。我同他在1966年见过面，事隔3年之后，在1969年又同他见过面。

虽然人们知道，他对戴高乐路线的忠诚程度时有减弱（主要是在内政方面），他还是保持了自己作为戴高乐路线拥护者的名声，即使当将军的形象开始变得暗淡时期也是这样。的确，1969年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反对戴高乐所提议的改革，按照公认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遭到失败。因此，总统下台了。吉斯卡尔·德斯坦积极支持与其紧密合作的蓬皮杜竞选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是个中间派（当然，这里指的是政治

上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思潮），他的这一政治面目具有某种吸引力。这对蓬皮杜作为总统候选人，以及后来成为国家元首都很有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包括他任经济和财政部长时所直接主管的领域——法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方面的观点，也被说成是带中间色彩的。

蓬皮杜去世后，吉斯卡尔·德斯坦成了法国的总统。象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他在一定程度上尽力显示对其西方盟友们们的忠诚，首先是争取与美国和联邦德国能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尽管从1966年起法国就已不是北约军事组织的成员了。但是，在同法国总统的交谈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在表示忠于北大西洋联盟的同时，极力想使法国保持自己的民族面目，继续遵循前些年开始执行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

上面所提到的方针，是吉斯卡尔·德斯坦许多有关苏法关系言论的基础。欧洲和世界的政治现实是，在吉斯卡尔·德斯坦上台前就已建立起的苏法合作显示出相当大的作用，因为这种合作符合苏法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这种合作已经有了发展，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懂得苏法合作的意义，他就任总统之后，很快就发表声明，表示要十分重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继续执行戴高乐和蓬皮杜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可归结为：苏联和法国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为了缓和与和平的利益进行合作。法国用戴高乐将军说过的三个词来称呼这种政策，即缓和、和睦、合作。

至于前面所谈到的另一个提法，即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要保持自己的面目的问题，当它在一些军事问题上表示要

忠于北大西洋联盟时，这条原则当然就同法国方面的路线相矛盾了。我们不止一次地提请总统和法国政府注意这一点。

不过，双方尽力利用其对外政策中相吻合之处，即关心建立各国间的和平协作关系。通常，在重要的苏法会晤中，在商讨双边文件时，我们都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每次同总统会晤之前都很清楚，将要讨论的是苏法关系和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不一样，这要视情况而定。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喜欢绕开这些问题。苏联领导，不管谁作为它的代表，也认为对问题不要兜圈子，而是要研究问题的实质，并且从最尖锐的问题开始。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找到需要讨论的问题。

1974年12月初，勃列日涅夫到法国进行工作访问。吉斯卡尔·德斯坦就任法国总统后，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同他举行会见。不过，他在其他级别上同我们谈过，我们对他是了解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多次参加过苏法会晤和会谈，包括他任政府财政部长时参加的最高级会晤。他长期担任苏法经济、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的法方主席，在不小的程度上亲自促进了法国与苏联经济关系的发展。

总的来说，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时的政策也有波动，但是，他（包括担任总统期间）还是为贯彻戴高乐所开创的苏法关系方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谈判中，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所讨论的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之一是，就尽快结束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达成协议。而要找到达成这一协议的途径并非易事。

正因为如此，在同法国总统的谈判中，苏联方面竭尽全

力说服法国，使它支持顺利结束全欧会议的主张。经过共同努力，在苏法联合公报中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为尽快结束会议，为进行会议的第三阶段和在最高级别上签署最后文件，已具备良好的前提。”

苏联和法国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欧会议参加者所面临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做法有助于采取一个重大步骤，以保障这个会议顺利结束。这一步骤明显地证明了苏法会晤对克服外交僵局、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所具有的意义。

总统驾驶直升机

总的说来，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接触表明，他对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对于问题的实质，他可能采取与谈判对手的观点不同的立场，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立场，这是另外一回事。在他同我们的交谈中就曾有过这种情况，例如，讨论核武器、北约集团及其政策、围绕阿富汗的局势及一系列其他问题时就是这样。

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谈话进行认真的准备。在就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他不是现想现讲，而经常是摆出论据，举出事实。看来，那些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在许多方面也以他为榜样。经常可以感到，总统周围的那些人，在同外国代表打交道时有着相似的风格。

作为一位有相当文化修养而举止又稳健的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似乎可以采用上流社会的自由交谈方式，回顾一下历史。但是，他几乎没有这样做过。

看来，他的性格对此产生了影响。

我从未见过吉斯卡尔·德斯坦情绪不稳、急躁、仓促从事。勿庸讳言，现在有些人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甚至还会信口开河。不错，他们过后会做出更正，解释说，这些话嘛，说是说了的，但当时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吉斯卡尔·德斯坦并不特别拘泥于礼仪。这一点给我们，包括我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根到底，礼仪应该使交往更加方便，而不是使其复杂化。

关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个人，流传着不少趣闻。那些刨根问底的法国记者以及外国记者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趣闻登在报刊上。德斯坦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由头。我本人就曾对这样一件事感到惊讶。

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时，苏联代表团住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古堡。谈判也是在那里进行的。法国代表团从巴黎乘车来到这里，在宫殿不大的前厅里，大家等候着双方代表团团长的出现。

突然，在古堡的屋顶上空响起了引擎的轰鸣。然后，一架不大的直升机降落在窗下的草坪上，吉斯卡尔·德斯坦从直升机中走了出来。有位法国人说了一句话：

“直升机是由总统本人驾驶的。”

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把这句话当成开玩笑。但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来到草坪上同东道主告别时，十分惊讶地看到，总统竟坐到直升机驾驶员的椅子上，微微一笑，轻松自如地把直升机升空，在古堡上空盘旋一周，朝我们挥挥手，便朝巴黎方向飞去了。

人们告诉我们：

“虽然他身居要职，但总统一有机会就开着汽车奔驰一阵。这使爱丽舍宫的警卫人员乱成一团，他们不止一次地坚决请求国家元首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

后来得知，总统的汽车出了一次不大的交通事故之后，他的理智才占了上风。

记得还有这样一件事。就在那次访问期间，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法国积极开展了一场节约燃料的运动。这是总统本人倡导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甚至下令在爱丽舍宫内要用木柴取暖。

在举行苏法会谈的朗布依埃古堡，所有的壁炉都点燃了。可能由于这些壁炉长时间没有用过，也可能因为烧壁炉的人没有经验，这些壁炉冒烟不止。整个古堡弥漫着刺鼻的浓烟，结果不得不经常打开通向花园的门窗，可是要知道，当时是12月份。

结果，一些法国代表团成员，其中也包括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都感到不适。傍晚，烧壁炉的试验结束了。只好改用暖器，这才为继续工作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

我同吉斯卡尔·德斯坦还会见了一次。1986年9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他参加了在该国北部森林举行的狩猎活动。在从乌兰巴托返回巴黎的途中，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客人，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昼夜。

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有意思的谈话。从谈话中我明白了，法国内外的某些人试图将吉斯卡尔·德斯坦从当今政治人物中除名的做法是徒劳的。昔日的法国总统，如今的参议员，还没有把自己的佩剑插入剑鞘，并准备在国内的政治斗争舞台上用这把剑进行一番较量。

他肯定地说：

“在法国，我的支持者们也希望我这样做。”

现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政府中不担任什么正式职务。但是，看来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法国以外，有许多人常常回想起这位在法国历史及其对外政策史上留下不能抹煞的篇章的人，这不是偶然的。

法国社会党人的领袖

1981年5月在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吉斯卡尔·德斯坦遭到了失败。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总统。这次选举虽未使这个国家动荡不安，但毕竟举国哗然。力量的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并且对资产阶级不利。左派的力量——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左派激进分子，占了上风。因此，1981年6月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

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并不轻松。它过去没有机会积累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善于观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新的法国总统不准备将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成分引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左派力量取得辉煌胜利后不久，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我有机会会见了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克洛德·谢松。这位部长声称：

“新政权将引导国家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他讲得热情洋溢。我和参加会谈的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话说得过分好了，但未必能成为现实。

我对我的法国同事说：“好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

都会弄清楚的。”

果然，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当然，任何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哪怕是试验性的），在法国都没有看到。

1984年6月，密特朗访问苏联后，苏法关系出现了某种进展。在同他举行的会谈中，我们方面曾强调指出，在对法关系上，苏联遵循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久的、广泛的利益，是为了促使苏法两国人民相互接近，加强他们之间的谅解和友谊。我们对他说：

“苏法关系在近些年的停滞之后，要重新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政治领域取得进展，这在当前具有首要的意义。毫无疑问，特别重要的是，苏法关系应当更为稳定。”

总统访问莫斯科时，我参加了同他举行的会谈。除此之外，我还有两次机会同他举行会见和会谈。一次是那次访问期间在克里姆林宫，另一次是1983年9月在巴黎，当时我从马德里返回莫斯科途中，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到达那里。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们的著名外交家沃龙佐夫。

与密特朗谈话所留下的印象，同总统访问莫斯科后留给苏联方面的印象一样，只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在巴黎举行的会谈中，他显得更加拘谨。众所周知的南朝鲜飞机事件给谈判的气氛增添了“电波”影响。

对于后来在苏法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最好根据几次苏法最高级会晤来作出评价。康·乌·契尔年科于1984年，米·谢·戈尔巴乔夫于1985、1986年分别同密特朗举行了这种会晤。

密特朗1986年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还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也会见了我们。

所有这些会晤，特别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密特朗的最高级会晤，使苏法关系得到了充实，合作精神得到了某些恢复。在1986年那次访问期间米·谢·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以及访问期间和访问结束后公布的文件，都反映了那次访问的具体成果。

在我送法国总统去机场途中，当他谈到同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以及访问的整个气氛时说：

“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于发展双边关系，对于广泛的国际政治关系的意义，我想应给予最高度的评价。”

在苏联，法国总统1986年的访问结果也得到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在其他一些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这次访问的结果也得到了这种评价。

法国方面同密特朗一起参加莫斯科会谈的还有新任外交部长让·贝尔纳·雷蒙，他是在总统访问莫斯科前不久受命上任的。在此之前，雷蒙曾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并在外交界受到尊敬。

罗朗·迪马生平中的几件事

80年代，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位新的法国活动家——罗朗·迪马。1984年12月，他就任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以前我没有见过他。因此，结识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的一位代表，就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尤其是因为迪马本人无疑也是一位能引起人们相当兴趣的人物。

迪马曾参加过抵抗运动，他生平中的这件事本身已经给我留下了印象。他年轻时就已体验到战争的悲惨。战火也波

及到了他的家庭。迪马的父亲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于1944年遭到希特勒刽子手的残害。

显然，这在迪马的思想里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不能说他总是沉湎于过去，常常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但是，迪马有理由为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而感到自豪。

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一位著名律师和记者，但他仍忠于抵抗运动的朋友们，仍忠于同法西斯斗争的理想。在“冷战”时期，在50年代法国反动势力活跃时期，迪马积极地、常常是成功地、为遭到攻击的抵抗运动老战士，为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人进行辩护。在他为之辩护的人当中，也有不少共产党人。正是在那个时期，他结识了密特朗。

1985年3月迪马在莫斯科访问时，我同他进行的最初几次谈话表明，尽管他不是职业政治家或外交家，但他在国际事务方面仍有不少的经验。他是法国当之无愧的代表，这就是他通过会谈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记得他曾用一个鲜明的提法来描述同苏联的政治对话：

“这种对话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常数。”

这句话说得言简意赅。

罗浮宫的珍品

除了两国安全的根本利益以外，两国丰富的历史，两国的文化、艺术也总是说明，苏法两国人民应相互谅解，在精神生活方面应进行交流。

我每次到法国，该国政府差不多都安排参观一些法国人特别珍惜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古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在法国能够看到的东⻄，远非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会对法国的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兴趣。

法国人好象猜到苏联代表们的心思，总是很得体地推荐参观罗浮宫、巴黎圣母院、凡尔赛、贡比涅、圣米歇尔山、卢瓦尔河谷、马勒梅松城堡，当然，还有马赛、里昂、波尔多、第戎等城市。在不同的年代，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有机会参观了法国及其首都的许多名胜古迹。

在罗浮宫，在这一庞大的宫殿内，现在是国家艺术博物馆、工艺品博物馆和位于宫殿北侧的财政部。目前用房严重不足，极其丰富的文物都无处收藏，而财政部的官员却仍然占据着罗浮宫的一部分，这是令人惊奇的。

罗浮宫历尽沧桑。过去，在现在博物馆的所在地，曾经是一个要塞，是巴黎的防御据点之一。要塞同时供作军械库、皇家金库和监狱之用。这样的事过去也是有过的。

从1791年起，罗浮宫首先是博物馆。它的展厅仍在不断扩大。除了原已开放的大厅之外，不断有新的大厅修复之后开放。

罗浮宫是艺术珍品的无价宝库，主要收藏绘画和雕塑作品。就其收藏量来说，这个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罗浮宫是最伟大的艺术圣殿之一。著名的《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和《米洛斯岛的维纳斯》在这里各自占有荣誉的一席。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委罗内塞、

鲁本斯、伦勃朗——仅仅列举一下这些人的名字就令人敬佩不止！他们的作品是世界艺术的珍品！这些作品也在这里展出。

罗浮宫里没有不卓越的作品。参观这个博物馆时，我不仅被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所吸引，而且被象尼古拉·普桑、安托尼·华托、雅克·路易·大卫、欧仁·德拉克洛瓦、居斯塔夫·库贝等许多杰出的法国艺术家的作品所吸引，看得入了迷。

罗浮宫所收藏的绘画和雕塑品总共有两万件左右。法国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几百年功夫才收集到这些珍品。至于收集的办法，有时可不能认为是人道的办法。其中相当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向战败国索取赔款的形式或者干脆进行掠夺。这是拿破仑式的征用办法。

在罗浮宫内，绘画作品、大理石雕刻、珍贵的宫廷家具和各种摆设都各得其所，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些国宝，法国人很珍惜，爱护备至。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对这座博物馆所收藏的艺术财宝至今仍然印象很深。

法国历代国王都很喜爱罗浮宫，欣赏这里的珍宝成了他们的一大乐趣。只有路易十四把他的官邸迁到了凡尔赛。拿破仑为继续建造罗浮宫做了许多事。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座宫殿才竣工。

是的，几乎每次参观罗浮宫之后，同法国人士再谈起来都感到有话可说和有东西可回忆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为谈话建立一种良好的气氛。

一个法国人会问一个外国人：

“您参观过诺特尔达姆德巴黎吗？”

这是巴黎圣母院几个字的法语发音。

假如这个外国人答道：

“不，我没参观过。”

这样的回答会使这个法国人不胜惊讶。

几个世纪以来，远在艾菲尔铁塔建成之前，圣母院曾是法国首都的象征，是它的核心。700多年前建成的这座法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真是富丽堂皇，深深地嵌入巴黎人、以及所有法国人的意识中。

许多绘画大师和语言大师的创作都曾取材于这个教堂。譬如，回顾一下维克多·雨果就足够了。这位杰出的作家把圣母院比作“用石块砌成的交响乐”，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写出了一部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这部作品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激动不已。绝大多数法国人从小就了解这位作家用丰富想象创造出来的人物——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的坎坷命运。

其实，在当今法国，人们所重视的不是与“教堂”这一概念相关联的宗教外壳，而是法国及其人民所赋予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和艺术内容。

一般地说，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某种自己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东西，一提起它就能联想到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城市因此而载入史册。这可能不过是一幢漂亮的建筑，一个博物馆，一个古建筑或某个出名的现代建筑。在巴黎，这就是艾菲尔铁塔。

根据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顺手写成的诗句，法国人把这座铁塔称为“牧云女郎”。从这座铁塔上可以放眼远眺法国首都及其四郊的美丽景色，对此我自己有过体验。它作为

一个名胜古迹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自1889年建成以来已经有1亿人参观过，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在巴黎或其他城市的街上随便问一个法国人：“巴黎为什么要有一座艾菲尔铁塔呢？”那么，他会惊异地望着你，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会觉得提这类问题本来就是不合情理的。他有一段时间不知所措，之后他会说点儿什么来回答你，大致会是这样的说法：

“难道能想象巴黎没有艾菲尔铁塔吗？”

当然，这样的回答一部分是出于感情，但实质上是正确的。

在同法国人士谈话时，因为各种由头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艾菲尔铁塔，需要稍稍缓和一下气氛或是在下一轮政治谈判之前需要轻松一下的时候更是这样。

毕加索的见解

早在青年时代，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见见一位可以说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画家。至少是所有对绘画艺术感兴趣的人都知道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帕勃洛·毕加索。

他是西班牙人，但他把自己的一生与法国联系在一起，选定了在那里从事创作活动。

毕加索是当时最驰名的画家，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当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占领了巴黎时，毕加索决定留在巴黎。这一举动本身就是英勇的行为，炽热的爱国主义行为，是值得最高度赞扬的。

他对一个纳粹军官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当这个希特勒分子闯进画家的画室并在那里看到了《格尔尼卡》这幅画的巨大的彩色复制品时，他问道：

“这是您干的吗？”

画家平静地回答说：

“不，这是你们干的。”

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

造型艺术界认为，毕加索笔下描绘的是被法西斯炸弹炸烂了的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他以此来表现一种恐怖感和对法西斯的鄙视。

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止一次地去过法国，但一般是随苏联代表团去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安排了各种项目，但就是没有安排同那些有意思的人的会晤，这些人不担任什么国家职务，因而也就不会引起那些制定接待计划的人的注意。如果某个人还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的社会运动，那么，对制定接待计划的人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而要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总觉得有些不方便，因为这需要从计划中取消一些正式活动或者减少这些活动的时间。

但有时由于某种巧合，也举行一些计划外的会晤，甚至是偶然的，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半偶然的”会晤。当一方没有料到要举行某种会晤，而另一方则希望举行这种会晤并有意加以安排的时候就是这样。于是我“半偶然地”，简直是碰上了毕加索。

法国礼宾部门把此事安排得好象我和这位绘画泰斗的会晤是偶然的。虽然大家都明白，这种意外的事不可能是偶然的。

列·伊·勃列日涅夫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时候，安排了参观罗浮宫。苏联客人，我也在内，准时抵达这一艺术的宫殿。在这个博物馆二楼，在最大的一个厅内，馆方人员完全按照法国的礼节迎接我们，很有礼貌地欢迎我们。

突然，一个身材不高的人穿过周围的人群，快速地挤过来并伸出了手同列·伊·勃列日涅夫，然后同我及其他同志握手，并且简单地说了句：

“您好，我是毕加索。”

代表团团长和著名画家相互简短地问候致意。然后，毕加索好象往后退了退，以免影响客人参观。客人们就继续往前走了，况且在这个大厅的另一头还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幅名画《莫娜丽莎》。

这时，毕加索快步走到我面前。

“葛罗米柯先生，我以前见过您。”

我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说这些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可我确切地知道，我同他并没有见过面。否则，我会记住的，况且我自己也很想同他认识一下，同他交往交往。

毕加索表示了一个愿望：

“您能否耽误几分钟和我谈几句话？”

我说：

“我很乐意这样做。”

毕加索开始谈起来：

“您知道吗，我和苏联人的交往很少。有些苏联知识界人士还来看过我。但贵国公众对我这个画家的看法如何，我还没有一个概念。”

正如所说，我们是“边走边谈”，而且就在罗浮宫的大厅里，但这丝毫也没使我们感到不方便。

毕加索说：“我理解，这里有距离造成的不便，也有旅费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在苏联举办我的画展一事，没能象我所期望的那样办。但这可能是我自己的过错。我不愿让我的许多绘画经常从我的眼前消失一段时间。最好让它们总是留在我的眼前。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样做并不怎么好。但我经常在想，用实业家的话来说，怎样能更多地打入苏联市场。当然，说的是转义上的市场。”

画家以此表示，在苏联，即1956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那些画展是很不够的。毕加索的意见也涉及到了苏联人对他的绘画创作方向的实质所持的态度。他终归是立体派的创始人，虽然也曾创作了许多新古典主义式的作品。毕加索的许多作品接近超现实主义，在不少作品中，人物原貌被随意扭曲了。他自己也同意，关于他的创作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看来，对它的态度也不会是单一的。

和毕加索站在一起的还有他的3个熟人，看来也是画家。毕加索和其他这些人没有陪苏联代表团一起参观博物馆，很可能这也是根据接待计划安排的。因为和毕加索聊起来，我就停了下来，他的几位熟人也呆在这里。旁边挂着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画《为约瑟芬加冕》。这是一幅巨幅油画，原作者画的复制品现存凡尔赛宫。

我说：

“我喜欢大卫的作品，他的画在罗浮宫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毕加索说：

“大卫是法国伟大画家之一。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绘画和整个艺术是不会停滞不前的。”

在罗浮宫里，毕加索的画连一幅都没有展出，这使我确实感到不解。但我没有同他谈这些。

尽管他已上了年纪（毕加索生于1881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我觉得，他甚至很难在原地站一会儿。他问道：

“您可能不止一次来过罗浮宫吧？”

我回答说：

“我来过罗浮宫大概有五六次吧。”

我想，应该说我也了解他的艺术。所以我就马上把话锋引到这个题目上：

“我也经常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那里也看到了您的画。其中我很喜欢您给您父亲画的肖像。这幅肖像是以现实主义手法画的，受到绘画爱好者的青睐。”

毕加索说：“是的，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爱来画这幅肖像的。这幅肖像的创作手法是新古典主义的，这是现在的叫法。但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作为画家的我本人在内。”

而在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好象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我们原先已经谈到过的那个题目。

毕加索说：“我知道，在苏联一般地说是尊重我的。很可能尊重的是我的名字。但对我的画并不特别尊重。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生变化。”

我决定对这个题目不进行深入谈。如果论证说他的艺术在苏联受欢迎，这不合适，听起来很虚伪。

遗憾的是，在我国真的很少了解他的创作。虽然画家本人非常有名：早在战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他那举世闻名的《和平鸽》是反战运动的象征；他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战士，是“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金的获得者。

我和画家告别了，况且我们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已快走到出口处了。我和他握了手之后，他说：

“毕加索只能是毕加索，而不会成为别的什么人。”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不仅他的创作，还有他的反战观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热爱生活并为之而奋斗。总之，毕加索作为一个人，一个画家，一个公民，始终保持着他自己的本色。

时间在流逝。有一次，法国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正式访问苏联的时候从巴黎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

“我知道您爱好绘画艺术，”他说，“我现在把这幅毕加索的画转交给您。以前没能有机会这样做。”

毕加索是1973年逝世的，而我和迪马的这次谈话是已经过了整整10年。他把毕加索的《和平鸽》转交给了我。画的一角写着“32”这个号码。每当有人请画家把这幅已为人们所喜爱的杰作再重新画一遍时，画家画好后就编上号码。他画了一遍又一遍，在每一张上都编了顺序号码。

这样，我家里就挂上了著名的《和平鸽》的第32号真品。

凡尔赛和格雷内尔大街上的房子

到法国来访的人总是要参观曾经作为法国国王主要行

宫、后来又成为国家博物馆的凡尔赛宫殿花园建筑群。法国17—18世纪这一杰出的古建筑与该国历史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当你和法国人交谈时，不管对方是政界人士还是学者，是工人还是农民，是作家还是神职人员，是学生还是演员，只要一提到这个地方，对方就会感情洋溢。从对方的脸部表情你马上就会发现，他对你参观了凡尔赛并知道它在法国人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感到满意。

正是在这里，在凡尔赛，1789年8月国家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为资产阶级铺平了道路，对封建秩序、封建的社会制度给以致命的打击，这种制度的末日来临了。法国虽然还保留了皇帝、国王，但执政的已经是资产阶级了，它也就成了法国真正的君主。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凡尔赛落入德国人之手，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就驻扎在这个昔日的王宫。1871年1月，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这座宫殿里加冕。同年，在巴黎公社失败的日子里，反革命的国民议会和梯也尔政府在这里策划了对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的屠杀。1919年6月28日，在该宫的镜厅，协约国和战败的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建筑群包括大特里亚农宫和小特里亚农宫以及周围的花园。这两个宫殿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

1717年彼得一世到过大特里亚农宫。因此，也许有理由说，由于凡尔赛的雄伟壮观给俄国沙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开始在彼得戈夫修建那座著名的宫殿花园建筑群及各种喷泉。

我顺便举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例。不久前，苏联的古迹修复人员在一座位于格雷内尔大街的、属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

的房子里进行了一些施工工作。他们推测说，彼得访问巴黎时曾参观过这幢房子并且看来高度评价了它的建筑和装饰。

这种推测的理由是，当年建造这幢住宅的一位室内装修技师和一位建筑师助手后来到了圣彼得堡并参加了冬宫的内部装修工作。

至于大特里亚农宫，那里现在是接待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的宾馆。有一次苏法举行最高级会晤时，我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也有幸受到东道主好客的接待，在这座宫殿中度过了3个昼夜。

在马勒梅松城堡里

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约瑟芬在皇帝赐给她的豪华的马勒梅松城堡里度过了她的余生。拿破仑送礼大手大脚的，有时还赠送宫殿、城堡，甚至是王位。

1814年，当这个冒险家皇帝显赫一时的官运告终时，约瑟芬正重病在身。同年，俄国军队进入巴黎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曾到马勒梅松拜访过她。这是一种独特的“骑士”姿态，符合俄国帝王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约瑟芬和推翻了波拿巴帝国的俄罗斯强国的皇帝谈了些什么，历史没有留下记载，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值得注意的话。亚历山大考虑更多的是法国，而不是约瑟芬。

在这位皇后住过并去世的马勒梅松，人们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

马勒梅松实际上是法国唯一的拿破仑纪念馆，如果不算科西嘉的纪念馆的话。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感到惊讶，

因为许多法国人现在仍然极为崇拜这位著名的科西嘉人。我和其中一些人谈到过这个话题，他们解释说：

“法国有许多与拿破仑的名字有某种关联的地方，比如说残疾人之家，它的地下室里有拿破仑和他的儿子小鹰的墓，还有那个马勒梅松和其他地方，因此很难选定某个地方来建立一个结构统一的博物馆，以纪念这位法国皇帝。”

我们的法国东道主经常建议我们参观在某种程度上与俄法关系史相呼应的那些项目。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联系这个事实本身总体上说有利于今天的苏法关系。

法国没有忘记安娜·雅罗斯拉夫娜

我有一次访问法国时，在活动日程中安排参观巴黎以北50公里的小城市桑利斯。

我们和许多我国同胞一直对桑利斯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与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智者）的女儿安娜的生平有联系。1044年，安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亨利一世，她就成了法国的王后。

剧作家伊万·科契尔加在诗剧《雅罗斯拉夫（智者）》中成功地描绘了基辅罗斯时期的风情，为此他荣获了苏联国家奖金。作者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写的这部剧作，我国的许多戏院上演了这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话剧。安娜·雅罗斯拉夫娜在剧中说了这样的话：

“法国国王派来了媒人。

如果父王决定把我嫁出去，

人们就会让我骑上快马，
带到巴黎去，
那里野狼嚎叫，
象在荒野的树林。
街道肮脏，
房屋阴沉、寒冷、黑暗。
那里没有店铺，没有好裁缝，
法国人没有
好面包，没有蜂蜜，
没有鲟鱼，没有家乡煎饼，
没有我们的甜西瓜。”

是的，在那个远古年代，罗斯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繁荣国度。难怪斯堪的纳维亚人把它称做“加尔达里卡”，即“城市之国”。11世纪的巴黎同基辅这个京都相比，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就当时来说，安娜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她学会了好几种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教会斯拉夫语，能说会写。而她的丈夫——法国国王及其几乎所有的近臣还都是文盲。法国的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1053年安娜生下儿子腓力，之后不久她在桑利斯修建了圣文森特教堂以示纪念。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建造了一所同名的天主教修道院。现在那里是一所学校。在教堂的入口处竖立着一位淑女的全身雕像，这座雕像至今仍引人注目。雕像下面有题词：“俄罗斯的安娜，法国王后，教堂的奠基人，于1060年。”这就是为安娜·雅罗斯拉夫娜塑造的永久形象。我们站在这一塑像前默默地说：

“你好，美丽的同乡。”

大约20年前，我在巴黎参观过有关我们两国关系发展史的苏法文件展览。在展览会上展出了安娜给她父亲的信的影印件。

据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愉快。1060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幼子腓力一世登上了王位（他作为法国国王执政到1108年）之后，安娜就搬到了桑利斯住。过了一段时间，她成了瓦卢瓦伯爵的妻子。但罗马教皇认定这一婚姻是非法的。5年之后，新的丈夫也死了。

在信中（我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影印件），安娜请求父亲允许她回国，回到基辅，因为在“野蛮”的法国人中间她很难生活。

后来究竟怎么样了？这方面史料异常混乱。而且，不论是法国的研究人员，还是我国的研究人员，都令人奇怪地避免涉及安娜晚年的生活，这更令人诧异。

中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说，她去了基辅，生命的最后七八年是在那儿度过的。所以法国没有她的坟墓。如弗·梅泽雷写的从远古时代至1588年的三卷本的法国历史书中也是这么说的。这一著作直到17世纪中叶才出版。

莫斯科的列宁国立图书馆收藏着一套这部三卷本的古老巨著。从这本书中古代法语翻译过来的关于安娜的记载是这样说的：

“亨利一世既没有子女，也没有妻子。他明白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当时他39岁），同意了要求他为王国保证继承人的御前会议的忧虑。他听说有一位美貌的公主能够征服伟大的君主的心。这是我们当代人称之为莫斯科维亚的罗斯

大公、称号为智者的雅罗斯拉夫的女儿安娜。亨利一世听说她品德高尚，深为动情，于是在1044年派德莫主教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去求婚。

“他的求婚被接受了，并且给予了只有这样的国君才能得到的礼遇。公主被交给了主教，被带到了法国。举国上下兴高采烈地庆祝婚礼，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一婚姻会比国王同第一个妻子马蒂尔达的婚姻更为幸福。

“但是善良的法国人的希望没能立即实现：8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孩子。日夜盼望幸福降临的法国已经开始失望，国王为此非常忧伤，安娜比他更忧伤，悲痛异常。她吃遍了所有的药，向上天祈祷，指望圣文森特——法国人的保护神能赐福给她。安娜终于感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遂于1053年底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腓力。

“安娜在桑利斯修建了圣文森特教堂以示谢意。她还生了两个儿子——罗伯特（先于其父而死）和古果（后来娶了一个伯爵领地的继承人成了德韦尔芒杜瓦伯爵）。还有一个女儿，名字不详，因为她在童年就夭折了。

“1060年国王死后，安娜去了桑利斯，因为离圣文森特修道院近，她喜欢在那儿住。她在那儿住了不久，因为德克莱贝伊瓦卢瓦伯爵劳尔·德佩隆把她抢走了并娶她为妻。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了她的同意。安娜当时刚刚34岁。

“因为伯爵的第一个妻子还活着，教会认定这一婚姻是非法的，并因此把他逐出教门。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迫使伯爵与他的新婚妻子分手，直到结婚后5年伯爵死了，他们才离别了。

“安娜第二次守寡，正如所料，因她作为王后而如此下

嫁，受到法国人的鄙弃，安娜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那儿又生活了七八年。”

但是，雅罗斯拉夫这位出名的女儿究竟在什么地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在这方面有些特殊情况是令人很感兴趣的。

安娜死后最初600年的大部分史料表明，她是在基辅走完生命之路的。研究基辅罗斯的苏联专家谢·维索茨基教授也是这样写的。

但是，在近300年，离我们的时代越近就越发现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死在法国。“她宁愿留在法国，而不愿返回本国”，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迪尔当在1816年在他关于自留里克时代以来的俄国历史的巨著中是这样说的。这部巨著中只有两小段谈到安娜·雅罗斯拉夫娜。

多数苏联历史学家也认为，安娜是在法国结束自己的一生的，并没有返回罗斯。值得注意的是，最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干脆回避这一问题。比如，鲍·德·格列科夫院士。这位非常权威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基辅罗斯》一书“雅罗斯拉夫时期的基辅和西欧”这一章中专门有一节“基辅和法国”。其中一共有6行半谈了她的两次婚姻，她的儿子法国国王腓力，谈了她曾亲手签署法国文件，但却只字未提她以后的命运。院士本人在这一章开头就说，这一章的史料“未经认真研究”，“只引用那些仅仅能够描绘基辅罗斯的国际地位的轮廓的一般性史料”。^①这些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位院士采取了上述态度。

^① 鲍·德·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1953年版，第486、488—489页。——作者

我想提一下，在我们苏联拍摄了一部题为《法国王后雅罗斯拉夫娜》的电影。影片介绍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是怎样到法国的，也丝毫未提（我想这又是受我国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她返回基辅的事。

最后还应指出，在历史学界还有一种大概可以说是半幻想式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有学者德·德·库利尼奇。他说，安娜回到基辅后正遇上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在互相争吵内哄，对她接待又很差，安娜于是又回到了法国。^①

从这篇著作看，好象王后11世纪在欧洲的旅行是轻松愉快的消遣。似乎在那久远的年代里没有频繁的流血战争，没有强盗的劫掠，密林中没有无数的野兽。要知道，当时这种旅行一般要长达几个月。

总之，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罗斯，都未找到安娜的坟墓——这个谜最终仍未解开。

不错，1825年法国出了一本关于安娜·雅罗斯拉夫娜的文件集。这本书是法国文物的爱好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整理的，他还写了前言。

他援引法国的史料写道，安娜“返回了俄国”。然后他说，1682年有个叫梅涅斯特雷的神父在离巴黎不远的维利埃天主教修道院发现了她的坟墓。这种观点一直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后来有人对它提出了怀疑：新的研究人员开始论证说，这一棺墓不过是为了纪念王后而修建的、类似于桑利斯的那种纪念碑。

但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本人支持梅涅斯特雷的

① 《历史问题》，1967年第2期，第218页。——作者

假设，即亨利一世遗孀的纪念碑是安娜·雅罗斯拉夫娜的坟墓。这里有意思的是，从那时起（已经过了150多年），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坚信不疑地断言安娜的坟墓就在法国，没有一个人对梅涅斯特雷的“发现”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猜测信以为真。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我也可以发表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况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我国同法国关系表现出来的任何兴趣本身就值得注意。

当时（说的是11世纪）的法国史料不可能不把法国王后这样的人物的逝世记载下来。而且安娜当时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她不仅是王后（法国国王的妻子），而且曾一度当过摄政王，代替年幼的儿子签署所有的国家文件。如果她死在法国，难道当时的历史学家会保持缄默、不置一词吗？甚至连她的坟墓何在都不给后人做任何交代说明吗？

我向法国的专家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难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是死在法国吗？”

“没有，”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

这样，虽然关于她晚年生活有两种说法，但有理由认为，安娜返回了基辅这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当然，如果今后发现一些令人信服的否定上述说法的史料，则另当别论。至于说连一点文字的记载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基辅木城被征服者烧毁过好几次，所以11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细节没能流传到我们20世纪的今天，这是不难理解的。对返回基辅这种说法有利的论据中还可指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中世纪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证明，比起近几个世纪

的历史学家来，他们生活的年代离安娜要近些。

给我们解说的导游说，安娜王后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我和法国交谈者谈了参观桑利斯之后的印象，我当时强调指出：

“你们看，俄国和法国的联系有多么悠久。俄国大公的女儿在法国的生活和活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们双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的祖先，不管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是理解两国人民联系的意义的。至于安娜对法国人的指责，那么，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这已经是“古老的传说”了。

彼得一世在巴黎

法国东道主问道：

“您是否想了解一下彼得一世访问巴黎之后给后代留下的那些东西？”

我说：

“如果能抽出时间，我争取去。”

从东道主的讲解中和参观了巴黎的许多名胜之后，我饶有趣味地了解到了与彼得一世访问法国首都有关的一些事实。

彼得想尽快结束北方战争^①，对其盟国丹麦和萨克森这两位“冷漠的朋友”的迟缓行动甚为不满，因而他果敢地

^① 1700—1721年俄国同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而进行的战争。——译者

设法去接近与瑞典结盟的法国。

利用法国当时所处的复杂处境（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失利；摄政王奥尔良大公菲力浦在国内的地位不稳），彼得于1717年春在荷兰时向巴黎提出了互相接近的建议。得到对方赞同的答复之后，他于同年4月底前往法国。

尽管到处是戒备的目光，彼得出色地溶化了巴黎沙龙的坚冰，引起了人们对自己和俄国的浓厚兴趣乃至好感。他会见了当时刚刚满7岁的国王路易十五，而后来彼得想把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他。

在俄国沙皇对巴黎进行近两个月的访问时，关于同法国和普鲁士签订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普鲁士使臣收到全权证书晚了而耽误了时间，这一条约直到1717年8月才在阿姆斯特丹签字。

条约的宗旨——“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当今几个常用词语。

在巴黎，彼得不愿住在为他准备的在罗浮宫内的官邸，而住在租来的一座私人宅院里。这也反映了这位俄罗斯沙皇的举止和作风。他对参加各种官方仪式、招待会和舞会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态度，但却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工匠们的作坊、工场，学者们的实验室。

沙皇参观了天文台、制图（地理地图）室并许诺促成俄法绘图人员之间建立合作。访问巴黎的科学院时，他同著名的学者们谈了很长时间。由于彼得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被选为该科学院的名誉院士，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彼得渴望了解新事物，求实进取，平易近人，这些特点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据史书说，他们惊讶了，他们传诵

着：

“这才象一位君主！”

外省的“巴士底狱”和贡比涅

有一次访问法国时，主人建议我们到诺曼底西南部旅行，参观一下圣米歇尔山天主教修道院这座法国中世纪的古建筑。

修道院坐落在一个不大的岩石岛上，有一条长1800米的堤坝与大陆相连。这座修道院是本笃会^①于12—15世纪修建的，四周是厚厚的城堡墙和棱堡，在中世纪是谁都无法攻占它的。

象其他许多著名的城堡、要塞、教堂一样，圣米歇尔山也被变成了某种外省的“巴士底狱”。在19世纪上半叶，它的建筑被变成监狱，而且，它的石室中曾关押过著名的革命暴动者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②。

风景如画的地理位置和饶有趣味的历史使圣米歇尔山成为这个国家西北部的一个名胜。法国的这块小地方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但说实话，除此之外，我在这里看到的那些巨大的石墙和阴森小岛，特别是我们听到的有关圣米歇尔山过去发生的那些严酷而真实的故事，使我们离开该地时感到颇为惆怅。其实，这座城堡在法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贡比涅城在法兰西国家的历史中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

① 天主教最早的修会，6世纪上半叶为意大利人本笃所创。——译者

② 空想共产主义者，1871年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译者

在它附近，在贡比涅森林中，协约国——法、英、美等国于1918年11月11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是法军统帅费·福煦和德国的全权代表马·埃茨贝格尔。签字仪式是在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的。

1940年6月22日，在贡比涅，而且也是在那节车厢里，签订了另一个停战协定。不过，这次法国和德国相互调换了角色。依据新的停战协定并在维希敌伪政权的协助下，法西斯德国整整4年在法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更准确些说是横行霸道。直到1944年法国解放时，贡比涅停战协定才自动失效。

在签订这一停战协定的前一天，希特勒也是在这节车厢接见了法国代表团。希特勒分子对整个仪式所做的安排及进行的大肆渲染都是为了故意侮辱法国和法国人民。后来，纳粹分子把这节车厢弄到了德国，并于1945年有意地销毁了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贡比涅谈判有关的这节车厢按原样在老地方重建起来了。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地方，并到了车厢里面。据导游说，周围的一切同当年签订两个协定时时的布局一模一样。特别是这节车厢，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会忘记它。

顺便提一下，曾经作为法国国王行宫（当然是许多行宫之一）的贡比涅还有一件出名的事。1430年，勃艮第男爵们俘虏了法国人民女英雄贞德。仅这一件事就使贡比涅具有一层特殊的、虽然是忧伤的浪漫色彩。法国人也没有忘记，拿破仑也曾在贡比涅城堡呆过。

与法国人形影不离的一个词

我到过法国的马赛、里昂、波尔多、第戎等城市。这些重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当你乘汽车旅行驶向这些城市时，离城几十公里以外就能感觉到它们的气息。

上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但这主要说的是历史形成的老城区。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城市的外貌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其他大城市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最近二三十年建成的街道和市区来看，这一点就特别明显。

但是在法国，无论你到什么地方，甚至是最偏僻的角落，你肯定会多次地，甚或是几百次地听到“巴黎”这个词。大概可以说，法国人与这个词是形影不离的。早上，这个词伴着他醒来，晚上，这个词伴着他入睡。

是的，法国人热爱自己的首都。巴黎是他们的历史、骄傲和光荣。当然，当他们对当局说些不客气的话的时候，他们也会对巴黎说些不中听的话。因为首都也是政权的化身。

只是到了晚上9点之后，法国人对巴黎的谈话才少起来，看来原因很简单，这时甚至在大城市里，百叶窗也关上了，或者严严实实地遮上了窗帘。巴黎也是这样。只有它的拉丁区还精神抖擞。但法国人认为，甚至星星也允许首都的这一角落通宵达旦地跳、玩、行乐，而以后呢，就听天由命吧。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这里的人大都是学生和“自由职业者”。

无论我哪一次去法国，正式访问也好，路过也好，我总

是感到很惊奇：法国人多么善于周到地安排生活的各个方面，能考虑到人们不上班时应当既会幽静地思考，又会尽情地娱乐。当然，这样做是“各随己便”，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教养和个人兴趣。

法国人就是法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这样。如果观察一下成千上万的人（不论是在群众集会上、体育场上，还是在大街上），或者观察一下两个正在交谈的人，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秉性好动，并具有某种独特的轻松气质。

在日常交往中，法国人一般是讲礼貌、很殷勤的。但如果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冒犯了他，或甚至伤害了法国人的自尊心，那么，他会进行反击，虽然在用词方面会是比较讲究的。

人们经常说，法国人是礼貌和谦恭的典范。我大体上同意这种说法。

我每次到巴黎，都争取哪怕是坐着汽车走马观花地逛一逛塞纳河畔上的旧书摊。而当我做不到这一点时，我就觉得好象没有看到某种有意思的、有趣的东西。其实，那里好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不过有些商贩，一旁摆的是饱经风霜的书，这里也出售旧的铜、木版画。

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喜爱书的人，特别是稀有版本收藏家，可以找到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塞纳河畔，它的书摊、书亭不仅吸引着法国人，而且也吸引着外国人。这里讲的语言应有尽有，使人觉得，似乎到了某个“语言国际”。当然法语还是占优势。

这里的人并不成群结队地拥挤在一起。人们通常是悠闲地沿着河畔散步，大多是单独一人或成双结对而行。如果不

算略有所闻的汽车噪音，那么，可以认为这里寂然无声。那些翻书看画或挑书选画的人说话时声音都不大，他们把嗓门压得很低。商贩们也是这样斯文宁静的。他们回答顾客的问题时不仅很内行，而且摆着一副老教授的模样，而其中有许多人也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

总之，摆旧书摊是一个蛮不错的主意。其实，谁也没有专门凭空去想什么主意。这种现象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大城市的人海中的某种自生的文化需求导致了在巴黎中心，在塞纳河畔出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旧书市场。

我还注意到塞纳河畔的一个美妙的景色。这里经常可以看到钓鱼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身穿帆布斗篷，脚登长筒靴，头戴渔帽。他把钓钩甩到河里就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等着鱼上钩。如果在市中心能钓到鱼，这当然是一件大事。

沿河街道比河面高五六米。连一滴水也不会落到这个钓鱼的人身上，当然如果不下雨的话。但他却身穿防水衣。

有些人也会跟这位入迷的钓鱼人开开玩笑，表示疑惑不解。

“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穿这身衣服？为什么您在几乎没有鱼的地方钓鱼？”

钓鱼的人对有人跟他开玩笑也很惊奇。

在某种意义上说，好象他们双方都对。

说真的，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能看着塞纳河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下？为什么就不能暂时避开一下城市的喧哗和嘈杂，甚或是摆脱一下那些令人困扰的念头？

当然，塞纳河畔与蒙马特勒和它的消遣截然不同，这些

消遣绝不会培育人们严肃认真的情操。但是在蒙马特勒那里，却为某些年轻人无节制地显露其灵魂的某些方面创造了条件，而这些年轻人要么不知怎样驾驭自己的感情，要么不想去驾驭这种感情。他们过夜生活的原则是：得玩且玩，其余的都无所谓。据行家们说，在这个地区的常客中可以看到不少挥金如土的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类似的消遣不仅需要大量的精力，还需要塞得鼓鼓的钱袋。

在同一个城市中，既可以看到蒙马特勒如何纵情行乐，也可以发现塞纳河畔是多么端庄持重。是矛盾的吗？是的。但这一矛盾也是法国首都生活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巴黎是招人喜爱的、美丽漂亮的城市。这个城市虽已两鬓斑白，但却永远年轻。

马克思的波恩和阿登纳的波恩

是的，在我们这些人心目中，阿登纳的波恩同卡尔·马克思的波恩之间隔着一堵厚墙。科学共产主义的天才奠基人曾在该城里领略了各种科学的成果。100年以后，也就在该城里，一个保守的市民取代了那个上等兵刽子手当上了政府首脑。

只是一个指挥了整个德国，而另一个不过在德国的西部——联邦共和国得到了高升。

西德原来不接受德国分为两个国家这一事实，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态度开始变得过时了。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我不止一次访问过联邦德国。在每次访问中，我和每个

苏联人都不由得痛苦地回想起希特勒德国给我国和我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当你坐在汽车上沿着联邦德国的公路行驶，放眼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片片精耕细作的农田，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庄稼。如果碰上收获季节，就能看到一派丰收景象。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工业。这个国家向来拥有巨大的出口能力。那么，这个国家还缺少什么呢？

希特勒虚伪地宣称：“缺少生存空间。”于是，德国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德国大军涌向东、西、南、北，去奴役别的国家和人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贪婪的德国帝国主义是罪恶的根源。它用侵占和掠夺别国领土的思想毒害了德国人民。以希特勒为首的罪恶奸党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全人类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对此视而不见，发表了一些极其虚伪的言论，想让苏联成为希特勒侵略的唯一牺牲品。

无论是在波恩同战后西德政界人士的会见中，还是他们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同我们见面时，我和其他苏联代表都想搞清楚，西德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已经完全意识到，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要把世界各国人民都置于他们的奴役之下这种狂妄行径是一种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然，就连西德最反动的人物也一直未能重新捡起那些曾经在“第三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自杀。今天，对联邦德国的

政策负有责任的人不应该忘记，目前欧洲现状的形成是各国人民反对德国纳粹主义、争取解放斗争的结果。为了和平，为了在德国土地上再也不出现战争的威胁，有2000万苏联人和反希特勒联盟其他国家的几百万人献出了生命。

苏联和西德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苏联人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发动的那场侵略。

因此，如何对待同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也绝非那么简单。况且，在西德掌权的正是豢养了驱使本民族去进行大屠杀的希特勒及其一伙的那个阶级。

但是，岁月在流逝。人们对波茨坦决议已经有所了解。这样就不能不产生一个联邦德国同苏联建立关系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确实出现了。领导联邦德国政府的阿登纳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可以说，时间本身迫使这个反动的、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极端迂腐的人不再用发狂的希特勒那种眼光来看待东方。主要是他明白了，苏联这个强大的战胜国没有它西德也完全可以存在下去，何况就在西德的旁边，在原来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出现了一个社会性质不同的新型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存在的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

于是，到了1955年。

在伏努科沃机场，从飞机上走出一个仪表堂堂、面容端正的人。尽管他竭力表现出亲切的样子，但表情还是显得有些忧虑。面临的任务是不简单的……阿登纳来莫斯科的目的是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他是经过痛苦的反复考虑后，才作出这一抉择的。

一个重大事件就这样在战后的欧洲发生了。苏联和西德

关系的正常化进一步巩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对欧洲的整体局势和苏联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苏西德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在克服两国间疏远的鸿沟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想起了一件阿登纳在苏联首都访问期间发生的事。在那个时候，常常从西德往苏联境内放出大量侦察气球。同阿登纳总理的会谈是在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的外交别墅内进行的。就在这座别墅院内，举办了一个有关上述活动的展览，并请阿登纳参观。在参观时，阿登纳耸了耸肩膀，说道：

“原来，西方大国利用联邦德国的领土搞这些名堂，而且又不同我商量。”

会谈进行得不容易，但事情还是办成了。理智占了上风，外交关系建立了。

我同阿登纳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9年，会见的场合有点儿不寻常。当时，他从白宫的正面楼梯往下走，而我和我的同行——英、法两国外长（我们从日内瓦会议直接来这里参加杜勒斯的葬礼）正好从这个楼梯上楼去拜会艾森豪威尔总统。阿登纳看见我后，停下来对我说：

“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我没有同这位总理进行争论。他确实失去了一位朋友。这一点完全可以相信。因为全世界都知道，阿登纳和杜勒斯在政治上是一对难兄难弟。

阿登纳对展望未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要吞并民主德国这个念头老在他脑子里转，使他坐卧不安。联邦总理头脑中的幻想还没有化为乌有。

1961年8月13日凌晨……

1961年8月13日，在战后欧洲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同为了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及其主权而采取的措施有关。

西方大国的政府不准备解决德国问题和围绕西柏林的局势问题。它们一开始就拒绝了苏联的倡议。更有甚者，这些国家的政府进一步加强军事准备，粗暴践踏关于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以及确保它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的重大国际协议。

华沙条约国政府向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政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提出一项建议，即在西柏林边界上建立起一种秩序，以便有效制止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破坏活动，在西柏林的全部领土周围，包括在同民主柏林的交界线上组织起可靠的守卫和有效的控制。据此，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作出决定，采取措施保卫民主德国，特别是它的首都柏林。从8月12日深夜至8月13日凌晨，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上加上了一把牢固的锁。

这一步骤对复仇主义野心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两年后复仇主义方针的精神之父阿登纳就下台了。继任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企图继续奉行拒绝承认民主德国这一已经破产的政策，但也未能在台上维持多久。

勃兰特写下了载入史册的一页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承认欧洲大陆的领土和政治

现实而斗争的坚定立场，为保障欧洲安全而作出的建设性努力，联邦德国政策中现实主义倾向的出现，为制订苏联和联邦德国的条约创造了条件。

双方都同意签订条约。为此开始了谈判。代表们都有足够的耐心。论据经过了反复推敲。联邦德国方面主持会谈的是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

谈判期间，为了将文件的基本准备工作进行完毕，我同谢尔会见了15次。同他谈之前，我在莫斯科同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联邦德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埃贡·巴尔也会见了15次。会见的次数相同，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虽然联邦德国的使者坚守其立场，我同两个谈判伙伴的工作效率仍相当高。但那时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坐在联邦德国的联邦总理的宝座上。而该党成员巴尔和自由民主党的代表谢尔同勃兰特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谈判伙伴的立场中占了主导地位。有过许多争论、曲折，出现过僵局，有过激动，但一条主线与会者并没有失掉，这就保证了达成协议。

在莫斯科，勃兰特其人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通过同勃兰特的多次会晤，我可以有根据地说，他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卓越的活动家之一。战时他曾流亡瑞典。他宁可远离自己的国家，也不在纳粹党党徽下低头。这一行动本身给他带来了荣誉。

描述勃兰特既容易又不容易。说容易是因为战后40年来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担任联邦总理时也是这样做的。而说不容易是因为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才。

在登上波恩的国家权力金字塔顶尖之前，勃兰特连续几

年任西柏林市长。在这个微妙而又不简单的职位上，他获得了不少对他以后很有用的经验。但同样重要的是，处于区分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分界上，他接触了西柏林当局和民德政府之间过去发生的、而且现在仍在继续发生的那些事情。

很自然，这位市长需要处理这类事务。有时不仅要同民德代表进行接触，还要同苏联大使馆发生接触。苏联外交官和我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发现，在就日常事务的交谈中，勃兰特经常寻找机会就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看得比较远，还就整个东西方关系问题发表了中肯的见解。

勃兰特当时就已经在探索那种唯一能够赖以建立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提法正是这一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苏西德关系的大厦。他是这样认为的，并相应地制定了这方面的实际政策。

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的大选中获胜后有一段时间，莫斯科仔细观察着，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哪一股浪潮将占上风，是有利于缓和关系呢，还是相反，有助于加固阿登纳及其继任者们所建立起来的脆弱桥梁。此外，有一点也清楚了，即苏联和联邦德国仅仅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够的。这两个国家应该发展关系，继续往前走，而不是止步不前，阿登纳和他的继任者艾哈德实际上所期望的正是止步不前。

条约的反对者为反对签订条约制造了不少障碍。这些人经常是更向往过去，而不是面向德国人民的未来。最后，由于勃兰特能从宽广的角度观察事物，而且也愿意使有关事务

更加符合现实的生活，他从西德那一方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以巧妙的手法使谈判顺利结束，然后使条约得以批准。虽然据说他熬过了不少不眠之夜。

可以明确地说，联邦总理勃兰特同意了为苏西德关系奠定一个条约基础，从而在政治中走出了战略性的一步。

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

苏联一贯主张同联邦德国缔结条约。这个条约会是什么样的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苏联。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苏联认为，在第一阶段，双方把建立和平关系作为主要目标是成功的基础。这必须明确地反映在条约中。

需要承担明确的义务，承认战后形成的边界，包括三大国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奥得—尼斯河边界，承认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需要商定苏联和联邦德国间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和其他领域的联系。

双方就各项主要问题，以及就这些主干方向所必然产生出来的那些问题最为详尽地交换了意见。不论是这次谈判以前还是在谈判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工作的苏联同志大概都从未象这次谈判这样，如此详细地研究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里我应特别强调指出著名的苏联外交家瓦·米·法林所给予的帮助。

不出所料，最困难的问题是边界问题。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国家这个问题马上就变成了关于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统一德国”（而更确切地说是由西德吞并民德）这个固执的提法一直是一块绊脚石。就这一

点，联邦德国代表的头脑中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设想。

我不止一次问过巴尔：

“难道您不明白，苏联不会同意任何可能打开一个缺口来损害民主德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合法利益的交易吗？对两个德意志国家可能统一的任何暗示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坚决加以拒绝，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沿着截然相反的社会道路发展的。”

经过持久而艰难的谈判，西德方面同意撤消自己的要求，只是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了一封单方面的函件，就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方作出了以下声明：

“向谁发信和发什么样的信，这是联邦德国政府的事。单方面的文件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义务。”

之后，就条约的每一个条款进行协商时，仍然要克服不少困难。必须争取西德代表同意包含双方明确义务的措辞。

特别要指出在拟定关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的条款时出现的困难和该条款的意义。这一条款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的谈判伙伴千方百计地回避把这个问题弄得很明确，企图把事情办成这样，即最终确定边界似乎是将来的事情。这当然被苏联方面坚决拒绝了。结果，在历史正义的逻辑面前，他们没能够坚持下去，于是我们就商定了措辞。

结果，莫斯科条约在上述根本问题上规定得非常明确。条约第三条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致承认，只有任何人都不侵犯现有的国界，才能保持住欧洲的和平。

“它们承担义务严格遵守欧洲各国现在边界内的领土完

整；

“它们声明，不论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将来也不提出这种要求；

“它们认为，本条约签字之日欧洲各国间的现有边界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包括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奥得—尼斯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以上所引的每一项规定都写得很明确，很有分量。

今天再回顾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拟定条约各条款的主要工作实际上是在我们同巴尔会谈时进行的。正是在这些会谈中最初形成了“意向性协议”，该协议确定了稳定领土、政治现实和使欧洲局势健康化各种步骤的内容。

于是，剩下的工作只是以应有的条约形式把这一切肯定下来。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谈判的第二阶段到来了，这次已经轮到同谢尔部长进行会谈了。

回顾过去，应当说，只有双方决心把事情进行到底和双方理解各自担负的责任，才能保证顺利地结束拟定条约的工作。假使没有这种决心和对责任的理解，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件事，而前景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这次谈判的内容本身形成了许多文件和记录，这些都是双方的财富。历史学家们肯定会反复地阅读这些文件以探索真理，弄清双方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

莫斯科条约于1970年8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签字。代表苏联方面在条约上签字的是阿·尼·柯西金和安·安·葛罗米柯，代表西德方面签字的是维利·勃兰特

和沃尔特·谢尔。

如果要谈一下西德方面，那么，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办事坚定不移的联邦总理勃兰特本人在制定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这当然是他任联邦总理期间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政治行动。

条约的签字和随后的批准都受到了欧洲和全世界的热烈欢迎。欧洲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我写这几行字时，心情有些激动，并完全意识到，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改善该大陆局势的任何步骤都是对和平大厦的贡献，苏联准备同其他国家一道不遗余力地建设这座和平大厦。

总的来说，莫斯科条约是欧洲各国和平关系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事业，使世界政治气候健康化的事业向前发展。条约的灵魂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形成的欧洲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

这就是莫斯科条约的基本历史含义，这也是以后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别同联邦德国签订的条约以及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的含义。

1971年9月3日，在西柏林，在前盟国管制委员会大楼里（波茨坦大街196号），苏联驻民德大使、美国、英国、法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在文件上签字，这一文件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四方协定。这样就结束了由33次会议组成的、令人疲惫不堪的外交马拉松。在这次马拉松中，经过巨大的努力，商定了重大的条款。

最初，连谈判的题目都是个问题。西方大国坚持要讨论

“整个柏林”问题，这不符合业已存在的实际情况。而苏联坚持要采用“西柏林”这个措辞。最后就“柏林西区”这个定义达成了协议。

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名称争论了很久，而没有这个正式名称，协定条文就没法办。一遇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字母，西方国家的谈判伙伴就哑口无言了。过了半年之后，他们才学会说出这3个简写字母。

签订的协定标志着这个城市在其历史中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它结束了围绕西柏林问题长达20多年的危机。协定准确地以国际法为依据确定了西柏林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文件指出，西区“仍然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今后也不由它管理。”这样，四方协定有助于这一非常危险地区局势的正常化。仅仅在战后的历史中，西方围绕这一城市所加剧的紧张局势就有两次（1948年和1961年）达到了危机点。

四方协定是保障欧洲持久和平的重要步骤。1971年9月3日以后，民德政府与西柏林议会签订了20多个各种各样的协议，仅仅这点回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四方协定签订15年来，苏联和西柏林的贸易额增长了14倍多，1985年超过4亿卢布。

西方某些人想撕毁关于西柏林的四方协议并使西柏林成为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但是这就会意味着围绕这个城市再次造成一种爆炸性局势。在欧洲这一地区缓和紧张局势和保障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严格遵守四方协定的各项条款。

我想特别指出，经验丰富的、富有才干的苏联外交家彼·阿·阿布拉西莫夫为谈判和制定与关于西柏林的各项协

议有关的文件作出了重大贡献。

莫斯科条约签订后不久，再次举行了同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插曲。沃尔特·谢尔抓住一点空闲时间告诉我：

“葛罗米柯先生，您知道吗，我们家添丁加口了。生了个女儿。我给她取的名字叫安德烈娅。德国有这样的名字。但是，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我和妻子商量好了。”

我承认，我当时感到有点儿不大自在。但我马上决定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处境：

“你们夫妇当然完全有责任作出这种决定。这百分之百是你们的主权。但总的来说，听到这番话，我感到很愉快。”

最好不要忘记教训

签约后的年代表明，只要双方愿意，苏联和联邦德国是可以进行合作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同瓦尔特·谢尔和卡尔·卡斯滕斯总统、同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以及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外长举行过会晤。这些会晤通常都是内容丰富的，双方在许多方面可以达成相互谅解。但这仅仅是通常的情况，例外情况也有不少。

当然，不能把苏联和联邦德国间的关系想象得多么完美无瑕。两国的社会制度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各有各的盟友和朋友，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可以而且需要寻找共同的语言。

现在，苏联和西德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在联邦德国现在仍存在着一些势力，他们至今还没有屏弃重新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的各国国界的打算，对此苏联不能置之不理。

我们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时这样说过，后来我们也是这样说，今天我们仍然要这样说。对那些梦想复仇的人来说，我们的提醒并不是多余的：日耳曼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已被烧成灰烬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绝不会再次复活了。

苏联很有才华的著名外交家弗·谢·谢苗诺夫对那一时期联邦德国政府政策的每一步骤、每一复杂曲折的变化都作出过评价。他极其正确地指出：

“时间将会表明，那些在联邦德国决定大政方针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边界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联邦德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抛弃复仇主义情绪，这种复仇主义情绪在波恩许多政治家头脑中远未肃清。”

无论何时何地，苏联代表在阐述苏联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政策时，始终尽力强调指出，苏联对联邦德国、北约的任何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恶意。我们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同苏联人民一样，也不希望发生核浩劫，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和平。

施密特给我留下的印象

一度曾任联邦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联邦德国的一位著名活动家，他在该国的政治中曾有建树，如果从更宽广

的角度来看，那么他甚至对70年代的国际局势也产生过影响。施密特是在战后成为一名政治家的。30多年的政治生涯，他的沉浮荣辱都同社会民主党密切相关。

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讲道：

“战争年代，我是一名德军军官。有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位于加里宁州东南部的扎维多沃。扎维多沃那一流的猎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施密特并没有细讲，他是否去打过硬猪。但毫无疑问，他目睹了种种掠夺和暴力行为，目睹了希特勒刽子手们在我国城乡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的确，施密特在谈到他在扎维多沃的情况时说过：

“那时有些军官感到，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的冒险行为注定要失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我们愿意相信施密特这番话，法西斯部队的军官中有过这样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数人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长官的命令，从不考虑这些命令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不幸和痛苦。

施密特还在勃兰特内阁任国防部长和后来他自己成为联邦总理时，我都同他谈过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这位有才干、意志坚强的人没有彻底摆脱那种渗透了他过去的一生和作为法西斯德国军队军官的人生哲学的精神。

本来，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根据过去的经验应该清楚，联邦德国的未来同其他国家的未来一样，只有在和平条件下，在与所有其他国家首先是与苏联和民主德国和平相处的条件下才会有保障。这一点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中都有所反映。

施密特主张联邦德国应签订并执行“东方条约”。他表示赞成北约和华约之间应保持的军事战略均衡，并承认这种均衡的存在。

但是，在我同施密特总理的谈话中，他总是想办法为北约大幅度扩充军备进行辩护。我方向他介绍了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军备情况和武装力量对比的材料，他却似乎视而不见。

有一次在我访问波恩期间，我把一张标有两大国家集团在欧洲部署核武器情况的地图给他看。我等待着这位联邦总理作出评论。施密特没有发表评论，而是一上来就淡淡地说：

“如果可以的话，请把地图留给我，我再仔细看看。”

我们给了他详细研究地图的机会，但后来他仍然重复起原来的论调说：

“我不喜欢苏联的SS—20导弹。”

这里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美国用来瞄准苏联的核武器他喜欢，而苏联的武器他就不喜欢了。

联邦德国开门接纳美国新式核导弹——这是施密特直至1982年秋领导的西德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它对此应承担责任的。连阿登纳在1957年也没敢迈出这样的一步，当时美国人也曾向他建议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美国的“胸”式和“丘辟特”式中程导弹。

联邦德国的安全并未因部署了美国“潘兴—2”式导弹而得到加强。西德的许多政论家也明白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野时采取了比施密特更为现实的立场，它实际上同自己的领导人决裂了。

施密特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一般说来，这话

并没有错。但是，实用主义也有各式各样的。

施密特竭力显示其当机立断的能力，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小心翼翼地塑造的正是这样的形象。他同党内的拥护者、政府成员交往时的举止，同西方国家伙伴的关系似乎都显示了这种才能。但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光靠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施密特这位政治活动家，不妨把他的理论著述同他任总理时的实际活动对比一下。他在理论著作中所提出的东西同他作为联邦德国总理所坚持的东西相距甚远。

看来，施密特想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欲望决定了他为其理论研究所选择的题目。在他的著作中有谈军事战略问题的，也有介绍经济和财政政策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在联邦德国部署美国中程导弹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施密特在一些谈论军事战略问题的书中写道：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任何时候也不会把导弹部署在联邦德国的领土上，因为这是吸引另一方进行核打击的磁铁。这些导弹可部署在阿拉斯加、拉布拉多半岛、格陵兰等地，而绝不能部署在人口稠密的欧洲。

但这是书里写的，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1977年11月，施密特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在伦敦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他朝着在联邦德国部署新式美国导弹迈出的第一步。

后来，施密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已是他被迫下台之后的事了。是失误吗？是的。但是，人民的记忆要比某一个人的记忆强得多。

施密特还做了许多别的预测，但这些预测也同样落空了。正是他教导福特和卡特应该怎样更好地领导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建议他们稳定美元。显然，他没有想到，美国将会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一点，而这又会给联邦德国本身和整个西欧带来什么后果。当时，在华盛顿，人们嘲笑施密特，讥讽地称他为“施密特—拿破仑”。但里根上台后，贴现率提高了，美国因此从西欧获取了几十亿美元用于军事拨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僚们谈到施密特时是这样说的：“从本质上来讲，他不仅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是一个持保守观点的普鲁士军官。”

应该说句公道话，施密特还是为发展苏联和西德的经济关系做了些事情。施密特知道，应该如何按他自己的看法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是，他对自己做出的某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估计不足。这就是他同他的前任联邦总理勃兰特的主要区别所在。

虽然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双方在长远利益方面有着广泛的一致性。那些不愿看到这个基本点的联邦德国人士是要受到生活嘲弄的。这种一致性是由一些长远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相近、经济潜力能很好地互为补充、文化方面需要相互交流，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人民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都希望和平相处。

历史性的莫斯科条约签订的日期离我们越远，就越能清楚地看出，当时需要多大的气度和远见才能共同作出这样的决定。苏联现在仍然主张，不仅应该维护已取得的成果，而且应该扩大它。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